

جوڭگوتىڭ چىگارا سىياسىتى

中國邊政

چۇڭ-خەن-مەن-سەن-سەن

China Border Area Studies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一〇七年十二月

216

朝鮮族簡介

中國東北隔鴨綠江與朝鮮半島相鄰，且自古以來半島上的政權一直與中國歷代王朝保持密切關係，雙方長期聯姻，有許多朝鮮半島人民遷居中國，乃是極自然之事，久之乃歸化為中國人，但其為朝鮮族並不因其歸化中國而有所改變。朝鮮之遷來中國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紀末，此後以朝鮮半島政治不穩定，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半島北部遭遇大飢荒，更是大批北遷中國，由於地緣關係，北徙中國的朝鮮族大多分布於中國吉林、遼寧、黑龍江三省，其中又以吉林省居多，朝鮮族最大的聚居區，中共建政後，將之設為延邊朝鮮族自治州，下轄延吉市、圖們市、敦化市、琿春市、龍井市、和龍市、汪清縣、安圖縣（台北市街道有以延吉、敦化為名者）。

中國境內朝鮮族，據 1982 年資料有 176 萬 3 千 6 百多人，但依 2010 年大陸第六次人口普查時，朝鮮族人口為 183 萬零 9 百多人。可是第五次人口普查時，有 192 萬 3 千 8 百 40 餘人，不論五普或六普，朝鮮族人口較 1982 年之人口，僅增加六萬或十六萬多人，與全大陸人口增加比率不符，其中原因頗值探究。

朝鮮族應與古肅慎族有某種血緣上之關聯，其原始宗教信仰為泛靈的圖騰崇拜、祖先崇拜，十八世紀末葉，基督教、天主教相繼傳入，但信仰者並不多。

朝鮮族有其自身的語言文字，朝鮮族是否屬阿爾泰語系，目前尚未能確定，至於朝鮮文是由四十個拼音字母構成的方塊形文字，以前朝鮮文中夾用漢字，現在排除漢字都用朝鮮文，朝鮮文的筆順是先左後右，從上到下，既可豎行，也可橫排，豎寫時從右到左，雖說是橫豎均可，但現今橫排居多。

朝鮮族家庭行一夫一妻制，早期朝鮮婚姻多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近代則以自由戀愛為主，也有招贅婚、童養媳，富有者也有娶妾者。一般而言早期朝鮮族的婚俗在十六、七世紀以前是「男歸女家」，就是說新郎到新娘家舉行婚禮後，就在新娘家住一段時間，再選定吉日帶妻回家，之後逐漸演變成「女歸男家」，也就是與漢人一樣的嫁娶婚。

朝鮮族的服飾而言，以素色為主，白色服飾顯示清潔、樸素的特色。婦女以短衣長裙，色彩鮮豔有粉紅色、天藍色、淺綠色等。男子服飾有短襖、褲子、長袍，特點是上衣短，褲肥，褲下端用布帶繫結，有的男子外出時再穿上斜襟布帶鈕釦的長袍。老年人喜穿白色衣服。當然，時至今日在衣著上已經全盤西裝化了，民族服裝只有在節日及喜事時才穿著。

在飲食方面，朝鮮族以大米、小米為主食，一日吃三餐，有時在大米中也摻些豆類，副食則有醬湯、鹹菜、海鮮、辣椒醬、海帶、肉類及各種蔬菜，尤其泡菜。

在喪禮方面，早年朝鮮族家中如有老人去世，其直系親屬三天內不准洗臉、理髮，不能吃乾飯，且必須穿喪服，親戚朋友都會到喪家弔唁，先在屍體前行二叩首，而後與死者家屬相互一叩首，其葬俗以土葬為主。

朝鮮族民間有五大節日，分別是元日（即春節）、上元（元宵）、寒食（清明）、端午、秋節。這五大節日與漢人幾乎完全一樣。

目 錄

中國邊政協會十月學術交流之旅.....	林遙鵬	1
2017～2018 年上半年媒體有關達賴及西藏報導分析.....	孟 鴻	25
身體、語言、族群特質：愛新覺羅·瀛生的滿洲認同研究.....	甘德星	25
清初建州女真外郎群像	張華克	57
伊犁厄魯特營上三旗卡倫的建置與形制	納森巴雅爾	95
少數民族美食簡介	華 華	99
稿 約		103

中國邊政協會十月學術交流之旅

林遙鵬
中國邊政協會副秘書長

2018 年 10 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在昆明舉辦中國社會科學論壇，會議主辦方：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與雲南社會科學院；承辦方：中國(昆明)南亞、東南亞研究院。2018 年 8 月在內蒙呼倫貝爾海拉爾參會時，邢廣程所長即力邀劉秘書長能於會前先至邊研究所辦一場講座。劉秘書長皆同林遙鵬副秘書長於 10 月 22 日早班機飛北京，晚間七點劉秘書長在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院進行講座，此次是開放聆聽方式，所以也有許多非民族學科系的學生參加，講座結束後許多學生有較尖銳的兩岸問題，劉老師也一一解答毫不避諱；23 日至中國邊疆研究所舉辦新疆報導為素材之講座，展開為期五天的學術交流之旅。

第一場 民族大學講座

題目：從各族共構國史到史上分合與今後走向

會議主持人：民族學系主任祁進玉教授

人數：約 60 人

壹、國史係由多民族共構而成

- 一、中國民族之多元性
- 二、本講之時空架構
- 三、自秦至清漢人所創建之政權或王朝
- 四、自秦至清胡族所創建之政權或王朝
- 五、多元走向一體

貳、國史上之分合

- 一、立論基礎

- 1、時間之縱軸
 - 2、空間之橫軸
 - 3、分合之基數
- 二、分裂時代
- 1、三國
 - 2、諸胡列國南北朝
 - 3、五代十國
 - 4、兩宋遼金
 - 5、明與蒙古
- 三、往史分裂而不分離
- 四、往史由分到合
- 五、今後走向

第二場 中國邊疆研究所講座

會議主持人：孫宏年研究員

人數：約 20 人

題目：近一年多來新疆情勢分析-以臺灣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8 月各媒體所載有關新疆報導為素材

作者：中國邊政協會秘書長 劉學鈞

壹、前言

臺灣偏處中國大陸東南海隅，而新疆位處中國大陸極西部，兩者相距數千公里，而臺灣自三度政黨輪替後，極力奉行「去中國化」作為，臺灣社會普遍缺乏歷史觀，因此各平面媒體對中國大陸各項發展，均未作深入報導，對於新疆，內外蒙、西藏等邊疆地區之報導，更是少之又少，欲從各平面媒體對新疆之報導瞭解新疆情勢，有其難度，此處僅能根據一百多則媒體報導，輔以對新疆史地背景之認識，略對新疆情勢加以分析，必然不夠深入，尚祈指正。

貳、幾項基本認知

一、人與土地的關係

古往今來從未有一個人或一個民族來到這世界時帶來寸之尺地，連一粒泥沙也未曾帶來，因此說其地屬於某人或某個民族，全屬無稽之論，人只是土地的過客，土地從不屬於人。

二、中國是多民族構成的國家

華夏民族本身就是華與夏兩個揉合而成，由於時間的演進至秦統一天下時，已經有數不清的民族融合秦人之中，至漢代時所謂「漢人」或「漢族」，已包括：華夏、東夷、百越及荊吳四大系民族，之後四周各民族不斷融入漢人之中，當然也有漢人融入四周各民族中(如李陵、李廣利所部融入匈奴之中)，越往後代，漢人之內涵越多元，這是不爭之史實，因此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由多民族所構成。

三、各民族共構國史

試看自秦始皇統一天下之西元前 221 年，至清宣統宣布退位之 1911 年，頭尾 2133 年中，建元立號命王稱帝者，幾乎胡漢各半(「胡」指非漢人之各民族，由於「胡」字係中性名詞，不帶犬、牛、豸等偏旁，沒有歧視之意)，若論胡族所建政權或王朝，其累積統治年代，更較漢人所建政權或王朝累積統治年代為長，此也不爭之史實，若再進一步分析，試看自秦至清頭尾 2133 年中，曾經建元立號之政權或王朝有五、六十個之多，但其國祚能超過兩百年者，僅有：西漢、唐、遼、明、清五個王朝，其中西漢、明兩朝之創建者為漢人，固無爭議，而遼、清之創建者為胡族，也無爭議；至於創建唐朝之李淵一族，究竟為胡族或漢人，向有爭議，但其女系母統為胡族則為不爭之實(陳寅恪語)，此絕非歷史之偶然，而是各族共構國史之必然。

四、胡族從未自外於中國，且以中國自居胡族建立漢魏式政權，始於匈奴族劉淵，其定國號為「漢」，自認係延續兩漢，蜀漢之國祚，其後氐族所建秦政權(史稱前秦)君王苻堅，更宣稱：「吾承統大業垂二十載，芟夷逋穢，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賓王化，吾每思天下不一，未嘗不臨食輟舖。」(見《晉書·苻堅載記下》)苻堅完全以中國正統王朝自居。再看契丹族所建之遼朝，至遼道宗耶律洪基時，據洪皓《松漢紀聞》所載；

「大遼道宗朝，有漢人講《論語》，至『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帝曰：『吾聞此北極之下為中國，此豈其耶？』至夷狄之有君，疾讀不敢講，(帝)則又曰：『上世獯鬻獫狁，蕩無禮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卒令講之。」(另葉隆禮《契丹國志》也有此段記載，僅「吾聞北極之下為中國，此豈其耶？」記為「吾聞北極之下為中樞，此豈其地耶？《契丹國志》係台北廣文書局，1968 年版，又北京中華書局 2014 年版，「中樞」已改為「中國」)可見遼帝也不自外於中國。及至蒙古族建立元朝，對漢人普遍尊奉之孔子也禮敬有加，更於歷代累封孔子為「至聖文宣王」之上加「大成」二字，以其「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何曾自外於中國？(見葉子奇《菓木子》)

五、唐時與回紇族有密切的關係，唐朝與回紇汗國曾有多次和親關係，而且唐與回紇之和親，不是只有唐將公主嫁回紇可汗的單方面和親，也有回紇公主嫁唐宗室，如唐肅宗李亨(756~762 年在位)以回紇懷仁可汗之女為毗伽公主，嫁唐敦煌王李承寀，此種雙向和親，為前此所罕見，益增唐與回紇之親密關係，而回紇汗國也出兵助唐平定「安史之亂」，收復兩京，使唐朝重歸於統一，而且回紇從內地帶回摩尼教大師，從此回紇崇信摩尼教，直至其西遷後，始逐漸伊斯蘭教化，縱然回紇西遷西域(含今中亞)後，內地也進入五代十國混亂時代，西遷回紇仍與中原王朝有綿密之往來，此乃史實，不宜否認。

從以上所舉五項基本認知中，可知中國大地為各民族共同生活空間，不存在某地屬於某個民族所專有的問題，而且中國自遠古以來就是由許多民族共同構成的命運共同體，各民族共同建構一部中國史，且證明任何民族只要有出類拔萃之人才，均可成為中國之領袖。

參、新疆問題之由來

自中國清朝乾隆於其二十四年(1759 年)平定天山南北準回兩部後，將之納入中國版圖，定名曰新疆，至今已二百五十多年，其為中國領土毫無疑問，只是新疆成為中國領土後，俄羅斯也掙脫蒙古金帳汗國之統治，逐漸壯大，並開始向外擴張之外更大事向中亞侵城奪地，使中亞地區若干操

突厥語各民族野心份子受擠壓後，遂侵入中國新疆地區，主要在南疆地區，以南疆為操突厥語之維吾爾族為主，與中亞各民族在語言、宗教信仰、生活習俗上均無太大出入，極少數維吾爾族野心份子受其蠱惑，而造成南疆動亂，當然朝廷中之邊臣疆吏能力不足，操守不佳也是造成動亂原因。之後西方帝國主義將矛頭指向中亞，新疆遂成為英國進入中亞之基地，英國遂開始「經營」新疆。其後又有所謂「泛突厥」與「泛伊斯蘭」之「雙泛主義」興起，從此新疆多事。

國民政府時期，先有英帝國豢養下之新疆野心份子沙比提大毛拉在南疆喀什吹起「東突厥斯坦建國」號角，宣布成立「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時為 1933 年十一月十二日，由於此一叛亂活動幕後係由英國主導，因此蘇聯協助盛世才即將其收平，此一叛亂偽組織只存活了三個月又一天(1933.11.12~1934.2.13)，從此盛世才全面倒向蘇聯，及至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蘇聯被德軍攻擊節節落敗，而國民政府抗戰已現勝利曙光，盛世才一改親蘇政策，回歸中華民國，進而逮捕許多親蘇親共之各民族領袖人物如阿合買提江、阿巴索夫、伊斯哈別克等人，招致新疆各民族之反對，一場新暴風雨即將降臨，此際國民政府發表盛世才為農林部長，盛世才離新，中央暫以朱紹良主新，隨即命吳忠信為新疆省政府主席，吳氏入新時，(1944 年十月)，新疆伊犁、阿勒泰、阿山等已發生動亂，之後成立所謂「東土爾其斯坦民族共和國軍政委員會」，稍後又改組為「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此一「共和國」完全由蘇聯所一手操導成立，其後，由於中華民國與蘇聯簽定《中蘇友好同盟條約》承認外蒙古獨立，蘇聯如願以償得到外蒙古，因此對「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事件鬆手。

其後由張治中為新疆省主席，張氏向新疆少数民族採妥協政策組成聯合政府，「三區革命」問題基本解決。之後新疆在張治中運作下「和平解放」，在新疆地區已不可能再公開出現所謂「東突建國」聲浪。但艾沙、伊敏逃亡土耳其後不甘寂寞又在西方帝國主義煽動、蠱惑下，在國外搞東突建國活動，由境外滲入新疆製造了不少動亂事件。

肆、近一年多來台灣媒體所刊新疆消息

台灣與新疆距離遙遠兼以自李登輝以來推行「去中國化」措施，意圖

切斷台灣與中國大陸臍帶般關係，因此對中國大陸消息刊登不多，對新疆、內外蒙古、西藏等邊疆地區消息尤少刊登，綜計自 2017 年一月至 2018 年八月卅一日之一年八個月間，台灣主要平面媒體共刊登有關消息一百十四則，一年八個月共計五百零八天，平均每五天有一則，而其中尚有雷同者，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面積廣達一百六十六萬平方公里，比台灣四十七倍還大，人口約二千零四十萬(以上面積人口數字採自 2011 年北京星球地圖出版所出版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地圖冊》)，一年八個月僅出現 114 則消息(其間尚若干雷同者)，可見台灣對新疆之漠視與陌生。

台灣地區自台北至高雄，平面媒體有三、四十家之多，不過擁有較多讀者之媒體有七家，為《聯合報》、《聯合晚報》、《中國時報》、《旺報》、《蘋果日報》、《自由時報》、《大紀元報》；《聯合報》及《聯合晚報》係王惕吾家族所經營(王惕吾曾為中國國民黨中常委)，現由王惕吾之孫主政。《中國時報》初由余紀中所創辦，余氏也曾為國民黨中常委，余氏辭世後，由其子經營未久，讓渡于在大陸經營旺旺集團之蔡衍明，蔡氏接手《中國時報》後，另行創辦《旺報》；《蘋果日報》係港商黎智英所創辦；《自由時報》原係林榮三所創辦，林氏本為國民黨員，曾被國民黨提拔為監察院副院長，但其志在院長，因所求不遂，立場丕然大變；《大紀元報》係曹姓人氏所創辦，周日不出報，應屬小報，但以其立場特殊，遂也擁有一定讀者。

至於上述七家報紙之立場，《聯合報》、《聯合晚報》(另有《經濟日報》係純經濟性媒體，不涉立場問題)因其創辦人王惕吾之政治背景，忠於中華民國認同中國終將統一，至於由誰統一，則是另外問題，早年在兩蔣時代，《聯合報》就本諸媒體是第四權之立場，對時政常加評論，忠於媒體應有立場，因此《聯合報》係可說是立場相當客觀、公正，數十年來其立場可以說一以貫之。《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曾為國民黨中常委，因為其立場忠於中華民國乃是無可置疑，雖則如此，余氏也忠於媒體人維護媒體言論自由立場，早年曾為維護「黨外」人士言論自由(所謂「黨外」人士即後日之民進黨)幾遭停刊，可見該報忠於媒體應有之立場，該報易手後，蔡氏係在大陸發跡之台商，接手《中國時報》後，乃能一本余氏家族既有辦報立場，另行創辦《旺報》主要刊登大陸各地消息，

多持正面角度報導，但仍不失報人應有之立場。至於《蘋果日報》係港商黎智英所創辦，純以商業為考量，初以「色羶腥」為號召，以聳動畫面吸引讀者，談不上立場，但近二、三年來，黎氏在港事業似受大陸影響，因此對大陸有了不友善立場，間或刊載一兩篇小方塊評論大陸對新疆、西藏或海外流亡藏人消息，執筆著者為民進黨名筆，其人雖筆鋒犀利，可惜對大陸邊疆少數民族所知有限，因此所論皆非，且對大陸先有立場，再作評論，《蘋果日報》已失客觀性。至於《自由時報》自其創辦人背離國民黨後，已然失去報格，而變成「逢中必反」立場，形同台獨的「機關報」，因貪汙而判刑入獄(現已「因病」保外就醫)的陳水扁曾經在電視上聲嘶力竭的說：「台獨做不到，就是做不到」，然而《自由時報》仍然堅持其台獨立場，多年前該報曾於頭版條刊載：陳水扁所謂的「南線專案」表示確有其事，也確有經手「南線專案」，金錢之人，然而經法院審判後，確定並無所謂「南線專案」，而被指稱經手之台商，也正式否認涉入該事件，按媒體屬於服務業，而《自由時報》竟然成為（新聞）製造業。《大紀元報》似與法輪功有關，對取締法輪功者，恨之入骨，大陸取締法輪功因此反中共遂成為該報基本主場，而且經常扭曲事實，刻意醜化大陸之一切作為。

了解台灣平面媒體之背景與立場後，再分析台灣媒體所刊有關新疆消息始有意義，茲將年 2017 年至 2018 年 8 月 31 日共二十個月，以上七家媒體所刊登有關新疆消息則數已表列方式呈現如下：

媒體名稱	聯合報	聯合晚報	中國時報	旺報	蘋果日報	自由時報	大紀元報
刊登則數	18	1	2	33	9	35	16

在下列一年八個月中，以上七家平面媒體共刊登 114 則有關新疆消息茲再進一步將新聞內容分為新疆自然景觀，重大發現（如油田）或建設，一般消息，具批判性報導等四類，也以表列方式分析如下：

媒體名稱 出現則數 新聞內容	聯合報	聯合晚報	中國時報	旺報	蘋果日報	自由時報	大紀元報
自然景觀	5			8		1	
重大發現與建設	2			11		1	
一般消息	12		1	14	5	2	3
具批判性報導	1				5	29	14

從上表分析可輕易看出對中國大陸最不友善的媒體為《自由時報》與《大紀元報》對大陸最友善的媒體則為《旺報》。茲再從上敘 114 則消息中(有雷同者)對新疆情勢斟酌予分析。

一、關於有重大發現或建設者。

2017 年七月十四日《聯合報》A8 版以《寶蘭高鐵通車，新疆上海一日到》為題，報導陝西寶雞到甘肅省蘭州的寶蘭高鐵已於 2017 年七月九日正式通車營運，如是從新疆到上海一日可達，將大陸西北地區融入高鐵網，這是劃時代的進步建設，縮短了新疆與內地的距離，有其歷史意義。又如 2017 年九月十二日《旺報》A10 版，以「奇靈綠寶把新疆荒漠變甘田，林忠正博士率台灣農業團隊在鹽地上種出小米田」為題報導由台灣知名生技專家林忠正博士率領的台灣農業團隊，在新疆進行土地改良，在荒漠中種出小米，這是震古爍今的奇跡，類似的新聞共十四則。

二、關於自然景觀者

如 2017 年八月十六日《旺報》以《熱情吐魯番，大賺高溫財》為題，報導吐魯番地區向炎熱著稱，以往夏季地面高溫可達攝氏 75 度，人們避之唯恐不及，而今竟憑此項酷熱的特色，發展出「熱極旅遊」，此乃極有創意作法。又如 2018 年八月四日《旺報》C3 版以《羅布泊九大未解之謎，個個離奇》為題，報導從 1949 年至 1997 年間，在新疆羅布泊地區發生九個離奇事件，件件都令人百思不解，按羅布泊附近為古樓蘭之地，為西域南道進入中原必經之地，兩漢時仍稱富庶，其後改稱鄯善，北魏太武帝拓跋燾(424~452 年在位)太延元年(435 年)三、五年鄯善還曾遣使到北

魏京師平城(今山西大同)向北魏貢獻，不過此時之鄯善已遷到若羌，原樓蘭古城在一百年前忽然消失，其消失原因至今仍是不解之謎，在羅布泊發生之離奇事件，更可說是謎中之謎，在過去一年八個月中，有關新疆自然景觀之新聞共有十四則。

三、關於新疆一般消息

所謂一般消息，即指新疆在上敘一年八個月內發生之一般事件，就事件本身加以報導，不帶評論性，此類消息在上敘時間內共刊登三十七則，如 2017 年六月九日，《旺報》以《聯哈制疆，陸減緩能源與國安壓力》為題，報導大陸國家元首習近平赴哈薩克參與「上海合作組織」峰會，習近平此行具有鞏固並強化「一帶一路」之「絲綢之路經濟帶」的作用，也就是大陸大西部與中亞各國的聯通，具有政治、經濟和安全等多方面戰略意義，按哈薩克疆域廣闊，但人口不及兩千萬，緊鄰中國大陸新疆，對大陸而言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按所謂「三區革命」時，維、哈各族所組成之「民族軍」在中共建政後，將之編為第五軍，以朱龍泰伊波夫為軍長，並以之兼任新疆軍區副參謀長，據傳當時此一第五軍人數已由原先之一萬人，擴編制十餘萬人，其後中、蘇共發生矛盾，蘇聯誘煽新疆維哈各族遷入蘇聯聯境內(時哈薩克仍為蘇聯加盟共和國)，此一第五軍乃攜家帶眷西遷哈薩克，蘇聯將之集中於阿拉木圖一帶，至今已五十餘年，其人數當有四、五十萬之多，不過如今均已歸化為哈薩克國民，但對新疆、維、哈仍具相當影響，尤其在反恐方面具有特殊意義，習近平之赴哈國出席上合組織高峰會，當然具有多方面意義。又如 2018 年八月十四日《聯合報》以《環時嗆：美指責「涉秘密囚禁百萬人」新疆穩定就是最大人權》為題之報導，大意为：大陸《環球時報》反駁美國對大陸囚禁百萬維族，違反人權之指責，《環球時報》於 2018 年八月十三日在其社論中發表社評反擊，指出此乃美國及西方國家有意抹黑與汙衊並稱：「捍衛新疆和平穩定，就是最大的人權。」確屬的論，按美國所謂「人權」有多重標準，儼然以世界霸主自居，對各國指指點點，而對自己國內白人警察濫殺黑人，則默不作聲，何人權之有？只因美國兵強國富，舉世對之莫可奈何而已，《環球時報》對之嗆聲，並無不妥。

四、具批判性之新聞

過去二十個月台灣媒體刊登大陸對新疆措施具有批判性之新聞，共有四十九則，刊登最多者為《自由時報》二十九則，其次為《大紀元報》十四則，《蘋果日報》五則、《聯合報》一則，如 2017 年二月十六日，《蘋果日報》A11 版，以《新疆三維人亂砍民眾五死》為題，報導同年二月十四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田地區皮山縣，有三名襲擊者持刀砍殺路人，造成五人死亡，五人受傷，警方將三名肇事者擊斃，綜計此一事件共造成八人死亡，五人受傷，報導中指出：

「有消息稱：天山網當天(應是二月十四日)引述新疆互聯網總信息辦公室指稱：近日依法查處七起網路傳播違法訊息案，涉案人利用網路平台宣揚傳播恐怖暴力、宗教極端思想，民族分裂的文字影音畫面等，均被逮捕。這項消息曝光後，當晚就發生砍殺事件，不排除是報復。」對於此一當街砍人無論從任何角度看，都是屬於恐怖攻擊事件，但《蘋果日報》則引用「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發言人迪里夏提二月十五日之發言，認為維族人採激進的抵抗是因為沒有和平抗爭的機會，就可以當街砍人，想以此狡辯的說法，把當街砍人合理化，該報刊出迪里夏提的發言，不無對中共治疆方式隱含批判之意。又如 2017 年十月十八日《自由時報》A11 版以《中擴大維穩 新疆停用維語教材》為題，以《要求用漢語、唱國歌，2020 年全面漢語教學》為副標題，從正、副標題用字，已然看出帶有負面批判用意，我們不禁要問美國各級學校唱國歌時，是用英語還是各不同民族的語言？新聞報導中提到：「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2012 年上台後，逐步加強管制維吾爾族，近來再有新一波「維穩」舉措…；停用維吾爾語、哈薩克語輔助教材；要求所有學生必須接受漢語教學，從小使用漢語唱國歌等。」從用字遣詞語氣看，也是帶有批判意味，試問世界上哪一個國家國民或學生，唱該國國歌時不是用該國官方語言？大陸如此作法有何不對？同樣是《自由時報》2018 年八月二十日 A5 版，以《新疆維族集中營擴建，關押老弱婦孺》為主標題，，以《不再限極端份

子，美國衛星拍到增建營區估達 1300 座》為副標題，從用語看已充滿貶斥之意，再如 2018 年八月十三日《大紀元報》A5 版以《百萬維吾爾人被囚，各界譴責中共》為主標題，以《中共於新疆設『再教育中心』綁架、關押百萬名維吾爾人，很多兒童因而成為『孤兒』被送進條件很差的孤兒院，僅從主副標題上看，已可見《大紀元報》逢中(共)必反之立場，復如 2018 年三月九日《大紀元報》A4 版，以《逃離海外，維吾爾人仍受監控》，另同年五月十日《大紀元報》A5 版以《滿足抓人指標 新疆近百萬人被關集中營》為標題，即可看具強烈批判性，我們且看 2000 年大陸全國人口普查資料，新疆維吾爾族共八百九十四萬零一百一十六人，如照《大紀元報》所稱有近百萬人被關進集中營，豈不等於每十個維吾爾人就有一個被關進集中營，這可能性有多大？相信大家自有理性判斷，何況近百萬人每天所需食物，就是個天文數字，因此所謂關押近百萬人事，應予存疑，美國情報單位向來善於製造假新聞，連美國總統川普(特朗普)都提出此項指責，另同年五月二十五日，又是《大紀元報》對同一事件在 A5 版，以《新疆是當今世界最大的人造監獄》為標題，何其聳動，在該新聞的末尾稱：「毫不誇張地說，共產黨的極權統治已把昔日美麗富饒的新疆變成了當今世界最大的人造監獄。」這語氣帶有「文青」味道，但我們要問世間哪一座監獄不是人造的

伍、結語

台灣距離新疆數千公里，近年又未曾親臨新疆，對新疆的瞭解只憑一些史地知識以及台灣平面媒體的零星報導，當然不夠全面，也不夠深入，不過就以往二十個月的媒體報導，這一年八個月來新疆情勢大致尚稱平穩，並未出現較嚴重的恐暴事件，也即說明既往的維穩措施已收到預期效果，不過當今美國正全力打壓大陸，是否會利用海外「疆獨」組織興風作浪很值得注意。

前些年曾有媒體報導，有三百個在海外的維族加入「IS 組織」，三

百人如果組成一支部隊，無論其使用何種武力，都不足懼，但 IS 組織採取的是「孤狼」式的恐怖攻擊，三百人等於三百個不知在何時、何地爆炸的不定時炸彈，其殺傷力難以估計，如何防範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問題。

新疆問題錯綜複雜，外力誘煽固然是主要原因，極少數歧異分子野心太大，也是原因之一，如何使新疆問題能趨於無形，站在學術研究立場，提出若干「理想」但未必適合的看法，僅屬野人獻曝聊供參考而已。

一、擴大生產建設兵團，吸納維、哈各族優秀青年參與生產建設事宜，使新疆生產建設成果與維哈各族產生聯結，增進其向心力。

二、鼓勵內地入疆投資建設者，雇用當地維哈各族青年，必要時由政府補貼職前訓練費用，如是可使維各族對各項建設產生愛護之心。

三、入疆維哈以外各族幹部，應施以正確發音之維吾爾語訓練至少要有二、三百句日常用語，語言乃是最好之溝通工具，也是最易拉近人與人之間距離。

四、入疆非穆斯林幹部，應瞭解伊斯蘭教之基本常識與禁忌，按宗教乃是最不理性者，古往今來凡大智慧者，都能利用宗教，完成其霸業，反之，則被宗教所利用。

五、民族工作原是最「耗財」之工作，在經費許可情形下，似可於每年寒暑假期間，舉辦維哈各族優秀青年學生到內地與內地青年學生進行交流，透過交流宣達國族概念，久之，必能產生融合作用。

第三場 中國社會科學論（2018）：國際次區域合作與中國西南沿邊開放論壇

題目：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合作-以柬埔寨為例

作者：中國邊政協會副秘書長林遙鵬¹

主辦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承辦單位：中國邊疆研究所、雲南省社會科學院中國、中國（昆明）南亞東南亞研究所

參加人員：中國各省區專家、越南、泰國、柬埔寨、緬甸、寮國、孟

¹ 林遙鵬 1969 年出生於金門，目前任職美德向邦醫療集團總裁特助，中華大學行政管理研究所畢業，擔任中國邊政協會副秘書長。

加拉等國學者約百餘人。

壹、發展背景

中國改革開放迄今正好 40 年，進入 21 世紀以來中國跳躍式的崛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全球經濟、政治、軍事及科技等方面實力大幅增長。由於中國擁有穩定而眾多的人口，以及快速增長的經濟和軍事支出，因此經常被視為是一個潛在的超級大國。作為經濟發展最快的開發中國家之一²，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並且在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國雖然被認為是一個潛在的超級大國，但是仍然有許多經濟、社會、環境與政治等方面的不利因素有待克服。此外，目前中國在聯合國與世界上的影響力還沒有達到美國的程度。但是，其發展的速度，以及許多方面的不斷進步，中國在 21 世紀中期成為世界第二個超級大國³。

如今中國富了、中國強了，不但能參與國際事務更掌握了部分主導權，中國近數十年來不斷的與各國建立良好合作關係，維護多邊貿易體制，推動自由貿易區建設。截至 2018 年 5 月，中國已與 24 個國家和地區簽署 16 個自貿協定；2017 年，與自貿夥伴的貿易額（不含港澳臺）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 25.9%；已簽署的自貿協定中，零關稅普及的產品範圍基本超過 90%，承諾開放的服務部門已從加入世貿組織時的 100 個增至近 120 個。中國將繼續堅定不移的推進經濟全球化、維護自由貿易，與各國早日簽署並實施《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加快亞太自貿區和東亞經濟共同體建設，構建周邊、輻射“一帶一路”、面向全球的自由貿易區網路。但這些貿易政策的推動，不外乎有幾項原因作為堅實後盾！

一、國土面積與人口

(一)國土面積

中國領土陸地面積約 960 萬平方公里，是世界上純陸地面積第二大、

² 曾孟傑，103 年 07 月，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國家安全與大陸研究在職專班論文《中國崛起後中印關係競合研究》，台北。

³ 維基百科，中國崛起。

陸地面積第三大、總面積第三大或第四大的國家，當中劃分為 23 個省份、5 個自治區、4 個直轄市和 2 個特別行政區。

(二)人口

中國擁有世界最多的人口。截至 2018 年 7 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資料，中國大陸人口總數達到 13.9 億人，占世界人口總數 18.29%，人口數居世界首位。

二、軍事與國防

(一)軍事

中國人民解放軍現役 200 萬人，是世界上人數最多的軍隊，軍費世界排名第二，軍力亦世界排名第二。中國從外購、仿製、研發自製各項高性能武器，目前已有能力自製航母以及大量新式武器，並大力的改善解放軍的裝備和現代化科技，軍隊科技和力量已領先除了美國之外的其他國家，甚至在某些領域上超越了美國。

(二)國防

中國是世界上最多鄰國的國家，是世界第三大領土的國家（計算土地和領海），目前中國國防已從建國初期的陸防和以陸為主逐漸轉變成重視其自身海域（領海及其專屬經濟區）及攸關中國戰略利益的地區，例如中國已經向亞丁灣派遣了軍艦並有能力擔任重要地區的巡弋。

三、政治與外交

1971 年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成為五個擁有否決權的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中國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中國正在逐漸的增加他在國際事務中的影響力，以抗衡一向控制國際舞台的西方國家，這主要是因為中國政府實行的無意識形態外交，這種外交政策給中國在未來尋求外交幫助和與其他國家結盟留下了餘地。由於中國的經濟增長勢頭強勁，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係由以往的互動改為主動掌控，這促使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上的影響力。中國目前在全球 223 國家或地區(政治實體)中與 178 國家(政治實體)建立了外交關係，大大增加了在國際中的重要

性。

中國現在邁入了第五代以習近平為首的領導班子，在前四代領導班子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與胡錦濤的基礎下，充份展現出新一代領導人的魄力與遠見，內打貪腐外擴強權，新的思維與戰略正拉近國際間相互合作、相互發展，從此，西方世界不在只以美國馬首是瞻，更重要的是中國正逐漸地擴大它的影響力。一帶一路的絲綢之路戰略，串聯全球五大洲一百多個國家的共同合作，是繼聯合國成立後最大規模的國與國之間的合作關係，在未來國際間將發展出更緊密的關係，同時更強化世界的穩定性。

四、經濟發展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迄今正要 40 個年頭，這 40 年來 GDP 指數以年均近 7%以上的高速度增長，是歷史上增長速度最快、同時也是單一國家最大的經濟實體。2010 年中國 GDP 總量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居美國之後）。依據 IMF 統計數據，2014 年中國經濟總量（購買力平價）以 17.6 兆美元超過美國 17.4 兆美元而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有學者認為，2020 年到 2030 年間中國 GDP 將超過美國，而世界銀行、IMF 和聯合國齊發報告認為，根據國際匯率，中國在 2015 年 GDP 依舊位居世界第二，人均 GDP 超過 8,000 美元，達到 8,028 美元，中國的十三五規劃預計 2020 年前，人均 GDP 突將破 10,000 美元。

貳、湄公河次區域合作國家概況

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是指 1992 年由亞洲開發銀行推動下，由瀾滄江-湄公河流域內的中國、緬甸、寮國、泰國、柬埔寨、越南六個國家共同發起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簡稱 GMS）機制。中南半島五個 GMS 成員國其面積 256.86 萬平方公里，人口約 3.26 億。GMS 成立的宗旨是加強次區域國家的經濟聯繫，提高次區域的競爭力，推動本地區經濟和社會的共同發展⁴。

⁴ 維基百科，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英文：The Greater Mekong Subregion，縮寫：GMS）是基於湄公河流域的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包括的國家有越南、柬埔寨、寮國、泰國、緬甸、中國。

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是湄公河開發三個國際合作機制中起步較早，並取得實質性進展的機制。自 1992 年迄今，亞洲開發銀行為湄公河流域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累計提供貸款幫助實施交通、能源、電信、環境、人力資源開發、旅遊、貿易、私營部門投資和農業等領域的重點次區域專案。截至 2016 年，亞行為 84 個 GMS 投資專案批准貸款 73 億美元，而 GMS 成員國和發展合作夥伴分別提供了 49 億美元和 69 億美元。湄公河沿岸各國政府也十分重視亞洲開發銀行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專案。目前亞洲開發銀行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的重點是加強次區域的基礎設施建設和有關貿易投資政策等軟環境建設。更在第六次領導人會議共同宣言之《2022 區域投資框架》中規定了未來五年間的優先專案清單，包含 227 個投資和技術援助專案，總金額約 600 億美元。

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先後在成員國國內舉行過六次領導人會議，每一次的會議均取得具體的成果對於長期的合作有瞭相當巨大的助益。

圖一 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成員國及願景



資料來源：Google 圖檔

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合作機制分為兩個層次：

其一，是部長級會議，自 1992 年起每年一次，至今已舉行過 22 次。

其二，是司局級高官會議和各領域的論壇和工作組會議，每年分別舉行會議，並向部長級會議報告。

貫穿大湄公河次區域的瀾滄江－湄公河是亞洲一條重要的國際河流，中國境內段稱為瀾滄江，中國境外段稱為湄公河。瀾滄江－湄公河發源於中國青藏高原唐古拉山，自北向南流經中國青海、西藏、雲南三省區和緬甸、寮國、泰國、柬埔寨、越南五國，於越南胡志明市附近注入南中國海，全長 4880 公里⁵。大湄公河次區域涵蓋了多種氣候類型，又兼具多種地理特征，蘊藏著豐富的水資源、生物資源和礦產資源，經濟潛能和開發前景巨大。次區域內居住著多個民族，建築、風情、服飾、宗教習俗各不相同。次區域各國還擁有不少名勝古跡，包括中國的麗江古城，緬甸的仰光大金塔，寮國的琅勃拉邦古都，柬埔寨的吳哥窟，泰國的大王宮和越南的下龍灣等。

長期以來，受多種因素影響，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和社會發展相對落後，其中柬埔寨、寮國和緬甸被聯合國列入世界最不發達國家之列。近年來，次區域各國都在進行經濟體制改革，調整產業結構，擴大對外開放。經濟發展已經成為各國的共同目標。

表一 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GMS）歷屆領導人會議彙整

屆次	時間	地點	會議重點	備註
第一屆	2002/11	柬埔寨 金邊	通過區域一體化實現大湄公河次區域的增長、公平和繁榮”。	
第二屆	2005/17	中國昆明	加強夥伴關係，實現共同繁榮	
第三屆	2008/03	寮國萬象	六國領導人簽署了《領導人宣言》，並核准了《2008 年至 2012 年 GMS 發展萬象行動計劃》。	
第四屆	2011/12	緬甸 奈比多	次區域未來十年經濟合作通過戰略框架，發表了《內比都宣言》。	
第五屆	2014/12	泰國曼谷	致力於大湄公河次區域的包容性和可持續發展	

⁵ Google 資料庫。

屆次	時間	地點	會議重點	備註
第六屆	2018/03	越南河內	以“發揮 25 年合作成效，建設可持續、一體化和繁榮的 G M S”	
第七屆	2021	柬埔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二 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國概況彙總表

國別	中國	緬甸	寮國	泰國	柬埔寨	越南
首都	北京	奈比多	永珍	曼谷	金邊	河內
人口(仟)	1,396,982	58,832	6,777	69,182	16,253	94,575
面積 (平方公里)	9,640,011	676,578	236,800	513,120	181,035	331,690
經濟成長率						
2017	6.9	6.7	6.8	3.9	7.5	6.81
2016	6.7	8.1	7.9	3.2	7.5	6.21
2015	6.9	8.5	7.5	2.9	7.3	6.68
2014	7.3	8.18	6.6	-3.66	7	5.4
2013	7.8	7.5	8.2	2.9	7.6	5.2
2012	7.9	7.6	7.9	6.5	7	6.2
2011	9.5	5.9	8.0	0.1	6.9	6.4
2010	10.6	5.3	8.1	7.8	5.5	8.8
2009	9.4	5.1	7.5	-2.3	0.1	5.4
2008	9.7	3.6	8.8	2.5	6.7	5.7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觀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國家中，雖然，在 2009 年全球金融海嘯中，各國經濟成長率受到衝擊稍微下降以及 2014 年泰國因政治因素在紅、黃衫巾之亂中經濟負成長為-3.66，其餘的國家的經濟成長率仍非常驚人。

參、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投資國柬埔寨概況介紹⁶

一、地理人文

(一)地理環境：位於中南半島南部，東面和東南面與越南接壤，邊境長約 1,270 公里，北面與寮國相鄰，邊境長約 450 公里，西面和西北面與泰國毗連，邊境長約 690 公里，西南瀕臨暹羅灣。

(二)國土面積：181,035 平方公里。

(三)氣候：熱帶氣候。

(四)人口結構：高棉族佔 90%，其他尚有占族、普農族等少數民族，外僑則以華僑（1%）、越僑（5%）為最多。

(五)人口數：1,514 萬人。

(六)教育普及程度：柬國成人中有 68%的識字率，其中 4%有高中畢業，僅.8%有高中以上的學歷。

(七)語言：高棉語（Khmer）為官方語言。政府涉外官員以英語為主。

(八)宗教：信仰小乘佛教者佔全國人口 90%，華僑則信仰大乘佛教，天主教徒大部份為越南裔，占族與馬來人則多信仰回教。

(九)首都及重要城市：首都金邊市，重要城市有施亞努城、馬德望市、暹粒市。

(十)政治體制：君主立憲的內閣政治制度。

(十一)投資主管機關：柬埔寨投資發展委員會及柬埔寨投資委員會。

二、經濟概況

(一)幣制：RIEL（柬幣）。

(二)平均國民所得：美元

(三)匯率：1 美元＝4,068（2015.5.21）

(四)主要產業：成衣紡織業、鞋業、觀光、農業。

(五)主要出口產品：成衣紡織、鞋類、農產品、橡膠原料及水產品等。

(六)主要出口國家：美國、歐盟、日本、南韓、中國大陸以及東協國

⁶ 維基百科，柬埔寨介紹。

家。

(七)主要進口產品：建材、機械、汽車、機車、燃料、紡織業原料和消費用品。

(八)主要進口國：中國大陸、泰國、馬來西亞及越南等。

三、對外商態度

低工資以及低企業營所稅（20%）減少外商在柬國製造成本。柬國於1994年制定投資法，設置柬國發展委員會（Counci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ambodia，簡稱CDC），作為私人及公共投資之最高決策機構，其下設立柬國投資局，職掌吸引外資及核准私人投資之行政機構。

目前柬國仍被聯合國列為低度開發國家，極需外商資金注入協助發展。尤其是在農業、食品加工、觀光等產業。在觀光產業，柬國擁有著名的文化資產，吳哥窟（AngkorComplex）。惟柬國從1980年初期連續不斷之戰火，長年戰亂導致柬國基礎建設被破壞殆盡，投資環境一直也未見改善，官僚貪污腐敗及行政效率不彰，再加上有心政客煽動，勞工經常鼓動罷工，外商在柬國經營，所需花費之無形成本亦須考量。

四、在外人投資方面

柬國自1997年內戰結束以來，政治及社會發展漸趨穩定，惟因長年戰亂迄今，柬國行政體系仍未健全，基礎設施仍屬落後，惟在鄰近亞洲國家及國際金融組織之援助下，投資環境漸進改善，中國大陸仍是最大投資國，其次為南韓、馬來西亞、英國、越南及美國與台灣。柬國開放投資之產業，除農藥等有危害人體健康之虞的化學品禁止外人投資，以及對於特殊行業如菸草製造、電影生產、出版事業及媒體經營等項目有條件限制外，其餘行業均開放外資100%經營。

五、經濟展望

(一)多樣化柬埔寨經濟成長動力，促進經濟持續增長：

1、加強中小企業之發展：

由於柬埔寨經濟發展過於集中於成衣業及旅遊業，受到WTO取消紡品配額及旅遊業易受天災的影響，柬國當局體認到經濟發展過於集中特定產業的缺點，將以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為未來經濟發展重點項目。

2、加強基礎建設之興建：

柬埔寨基礎設備較差，造成廠商投資極大之困擾，其中電力缺乏且昂貴，已嚴重影響廠商投資意願，爰該國已將電力設施建設列為振興經濟發展之重要目標。

(二)開發特別經濟區，成立特別投資促進區（Special Promotion Zone，SPZ）：

柬國目前規劃有 33 個特別經濟區，其中有 7 個特別經濟區已開始運作，目前營運規模最大的是「曼哈頓經濟特區」。

(三)積極融入東協組織，參與各項合作計畫：

1999 年 4 月 30 日柬埔寨成為東協第十個會員國後，隨即積極參與東協各項合作計畫，柬國已經完成區內自由貿易目標約 83%的工作，另外柬埔寨、寮國、緬甸與越南則將去除約 98.46%貨品的關稅待遇。

(四)推動五年國家策略發展計畫：

加強發展農業領域，特別是大米，協助農民擺脫貧困，撤銷未按期限發展經濟特許土地的合約；加強國家治安與政治穩定，改善行政管理，加強國際合作關係。

六、投資機會

(一)柬國因擁有世界七大奇觀之一的觀光古蹟吳哥窟，2014 年赴柬國之國際遊客達 450 萬人次，其前 5 大外國遊客來源國分別為：越南、南韓、日本、美國及中國大陸等。觀光業為柬國吸收 30 餘億美元外匯，占 GDP 的 18%，並創造近 70 萬個工作機會，並每年定增長。因此，旅遊業的發展將繼續帶動金融、交通運輸、酒店、餐飲和服務業等相關產業的發展，成為未來柬國經濟的重要支柱和收入來源，另柬埔寨國公省、西哈努克省、貢布省等 4 省 440 公里的海濱地區已入圍世界最美的海灘俱樂部，亦成為柬國發展旅遊業的良好契機，並規劃致 2020 年到柬國的遊客可上升至年 600 萬人次，旅遊業的發展將帶動交通運輸、酒店及餐飲等觀光服務業之發展機會⁷。

(二)柬埔寨證券交易所已於 2012 年 4 月 18 日正式開市。第一家在柬

⁷ 亞洲經濟新老虎-柬埔寨投資環境介紹，2018 年 8 月 29 日，台北。

埔寨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是金邊供水管理局（PPWSA），在首日的交易中，其股票的價格從初始的每股 6,300 RIEL（約 1.57USD）上漲 50%，目前共有四家上市。

（三）東國近年來與越南簽訂邊境合作協議，興築邊境道路，帶動東越邊境地區投資開發特別經濟區外，近年來越南有部分產品（如越南自行車及鞋類等項）被課反傾銷稅，吸引在越南投資之台灣自行車廠、鞋廠進駐投資。

（四）由於東國除製鞋及製衣工業外，幾乎沒有其他工業，所有民生用品均仰賴進口，因此對於外資投資之產業項目幾乎完全沒有限制，任何產業均有機會前往東國投資，其中又以勞力密集產業最佳，可運用東國充沛之人力資源，將產品輸往東協國家，以及美、日、歐盟等給予低度開發國家（LDC）待遇，享有優惠關稅待遇，具有價格競爭優勢。

（五）東國土地廣大，在全球對原料市場需求增強之際，對於紙漿、乳膠等製品之橡膠園、樹、木薯、油加利樹等農業經濟種植甚為適合，我商如在技術及資金允許下，可向東國政府承租種植。

肆、結論

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體國家均有良好的發展機會，但為何本篇文章是以柬埔寨做為案例不外乎幾個原因：

一、大趨勢-列強爭相加碼基礎建設：

以中國大陸為首的國家、如韓國、日本及加拿大等國，大幅的加碼柬埔寨國家建設中的基礎建設，甚至有些橋樑、馬路、政府大樓與學校，均是以捐贈名義低利貸款完成的。

二、人口紅利-驅動東國經濟成長：

柬埔寨內戰中人口因戰爭或迫害死亡人數高達三百餘萬，佔總人口的 1/5，內戰結束迄今二十餘年，人口中中壯年佔大多數，15-64 歲人口佔全國總人口數的 64.5%，每年新生兒更高達近 60 萬人，充分反映人口紅利所帶來的經濟成長驅動力量。

三、經濟特區-帶動產業往製造業移動：

柬埔寨內戰結束後，以觀光財為主的經濟政策已無法滿足國家發展的預算來源，2004 年總理洪森主掌的政府，將經濟特區概念引入，成為國家發展的重要政策之一，目前全國核准設立的經濟特區有 33 個，創造 10 餘萬就業機會，為每年的 GDP 成長帶來可觀的貢獻。

四、東國最大的優勢-投資保障及優惠：

- (一)沒有外匯管制。
- (二)沒有外幣兌換限制。
- (三)沒有價格管制。
- (四)沒有出資比例限制 (公司可 100%由外商持有)。
- (五)外國投資人可出任董事長。

東國經濟發展及法令變動快速，充分與全球經濟發展接軌：

在一切以國家建設發展與經濟成長的前提下，柬埔寨的立法機構全力配合總理的施政，以招商引資為國家發展中政策的重中之重，只要是有利於國家、有利於人民的政策馬上修正實施，吸引外資一波接一坡的湧入柬埔寨，為這世界公認低度開發的國家，注入了新希望與新活力。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 講不過富人，乖巧不如縣官。(水族)
- 只許喇嘛宰羊，不許扎巴喝酒。(藏族)
- 豺狼欺綿羊，財主欺窮人。(蒙古族)
- 智者吃愚者，強者欺懦夫。(布依族)
- 一燕不成春，一鵲不成冬。(哈薩克族)
- 一片刨花，火引不了；一人獨行，事辦不好。(哈薩克族)
- 離開了人群，遇上了強盜。(烏孜別克族)
- 一匹馬揚不起塵土，一個人成不了英雄。(維吾爾族)
- 怕人，實際怕理；愛人，實質愛理。(彝族)
- 打獵要跟蹤獸跡，辦事要依據法理。(傣族)
- 山川永在，真理不滅。(苗族)
- 經驗用金子也買不來。(哈尼族)
- 船大不怕河寬，理足不怕官大。(毛南族)
- 真理的苦汁，比蜜餞有益。(裕固族)
- 人怕理，馬怕鞭，糞蠅蚊子怕火煙。(壯族)
- 有油，燈才亮；有理，語才響。(壯族)
- 生命可貴，其理不屈。(哈薩克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2017～2018 年上半年媒體有關達賴及 西藏報導分析

孟鴻

文化大學前兼任教授

摘要

十四世達賴自 1959 年三月，在其二位兄長及康巴組成所謂「衛教軍」擁簇（其意與裏脅僅有一線之隔），且在外國情報人員「導航」下，逃往印度，之後更組織所謂的流亡政府，起初在西方國家運作下，想在聯合國炒作西藏問題，但未成功，之後發現西方一些「嬉皮」對虛無的「香格里拉」充滿嚮往心裡，遂將西藏比附為想像中之「香格里拉」，由是達賴遂成為「迷幻」人物，將之神化，於是歐美日各國政客遂認為可以利用達賴以困擾中共，從此達賴遊走歐、美、日、俄、蒙各國，成為西方媒體寵兒，也確實給中共帶來不少麻煩，但中共整體國力不斷增強，由世界工廠變成世界市場，且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更產生所謂「達賴效應」（指凡接待達賴到訪的國家，其與中共的貿易額都會減少），近一年半來，達賴雖未必已由媒體寵兒，淪落為媒體棄兒，但其曝光率減少則是不爭之實，本文擬就台灣 2017 年至 2018 年上半年，台灣主要媒體有關達賴及西藏之報導作一分析。

關鍵詞：達賴、西藏，西藏流亡政府

一、1959 年西藏動亂與達賴外逃

十四世達賴家族，因達賴而成為新貴族，因其地為當采，故其長兄土登諾爾布也成為當采（或作當才）活佛，其二兄嘉樂頓珠青少年時曾入中

央政治學校（國立政治大學前身）附設蒙藏班就讀，能說一味帶川味的普通話，這一口普通話絕非讀中央政校蒙藏班時習得，由於其弟成為十四世達賴，俗語說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嘉樂頓珠搖身一變，也成為藏地貴族，其後娶漢人朱某之女為妻。以上達賴之二位兄長在西藏發生動亂之前（動亂發生於 1959 年三月）均與美國中央情報局（CIA）或其前身有密切關係，至於是美國情報單位出巨金將之吸收為「線民」，或此二人為謀求西藏獨立，而主動投向美國中情局，則不得而知，總之，在西藏地方噶廈政府與中共中央政府於 1951 年五月二十三日簽訂《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由於此協議的名過於冗長，以其協議共有十七條，故一般均稱之為《十七條協議》）之前，達賴之兩位兄長及西藏地方噶廈政府官員（如夏格巴之流）已經與美國中情局或其前身有所勾結，意圖遂行西藏獨立，此乃不爭之實，不過依常理而言，自民國建立後，十三世達賴即一面倒向英國，因此西藏地方噶廈政府中充斥許多親英、印官員，乃是無可避免之事，及至十三世達賴辭世後（事在 1933 年，僅得年五十六歲，難稱享壽），由熱振呼圖克圖出任攝政，一度扭轉噶廈政府之親英印歪風，罷斥了幾個親英官員，但為期未久，藏地親英分子在帝國主義卵翼養下，進行反撲，竟將熱振呼圖克圖逮捕入獄繼而在獄中將之毒害而死¹，從此西藏地方噶廈政府全面親英，快步邁向藏獨，而其時正時十四世達賴及其兩位兄長的青少年時期，受客觀環境污染，而有藏獨思想，應屬情有可原；但一旦西藏地方噶廈政府與中共中央簽訂《十七條協議》後，其中第一條開宗明義規定：「西藏人民團結起來，驅逐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祖國大家庭中來。」很明顯的就是不再受外力誘煽，放棄西藏獨立言論，思想與行動，然而當才土登諾爾布、嘉樂頓珠、夏格巴等並沒有遵守《十七條協議》的規定，放棄藏獨言行，視《十七條協議》如具文，率先破壞、撕毀該《協議》。同年（1951 年）十月二十四日，十四世達賴致電中共主席毛澤東

¹ 關於熱振呼圖克圖事蹟及其被捕下獄、遭毒害而死詳情，因非本文主題，從略，但可參看美、梅·戈爾斯坦著、杜永彬譯《喇嘛王國的覆滅》，北京時事出版社，1994 年。孫炯《西藏舊事》北京中國社科出版社，2010 年。柳陞棋《拉薩舊事》，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4 年。劉學鈔《十三輩達賴喇嘛圖寂與熱振呼圖克圖》，蒙藏委員會 1994 年。以上各書均指熱振係在獄中被毒害而死。

表示擁護《十七條協議》，茲將該電文全文引錄如下：

「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

今年西藏地方政府特派全權代表噶倫阿沛等五人，于一九五一年四月抵達北京，與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全權代表進行和談。雙方代表在友好的基礎上。已于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三日簽訂了《關於和平解放西藏辦法的協議》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擁護，並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領導下，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鞏固國防，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保衛祖國領土主權的統一。謹電奉聞。

西藏地方政府達賴喇嘛

公元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藏曆鐵兔年八月二十四日呈」²

達賴在此項電文中清楚明白地提到：積極協助人民解放軍進藏部隊，鞏固國防，驅逐帝國主義勢力出西藏，而達賴的兩位兄長與噶廈政府官員，對達賴之言語毫不在意，依然故我暗中在搞與《十七條協議》達賴電文相違背之藏獨。1959 年三月十日拉薩發生動亂事件之後，十四世達賴出逃印度，宣稱中共進藏後違反《十七條協議》，因而才發生動亂及出逃事件，但若捫心自問，此說能成立嗎？

中共黨政軍人員入藏後，由於其時入藏交通不便，入藏中共黨政軍人員可能有二、三萬人之多，所有物資需求不可能從內地運來，而西藏地瘠人貧，即使全以價購糧秣，也難充分供應，一時形成糧價上漲，拉薩藏人不無怨言連連（同時中共在西康實行土地改革、而中共之唯物無神論思維，視宗教為人民思想之鴉片煙，由是頗多西康地主，富商喇嘛、活佛湧入拉薩，散布反中共言論，而西藏地方噶廈政府中原就充斥許多親英分

² 原電係藏文，此處係漢文譯文，兩者在用字遣辭上可能會有若干出入，蓋許多辭匯在藏文中為前所未有者但大意絕對無甚出入，全電刊登於 1951 年十月二十七日《人民日報》，此處係引自西藏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學院、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編《西藏地方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史料選輯）》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年，頁 582。

子，從事獨立活動，於是與拉薩之康巴一拍而合，康巴組成所謂「四水六嶺衛教軍」³，聲稱以武裝力量保衛達賴及喇佛教，宣稱可與中共駐藏軍隊對抗，且穩操左券，因其口號「正當」，噶廈中親英官員多支持之，這些康巴衛教軍在拉薩與中共駐藏黨政軍機構、人員形同對立，康巴衛教軍態度相當蠻橫，似乎認定中共駐藏黨政軍人員不敢對渠等有任何干預行動。而且在夏格巴、嘉樂頓珠等人運作下，早在 1950 年、也即西藏地方噶廈政府與中共中央簽訂《十七條協議》前，已經將布達拉宮內庫所藏；歷世達賴所聚斂之黃金、白銀、銀元等財物，運到錫金首府甘托克存放⁴，此又可見西藏地方噶廈政府早懷攜貳之心。

1959 年時在拉薩之康巴衛教軍及噶廈中親英官員對中共駐藏機構與人員，已懷有必欲去之而後快之心，但達賴與中共駐藏人員，似乎並未嗅到任何火藥味，其實當年（1959 年）一月衛教軍圍攻中共扎木縣縣委會（此係採自師博主編《西藏風雨紀實》，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3 年，頁 109⁵；但經查《2011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區劃手冊》西藏自治區並無扎木縣，但在西藏自治區阿里地區有札達縣縣治在托林鎮，扎木或係托林之誤），給中共黨政幹部家屬造成重大流血事件，衛教軍「所到之處，燒殺奸淫、無惡不作；僅在墨竹工卡（今拉薩市墨竹工卡縣）就有八十四戶藏族群眾被搶、被害，在當澤（拉薩市當澤縣）附近的一個村子，……竟把群眾的心臟挖出來示眾……」（見《西藏風雨紀實》頁 109），或許由於噶廈政府的從縱容，但衛教軍在墨竹工卡、當澤之所為，受傷害的都是藏族百姓，也許在藏地貴族眼中，一般藏人（幾乎有

³ 所謂「四水六嶺」或作「四水六崗」，「四水」係指金沙江、瀾滄江、怒江及雅魯江而「六嶺」則指擦瓦崗、芒康崗、麻則崗、木雅繞崗、色莫崗及澤貢崗。見厲聲、孫宏年、張永攀《十四世達賴喇嘛人和事》四川知識出版社，2011 年頁 64。另留英藏人茨仁夏加著、謝惟敏譯《龍在雪域》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 2011 年，頁 593 則指四水為薩爾溫江（中國境內稱怒江藏語稱嘉莫歐曲）、長江（藏語稱則曲）、湄公河（中國境內為瀾滄江藏語稱扎曲）、黃河（藏語稱瑪曲）；六崗為：色莫崗、繃波崗、木雅熱崗、擦瓦崗、芒康崗及瑪扎崗。

⁴ 見夏格巴、旺曲德典著，劉立千等七人譯《藏區政治史》下冊，頁 270，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 年。此書或作《西藏政治史》，1976 年初以藏文在印度出版，後以英文在美國出版，晚至 1992 年始有漢譯本，且係內部發行。又頁 309 也提到此事。

⁵ 「師傅」係一編寫組之化名，此書由張國安、宋大川、王新光策劃，宮玉振、吳江、陳永剛、張世祥、張學誠，陳涌清，施克地等多人執筆。

80%以都是農牧奴）受到如此的傷害，只是「業報」，不值得大驚小怪，達賴對此種情況，或許真的一無所知，而中共駐藏當局也許刻意容忍，希望以時間沖淡漢藏間之矛盾，期望以寬容換取對西藏之和平治理，其實自1958年至1959年初，西藏自治區是外弛內張，具山雨欲來風滿樓情勢。

1959年二月七日，藏曆第十六繞迴木豬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這天是西藏傳統的「驅鬼節」，布達拉宮舉行隆重的「跳神」宗教儀式（藏語稱之為「拉爆」）照往年之例，達賴邀請了中共西藏工委、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的一些負責人到布達拉宮觀看跳神，西藏軍區副司令鄧少東及西藏工委秘書長郭錫蘭等人都應邀前往，並向達賴祝賀，在休息時，達賴主動向鄧少東提出：「聽說西藏軍區文工團在內地學習回來後，演出的節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請你們安排一下。」⁶這原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然而衛教軍及噶廈中的親英分子藏獨分子卻以此大造謠言，宣稱達賴如到中共軍區看表演，中共會將達賴以飛機劫往北京，發動藏人包圍羅布林卡，阻止三月十日到軍區看表演，在三月十日至三月十六日這一週間，中共駐西藏代理代表與達賴曾有三次書函往返」⁷絲毫看不出達賴有不想去看表演的意味，然而到了三月十六日之後，達賴已經無法掌控局勢，拉薩街頭已是一片混亂，形同爆動，暴民攻擊中共駐藏黨政軍機構中共只得起而平叛，所謂四水六嶺衛教軍及噶廈中親英藏獨分子，「簇擁」達賴及其家屬，向南而逃於三月二十六日到達山南隆子宗（今西藏自治區山南地區隆子縣），此時駐藏中共宣佈撤銷達賴之噶丹頗章政府，同時逃亡中的達賴在隨從噶倫等僧俗官員、衛教軍鼓動下，也宣佈成立噶丹頗章時政府，並發出佈告，該佈告文長一千七、八百字，當係由外人捉刀事先備妥，否則不可能如此快速反應⁸，此一文件中有以下一段話：「你們接到噶丹頗章

⁶ 見厲聲、孫宏年、張永攀《十四世達賴喇嘛人和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頁163。但夏格巴《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290卻稱「中國官員譚冠三突然派遣兩名官中國小官員前來拜見達賴喇嘛說，中國軍營裏有演出，達賴喇嘛何時能去觀賞，請予明示。」夏格巴書一向篡改，說謊成性，其說不可信；另在印度成長留學英國之藏人茨仁夏加於其《龍在雪域》謝惟敏漢譯，台北左岸出版社，2011年頁242，也稱：達賴禮貌地表示想去看他們表演。可證夏格巴書之不可信。

⁷ 關於譚冠三與達賴三封往返信函，漢文藏文（影本），可參見孟鴻所撰《1959年三月達賴出逃真相謎》一文，文載《中國邊政》季刊215期，中國邊政協會，2018年九月。

⁸ 該宣告全文見《藏區政治史》漢譯本下冊，頁298～300。另劉學鈞《從歷史看清西

西藏獨立國重新成立的喜訊文告後，應向屬下全體人民廣為宣傳……」。這一段話形同「獨立宣言」。當抵達印度提斯浦爾火車站，時為 1959 年四月十八日，達賴發表一份談話，全文約七、八百字（注 8 所引書錄有全文，此處從略），在「談話」的末在無人置疑其出逃情況下，達賴主動提到其出逃：「我決定同意他們（指噶廈官員及衛教軍首領）的請求，而不是被反動分子劫持。」這兩句話不僅是狗尾續貂畫蛇添足，而且予人以「此處無銀三百兩」意味，自此十四世達賴出逃遂為舉世所知。

二、流亡後之言行

中共建政初期，西方正處於反共時代，以美歐為首之西方集團，與蘇聯為首之共產集團，形成東西對峙之局，點慧之十四世達賴既已被「擁簇」出逃印度，印度在西方國家尤其美國支持下，收留達賴集團及數千藏人，撥出山區達蘭沙拉容許達賴集團成立所謂「西藏流亡政府」，並聘用荷蘭人「國際法學家」范普拉赫「創造」出西藏不屬於中國之邪說謬論（此處中國係指歷史、文化方面之中國，非專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下皆同），冀圖將西藏問題國際化。而達賴家族早就與美國情報單位有相當接觸，接受其諜報訓練，也有康巴藏人接受美國中央情報局或其前身之專業訓練，1959 年三月達賴出逃時，就有受過美國中情局專業訓練之諜報人員與印度情報人員聯繫，指引逃亡路線，關於這一點早有人指出：

「這一離奇的出逃及其重要意義，作為（美國）中央情報局那些無法談論的成功業績之一，已經永遠封鎖于他們那些演過了的拿手好戲的記錄之中。如果沒有（美國）中央情報局，達賴喇嘛永遠不可能被救出走。」⁹

可見達賴之出逃。或者可以說噶廈中藏獨分子及康巴四水六嶺衛教軍領導人物在美國中情局人員操導下，「擁簇」達賴出逃。達賴出逃最初幾年印度政府可能對中印關係相當重視，因而對達的言行作了相當制約，

藏問題—揭開達賴真實面貌》台北致知學術出版社，2013 年，頁 182～184，也錄此項「文告」。

⁹ 見直云邊吉《分裂者的流亡生涯——達賴喇嘛》，海南出版社，2015 年，頁 91，上引之文係 L.佛萊徹·普羅迪之語，此人當係美國中情局退休人員。

1962 年中印發生邊境戰爭後，覺得達賴是一顆可以利用的棋子，由是對其言行稍為放鬆，而美歐日各國也發現可以利用達賴使中共在國際政治舞台出丑，而達賴點慧無比，發覺自己是美歐日等西方國家眼中的「奇貨」，既是「奇貨」，就得將其邊際效用發揮到極大化，由是半個多世紀來，達賴似乎未付出分毫，時常出現在西方國家的媒體，成為媒體寵兒，把其「奇貨」的邊際效用發揮的淋漓盡致。按達賴逃抵印度後，以每年三月十日作為其出逃或西藏動亂之日，每年例必發表言論，其言論之尺度（宣揚藏獨，反對中共），與中共在國際政治舞台聲望高低成反比¹⁰，可見其善於察看國政治風向。

達賴近幾年來雖不再叫喊西藏獨立，改提出所謂「五點和平計畫」、「高度自治」、「中道」等訴求，只是把「西藏獨立」重新包裝，等於舊酒換新瓶而已，更妙的是提出凡有藏人居住的地方，或在歷史上曾被吐蕃王國占領的地方，都屬於所謂的大西藏，吐蕃王國盛時曾占有崑崙山北麓各綠洲（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和田、噶什等地）。今中亞費爾干那盆地，試問達賴或其流亡政府敢向維吾爾族、塔吉克族提出此項主張嗎？反而是山南達旺地區，不折不扣是屬於西藏地方噶廈政府所管，之後被印度強行占領，將之設為阿魯納恰爾邦土邦，但達賴及其流亡政府卻不敢向印度討回這塊土地，達賴或其流亡政府之所謂大西藏，只是迎合美歐日分化，裂解中國（指文化、歷史之中國，係概念上之中國，非某朝代或某黨執政之狹義中國，本文所有「中國」，均作此解，不另加注），截至 2013 年，達賴走訪近五十個國家或地區（圖瓦、喀爾瑪克，外蒙古只能稱為地區），論次數則有二百次以，其走訪國家或地區及次數見下表：

國家或地區	次數	國家或地區	次數	國家或地區	次數	國家或地區	次數
瑞士	18	希臘	1	立陶宛	2	葡萄牙	1
捷克	4	斯洛伐克	1	挪威	9	澳大利亞	2
加蓬	1	紐西蘭	3	南非	4	愛爾蘭	2
丹麥	6	荷蘭	7	比利時	4	保加利亞	1

¹⁰ 有關達賴每年三月十日所發表之言論，請參見劉學鈺、蕭金松、黃澎孝、陳又新等七人所撰《民國四十八年西藏反共抗暴後達賴喇嘛言行之分析》蒙藏委員會，1986 年。

國家或地區	次數	國家或地區	次數	國家或地區	次數	國家或地區	次數
英國	14	波蘭	2	列支敦士敦	1	義大利	19
瑞典	8	法國	20	德國	26	泰國	3
西班牙	6	芬蘭	2	拉脫維亞	2	愛沙尼亞	2
波多黎各	1	匈牙利	5	斯洛文尼亞	2	克羅埃西亞	1
布裡亞特	5	新加坡	1	委內瑞拉	1	特立尼達和多巴哥	1
尼加拉瓜	1	俄羅斯	4	前蘇聯	3	圖瓦	2
尼泊爾	1	土耳其	1	奧地利	10	喀爾瑪克	2
墨西哥	2	美國	33	外蒙古	3	日本	4

11

自 1991 年至 2014 年之二十三年間，美國有四位總統以「不期而遇」方式接見了達賴合計有十二次之多，其詳細情形為：老布希總統時接見一次，時為 1991 年四月；柯林頓八年任期接見了五次，接見時間依序為 1993 年四月、1997 年四月、1998 年十一月及 2000 年六月；小布希八年任期接見三次，接見時間依序為 2001 年五月，2003 年九月，2007 年十月；歐巴馬八年任期共接見三次，依序為 2010 年二月、2011 年七月、2014 年二月¹²，可見美國對「玩達賴牌」興趣頗高。

達賴自逃亡印度後，起初幾年還頗安份，及至 1962 年中印發生邊界戰爭後，就開始蠢蠢欲動，一方面不停的向國際發聲，希望國將西藏問題國際化，另一方面回顧往史，喇嘛教格魯派（俗稱黃教）曾經廣佈大漠南北之喀爾喀蒙古、漠西之額魯特蒙古，中國境外之布里雅特蒙古及喀爾瑪克蒙古¹³，使這些蒙古人在思想、心靈上成為黃教的殖民地，建構喇嘛王國，達賴流亡印度後，還想重構喇嘛王國，首先在流亡印度的藏族喇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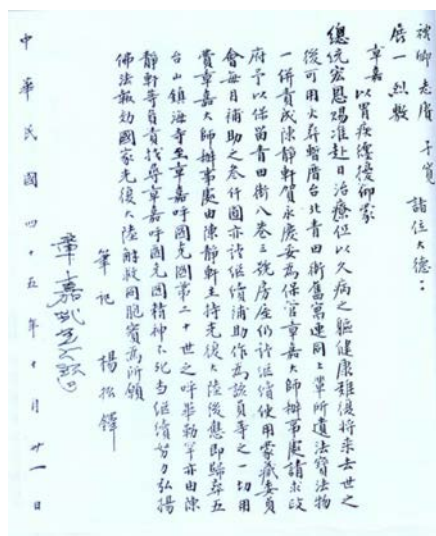
¹¹ 本表主要採用厲聲、孫宏年、張永攀《十四世達賴喇嘛人和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 275，但有所增加，如喀爾瑪克，日本，另蒙古改為外蒙古，訪美次數也從 29 次改為 33 次。

¹² 見張穎《民國時期的“藏獨”鬧劇與反“藏獨”的鬥爭》一文，文載《理論學刊》2015 年十月第十期，頁 127。

¹³ 大漠南北蒙古多為蒙古本支，漠西、境外之蒙古為蒙古別支，所謂蒙古別古係指原非蒙古，後併入蒙古之各民族。

中，找了一個喇嘛說是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的呼畢勒罕（轉世靈童），當達賴首有次到外蒙古訪問時，竟想把這個所謂的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送到外蒙古，讓外蒙古再度成為黃教喇嘛王國的殖民地，試看早年蒙古民族何其驍勇，但自從信奉喇嘛教格魯派（黃教）後，人口減少了、生產力低落了，喇嘛教荼毒外蒙古二百多年使蒙古淪為落後民族，外蒙古高層在深思熟慮後，拒絕了這位新的哲布尊丹巴重新君臨外蒙古，免得外蒙古人民再次受到荼毒，外蒙古高層此一決定算是高明的。

按喇嘛教格魯派有所謂「四聖」，指達賴、班禪，哲布尊丹巴及章嘉這四人而言，在宗教上地位無分軒輊，達賴掌前藏教務，班禪掌教後藏教務、哲布尊丹巴掌漠北外蒙古教務、章嘉掌漠南內蒙古教務。有清一代封為國師者，僅有章嘉呼圖



克圖一人（事在康熙四十五年，見乾隆《御製喇嘛說》，至於達賴之封號，乃延續明代之封號加以追認而已），第十九世章嘉呼圖克圖（此世系係從印度算起）隨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播遷來台，政府特以台北市青田街一日式住宅作為其住錫之所，章嘉大師似有預感在其圓寂前一年（1956年）十月二十一日預立遺囑交付吳忠信（禮卿）、劉廉克（展一，時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等人，遺囑中明白說明「光復大陸後應即歸葬五台山鎮海寺至章嘉呼圖克圖第二十世之呼畢勒罕等亦由陳靜軒等負責找尋。」並由。章嘉呼圖克圖親筆簽名（該遺囑影本如所付）¹⁴，章嘉大師於 1957 年圓寂，從遺囑文意上看，顯然是在「光復大陸」歸葬五台山後，由章嘉大師辦事處主任陳靜軒負責找尋其呼畢勒罕（轉世靈童）換言之，在「光復大陸」前是不會轉世的，陳靜軒先生也持如是看法，因此在「光復大陸」前，並無章嘉呼圖克圖轉世問題，此乃毫無爭議之事，然而十四世達

¹⁴ 該遺囑輯入《護國淨覺輔教大師章嘉呼圖克圖史蹟冊》1956 年，蒙藏委員會出版。另劉學鈞《蒙藏委員會簡史續編——附歷任委員長簡歷》一書也錄有此一遺囑，此係蒙藏委員會 1996 年出版，列頁 291。

賴流亡印度後，為了擴大其喇嘛王國版圖，竟然在印度流亡藏族喇嘛中，找了一個 1980 年出生于青海的安多喇嘛作為十九世章嘉呼圖克圖的呼畢勒罕，上距十九世章嘉大師圓寂已有二十三年之久，完全無視十九世章嘉大師生前的預立的遺囑，可見其膽大妄為已到駭人聽聞地步，（同時也證實其擴張喇嘛王國的野心）不過這也反映了另一個事實，任何活佛（達賴也是活佛）呼圖克圖生前所預立的遺言都不算數，例如一世達賴（係三世達賴追尊的，係宗喀巴嫡傳弟子）根敦珠巴。

生前曾明白表示死後要在漢地轉世，但他死後，他的弟子輕易地以漢地不流行佛法給否決了¹⁵，而十四世達賴根本無視十九世章嘉呼圖克圖的遺囑，擅自找了個二十世章嘉（見附圖二十世章嘉與達賴）；不過這也說明目前達賴



顛三倒四說可能不轉世，可能轉世在名大陸以外地區、可以以高位階喇嘛仿天主教教皇產生方式，選出十五世達賴，可能由金髮碧眼的女孩為轉世靈「童」……其實揆諸往史，他生前說得話都不算數，他的轉世，由後死者決定，由不得他。達賴所說的五花八門的轉世方式，都是在「唬弄」世人刷存在感而已。

2016 年以前此間各媒體，對達賴、海外藏情或大陸藏區消息，報導的數量還相當多，2015 年台灣閱看較多之平面媒體如：《聯合報》、《聯合晚報》、《中國時報》、《旺報》、《蘋果日報》、《自由時報》以及專事攻擊中共之《大紀元報》等七家媒刊登有關達賴言行、海外及大陸藏區情況，共計六十七則經整理以新聞性質、刊登之媒體，以表列方式，呈現如下（其中《週刊王》係純娛樂性質、刊登一則，故總數為 68 則）：

媒體名稱出現則數 新聞類別	聯合 報	聯合 晚報	中國 時報	旺報	蘋果 日報	大紀 元報	自由 時報	其他	備註
有關西藏新聞	8	4	2	13	3	3	1		34

¹⁵ 見陳慶英等編著《歷輩達賴喇嘛生平形象歷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 年，頁 33，該書指此項說法係引自《根敦珠巴見桑布傳》。

十四世達賴喇嘛措施	2	3		1	2	1	2		11
批判中共對藏措施					2	10	7		19
有關喇嘛教	2								2
其他						1		1	係《週刊王》
合計	12	7	2	14	8	14	10	1	68

在 2015 年以前，台灣平面媒體有關達賴及藏情報道，每年多在一百則以上，2015 年僅有 68 則，明顯減少了三分之一，達賴媒體寵兒光環的聚焦效應，已呈遞減狀態。再看 2016 年情況，同樣以上年所選之七家平面媒體，刊登達賴及情報導，又較 2015 年少了十五則，其詳細情況如下表：

媒體名稱出現則數 新聞類別	聯合 報	聯合 晚報	中國 時報	旺報	蘋果 日報	大紀 元報	自由 時報	其他	備註
有關西藏新聞	9	1	4	7	5	1			27
十四世達賴喇嘛措施						1			1
批判中共對藏措施	1				2	4	4		11
有關喇嘛教	3	1	4	1	2	3			14
其他									
合計									53

2016 年較之上年又減少了十五則，而且其中還有三則是達賴會見美國女歌手卡卡的報導（2016 年 6 月 28 日《蘋果日報》、同日《聯合報》、2016 年 7 月 17 日《蘋果日報》）如所周知卡卡女士向以穿着怪異大膽著稱，是一個具爭議性女藝人，政治人物與之會面，或可爭取曝光率，但宗教人物與之會晤實屬不可思議之事，如扣除此三則屬娛樂性外，則僅得五十則，較之以往可說每下逾況。

三、2017 年至 2018 年上半年媒體報導狀況

2017 年六月中（共）印，在洞郎地區發生武裝衝突，一時之間雙方劍拔弩張大戰頗有一觸即發之勢，媒體對之多加報導，但對洞朗地區歷史

多語焉不詳，洞朗地區在不丹之西北邊外，不丹清時稱布魯克巴，為中國清朝藩屬，清雍正十二年（1734 年）不丹遣使進京向中國清朝請封，這批使者於雍正十二年二月初二（1734 年 3 月 6 日），由中國清朝駐藏大員頗羅鼐派員護送不丹使者，從西藏拉薩出發走向北京¹⁶，不丹之為中國清朝藩屬，乃是不爭之實，其西北部界外，根本就是屬於西藏所統轄，洞朗即在此一地區，既不與印度接壤，更不屬印度，印度視不丹為其保護國、為其戰略利益之棋子，強替不丹出頭，於是雙方發生武裝對峙，不過雙方都相當克制，始終未正式駁火，自 2017 年六月至八月底，最終經談判和平落幕，因此 2017 年此間平面媒體對此項衝突有大量報導¹⁷雖然事件地點在西藏自治區南邊，但係國與國間之邊界衝突，非西藏地方事務，此乃需澄清者。

自 2017 年至 2018 六月三十日，共計十八個月，仍然以《聯合報》、《聯合晚報》、《中國時報》、《旺報》、《蘋果日報》、《大紀元報》《自由時報》等七家平面媒體，所刊登有關達賴，海內外藏情，對中共治藏措施之批評等，共計一〇五則，每個月平均不到六則，這七家媒體屬性其情況大致如下：《聯合報》、《聯合晚報》係由王惕五家族經營，其立場乃維護中華民國、反對台獨、支持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識，可以說合於憲法的媒體；《中國時報》、《旺報》係由蔡氏旺旺集團所經營，其立場與聯合報系相近，其中《旺報》以報導大陸新聞為主，間或有相當精彩的評論性文章以及專題性之報導，頗具可讀性；《蘋果日報》係港商黎氏所創辦，原係港商業性考量，以色羶腥取向，投社會大眾之所好，並無政治立場，但近兩三年來，以其港商立場，對中共治港措施頗有意見，連帶使《蘋果日報》、也具有若干偏頗立場，三不五時會出現強烈台獨意識人士以筆名撰寫專文，尤其對新疆、西藏問題發表意見，該人士具相當知名度，論文筆也屬一流，可惜對疆、藏基本知識不足，因此所論多屬模象之說，如 2013 年六月二十六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地區鄯善恐怖攻

¹⁶ 關於布魯克巴（不丹）向中國請封納為藩屬一事，非本文主題，從略，有意者可參看扎洛《清代西藏與布魯克巴》一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 年。

¹⁷ 有關中印邊界衝突詳情可參看劉學鈺《試析中印邊境衝突》一文，文載《中國邊政》季刊 211 期，中圖邊政協會，2017 年 9 月出刊。

擊事件發生後，該報出現一篇由此人撰寫以《無法停止的對抗》為題的小方塊，開首以四年前（2009 年）七、五烏魯木齊動亂切入，接着提到六月二十日鄯善事件，緊接着說：

「西方媒體以『無法停止對抗』形容新疆不斷的動亂，但官方和世維會（按係指世界維吾爾大會）每次都各說各話，外界不知真相，官方每次都把它（按係動亂事件）定調為暴力恐怖攻擊，與東突（按係指東突厥斯坦組織）和維獨（係指維吾爾立組織）有關聯，地方法院也以煽動民族仇恨和種族歧視罪名起訴肇事者。但世維會每次都指摘中共高壓民族政策和系統性鎮壓，引起武力抗暴。」

這一段話說得相當坦誠，也頗客觀，中共當局和世維會總是各說各話，但世維會人不在新疆，對發生動亂事件，既不瞭解發生動亂事件的原因以及現場情況，以先入為主心理，千篇一律指責中共之高壓政策及系統性鎮壓，頗不客觀，姑以 2011 年八月十九日（星期五），和田地區皮山縣桑株鄉許多維族穆斯林做完禮拜後，到餐廳用餐，結果有一百五十人中中毒，其中十一人（不幸死亡，如所周知維族穆斯林幾乎不會到漢人開的餐廳用餐，是怕漢人餐廳不合伊斯蘭的飲食禁忌，這只一件很普通的食物中毒事件，扯不到維、漢衝突，也與中共的民族政策無關，但世維會發言人迪里夏提卻呼籲世界衛生組織應採取緊急措施，世維會這種思維有欠理性，其實臺灣也曾發生過集體食物中毒，從沒有人懷疑其中有任何陰謀，即使臺灣社會藍綠對立相當嚴重，但對這一類問題，還不致於盲目猜疑，世維會應該排除，先入為主，凡事都是中共民族政策不當所造成。接着該文又提到

「其實新疆從從未真正融入中國，中國人對新疆的歷史一片空白，頭腦裡只有一個模糊的地域概念。除了古代的張騫、班超和李白的傳奇，以及近代的左宗棠這些歷史人物之外，根本分不清匈奴、突厥、蒙古和維吾爾人，就連新疆『建設兵團』也是一團謎。高山沙漠交通不便的新疆地區，2000 年來一直存在許多王國，佛教最早經新疆傳入中原，最古的千佛洞在新

疆，比敦煌早幾百年，維吾爾人的佛教一直延續到十八世紀，不過，更重要的是這裡曾經屬於突厥帝國，這個歷史印記，至今仍是政治暗流。突厥帝國從西伯利亞、中亞到地中海，三、四十個民族分布在二十多個國家，本來一個可汗一個王國，但都對統一沒興趣，這是血緣和文化相連的無形帝國，維吾爾語就是突厥語的一種，這是今天東突厥獨立運動的根源。」

這一段話雖非錯誤百出，但卻是絕對的不專業，該文的作者或者根本不知道在西元六世紀突厥崛起進入西域之前（「新疆」一詞是清乾隆平定準噶爾，進入天山南路後，始有之名詞，清初稱準部，回部，再早則通稱西域），西域的早住主體民族是吐火羅人（屬於廣義的塞種，為印歐語系民族，是高加索種，也即是習稱之白種人），這是對研究西域或新疆問題的基本常識，該文作者對此竟然一字未提，或許該文作者認為突厥就是西域新疆之早住民族，這種看法正是東突分子或疆獨分子、罔顧史實捏造出來的說法，至於維吾爾（古作回紇或回鶻）人晚到九世紀以後才進入高昌（唐時以高昌作西州，即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地區），之後始向天山以南（今稱南疆）塔里木盆地南北兩沿各綠洲遷移，這一點該文作者也未提到，不知道是刻意忽略，或是根本不知道這一段歷史；至於說「中國人對新疆歷史一片空白」，這句話未免太武斷，或者該文作者對新疆歷史一片空白，遂以已度人認為「中國人對新疆歷史一片空白」，不過海峽兩岸的漢人對新疆有深入研究的人，確實不夠多，不過推究其因，實以有清一代以其創建者女真族（入關前後改稱滿洲）本身係邊疆少數民族，其治邊政策是嚴禁回（指維吾爾）藏、蒙……各邊疆少數民族與中國主體民族—漢人來往，有清一代派駐邊疆地區之將軍、都統、大臣、幫辦大臣、副都統等方面大員幾全無漢人，而清代中央治邊機構理藩院（部），在康熙三十八年以前尚有三、五個漢人職缺，之後竟無漢人職缺，在此種情況下，漢人對新疆有研究者確實不多，縱或如此，自清至今，有關新疆之專門著作，沒有一百種，也有八十種，怎會是一片空白？至於維吾爾或回紇人，在皈依佛之前，在回鶻汗國時期，是以摩尼教為國教，這一點該文作者或許也是一片空白，至於該文稱「維吾爾族人的佛教信仰一直延續到十八世紀」，這倒是很新鮮的說法，相信在新疆或在海外的維族，都不

會同意這種說法，按回紇汗於九世紀中葉被黠戛斯汗國擊敗後，汗國崩解，回紇之眾四處奔逃，其進入西域者龐特勤及後人，建立喀拉罕汗國（宋代文獻稱之為黑汗，按「喀喇」在維語中其為黑），隨即伊斯蘭化，當十二世紀上半葉，遼朝遺緒在西域建立西遼王朝（西方史料均稱之為喀喇契丹）威服喀拉罕汗國時，該汗國已全是穆斯林了，該小方塊作者稱維族的佛教信仰延續到十八世紀，不知出自何典？《蘋果日報》刊登該文，在某種程度上，已可看出對中共已有厭惡之感，就媒體而言，已不夠客觀。

至於《大紀元報》係小眾媒體，周日不出報，由曹姓人士所創之辦，具有濃烈的法輪功色彩，凡法輪功之各種演出，莫不以大篇幅報導，譽為天籟人間罕見，也因此對中共取締法輪功，深痛惡絕，對下令取締之江澤民更是恨之入骨，因此該報對中共所有正面作為，絕對不予報導，反之，則大肆刊登，且所下標題極聳動之能事，綜計自 2017 年一月一日至 2018 年六月三十日，十八個月期間，共刊登達賴或有關藏情共有九則，平均兩個月一則，其中除 2017 年十一月十六日 A3 版以《達賴喇嘛籲藏人堅守文化相信中國會變》為標題，尚屬中性外，其餘八則之標題皆帶批判性，茲將之表列如次：

刊登日期	所下標題	版別
2018.2.23	大昭寺火災 主殿金頂延燒一小時	A5
2018.2.27	大昭寺僧侶爆料：主殿被燒二小時	A5
2018.3.7	藏文受美官方認可 在陸卻頻遭打壓	A4
2018.3.9	藏民抗暴選擇自焚 中共卻稱藏區宗教和睦	A4
2018.3.14	大昭寺大火下的真相 塑造美好中國的假象	A5
2018.3.24	中共嚴控西藏 寺院僧人需考法律	A4
2018.5.23	藏人倡母語 遭中共重判五年	A5
2018.6.4	西藏「再教育營」酷刑性虐待猖獗	A5

從上表可以看出《大紀元報》反中共之立場，而且該報三不五時會爆出中共內部極為「機密」訊息，似乎在中共高層埋有「暗樁」，如該報 2014 年五月三日 A4 版所刊登標題為《習江鬥日益火爆，新疆爆炸內幕深，官媒暗示習要打大虎》，該新聞內容有如下一段話：

「經昆明血案（按係指 2014 年三月一日，雲南昆明火車站維族持刀砍人事件），屬中共前黨魁江澤民集團（江派）勢力地盤新疆發生大爆炸，暴恐事件威逼習近平手。……

……新疆因為能源的原因，一直是周永康和曾慶紅等人的大本營，也是江派政變基地之一。」

《大紀元報》透露出新疆為江澤民（江派）的地盤，且暗示昆明暴恐攻擊血案是江派所發動，更明指新疆是江派政變基地之一（顯然還有之二、之三……），這則內幕消息相當勁爆，可惜至今已經四年多，還無法得以證實，設若新疆果真是江澤民（江派）勢力地盤，且為江派多政變基地之一，何以江澤民執政時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動亂事件發生率相當頻繁¹⁸，可見其所謂新疆是江派政變基地之一，純為天馬行空之說，屬於最近流行的所謂「假新聞」，該報之所以如此作為，實肇端於江澤民或所謂江派下令並執行取締法輪功（該報稱之為迫害法輪功，不過此間已有人著有專書批判法輪功，見勞政武《破極法輪功》，桃園淨名文化中心 2011 年出版），《大紀元報》與法輪功有極密切關係，因此對江派恨之入骨，該報對中共具有既定立場，而且呈現在新聞報導上（各媒體均可有立場，但多以社論方式表達其立場，在報導新聞時，仍需遵守客觀、公正立場），實屬不宜，不過該報縱或如此，似乎尚未對傳統文化、歷史概念之中國，加以否定、誣衊，也未見明顯的宣揚台獨、藏獨、疆獨，可見其創辦人尚具一絲之良知，其基因中也尚保有一些中國（定義如前）元素。

至於《自由時報》則等同台獨的機關報，不僅逢中共必反，即使是傳統文化、歷史、地理、習俗上的中國，也一概不予認同，不過陳水扁在任內曾經於電視台上、聲嘶力竭地說：「台獨辦不到就是辦不到」，然而該報卻仍然咬住台獨不放，該報曾於 1997 年三月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連續三天刊登曹長青具名，標題為《西藏與台灣都有獨立權利》的文章，在文章中指出達賴對「台灣某些機構在藏人流亡地製造了一些不愉快，達賴不說中華民國政府某些機構」，可見在達賴心目中，早已沒有中華民

¹⁸ 有關新疆、西藏動亂事件，可參看劉學鈞《平心靜氣看新疆、西藏事件》一文，該文輯入劉著《少數民族史新論……平心靜氣看新疆、西藏事件》一書，台北，南天書局，2011、2014 年兩度出版。

國，心目中既沒有中華民國，又何必到台灣來，可見其來台灣的目的旨在撈「供養」，而曹某對達賴的話作了如下的解讀：

「事後我才了解，所謂『不愉快的問題』，是指台灣的蒙藏委員會派人到印度，用鉅額金錢收買和分化瓦解流亡的藏人，要藏人認同是中華民國的領土。」

曹某實在膽子很大，未經查證就說蒙藏委員會派人到印度，用鉅額金錢收買和分化瓦解流亡的藏人，曹某此話完全未經大腦思考，按蒙藏委員會全年預算僅占中央政府總預算萬分之零點捌，如果中央政府總預為壹萬元，蒙藏委員會年度預算只有八毛錢，何況其中二分之一為人事費，餘下的二分之一（也即中央政府總預算萬分之零點肆）還需要支付大樓管理費、水電、文具紙張等，真正用於蒙藏業務者，可能不到中央政府總預算萬分之零點參，請問這是巨額的金錢嗎？曹某不加思考信口胡言，揆其目的，一則是在污衊蒙藏委員會，因為蒙藏委員會的存在，象徵中華民國形象的完整，曹某雖係大陸黑龍江省人，但附和台獨主張，所以不加思考，任意誣衊蒙藏委員會，再則為討好達賴，蓋達賴自被擁簇流亡後，即主張藏獨，如與蒙藏委員會往來，等同承認西藏一如《中華民國憲法》第一二〇條明文規定「西藏自治制度，應予保障」，等同規定西藏為中華民國固有疆域之一部份，因此達賴及其流亡政府想方設法誣衊蒙藏委員會，曹某乃投其所好而有上述言論。達賴之所以要來台（首次來台係在 1997 年），概略分析可能有以下幾個原因：

1、達賴自 1959 年逃亡後，始終高唱西藏獨立，企圖將西藏問題國際化，也曾以重金聘請荷蘭籍所謂國際法專家范普拉赫，撰著《從法律看中國對西藏的侵占》一文¹⁹希圖在國際上炒熱西藏問題，可惜范普拉赫對中國清代歷史可能只有幼稚園程度，根本不知道《大清會典》（類同今日的《六法全書》），其中有《理藩院則例》，一種詳載中國清朝對西藏、內外蒙、準部回疆等邊疆地區如何治理的法令規章，此外乾隆的《御制喇嘛說》²⁰，（等同法律，事實上《御制喇嘛說》出台後，達賴、班禪等大

¹⁹ 全文見網路 <http://www.xizang-zhiye.org/65/arch/writings/waiquoren/fplh.html>

²⁰ 關於乾隆《御制喇嘛說》全文見張羽新《清政府與喇嘛教》所附《清代喇嘛教碑刻錄》，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 年。序，趙志忠《清王朝與西藏》頁 28～33 也載有全

活佛轉世，均遵照《喇嘛說》之規定進行轉世）等都是中國清朝治理西藏等邊疆地區、民族的法規，就法律而言中國擁有並統治西藏，有完整之法律依據，范普拉赫不學一至於此，實有辱學者專家之名，如再從另一角度看，關於國家領土問題，從來就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達賴及其流亡政府雖想盡方法謀求西藏獨立，或將西藏問題國際化，但都是徒勞無功，於是轉而直接與中共聯繫、達賴於 1978 年五月通過記者轉達了如下的一個訊息，達賴稱：

「如果北京邀請我訪問拉薩和西藏部分地區，我將樂意接受，如果我耳聞目睹西藏人民在中國（指中共）統治下生活幸福，我就放棄西藏獨立的要求。」²¹

中共當局於 1978 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對達賴此一放話，由鄧小平與美聯社記者談話時，作出明確表示：

「達賴可以回來，但他要作為中國公民。」²²中共此一答覆，使達賴躊躇不前，雖然中共當局同意其可以回到大陸（注意不是回到西藏），但擔心一旦回到大陸，中共不會再讓他遊走海外，幾經考慮，決定派其二兄嘉樂頓珠（能操帶川味之普通話，曾就讀中央政治學附設蒙藏班，其妻係漢人朱洲乎之女，嘉樂頓珠與美國中央情報局關係相當密切）為代表人赴大陸與藏區參訪，中共只承認其為達賴私人代表，不承認其為海外藏人代表，此後陸續派數批代表回大陸藏區參訪，並與中共有關方面舉行會談，但均無具體結果，中共堅持達賴必聲明西藏為中共不可分割之領土，並聲明放棄藏獨主張，且返回大陸後不必回西藏，可住北京，會給予適當職位（如人大副委員長或政協副主席之類），達賴眼見與中共接觸並未得到預期結果（藏獨固不可能，連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中共也不同意），於員興起到台灣參訪，期能增加與中共談判之籌碼，時政大副教授之張駿逸曾指出：「達賴來訪只是為未來西藏獨立時增加與中共談判的籌碼。」²³可見達賴之欲來台參訪，其真正用意，只是要把台灣當成一枚棋子來耍而

文，此書係北京出版社，2001 年出版。

²¹ 見直云邊吉《分裂者的流亡生涯～達賴喇嘛》海南出版社，2015 年，頁 217。

²² 同注 21。

²³ 見 1997 年三月十七日台北《自立晚報》

已。

2.達賴流亡印度後，即嚴禁喇嘛、活佛到台灣弘揚喇嘛教法，達賴喇嘛雖是格魯派的最大活佛，但在喇嘛教上其宗教地位與噶舉派、寧瑪派、薩迦派法王完全平等，格魯派固然不得不遵守此項禁令，但其他三派則未必要遵守此一禁令，在台灣有一些喇嘛教信徒從流亡尼泊爾的喇嘛、活佛中，邀請若干非格魯派喇嘛、活佛來台，在台弘法接受供養，回到尼泊爾後，以所收到的豐厚的供養，在尼泊爾首府加德滿都起精舍蓋豪宅，今加德滿都精華區寶塔一帶（類台北之西門町、北京之王府井大街）的豪宅皆為藏族非格魯派活佛、喇嘛所有，這對格魯派活佛、喇嘛而言，既羨慕也是一大刺激，當時台灣正處於經濟頂點，號稱亞洲四小龍之首，一般人在極富有或極困窘時，就會激起強烈的宗教信仰，所以當時（指 1997 年以前）來台「弘法」的喇嘛、活佛幾乎都兩手空空來台，離台返尼泊爾、印度時也幾乎都是滿載而歸，這對格魯派而言，絕對是一大刺激，當然對達賴也構成一種壓力，心想格魯派乃是最大的教派，且是當權派，所收到的供養，竟然不如其他三派，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心想自己既是最大教派的最大活佛、又是流亡政府的首腦，如果去台灣一趟，除了可以刺激中共，厚植未來談判的籌碼外，憑自己的名氣，必然可以獲得滿坑滿鉢的「供養」，這應該也是達賴要來台的原因之一。果不其然，達賴來台訪問期間，此間中國佛教會主辦達賴「弘法灌頂法會」，規定凡是要參加此項灌頂法會者，要繳交新台幣一千元的「供養金」²⁴，據中佛會公佈的資料，參加「灌頂法會」的人多達三萬人，換言達賴為人「灌頂」（其實只是以手「摸」頭而已），就收到了新台幣三千萬元，這個數據相當駭人；其後在台北五星級的福華飯店席開近百桌，視其與達賴所坐的主桌遠近，收「供養金」自壹佰萬元至五萬元不等，百桌約為一千人，平均每人十萬元，一千人約為新台幣壹億元，其間並無強制，也無欺騙，全為自願「供養」。我們只能說達賴的吸金大法，讓人歎為觀止，來台接受「供養」，也應該是原因之一。

3.依照《中華民國憲法》明白規定西藏為中華民國固有疆域（參看第四條、第一二〇條），據此《行政院組織法》乃設置蒙藏委員會，依《蒙

²⁴ 見 1997 年三月二十一日，《自立晚報》

藏委員會組織法》規定：凡蒙古、西藏一切行政及興革事項，均屬該會職掌所及，因此西藏所有行政及興革事項，蒙藏委員會均有權處理，因而達賴及其流亡政府既以西藏獨立為訴求目標，自然視蒙藏委員會眼中刺、肉中釘，必欲去之而後快，因為只要蒙藏委員會存在，就象徵西藏屬於中華民國，因此必欲去之而後已，前此在蔣介石時代，達賴派其姊夫塔克拉·彭措扎西於 1966 年來台謁見蔣總統，其時由筆者全程作陪，蔣介石曾為政治學校校長，彭措扎西曾就讀政校蒙藏班，因此與蔣氏有師生之誼，蔣氏曾面告西藏係中國（中華民國）領土，時彭措扎西並無異議，當然這或許攝於蔣氏之威嚴不敢表示異議；其後蔣經國任行政院長時、達賴曾派其出逃時任侍衛之帕拉來台，表示達賴有意訪台，蒙藏委員會呈請行政院核示，時蔣院長在蒙藏委員會公文上批「不必」兩字，然後將該公文影印後，加上行政院之發文號擲回蒙藏委員會，可見經國先生對達賴及其流亡政府主張藏獨之厭惡，也顯現其維護國家領土完整之意志，因此蒙藏委員會之存在與中華民國形貌完整與否，有相當密切之關聯，達賴乃是極點慧者，在兩位蔣先生時代，均未提出廢除蒙藏委員會之主張，及蔣經國崩殂後，由李登輝嗣任，李氏青年以前接受日本皇民教育，對中國意識淡薄，達賴窺知此點，乃要求渠之來台參訪，應繞過蒙藏委員會，李登輝心中既乏中國概念（此處中國係指文化、歷史之中國），也未探悉達賴真正意圖，乃告訴時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李厚高，此次達賴來訪蒙藏委員會不必介入，因此 1997 年達賴來台與蒙藏委員會毫無關聯，達賴在台與一些政客接觸時，必然談到要廢除委員會的要求，此當為達賴來台之另一原因，按自蒙藏委員會成立以來，西藏地方政府或達賴雖然與中央始終維持若即若離態度，但從未向中央提出廢除蒙藏委員會之要求，如今十四世達賴竟然做到，是達賴點慧？還是中華民國政府自總統以降的政務官員愚蠢，這有待未來歷史斷定。

以上一段話皆因曹某《西藏與台灣都有獨立權利》一文所伸引出來，而此文刊載於《自由時報》該報之立場與風格於焉可見。此外，《自由時報》曾於 1997 年三月十七至十九日連續四天連載海因利希·哈勒（Heinrich Harret）所撰《我與少年達賴》，由刁筱華漢譯，全文約一萬二千多字，其中有段描述拉薩大昭寺附近乞丐的情形，曝露了 1950 年代

西藏貧窮情況，很可能該編輯及漢譯者不了解原作者，海因利希·哈勒的背景，只因達賴來台湊熱鬧而登載了該文，以示該報對西藏歷史，文獻之瞭解，殊不知這位海因利希·哈勒是德國納粹分子，此人係奧地利人，生於 1912 年，1938 年五月四日加入納粹黨，黨證號碼為 6307081，從此參加納粹德國的對外侵略戰爭，1939 年九月在印度被英軍俘獲，1941 年越獄逃往西藏，兩年後接近十四世達賴，1948 年開始擔任達賴的私人教師，1950 年中共軍隊入藏，哈勒於 1951 年倉惶逃離西藏，次年回到奧國，為免其納粹背景曝光，又遷往瑞士邊境的小國列支敦士登，一住多年，並著手撰寫《在西藏七年》，此書後來被翻成四十多種文字²⁵，但其為納粹分子，乃是不可篡改的事實，如所周知納粹分子在歐美社會被視為極端恐怖人物，而《自由時報》竟刊載其文章，如果不是疏於查證，則該報的立場會令人感到恐懼。

綜計自 2017 年一月至 2018 年六月，十八個月間，《自由時報》刊載有關達賴及海內外藏情之新聞共有二十六則，其中批評中共對藏措施有十八則，有關達賴者五則，一般藏情僅三則，可見其反中共意志之強烈，走回五十年前國民政府「反共抗俄」時代的意識形態，茲將其批判中共之十八則新聞依日期標題出現版面表列如下：

2017.4.12	中國 H7N9 延燒 西藏也淪陷	A7
2017.4.25	中國導演找李察吉爾拍片被威脅驅逐出境	D4
	李察吉爾就是狂（鄧蔚偉具名短文）	A4
2017.4.27	坎城慈善趴挺達賴 中國女星全失蹤	D4
2017.6.23	達賴到加州大學演說的啟示	A2
2017.7.2	《中英聲明》沒約束力？	A17
2017.7.19	中媒批挑釁印媒斥好戰論晉級	A7
2017.12.29	不再恐懼 西藏導演逃抵美國	A22

²⁵ 見德國《明星》雜誌，（Der Spiegel），或譯為《明星周刊》，1997 年五月二十八日發行之周刊，題為《沾有納粹污點的“英雄”》。但此處係轉引自厲聲孫宏年、張永攀《十四世達賴喇嘛人和事》，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 215～294。

2018.1.5	藏人推廣藏語 分裂國家受審	A20
2018.1.12	台港澳列國家 萬豪酒店遭中媒追殺	A12
2018.1.14	踩國家門紅線 中企遭中國圍剿	A6
2018.2.8	IG 引用達賴語錄 賓士向中國致歉	A12
2018.2.19	西藏大昭寺失火 中國封鎖消息	A8
2018.3.7	按讚藏獨 美國萬豪酒店小編丟飯碗	A12
2018.3.8	達賴 寇謐將 封建中國	A17
2018.4.15	控情蒐流亡藏人 瑞典起訴一中諜	A11
2018.5.23	藏人倡學母語 煽動分裂國家罪判五年	A8
2018.5.30	限制宗教 中國列特別關切名單	A6
2018.5.31	西藏資訊封鎖 比北韓更嚴重	A7

自 2017 年至 2018 年六月，共十八個月，此間七家平面媒體刊登達賴及有關藏情，以分類方式表列如下：

媒體名稱 出現則數 新聞類別	聯合報	聯合晚報	中國時報	旺報	蘋果日報	大紀元報	自由時報	小計
一般藏情	11	4	3	35	2		3	58
有關達賴報導	2		3	3	1	1	5	15
批判中共對藏措施	1	1			4	7	18	31
有關喇嘛教						1		1
其 他								
合 計	14	5	6	38	7	9	26	105

從上表所呈現數字可以看到自 2017 年到 2018 年上半年共十八個月，台灣地區七家平面媒體共刊登有關達賴的新聞只有十五則，一個月不到一

則，較諸往年大為減少，這是有目共睹之事實，往年達賴的媒體曝光率一直居高不下，可說是媒體寵兒，不僅是台灣的媒體的寵兒，美國的華郵、紐時、英國的泰晤士以前也經常刊登有關達賴活動的消息，但近一年半來，雖非媒體棄兒，但其見報率明顯不如以前，則是不爭之實，可見已呈秋扇之勢。

四、結語

十四世達賴拉木登珠乃是極點慧之人，當初被噶廈政府中親英分子及康巴衛教軍「擁簇」出逃印度，從此走向藏獨的不歸路，當時歐美正處於反共時期，達賴之逃正可以用以攻擊中共，因此達賴被西方國家視為「奇貨」，既是「奇貨」，當然要待價而沽，何況達賴又極其點慧，總能抓住時代潮流，當西方國家講環保時，達賴就指稱中共將核廢料放在藏區；當西方國家講人權時，達賴就宣稱中共濫殺藏人一百二十萬（中共建政之初，西藏人口尚不足一百萬人，豈不是要向他省借二十萬人讓中共殺，其信口開河於焉可見）；當西方講維護傳統文化時，達賴就指責中共摧毀西藏文化宗教；其善於掌握世界潮流的脈動，實令人敬佩，許之為國際級公關高手，絕非過譽，因此西方社會認為可以利用達賴，以打擊中共，而達賴也深知歐美日各國意在利用其以打擊中共，乃順勢借美歐日各國推動藏獨，至少將西藏問題國際化，雙方互相利用，像是在博弈，在 2015 年之前，勝負尚難看出，但越往後態勢漸趨明朗，達賴的剩餘價值已在遞減中。

其所以如此者，可以分幾方面來看，首先看中共方面，達賴在國際間流竄，雖然給中共增加不少困擾，但並未造成傷筋動骨的傷害，區區十幾二十萬流亡藏人成不了氣候，而中共自改革開放後，在經濟上可以「突飛猛進」來形容，從世界工廠一躍而成為世界市場，據媒體報導中共經濟力已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畢竟是最現實的，「德國有一項研究首次發現，中國（指中共）崛起後，進出口貿易有所謂明顯受政治影響的『達賴效應』，西藏精神領袖一旦由某國領導接見，之後該國對中國出口額減幅平均達 8.1%²⁶，任何一個國家出口額減少，對經濟都是

²⁶ 見 2010 年十一月五日台北《聯合報》A25 版。

一項打擊，何況減少 8.1%，並非小數字，會讓各國有感，會讓各國元首是否再玩「達賴牌」慎加考慮，2013 年中共又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海上絲綢之路」（簡稱「一帶一路」或「帶路」）大計畫，又輔之以「亞投行」之設立，對世界經濟影響力，又向前邁一大步，對於達賴或其流亡之政府之言行，根本不加重視，在 1997 年達賴首次訪台前，中共當局對達賴之返回大陸（不是返回西藏），只提出兩個條件：放棄西藏獨立及承認西藏是中國不可分割的領土。但來台後增加了「台灣是中國（指中共）的一省」這個前提，台灣如果還有一些政客想玩「達賴牌」，很可能有一天達賴為了要返回大陸，台灣就很輕易被出賣了。在中共認知裏，從來就沒有所謂西藏問題，有的只是達賴問題，如所周知，縱有不死的靈魂，絕無不死的身軀，達賴問題，將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自然解決，中共不急著解決達賴問題，因為時間沒有站在達賴這邊，因此對達賴返回大陸所提的三個條件（或前提），絲毫沒有鬆動的跡象，拖下去對達賴是不利的，中共只要在經濟方面持續成長，達賴的國際空間會越來越小，中共有足夠的時間可以等待。

接著看國際方面，國與國之間只有利害關係，不存著道義，更談不上情誼，當利害一致時，自然就有了所謂友誼、道義，從歷史上看歐洲國家曾有兩次受到來自東方的侵襲，第一次是西元四世紀下半葉，由中國北方西徙的北匈奴後裔，在首領巴蘭勒領導下，入侵東哥德人領地，引起東哥德人西遷，迫使西哥德人也向西徙，於是引發歐洲民族大遷徙，其事在西元 374 年，其後這部匈奴出現了阿提拉，更是驍勇無比，毫無忌憚肆虐歐洲，間接造成羅馬帝國的崩潰，歐洲史家遂稱這支來自東方的匈奴為「上帝之鞭」，認為是上帝派來懲罰歐洲各民族，自是對來自東方的民族充滿恐懼與敵意。第二次是發生於西元十三世紀的蒙古西征（指窩闊台時的第二次西征）這次蒙古西征可說是殺人遍野血流成河，歐洲遂視東方民族為「黃禍」，並從此對東方民族有了偏見，其實東方（或亞洲）有數十百種民族，而亞洲以中國歷史最為悠久，典章也最為完整，於是歐洲各國就將對西遷的北匈奴、西征的蒙古的恐懼與敵意，全部投射到中國的身上，因此對中國的態度就是要敵對、仇視，不能讓中國統一強大。試看 1817 年（清仁宗顥琰嘉慶二十二年）英國派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Lord

Amherst) 欲到北京朝見嘉慶帝，因未遵中國清朝規定必須從廣州北上，而是從天津進入北京，又因國書放在行李中，行李船未同時到，因此拒絕接見，並命從廣州離境，阿美士德於同年七月一日在聖赫拿島會見拿破崙，拿破崙他說：「中國讓她沉睡，醒來世界就麻煩了。」²⁷從此分化，裂解、麻醉中國，就成了歐美各國對華政策的最高指導原則，中共自鄧小平改革開放後，在經濟上突飛猛進，於是美國又喊出「中國威脅論」，時時刻刻都想著要如何打壓、弱化中共，達賴之逃亡印度，正像一枚可以用來打擊中共的棋子，美國自 1991 年至 2014 年之二十三年間的四位總統（老布希、柯林頓、小布希、歐巴瑪）以各種「不期而遇」的方式，接見了達賴，就是分化、裂解中國（文化、歷史之中國）的具體作法。不過由於中共近三、四十年來在經濟上的成長，一躍而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迫使歐美日各國對達賴之支持，有所收斂，如 2014 年十二月十二日，達賴到羅馬參加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會議時，梵蒂岡教宗方濟各就避見達賴²⁸，但方濟各上任後曾會晤猶太教、東正教領袖，更曾邀以色列與巴勒斯坦領導人齊聚梵蒂岡，而且計畫訪問斯里蘭卡與某佛教領袖會晤，唯獨避見達賴，顯然意在避免刺激中共，何況達賴政治光環日益減弱，已不值得會晤，如再進一步分析，是否天主教教宗已知悉喇嘛教有男女雙修一事，與世界各大正派宗教均有「戒色」一事有關，則不得而知。曾有一份向以反中共著稱之媒體對宗教避見達賴一事，以《教宗私人演講，達賴與會遭拒》為題加以報導²⁹，如從文意上看，達賴似曾要求參與，但遭教宗拒絕，果而，則達賴的「行情」已日見下跌，而且很可能是跌跌不休。

再看美國已行之數十年的每年一度「祈禱早餐會」，2015 年此項早餐會共有三千六百人受邀出席，達賴雖為三千六百人中之一員，但與美國總統歐巴瑪僅「隔空致意」³⁰，並未交談，這種政治行情「利空」，顯還會向下探底。達賴天生睿智，每當他行情下跌時，就會想起玩台灣牌，於

²⁷ 該句話曾刊印於 1958 年十二月，美國《時代雜誌》（TIME）封面上，該封面以毛澤東頭像為主，加上此句拿破崙話語，也有譯之為：「當中國覺醒時，世界也將為之震撼。」

²⁸ 見 2014 年十二月十三日，台北《聯合報》A17 版。

²⁹ 見 2014 年十二月十六日，台北《大紀元報》A3 版。

³⁰ 見 2015 年二月六日，台北《蘋果日報》A30 版。

是在 2014 年十一月就放出空氣，說想來台灣過八十歲「大壽」³¹，這很令人感到怪異，一個四大皆空的出家喇嘛，怎麼會有過壽的想法。美國新任總統川普就任至今（218.7.30）尚未接見達賴，不過川普具商人兼賭徒性格、行事風格怪異，且不按牌理出牌，前此之未接見達賴，並不等於其漠視達賴，2018 年七月川普在荷蘭赫爾辛基會見俄羅斯總統普亭，發表對普亭示好言論，美國國內輿論對之大表不滿，川普原欲邀請普亭於 2018 年底訪美，基於輿論壓力，不得不延遲到 2019 年，川普之對普亭示好，或有戰略考量，按當前川普正對中共進行貿易戰，貿易只是表面問題，真正原因是川普不能接受中共崛起，因此想方設法要將中共打壓下去，聯俄制中遂成為最佳選擇，果而七月下旬，尼克森時代之國務卿季辛吉提出聯俄制中之策，果而如此，則達賴也可能成為川普制中的一棵棋子，對達賴而言，將是鹹魚翻身，但會否朝此方向發展，有待時間證明。

至於達賴方面，其人點慧無比，善於掌握（與玩弄幾乎同意）人們的好奇心，其是否轉世及如何轉世，幾十年來有好幾種版本，或說不再轉世、或說轉世在海外，或說仿照天主教由幾個大活佛選舉十五世達賴（果真如此，則失轉世的本意），甚至還說可能轉世為金髮女娃，又曾說是否轉世，需看藏人的意願，（在傳統西藏社會農牧奴占九成以上，何曾有表達意願的可能，這純屬欺騙世人、尤其是西方國家人民，對「達賴喇嘛」名號由來的不瞭解，又為迎合西方的民主思潮，而瞎說達賴是否轉世，需看西藏人民的意願，這門面話說得漂亮，然而事實全非如此，按格魯派始創者宗喀巴三傳弟子鎖南嘉措與漠南蒙古吐默特部首領阿勒坦汗（或作俺答汗）私人互贈名號，與其他教派無關，與廣大的藏人更無關，這是任誰都無法否定的史實，則其轉世與否與藏人何干，其善於掌握人們的好奇心，而隨口應答本領之高，一搬政客實難望其項背。

關於西藏獨立問題，達賴自 1959 年三月出逃之後，就宣稱西藏重新獨立，並高唱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需知所謂國家主權，是十八世紀歐洲民族國家興起後，始有之觀念與詞彙，西藏如何在還沒有「主權」觀念與詞彙的時候，就宣稱「西藏自古就是主權獨立的國家」，這顯然又是在唬弄世人，美國富庶科技發達這都是事實，既令人敬佩，也

³¹ 見 2014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台北《蘋果日報》A8 版。

令人羨慕，但絕大多數美國人常識不足，連小布希總統都曾拼錯一些字彙，一般美國人對外國歷史、文化可以說是大部份是無知，居然有許多知識分子會相信人世間真有一個「香格里拉」，達賴就利用西方人的好奇心，把西藏說成是香格里拉，使歐美人一時對西藏產生了迷惑、羨慕，一時對流亡藏人給予同情與支持，而達賴也利用西方人這種避世思想，宣揚西藏傳統社會是如何的安祥樂利、如何的無競無爭，「是一個和平、自由、精神、博愛、智慧、慈悲、環保、男女平等，沒有階級、不分貴賤、非暴力，非物質的人間淨土」³²，然而事實是否真如達賴所說西藏就是香格里拉呢？且看前文提奧國納粹分子與海因利希·哈勒，曾在拉薩生活了七年，他於 1950 年代親眼目睹了拉薩大昭寺門口的一個情景如下：

「大昭寺門口盤踞了不少乞丐，他們深知人在神面前是慈愛又體貼的。在西藏，如同在多數其他地方，乞丐是一項公害。在我建霸那段時候，政府決心化乞丐為人力，他集合拉薩千名乞丐，從中挑出七百合於受雇者，安排上工，支付其食物、新資。詎料，第二天就跑掉一半人，再過幾天全跑光了。可見這些人並非因為找不到工作才成為乞丐，多數也沒有身體殘疾。純粹只是因為懶而已。乞討在西藏是項好營生，沒有人會趕乞丐。即使從每位客戶那兒只能得到一些糌粑、一點點錢，兩小時下來的『工作』收入也夠他過一天了。接著他往牆角一靠，在陽光下快樂打起呼來。許多乞丐患重病，處境堪憐，他們利用自己的病態，非要路人關懷不可，這一點又令人不敢苟同」。³³

如果達賴以這個實況，硬說西藏就是香格里拉，這個玩笑開得太大，為彌補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只好不停的說西藏是如何美好，這等於自己被自己所創造的香格里拉給綁架了，這雖然是笑話，卻是活生生的事實。

香格里拉問題就此帶過³⁴，回過頭看達賴對西藏獨立問題如何說

³² 見沈衛榮《妖魔化與神化西藏的背後》台北人間出版社，2013 年，頁 44。

³³ 見 1997 年三月十七～二十日，台北《自由時報》，刁筱華所譯《我與少年達賴》一文。

³⁴ 關於香格里拉，梵語作苦婆羅，藏語作香拔拉，漢語訛為香格里拉。意為保持樂

法，自 1959 年逃離西藏，至 1987 年九月二十一日在美國國會山莊人權小組演說時，所提出五點「和平計畫」，雖未提到「獨立」字樣，但其內容幾與獨立無異，尤以其中第一點「將整個西藏轉型為和平地區」，這區區十二字暗藏無限「機關」，就達賴及其流亡政府而言，所謂西藏，除了當前的西藏自治區外，還包括整個青海省，四川省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甘肅省的甘南藏族自治州，雲南省的迪慶藏族自治州，也就是所謂的大西藏，除西藏自治區外，其他各自治州、青海省，藏族均非主體民族，人口也未占優勢，憑什麼納為「整個西藏」；其次「將整個西藏轉型為和平地區」，更是充滿詭譎，難道除「整個西藏地區」之外，都是戰爭地區？達賴此項說法完全是在愚弄西方社會，反正「和平地區」與歐美日各國無關，但對中國（歷史、文化之中國）而言，三、四百萬平方公里成為化外之區，中共豈能接受，所以「五點和平計畫」無疾而終。

次年（1988 年）六月十五日，達賴又在法國史特拉斯堡歐洲議會發表談話，提出所謂「中道」說法，全文共三千多字，仍然在自說自話，其目的仍在誤導西方社會，不過其中有段話錯的離譜，達賴說：

「中共於 1949 年強行侵略西藏。嗣後西藏就進入歷來最黑暗的時代，一百多萬西藏人民死於中共的佔領。……」

按 1949 年時西藏人口尚不到百萬，怎麼可能有一百多萬西藏人民死於中共的佔領？口作河漢之言，旨在博取西方社會的同情而已。而且在演說中，仍然強調西藏獨立他說：

「每一個西藏人民都在祈禱國家早日完全恢復獨立。數以千計的西藏人民犧牲了他們的性命，整個國家都還在掙扎。……」

這是強烈的藏獨訴求，但是達賴在 2008 年十月三十一日向中共遞送《全體西藏民族實現名副其實自治的建議》闡釋的《前言》中有以下這麼

源，傳說古印度北方的一個人間淨土。地形為圓形，雪山環繞，狀如八瓣蓮花，每瓣有河流貫串其間，為貴種王所領也。見五世達賴著，劉立千譯《西藏王臣記》，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年，劉立千注 49，頁 144。

一段話：

「從 1974 年開始，就西藏的未來地位問題，達賴喇嘛已經在內部會議中討論不尋求獨立，而是通過自治達成妥協和解。」

達賴既然在 1974 年已決定不尋求西藏獨立，何以在十四年後的 1988 年，於史特拉斯堡演說中，仍然說：「每一個西藏人民都在祈禱國家早日完全恢復獨立」，其言論之不一致而且矛盾，抑有甚者，2008 年國際奧運在北京舉行，當奧運聖火在歐洲各大城市巡繞時，藏獨分子如影隨形，對奧運聖火進行干擾，如說幕後沒有強有力的組織在支持，其誰能信，這個幕後黑手，達賴及其流亡政府都脫不了關係，不僅如此，這隻黑手更在暗中鼓動大陸藏區異議藏人進行示威遊行，從 2008 年三月十日至同年四月十九日，一個月又六天，共發動了十五次動亂事件³⁵，揆其目的既在阻擾北京奧運的順利進行，也在訴求藏獨，所謂達賴從 1974 年已不尋求西藏獨立，純屬謊言，與出家人不打誑語背道而馳。

自 2015 年原欲來台度其八十「大壽」，但當年馬政府鑒於達賴每來台一次，撕裂台灣社會一次，因此達賴當年並未來台。自此之後，達賴在國際媒體曝光率漸見減少，已非媒體寵兒，由於其剩餘價值遞減，已呈秋扇見捐態勢，2017 年中印在邊界洞朗地區對峙，雙方劍拔弩張，為時長達兩個多月，期間竟然不見達賴發言，按洞朗地區純屬藏人所有，清時連不丹也為中國藩屬，達賴之未對中印邊界衝突發言，或許有其難言之處，雖然其地實為藏屬，但目前寄居印度，立場至為尷尬，因而選擇緘默，此雖為可以理解者，但領土乃是一切的根本，似不可以緘默，但達賴曾稱自己是印度之子，如果因此而緘默，則大不應該。

又本文完稿後，於 2018 年七月三十日見《自由時報》以《尼泊爾喇嘛逛玉市，襲女臀當街被逮》為標題之新聞（見該報 A13 版），按尼泊爾人不信喇嘛教，流亡尼泊爾之藏人中有為數不少之喇嘛、活佛，多持尼泊爾國護照來台，因此報端稱其為「尼泊爾喇嘛」，實為藏族喇嘛，新聞

³⁵ 詳細動亂事件見文化大學大陸研究所碩士生黃敬平之專題報告，黃氏日前已是桃園市議員，且經常上電視評論時事。

內容大意是指：「自稱從尼泊爾來台參加佛教法會的 42 歲喇嘛，日前逛台北市建國玉市時，竟伸出鹹豬手，偷摸選購玉飾女子臀部，……監視器顯示，上月十七日下午四時許，被害女子在本玉飾攤選購，該名喇嘛從後方閒步走來，原本放在背後的雙手突然放下，並伸出右手，停留在女子臀部附近，做出疑似撫摸動作……警方根據監視器畫面，認定喇嘛有出手襲臀行為，將他移送台北地檢署偵辦。」這則新聞明指喇嘛在大庭廣眾之下偷襲女子臀部，喇嘛教徒常自稱是「藏傳佛教」，按佛教最重視殺、色二戒，近來每年有一、二千人次的「活佛、仁波且、喇嘛」來台，其中大多數規規矩矩宣揚喇嘛教法，但詐財徧色者，也不少見，有關喇嘛、仁波且、活佛觸犯色戒的淫穢邪行，此間媒體也時有報導，但在喇嘛教看來、喇嘛、仁波且、活佛與女子發生性關係，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反而認為性交是一種修方式，十四達賴在其所著《修行的第一堂課》中就說道：

「對於佛教徒（是指喇嘛教信徒）來說，倘若修行者有著堅定的智慧和慈悲，則可以運用性交在修行的道上，因為可以引發意識的強大專注力，目的是為了要彰顯與延長心更深刻的層面，為的是要把力量用在強化空性領悟上。否則僅只是性交，與心靈修行完全無關。當一個人在動機和智慧上的修行已經達到很高的階段，那麼就算是兩性相交或一般所謂的性交，也不會減損這個人的純淨行為。在修行道上已達到很高程度的瑜伽行者，是完全有資格進行雙修，而具有這樣能力的出家人，是可以維持住他的戒律。」³⁶

從上引資料可見喇嘛教根本不認為「出家」喇嘛、仁波且，活佛與異性性交，是犯了色戒，反而認為是一種「修行」的方式，無怪乎一些喇嘛、仁波且、活佛在台灣、美國、加拿大……各地作出淫穢邪行，也就是性侵信徒的犯行，達賴對這種情形，早在 1990 年就已經知道了，據媒體報導，十四世達賴於 2018 年九月訪問荷蘭阿姆斯特丹時，有十多名被喇嘛教的喇嘛（或自稱仁波且、活佛）性侵的受害者，發動請願，要求與正

³⁶ 該書為了乃竺所譯，由先覺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3 年五月初版七刷，頁 177～178。

在歐洲訪問的達賴見面，受害者在請願書中說：「我們敞開心胸，在佛教（指喇嘛教，非正統的佛教）中找到安慰，直到我們遭人以宗教之名性侵為止。」達賴於九月十四日與這些被喇嘛性侵者見面，對於喇嘛性侵信徒事件，達賴於十五日對荷蘭廣播基金會（NOS）表示：「我已知情，這並非新鮮事」，達賴表示：二十五年前，有人在印度達蘭薩拉舉辦的西方佛教僧侶導師，（實際就是喇嘛教的喇嘛、仁波且、活佛）會議上，提到性侵問題及相關指控，達賴表示性侵他人者「不在乎佛陀的訓誡，如今一切公諸於世，人們應該關心他們可恥的行為」³⁷，一派雲淡風輕、不痛不癢的回答，似乎與他無關，這與他主張性交是修行的一種方法有關，所以他不認為出家喇嘛、仁波且、活佛的性侵行為有什麼了不起。

最近美國總統川普（大陸稱之為特朗普）對中國大陸進行經濟戰，希望透過經濟「制裁」中共，以遂美國霸權思維，但中國大陸本身就跟一個市場，雖然川普提高大陸貨物銷往美國的進口稅，會影響到大陸的經濟成長，但關稅的增加，同時也連帶提高大陸貨物在美國的售價，苦的是美國廣大的消費者，經濟「制裁」這一招是否會削弱中共在世界的影響力，尚有待時間的考驗，以川普商人急功近利性格，很可能會想到利用只剩落日餘暉的達賴及其流亡政府，以困擾中共，果而如此，對達賴而言可說是鹹魚翻身，會否朝此方向發展，且拭目以待。

就在本發排之際，台灣《自由時報》於 2018 年十一月一日、二日、四日，分別以不小的版面刊登台灣一個無所不能如 9.21 地震救災善後事宜負責人、兩岸事務負責人、高等教育改革負責人李遠哲（卻又什麼事都沒做好，如今小小的台灣，居然有一百五十八所四年制大學或學院，使許多大學生不具大學生應有的水準），率團到印度，參加由達賴辦公室舉的「達賴喇嘛尊者與華人量子科學家對談」，將與達賴於十一月一日對談，而且表示：盼望來合³⁸。看來沈寂了一年多的達賴，靜極思動，不甘被媒體冷落，又在刷存在感了，或許盼望來台除了可以增加與中共對話的籌

³⁷ 詳情見 2018 年九月十七日，《聯合事》A11 版。

³⁸ 見 2018.11.《自由時報》A5 版，同月二日《自由時報》A10 版，同月四日《自由時報》A7 版，分別以：「李遠哲率團抵印度、今與達賴對話」、「與達賴喇嘛對談，李遠哲：科學要與大自然溝通」、「達賴盼來台與科學家對話，李遠哲：非常歡迎」為標題。

碼外，更可海撈一票信徒的「供養」；但是也可能是蔡政府對兩岸問題一籌莫展之際，想「玩」達賴牌，以刺激中共與台北展開接觸，真正原因如何，目前尚無法確知。不過以近一、二年來達賴不再是媒體寵兒，對半個多世紀來，過活在鎂光燈下的達賴而言，不免感到寂寥，遂興起來合的念頭，畢竟對達賴而言，玩「台灣牌」是投資報酬率最高的把戲，蔡英文政府想玩「達賴牌」，兩者究竟誰玩得過誰，且看後續發。

身體、語言、族群特質：愛新覺羅· 瀛生的滿洲認同研究¹

甘德星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

摘 要

本文擬以愛新覺羅瀛生為例，探討身體、語言、族群特質三者之間的關係。瀛生雖屬天潢貴胄，但他原來並沒有特別在意他的滿洲背景，因此他從童年時朦朧的歸屬感至後來堅定認同於滿族的個人體驗，乃探討身份認同的絕佳例子。從其名字可見，瀛生生於日本。他十二歲時，才「來到」中國。經過王府的「規訓」，其「身體」逐漸滿洲化。滿文便是他住進王府以後才學的。他一生致力於推廣滿文，不但出版多本與滿洲語言有關的書籍，更積極投入滿文教學。不過，最令人驚訝的是，在強調自己是滿族的同時，瀛生晚年又自認是宋室趙氏之後。他的這個「金趙說」應是滿人在近代的排滿氣氛中，將流傳已久的掌故轉化為歷史事實的附會之說，其目的在表明滿漢同源，以合理化其身份轉向。瀛生這種同時認同於兩個互為表裡的並列族群，或可稱之為「包孕認同」。對失根的滿族而言，這種認同是滿人在尷尬的漢化過程中所採取的權宜之計。不過，滿人由於漢化過深，已變成一「虛擬」族群，

¹ 本文撰寫前期，獲臺灣「純智基金會」支助；寫作期間，復蒙北京社會科學院滿學所徐丹俁、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所邸永君、北京滿文書院金寶森院長公子雪麟諸先生惠賜瀛生訪問的未刊稿及相關出版品，特此致謝。由於穆麟德 von Möllendorff 的拼寫法有不能還原成滿文的問題，文內的滿文拼寫乃依據甘德星，〈滿文羅馬字拼寫芻議〉，《滿學研究》，第 6 冊，頁 50-68 的方法轉寫。初稿完成後不久，忽聞瀛生先生於 2013 年 5 月 12 日去世，謹以此文紀念這位傑出的滿文學者。

其最終似亦難逃消融於「中華民族」中的宿命。

關鍵詞：愛新覺羅瀛生、王府、「身體」、族群特質、
中華民族

一、前言

愛新覺羅·瀛生（圖 1）是前清宗室，也是著名的民間滿文學者。本文擬透過他個人的心路歷程，特別是他對延續滿文苟延殘喘生命的執著，²從「身體」的角度切入，³作一個案研究，以反映「後清」滿洲認同的一個側面。

瀛生雖屬天潢貴胄，但他年幼時對自己的滿洲族屬並不特別關心，因此他從原來朦朧的滿洲自覺到自認為滿族的個人體驗，乃探討身份認同的有趣例子。本文討論的材料，除採用我與瀛生 2006 年夏天及其後三次的訪談記錄外，⁴亦參考了兩位學者的訪問文稿，⁵和其他報刊報導。由於相關的文字記錄不多，為存真起見，行文時盡量保留原記錄的文字。在訪談時，瀛生對若干事情，語多保留，亦偶有誤記，所以得藉助其他相關資料以補充、彰顯一些在訪談中不夠明晰之處。就性質而言，這些訪談紀錄可視為瀛生個人所「編織」的「記憶性敘事」（*memorial narrative*）。⁶

² 「滿文」一詞，如同清代的「清文」或「清語」，同時指涉文字和語言兩個側面；而「滿語」，在文章中，除非特別說明與口語有關外，與「滿文」同義。

³ 「身體」除了是可供從外面客觀分析的自然軀體外，也是承載個人主觀經驗和內在情感的場域。有關「身體」，特別是「身體」與「規訓」的研究，可參看 Michel Foucault 的經典著作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⁴ 2006 年後，本人分別於 2007、2008、2010 年夏天三次到北京，向瀛生請教，以釐清、補正訪談內容中若干不夠清楚的細節。

⁵ 徐丹俚，〈音節羅列讀出來的，它不是滿語呀！〉2004（未刊稿）；邱永君，〈瀛生先生訪談錄〉（2006 年），2008 年 11 月（未刊稿）；邱永君，〈瀛生先生訪談錄〉（2006 年 5 月），載《燕情良意》，2009。邱永君《燕情良意》的訪談文稿，與其未刊稿及其〈瀛生先生訪談錄〉（2008 年 5 月），載《民族學名家十人談》，2009 中的版本略有不同，其文稿中所用的資料部分與劉澍所著〈平凡而又非凡的瀛生〉一文相近，該文收入瀛生，《燕情良意》，頁 377-83。我的訪談，雖與徐、邱二先生的文稿內容有重疊之處，但卻可作為彼此之間的相互參照。

⁶ 見 James Olney, *Memory & Narrative: The Weave of Life-Writing*, p.21.

不過，瀛生「感情投注」（emotional investment）所在的滿洲，⁷並非如支持「工具論」學者所謂的「重新發明」及「自我建構」。清代滿洲已存在二百多年，瀛生也知曉他愛新覺羅的背景，他的認同滿洲，可以說是一個基於「原生感情」的認祖歸宗過程，與工具論所主張的「攀附」無關。⁸

作為大清宗室，瀛生的滿洲身份有其代表性。他的家世，⁹於清代相關的文獻如《愛新覺羅宗譜》中彰彰可考。據瀛生（字文蓬）告知，他是1922年11月25日在日本橫濱市出生的。¹⁰他原籍遼寧省新賓縣，即清太祖努兒哈赤（Nurjaci）¹¹祖居之地，隸滿洲正紅旗，即始封王和碩禮烈親王代善（Xošoi dorongyo gungge cin wang Daišan）¹²第三子薩哈廉之後（Saxaliyan）。¹³按輩分，瀛生為努兒哈赤十三世孫。兄仰宸，名文葵

⁷ 滿洲一詞，1635年以前已存在。入關前的滿文資料《無圈點檔子》荒字檔（1613年/萬曆41年癸丑九月）中已有滿洲 manju 稱號的紀錄，而且 manju 一字前另加插 nioji 一字，可見滿洲清楚知道自己與女真的密切關係。見《滿文原檔》（一），頁41。三田村泰助根據滿文《加圈點字檔》，推測早至1600年左右，滿洲一詞已出現。見三田村泰助，《清朝前史の研究》，頁469-73。不過，朝鮮的記載更早。1595年，朝鮮南部主簿申忠一受命至費阿拉 Fe Ala 刺探情報，回國後撰《建州紀程圖錄》，其中的「蔓遮」二字所指即滿洲，見黃彰健，〈滿洲國國號考〉，頁459-473。

⁸ 研究族群認同的學者，往往抱持「原生論」或「工具論」兩種不同的看法，但這兩種原來相互排斥的兩極看法漸有合流的趨勢，如人類學者彭特理（Bentley）利用布爾迪（Pierre Bourdieu）的「慣習」（habitus）理論來調和兩派的學說。可參看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有關「慣習」與族群關係的討論，可參考 G. Carter Bentley, "Ethnicity and Practice," pp.24-55, pp.39—40, 以及 Kevin A. Yelvington, "Ethnicity as Practice? A Comment on Bentley," pp.158-68, G. Carter Bentley, "Response to Yelvington," pp.169-75。

⁹ 參看表1。

¹⁰ 有關瀛生出生日期的記載頗為混亂。2011年6月13日，瀛生就我的相詢回函，指出他的出生日期是中國農曆壬戌年（狗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即民國11年壬戌11月25日，農曆一九二二壬戌年十一月廿五日。此與瀛生在其自撰小傳中記其出生時間是1922年12月25日不同，見戴逸主編，《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傳略》，頁245；《愛新覺羅宗譜》所記瀛生的出生日期為民國12年癸亥11月25日，似亦為誤記，見金松橋纂修，《愛新覺羅宗譜》（六），頁3418。

¹¹ 有關清太祖滿、漢文御名的寫法，可參看甘德星，〈「正統」之源，滿洲入關前後王權思想之發展與蒙藏轉輪王關係考辯〉，頁119-20，注1；Kam Tak-sing, "The Romanization of the Early Manchu Regnal Names," pp.134-37；甘德星，〈滿漢合璧《滿洲實錄》與清太祖滿文御名〉，《中正大學滿洲研究》，2012年4月15日。

¹² 《穆爾哈齊譜錄》，頁284。

¹³ 鞠殿義，《愛新覺羅家族全書》（3），頁27。

(1911-1992)，啟字輩，因其叔無嗣，襲其多羅順承郡王爵，¹⁴為清朝最後一代(第十代)多羅順承郡王，世襲罔替，在八鐵帽子王之中，是唯一由清內務府行文民國大總統府授以鍍金銀冊正式冊封者。¹⁵多羅順承郡王(簡稱順承郡王)，滿語作 Doroi daxasxôn~ daxasun giyôn wang，漢譯達哈蘇王(白話誤稱「達莫蘇王」)，¹⁶daxasxôn~ daxasun 即「順從」之意。¹⁷瀛生之曾祖父曾任領侍衛內大臣，熱河督統，¹⁸曾祖母是原住瀋陽的錫伯族。¹⁹父親長福(壽卿)，以貢生資格赴日留學，清末駐日本神戶兼大阪理事官(後改稱領事)，²⁰與梁啟超、康有為、陳寶琛遊，支持君主立憲，保皇但無意於政治。²¹庶母王氏乃杭州駐防八旗王福之女。²²叔父是順承郡王訥勒赫(字樂莊)(圖 2)，²³孀母是慈禧太后的娘家三侄女，即光緒帝皇后隆裕太后之妹。繼娶的孀母是崇厚(字地山)之女，完顏氏。²⁴表哥傅涇波(Philip C. Fugh, 1900-1988)，隸頭甲喇三牛彖，曾任燕京大學校務長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的秘書，²⁵其子

¹⁴ 金松橋纂修，《愛新覺羅宗譜》(六)，頁 3412、3417。

¹⁵ 《燕情艮意》，頁 387；銀冊形式和冊封儀式，可參看文仰宸，〈記憶中的順承郡王府和我襲爵的經過〉，頁 253-56。

¹⁶ 「達莫蘇」，金啟孫謂即滿文的 *demesi*，意即驕傲自大，見馮其利，《尋訪京城清王府》，頁 58。

¹⁷ 《燕情艮意》，頁 394。

¹⁸ 《燕情艮意》，頁 389。

¹⁹ 徐丹俔，〈音節羅列讀出來的，它不是滿語呀!〉，頁 2。

²⁰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合編，《清季中外使領年表》，頁 77；瀛生，《燕情艮意》，頁 389。

²¹ 徐丹俔，〈音節羅列讀出來的，它不是滿語呀!〉，頁 8；瀛生，《燕情艮意》，頁 389。

²² 王氏是長福的妾，其嫡妻是沙濟富察氏，繼妻是蒙古博羅特氏。見金松橋纂修，《愛新覺羅宗譜》(六)，頁 3417-18。

²³ 金松橋纂修，《愛新覺羅宗譜》(六)，頁 3417。

²⁴ 瀛生，《燕情艮意》，頁 387。

²⁵ 瀛生，《燕情艮意》，頁 394。民初，按教育部的規定，只有華人始能擔任中國大學的校長，所以司徒雷登 1919 年雖受聘為燕京大學首任「校長」，但他的職稱卻是「校務長」，中國政府正式任命的校長是晚清翰林吳雷川。不過，對美國托事部 Board of Trustees 而言，大學的「校長」President 是司徒雷登，吳雷川只是「名譽校長」Chancellor。見燕大文史資料編委會編，《燕大文史資料》，第 3 輯，頁 227、229、234，John Leighton Stuart, *Fifty Years in China: 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 p.72；Susan Chan Egan: *A Latterday Confucian: Reminiscences of William Hung (1893-1980)*, p.129；陳毓賢，《洪業傳》，頁 157；

傅履仁（John L. Fugh，1934—2010），1993 年在美國以陸軍少將退役。²⁶

不過，瀛生卻生不逢時。他所處的時代，正值滿洲遜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相繼而起之時。雖然這兩個由漢人主導的共和國，並沒有漠視滿族的客觀存在，但二者也沒有刻意要突顯、強化其日漸消亡的族群特質（ethnicity）。相反，這兩個新興的共和國卻企圖利用滿洲已經漢化，並已喪失其民族特質的事實，將之積極整合至建構中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之中，以便其最終能「融合」為現代中華民族的一員。²⁷職是之故，瀛生的滿洲「身體」注定要活在「後清」滿族本身的持續漢化以及國族主義的雙重陰影下。

二、「身體」的「滿洲化」：郡王府的「規訓」

朦朧的滿洲「身體感」

1934 年，即滿洲國成立後二年，瀛生約 12 歲，由於中日關係惡化，橫濱領事館派人把他從日本帶回中國。回國後入北京市第一中學，²⁸與滿語、錫伯語專家李樹蘭的哥哥同學。但瀛生強調他並非回國，而是「來到」中國。其時，中國對他而言，全然陌生。他的母語是日語，²⁹漢語與滿語都是到中國後才學的。因為在日本當地生活，所以受到日本文化的感染也較深。他說現在脾氣有時較壞，即日本人所謂的「短氣」，乃是其「島國根性」使然。³⁰儘管在日本出生和成長，他對自己的滿族身份不可能完全沒有感覺。他的滿洲名字愛新覺羅·瀛生就是一個很明顯的民族標記。不過，瀛生說，畢竟當時年紀還小，他對自己的滿族身份並不關心，滿族不滿族對他來說並不重要。由於這個滿族身份，與他在日本當地的生活，絕少關聯，只存在於他大腦的底層，可以暫時擱置，甚至隨時遺忘，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pp.65、108、130。

²⁶ 徐丹俤，〈音節羅列讀出來的，它不是滿語呀!〉，頁 7；《燕情良意》，頁 376。

²⁷ 參看 Shao Dan, *Remote Homeland, Recovered Borderland*, Chapter 4, pp.158-163, Chapter 5, and Chapter 6; Edward Rhoads,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pp.252-284。

²⁸ 瀛生，《燕情良意》，頁 390。帶瀛生回國的人，粵籍，姓林，名字不復記憶。

²⁹ 徐丹俤，〈音節羅列讀出來的，它不是滿語呀!〉，頁 2、11。

³⁰ 徐丹俤，〈音節羅列讀出來的，它不是滿語呀!〉，頁 4。

所以只算是他的「象徵性族屬」。³¹

「到」了中國以後，一直埋藏於他心內的「滿洲特質」³²逐漸轉化為滿族認同，並將原來的日本文化從其「身體」中壓擠出來。在訪談中，瀛生極力與昔日的日本經驗切割，絕口不談在日時的種種，如他的日本名字、所讀的學校³³，即是明證。唯一提到的是他父親死於 1923 年（即他出生後一年）的關東大地震，及養父森田氏對他的幫忙。³⁴這些都是一些與日本化「身體」無涉的事實。瀛生雖然偶爾提到想回到日本居住，但這只是他對年輕時無憂無慮生活眷戀的反映，與日本認同沒有關係。在我和他接近 30 年斷斷續續的談話中，他從無提及以當日本人為榮，他旁邊的朋友或其他學者也從沒議論過他有親日的傾向。³⁵

滿洲「身體」的「重現」

瀛生「到」中國後，就回到多羅順承郡王府居住。這是他「身體」重新滿洲化的開始。³⁶王府有兩個。一個座落在西城太平橋大街路西，是原

³¹ 所謂「象徵性族屬」(symbolic ethnicity)即平常不以滿族自居，而以另一種身份出現，在特定日子，如節日、族人聚會時始恢復其原來的滿族身份。見 Herbert J. Gans, *Making Sense of America: Sociological Analyses and Essays*, pp.167-202.

³² 柯嬌燕 Pamela Crossley 以為 Manchuness「滿洲特質」一詞，相對於滿文的 manjurarengge。其實，此字按母音和諧律應寫作 manjurarangge，即 manjurambi 的動名詞；manjurarengge 為柯氏的誤記，滿文無 manjurarengge 一字。俄國滿文學者 Liliya M. Gorelova 指出 manjurarangge 這個字，可在 P. G. von Möllendorff, *A Manchu Grammar with Analysed Texts*, 頁 32（正確的頁碼應是頁 31）找到用例，但卻不敢遽以為非，只婉轉地說 manjurarengge 是 manjurarangge 的變體。見 *Manchu Grammar*, p.26, 注 18。此外，滿文 manjurambi 的意思是「裝作滿族人」（見胡增益，《新滿漢大詞典》，頁 527），與柯嬌燕所說「滿洲特質」的語意並不完全吻合。

³³ 在邱永君的訪談中，瀛生說他就讀於神戶第一小學。見邱永君，〈瀛生先生訪談錄〉，《燕情良意》，頁 389。

³⁴ 徐丹俔，〈音節羅列讀出來的，它不是滿語呀！〉，頁 8；瀛生，《燕情良意》，頁 389。

³⁵ 近代的滿洲皇族，從溥儀起到他身旁的親族大臣，表面上和日本關係密切，但其實都痛恨日本人。溥儀的父親載灃和叔叔載濤都不願意留在滿洲國和日本人合作，見 Edward Rhoads, *Manchus & Han*, p.273。毓璽「對日本恨之入骨」，殺日本人更絕不手軟，見許仁圖，《長白又一村》，第 4 章，頁 141、146、151；張輝誠，〈毓老真精神〉，頁 49，注 11。瀛生的哥哥文葵對日本人的所作所為也頗有微言，見張嘉鼎，〈末代王爺——文仰辰〉，《人物春秋》，頁 11-12。溥傑即因娶日本人為妻，後人又在日本定居，以致不能回祖廟拜祭，見《長白又一村》，頁 151。

³⁶ 瀛生說他是回到王府後才受到滿洲文化的影響的。見徐丹俔，〈音節羅列讀出來的，它不是滿語呀！〉，頁 5。

來的王府，面積約 3000 平方米，³⁷始建於勒克德渾在順治三年(1646 年)封爵時，其格局一直到近代無大改變(圖 3)。³⁸一個在東城鼓樓的王佐胡同³⁹，規模比原王府小，是離開舊邸後搬過去的。⁴⁰

原王府基本是按《大清會典》所規定的府邸規模建築，⁴¹共分成三個部分：中路正所是主體建築，東西兩路，即東所和西所，是附屬建築，沒有一定的規制，可自由配置。⁴²王府座北朝南，北面抵麻線胡同，⁴³南面為正門，⁴⁴面闊五間，即現今全國政協機關之大門，政協的禮堂是原來王府的花園。⁴⁵由於正門與六部衙門的正門建築是一樣的，所以王府又稱為「大衙門」。⁴⁶

從《乾隆京城全圖》所見，王府中路是主要建築，在進正門後，尚有與之相連的左右各面闊九間的倒座房；面闊五間的大殿，即所謂的「銀安殿」，有丹墀，面闊各五間的翼樓；面闊三間的後殿(過廳)；面闊五間的後寢及面闊各五間的東西配殿；面闊九間的後罩樓。⁴⁷正殿內不設屏座，梁棟繪金彩花卉，四爪雲蟒。門釘四十五枚，壓脊五種。⁴⁸除正殿為

³⁷ 王梓，《王府》，頁 100。

³⁸ 文仰宸，〈記憶中的順承郡王府和我襲爵的經過〉，頁 247。

³⁹ 原作王作兒胡同，宣統時始改稱王佐胡同。

⁴⁰ 張嘉鼎，〈末代王爺——文仰宸〉，頁 11。

⁴¹ 與其他王府不同，這個郡王府沒有所謂的「獅子院」，因為正門前沒有一般王府應有的一對大石獅子。王府正殿前種有四棵高大的楸樹，據說是明代遺留下來的，這又與其他王府正殿前不種樹者不同。見文仰宸，〈記憶中的順承郡王府和我襲爵的經過〉，頁 247。

⁴² 文仰宸，〈記憶中的順承郡王府和我襲爵的經過〉，頁 248。參看葉明、石軍，《正說清初十大貴族》，頁 133-34。

⁴³ 見昭槤，《嘯亭續錄》，卷 4，〈京師王公府第〉，頁 509。麻線胡同即今太平橋大街北段路西大麻線胡同。

⁴⁴ 王府南牆外原為扁擔胡同，與順承恭惠郡王勒克德渾的親弟貝勒杜蘭的府邸相望，今杜蘭貝勒府已全部拆除，扁擔胡同亦因而同時消失，成為了武定胡同的一部分。《乾隆京城全圖》上標注的「輔國公興寧」是貝勒杜蘭的曾孫。

⁴⁵ 花園於 1952 年拆除改建政協禮堂。見瀛生，《燕情良意》，頁 351。

⁴⁶ 文仰宸，〈記憶中的順承郡王府和我襲爵的經過〉，頁 248。

⁴⁷ 《乾隆京城全圖》所載似與乾隆朝《欽定大清會典》，卷 72，頁 4a/643 所記後殿五間，後(罩)樓亦五間，以及文仰宸〈記憶中的順承郡王府和我襲爵的經過〉，頁 249-50 所記正殿、後殿、後(罩)樓各為七間不合。此應為 1926 年張作霖入據王府後所改建。見王梓，《王府》，頁 207。

⁴⁸ 乾隆朝《欽定大清會典》卷 72，頁 4b/643；崑岡，《清會典事例》，第 10 冊，卷

重簷、起脊、琉璃瓦外，其他房屋都是起脊，有鴟吻、筒瓦的建築。⁴⁹東、西路則有院落數進。東所有回事處(相當於傳達室)、會客用的隨安堂和陳華館、馬號。西所有保管與宗人府等各機關往來公文的番單檔房、神殿、影堂(即家廟或祠堂)。⁵⁰王府的東西側門 *asxa duqa* 是三間筒瓦、有脊、有鴟吻的建築。⁵¹東側門開在南溝沿，⁵²斜對豐盛胡同，西側門開在錦什坊街(即明代之金城坊街)。⁵³側門白天全開，車馬不准通行，但普通行人可以往來穿過，所以王府又名曰「穿堂府」。⁵⁴

辛亥遜國後，滿洲不得不屈從於漢人的「霸權」之下，王府瞬即成為漢人覬覦之物。1919年，民國政府因軍閥混戰，原來的年俸停發，王府落入了皖系軍閥徐樹錚之手，為其租用作為其西北籌邊使署。⁵⁵1920年，直皖戰爭後，王府又以七萬五千大洋「賣」了給奉系的張作霖，作為其在北京的「大帥府」。但據瀛生所言，張作霖從未付過錢。⁵⁶30年代，王府又被改為高等工業學校校舍。⁵⁷王府雖然陸續為他人所據，但瀛生依稀記得，在搬至王佐胡同前，其家族仍佔住原王府的部分。⁵⁸不過，

869，頁 2b/81。

⁴⁹ 文仰宸，〈記憶中的順承郡王府和我襲爵的經過〉，頁 250。

⁵⁰ 文仰宸，〈記憶中的順承郡王府和我襲爵的經過〉，頁 250-52。

⁵¹ 文仰宸，〈記憶中的順承郡王府和我襲爵的經過〉，頁 248。

⁵² 文仰宸，〈記憶中的順承郡王府和我襲爵的經過〉，頁 246-47。「溝沿」，見於《乾隆京城全圖》，以馬市橋為界，南面稱南溝沿，北面的稱北溝沿。1937年分別改名為佟麟閣路和趙登禹路。見葉明、石軍，《正說清朝十大貴族》，頁 133。

⁵³ 瀛生，《燕情艮意》，頁 386。

⁵⁴ 文仰宸，〈記憶中的順承郡王府和我襲爵的經過〉，頁 247。

⁵⁵ 文仰宸，〈記憶中的順承郡王府和我襲爵的經過〉，頁 247；竇如忠，《北京清王府》，頁 68。

⁵⁶ 文仰宸，〈記憶中的順承郡王府和我襲爵的經過〉，頁 248；徐丹俚，〈音節羅列讀出來的，它不是滿語呀！〉，頁 6；愛新覺羅毓嶠，《愛新覺羅毓嶠回憶錄》，頁 253。

⁵⁷ 1949年以後，王府成為全國政協辦公處所。1952年王府南面之花園改建成政協禮堂大樓。1994年，王府拆遷，部分建築物移至北京朝陽公園重建，可惜並未按王府原來的格局排列，而且門前加了牌樓，後部又加建了花園，已非王府原貌。參看邸永君，〈瀛生訪先生談錄〉，《燕情艮意》，頁 388。拆遷前的郡王府平面圖，可參看馮其利、楊海山、王林，《順承郡王府資料》，2005，頁 16-18。

⁵⁸ 鞠殿義，《愛新覺羅家族全書》(3)，頁 27 謂 1924 年，王府繼馮玉祥驅逐溥儀出宮後，遷至王佐胡同，似為誤記。邸永君在〈瀛生先生訪談錄〉中記曰：「回京後，我（瀛生）即入北京第一中學……當時我住在北京的順承郡王府（今政協禮堂），

王府給漢人佔用的不愉快經驗，⁵⁹再加上在王府外，因滿洲國的成立而加劇的反滿、排滿氛圍，⁶⁰讓剛回國的瀛生確切地認知到他的滿洲人身份。

瀛生的青年期是在郡王府渡過的。青年期是人生成長可塑性最高的時候。對瀛生而言，這個沿襲了二百多年滿洲傳統的王府，儼然是個「規訓」的新世界。⁶¹在漢人的汪洋大海中，王府猶如一座保守的滿洲孤島。在這個封閉的空間內，個人的一切言行舉止，得循規蹈矩，⁶²不能乖離滿洲本習。⁶³這和傅柯（Foucault）所指出的工廠、學校、醫院、軍營等完全被掌控的規訓場所無異。若說王府是規矩森嚴的紫禁城的縮影也不為過。⁶⁴

上學先乘車至平安里（經太平莊），轉四路有軌電車，寶鈔胡同下車，往北走到學校，來回約 2 小時」（見瀛生，《燕情良意》，頁 390，此與《民族學名家十人談》的版本，頁 198，所記略有不同）。從地理位置和車程可以判斷，這個王府不是後來遷去的王佐胡同王府。舊王府在城西，與位在城東的學校有一段距離，若在城西的平安里換車上學，比較符合從政協禮堂出發往東走的交通動線；王佐胡同和北京（市）第一中學都在城東，兩者相隔不遠，乘車來回二處需兩小時並不合理。因此，瀛生曾住在舊順承郡王府的記憶應無誤。其時，瀛生應與王府的其他人擠住在後跨院。在搬到王佐胡同的新王府前，順承郡王一家曾在城東的東四三條一間民宅住了不足一年。見龍翔、泉明，《最後的皇族，大清十二家“鐵帽子王”逸事》，頁 93、95。末代禮親王金睿銘的情形與瀛生家相似。1927 年，華北大學曾租用禮親王府作校舍，但金睿銘全家仍住在王府的後半部。1934 年，禮親王府售與「滿鐵」後始搬遷至他處居住。見金寄水、周沙塵，《王府生活實錄》，頁 12；王梓，《王府》，頁 212。參看徐丹俔，〈音節羅列讀出來的，它不是滿語呀！〉，頁 5。民初，王府一類的宅第，由於面積廣大，多可按經濟清況，逐部切割分售。奉恩將軍崇斌的府第，便是「一進一進地賣」。見金玲，〈懸案與解答（落葉歸根）〉，頁 14。有趣的是，大清遜帝溥儀，雖住在紫禁城內，但被逐出宮前，也只能住在乾清門以北之地，其以南之地基本上屬民國政府所有，見 Edward Rhoads, *Manchus and Han*, p.233。

⁵⁹ 參看龍翔、泉明，《最後的皇族，大清十二家“鐵帽子王”逸事》，頁 95 所記瀛生兄長文葵對民國時王府被「霸佔」的憤慨。

⁶⁰ Shao Dan, *Remote Homeland, Recovered Borderland*, Chapter 2; Chapter 4, pp.158-63。

⁶¹ 徐丹俔，〈音節羅列讀出來的，它不是滿語呀！〉，頁 4-6。王府生活的細部敘述，除了金寄水、周沙塵合著的《王府生活實錄》外，尚可參看孫喆鈺，《中國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傳》，頁 32-43 有關醇親王府的記載。

⁶² 據金寄水、周沙塵，《王府生活實錄》頁 40、213 所記，「王府規矩甚嚴，對稱呼尤甚」，「長幼尊卑有序，十分嚴格」。

⁶³ 談到王府的繁文縟節，瀛生說：「長輩叫做，我也做。覺著可笑，但不做不成。」見徐丹俔，〈音節羅列讀出來的，它不是滿語呀！〉，頁 5。

⁶⁴ 王府的規制和禮節多沿襲自清宮，宮中府中實為一體。見金啟琮，《金啟琮談北京的滿族》，頁 196。王府的正殿之所以名叫銀安殿就是從紫禁城正殿金鑾殿（太和殿）的名字衍生而來。王府的影堂，其內部格局與皇室祭祖用的家廟奉先殿相似。

王府的主人，即瀛生的兄長文葵，滿族意識極強，他自認是「亡國奴」，堅拒為民國政府服務。⁶⁵1936年，更毅然往投成立不久的滿洲國，因為這個國家的名字中有個「滿」字，讓他聽了有親切感。到了東北後，文葵在軍官訓練處學炮兵。訓練期滿後，分發到瀋陽炮兵隊任隊副，官拜少尉，但未幾因痛恨滿洲國為日人所控制，遂憤而辭職，退隱田園。

66

瀛生回憶說，他回到王府時，溥儀雖然早已被逐出宮，但滿洲的雰圍仍在。王府依然如清朝遜國前一樣，配備有漢人太監、護衛等等，只是人數較少而已。王府在農曆新年時舉行的慶節活動，多具滿洲特色，其中之一即所謂的「倒仰頰」（doo-yang-ke）。「倒仰頰」，早在康熙時便已有記載，但近代知道的人已經不多。據瀛生說，這是新年時，滿洲男人模仿年長婦女，頭往後仰的一種滑稽歌舞。⁶⁷

祭祖是王府逢年過節（如冬至、除夕、四孟月）必定舉行的儀式，而且只有族人才能參加。⁶⁸瀛生在訪談時雖並未提及祭祖之事，但王府既然設有影堂，祭祖又是王府的大禮，他必定參加過這個重要儀式。通過祭祖

見金寄水：《王府生活實錄》，頁46。王府的神殿位於銀安殿後，一如紫禁城內的坤寧宮之位於乾清宮後。康熙57年，清廷停止宮中朝夕祭後請神回府祭祀之規定，改由各王府自行祭祀。因此，王府薩滿祭祀的佈局、時間、儀式、祝詞亦與坤寧宮相同。見周勁思，〈恭王府宗教生活初探〉，頁71，苑洪琪，〈清代宮廷祭祀對王府的影響〉，頁16-21。

⁶⁵劉小萌，《愛新覺羅家族全書》（1），頁458；楊學琛、周遠廉，《清代八期王公興衰史》，頁403；龍翔、泉明，《最後的皇族，大清十二家“鐵帽子王”逸事》，頁95。民國初期，滿洲權貴之與民國政府誓不兩立者不少。愛新覺羅·溥儒，即名畫家溥心畬（1896-1963），道光皇帝的曾孫，恭親王奕訢次孫，便從不用民國紀年，而以「舊王孫」自居。見侯芳，〈筆墨留聲 風物銘心—溥心畬和他的書畫〉，頁309。

⁶⁶張嘉鼎，〈末代王爺——文仰辰〉，頁11-12；鞠殿義，《愛新覺羅家族全書》（3），頁27；楊學琛、周遠廉，《清代八期王公興衰史》，頁403。

⁶⁷有關 doo-yang-ke，康熙時 Zengšeo, Beye-i cooxa bade ejehe bithe 中有相同的解說，見季永海譯注，曾壽著，《隨軍紀行譯注》，頁99。但季著不知 doo-yang-ke 即「倒仰頰」，於頁1直譯之為「禱仰科」，而據季著繼作的 Nicola Di Cosmo, *The Diary of a Manchu Soldi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p.117n5 更是望文生義，將之誤解作「跳秧歌」。

⁶⁸有關王府祭祖的情形，如「影堂」的佈置、懸影、祭祖的規模、程式、逢年過節的祭拜活動、全家男女老少（十歲以上）的參與等等，可參看金寄水，《王府生活實錄》，頁10、30、46、66、71-73；彭林，〈論清代王府祭祀制度中的中原文化因素〉，頁251-57。

之禮，瀛生的「身體」得以重新納入愛新覺羅穆昆哈拉（muqôn xala）之內，為其後繼。由於祭祖是週期性的活動，瀛生的「身體」也得周而復始地按照拜祭儀式的規定，作出王府刻意設定的「身體」動作，如男先女後、長幼有序、兩跪六叩，⁶⁹在莊嚴肅穆的雰圍下，行禮如儀，其滿洲認同，亦因這些異於平常、年復一年的「身體」實踐，而得以透過與祖先的例行聯繫，不斷獲得確認、提醒，並日漸強化加深，成為記憶的一部份。

王府的薩滿祭天祭神也起著同樣的形塑作用。府內的薩滿祭祀屬家祭，參加者都有血緣關係，其儀式有時包含祭祖、續譜的活動。⁷⁰與祭祖儀式一樣，薩滿祭天祭神是年中的重複性活動，春秋二季都有例祭，但以秋祭為重，其進行時程（如朝祭、夕祭完了祭天，後再作求福祭）⁷¹和在儀式中所做的「身體」動作（如冠服穿戴，序立進退，進牲下跪，祭後享胙），⁷²基本上都受乾隆時編製的《欽定滿洲祭天祭神典禮》（Hesei toqto buxa Manjusai wecere metere qooli bithe）所規範。⁷³透過例行祭天祭神儀式的參與，瀛生的「身體」被重複導入滿洲的傳統之中，並被重塑改造。當時王府內仍設有神殿、索羅杆（somo），又有薩瑪（sama(n)）多人，這和民國時，其他王府多已沒有「家薩瑪」，且薩瑪不能用滿文唸祝詞者大不相同。⁷⁴瀛生的外祖母便是府中的薩瑪之一。按規定，外姓婦女是不能成為王府內的薩瑪的。⁷⁵他說坤寧宮的滿文薩蠻神歌就是從外祖母

⁶⁹ 金寄水，《王府生活實錄》，頁 72-73；彭林，〈論清代王府祭祀制度中的中原文化因素〉，頁 255。

⁷⁰ 愛新覺羅瀛生，《滿語雜識》，頁 1003-05；富育光、孟慧英，《滿族薩滿族研究》，頁 70-71。

⁷¹ 姚元之，《竹葉亭雜記》，收入《清代史料筆記叢刊》，頁 60—63；富育光、孟慧英，《滿族薩滿族研究》，頁 73-80。

⁷² 索寧安，《滿洲四禮集》，收於《續修四庫全書》，卷 824，頁 743/1a、747/8a、749/1b、758/20a、767/37a、767/40a-b、823/1a-2a 以及《滿洲家祠祭祀儀注》，頁 824/3a-b、825/5a-6a、830-31/16a-18b；周勁思，〈恭王府宗教生活初探〉，頁 73-75。

⁷³ 富育光、孟慧英，《滿族薩滿族研究》，頁 54-59；宋和平、孟慧英，《滿族薩滿文本研究》，頁 94—107。

⁷⁴ 金啟琮，《金啟琮談北京的滿族》，頁 240。

⁷⁵ 愛新覺羅瀛生，《滿語雜識》，頁 1004；富育光、孟慧英，《滿族薩滿族研究》，頁 51。

那裡學來的。他對坤寧宮的薩蠻神歌頗有研究，且親自誦唱錄音存世。⁷⁶

滿洲的民族標誌「清語騎射」仍是府中勉力維持的傳統之一。瀛生還記得其兄長曾於王府南面花園拉弓，由「諳達」(anda)⁷⁷一人陪同練習。當時府中的長輩都用滿語交談。⁷⁸瀛生說其兄長六歲入王府，除了漢文外，也得學滿文；而他自己進了王府以後，漢文以外，也得同時學習滿文。⁷⁹他的老師阿克敦布(Aqdunbu，字子堅)就住在王府內。⁸⁰阿克敦布即所謂的「同光六賢」之一，⁸¹是其叔納勒赫(字樂莊)郡王的伴讀。⁸²在阿克敦布的督導下，他學過的滿文教材包括《清文啟蒙》(Cing wen ki meng bithe)、《清文接字》(Cing wen jiye zi' bithe)、《清文虛字指南》(Manju gisun-i untuhun hergen-i temgetu jorin bithe)、《十二字頭》(Juwan juwe ujui bithe)、《三字經》(Ilan hergengge nomun bithe)、《四書》(Si" Šu)以及諸經，還有必須天天背誦的「話條子」。⁸³所謂「話條子」，即塾師教授滿文時所編的教材。他說他收藏的「話條子」就多達一百多本。⁸⁴由於日語與滿語相近，瀛生的滿語進步神速，漸至日常生活也多說滿語，⁸⁵從而對滿洲舊俗也發生了興趣。瀛生說他兄長的滿文

⁷⁶ 萬依、黃海濤，〈清代宮中坤寧宮祀神音樂〉，頁 235；愛新覺羅瀛生，《滿語雜識》，頁 853-80。

⁷⁷ 「諳達」即教授騎射的八旗武員，見昭槤，《嘯亭續錄》，卷 2，頁 432。滿文 anda 一詞源自蒙文之 anda，即結拜弟兄、友人之意，故亦譯作「賓友」。

⁷⁸ 徐丹俚，〈音節羅列讀出來的，它不是滿語呀!〉，頁 1。

⁷⁹ 徐丹俚，〈音節羅列讀出來的，它不是滿語呀!〉，頁 2—3、6。瀛生第一次接觸到自己的「母語」滿洲語是 9 歲（1931 年）的時候，但正式有系統地學習是到了王府後才開始的。見李楊，〈滿語，丟失的歷史密碼〉，《羊城晚報》，2012 年 1 月 7 日，B6。

⁸⁰ 徐丹俚，〈音節羅列讀出來的，它不是滿語呀!〉，頁 6。阿克敦布，蘇完尼瓜爾佳氏，正紅旗頭甲喇，曾任王府諳達及正黃旗官學滿文教師。見愛新覺羅瀛生，《滿語雜識》，頁 262、957。

⁸¹ 「同光六賢」是晚清的著名滿語學家，「六賢」中的其他五人為樸厚 Puheo，字力田、舒明阿 Šumingya，字伯淵、依克坦阿 Iqtangya，字厚存、尼瑪善 Nimašan，字翔德、倭和 Wehe，字仲岩。

⁸² 徐丹俚，〈音節羅列讀出來的，它不是滿語呀!〉，頁 6。

⁸³ 徐丹俚，〈音節羅列讀出來的，它不是滿語呀!〉，頁 2；愛新覺羅瀛生，《滿語雜識》，頁 960。

⁸⁴ 這些「話條子」或是家傳、或是師贈、或是自購，但不幸於文革時全部丟失。見愛新覺羅瀛生，《滿語雜識》，頁 961-62。

⁸⁵ 愛新覺羅瀛生，《滿語雜識》，頁 960。

成績絕不能與他相比，連初學滿文必識的「十二字頭」都不懂。有一次，大概是 1980 年代末，其兄長見了瀛生，曾拿著手中的滿文書，問他書內的滿文字是第幾字頭，瀛生對他兄長說：「您好好休息休息吧！」認字以外，他兄長的滿文發音也強差人意，如他兄長把他們曾祖父曾擔任過的 *hiya qadalar dorgi amban*（領侍衛內大臣）讀作 *siya cadalar dorgi amban*，即為一例。「身體」語言，像請安、叩頭⁸⁶一類以前在日本不用緊隨的滿洲禮數，現在也得一一遵守。⁸⁷

自回到王府以後，瀛生的「身體」便被滿洲傳統種種繁文縟節所規限，換句話說，他的「身體」被完全置入了王府所定義的「滿洲」語境中。在王府的「凝視」下，他的「身體」變成一個不得不隨時警惕，甚至是恆常自我「凝視」的「馴服身體」（docile body）。⁸⁸這個被「凝視」的「身體」，得恪遵府中的滿洲舊俗(*Manjusai fe doro*)，身體力行，在規定的時程內，適時作出相應的動作，以與王府的整體結合，否則便成了偏離祖宗遺規的「異物」。透過王府日復一日的「規訓」，瀛生原來在孩童時期朦朧的滿洲意識逐漸內化為「身體」的有機部份，並得以「重現」，最終讓他變成了「被看見」的「滿洲人」。王府，對瀛生而言，一如其所在的北京城，⁸⁹已不再是一個遙遠、無意義的陌生「空間」，而是一個他感情依附的「地方」。⁹⁰

⁸⁶ 「請安」的「身體」化，包括「蹲兒安」（亦稱「行萬福安」）、「單腿安」（即「打跄兒」，俗作「打韃」）、「雙腿安」、「接安」等不同形式，見金寄水、周沙塵，《王府生活實錄》，頁 193，金啟琮，《金啟琮談北京的滿族》，頁 198，趙展，《滿族文化與宗教研究》，頁 263--64。其他滿洲王府禮節，可參看趙展，《滿族文化與宗教研究》，頁 256—66。

⁸⁷ 徐丹俔，〈音節羅列讀出來的，它不是滿語呀！〉，頁 5。

⁸⁸ 參看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Jacques Laca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⁸⁹ 1961 年 3 月，即使瀛生被調任至鎮江農業機械學院任教，但未幾，基於對滿族的情感，即回到滿人聚居的北京居住。見戴逸主編，《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傳略》，頁 247。

⁹⁰ 「地方」place 與「空間」相對。「空間」是客觀的、一般的、開放的；「地方」space 是主觀的、特殊的、封閉的。當人在「空間」停留，並與之互動，空間便有了意義，成為情感聯繫所在的「地方」，即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所謂的「關懷之處」field of care。參看 Yi-Fu Tuan, "Space and Place: Humanistic Perspective," in S. Gale and Gunnar Olsson, eds., *Philosophy in Geography*, pp.412-419; Tim Cresswell, *Place : A*

滿洲「身體」的對立面

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中央對滿族的態度較國民政府積極。1952年，滿族被人民政府界定為相對於漢族的 55 個少數民族之一。⁹¹瀛生在王府重新發現的滿洲「身體」，從民國「五族共和」中滿族的個體，⁹²變成為「統一多民族國家」內滿族整體的部分。按 1953 年的官方統計，滿族人口便達一百五十萬。⁹³1954 年，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中，老舍、羅常培被任命為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溥儀的七叔載濤則成為北京市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⁹⁴1956 年 2 月 18 日，按照國務院頒佈〈關於今後的行文中和書報雜誌裏一律不用“滿清”的稱謂〉的通知，「滿清」一詞停用，因為滿族與腐敗之清朝和反動的滿洲國無關。⁹⁵雖然滿族在民國時期的隱蔽身影從此得以「再現」，但滿族實質上已淪為民族大團結下的陪襯品。⁹⁶

文化大革命期間，瀛生一直苦心經營並引以為傲的滿洲「身體」，卻不幸地讓他變成「異類」，並被標籤為國家的叛徒、人民的敵人。有關這場政治運動，瀛生不欲多談，只提了兩件事。一是家傳多羅順承郡王鍍金銀冊⁹⁷被紅衛兵鈔走，⁹⁸二是由於其滿洲權貴之身分而受的牢獄之災，⁹⁹

Short Introduction, introduction and chapter 2.

⁹¹ 《滿族簡史》修訂本編寫組，《滿族簡史》，頁 201。趙書，〈北京滿文書院〉，頁 463。

⁹² 民國成立不久，前清的滿人已開始自稱為滿族，如熙彥、斌魁於 1912 年成立的旗人團體即稱作「滿族同進會」。其後「滿族」一詞日見普及。1945 年，溥儒籌備的旗人團體也冠名為「滿族文化協進會」。

⁹³ 《滿族簡史》修訂本編寫組，《滿族簡史》，頁 217。

⁹⁴ 《滿族簡史》修訂本編寫組，《滿族簡史》，頁 202。

⁹⁵ 《滿族簡史》修訂本編寫組，《滿族簡史》，頁 202。李燕光、關捷，《滿族通史》，頁 772。根據愛新覺羅烏拉熙春（吉本道雅譯），《最後の公爵愛新覺羅恒煦，激動の中國百年を生きる》，頁 150 所述，帶貶意的「滿清」一詞的使用，大概在 1925 年左右開始變得普遍。

⁹⁶ 《滿族簡史》修訂本編寫組，《滿族簡史》，頁 202。

⁹⁷ 清代郡王、郡王福晉皆授以鍍金銀冊。見《清會典事例》，第 1 冊，卷 16，頁 2a/209。據文仰宸，〈記憶中的順承郡王府和我襲爵的經過〉，頁 254 所載，鍍金銀冊，長約 7 寸，寬約 2 寸 5 分，一式 4 塊，塊與塊間的連結處，亦用鍍金銀環連結，上下兩個，共 6 個，方便折疊。冊文大意是「清皇室順承郡王文葵之藩封仍將帶礪河山以垂永久」等，冊文只用漢文，末尾用民國年號，鈐大總統印。外用紅綢裏黃綢面的黃袱子包裹，貼一黃紙標籤，上寫「多羅順承郡王文葵封冊」。多羅郡王墓碑，可參看朱誠如編，《清史圖典》2，順治朝，頁 50。

其妻子葉赫那拉氏（玉嘉）亦於此時受牽連，後因不堪壓迫而於獄中自殺身死。¹⁰⁰瀛生文革的遭遇，跟他是滿洲皇族固然有關，但不能說與他的滿洲背景毫無牽連。如果不是滿洲人，不生於滿洲多羅順承郡王之家，就不會一夜之間變成「壞份子」、「反革命」。¹⁰¹北京師範大學的啓功也說：「到了『文化大革命』，只要說自己姓愛新覺羅，那自然就是封建餘孽，牛鬼蛇神，人人避之唯恐不及」。¹⁰²瀛生精通滿語，在當時，「說滿語，意味著『叛國』或『裏通外國』」，¹⁰³罪名不輕，何況他在日本出生，亦精通日語，這更容易讓人將他和「滿洲國」作出錯誤的聯想。¹⁰⁴

三、「身體」的銘寫：滿洲語文

不過，即使文革時受到「衝擊」，瀛生並沒有因而放棄其滿族身份。

⁹⁸ 瀛生的記憶有誤。根據文仰宸的記憶，他早在 1958 年已將封冊捐獻給東城區政協，見文仰宸，〈記憶中的順承郡王府和我襲爵的經過〉，頁 254；張嘉鼎，〈末代王爺——文仰宸〉，頁 12。2011 年 6 月 13 日，瀛生來信，証實其兄文葵於「解放」後已將家傳鍍金銀冊交給了文物局。封冊現收藏在市文物館。

⁹⁹ 文革時，滿族是否因其族群背景而被批鬥，說法不一。雖然滿洲人一般並不會因為身為滿洲人而被波及，但相反的例子並不闕如。2012 年 10 月 18 日，我在網上找到題為〈老舍自殺之迷新解〉（2006 年 7 月 10 日）的一篇文章。從文章的遣詞用字，可以感覺到作者是個滿人。他的看法也許能代表一些滿人的感受。現將其中的一小段，錄之如下，以供參考：「文革十年，只要戶口本是滿族的人全都被漢人批鬥過，老舍本來想寫一本敘述滿人自己生活的書《正紅旗下》……老舍最後在文革中被迫自殺。文革期間，哪個民族受難最多，就是滿族了，任何一個民族受到的苦難都沒有滿族多。」滿人若是王公貴族則肯定難逃劫運。專研滿族史的學者閻崇年說，「北京的故清宗室、王公貴族、軍政官員及其後裔等，幾乎無例外地在『文革』中受到衝擊。他們被抄家、揪鬥、勞改、下放，倍受折磨，無一倖免。」見閻崇年，〈北京滿族的百年滄桑〉，頁 12。

¹⁰⁰ 有關瀛生妻子葉赫那拉氏，可參看愛新覺羅瀛生，《老北京與滿族》，頁 302。

¹⁰¹ 戴逸主編，《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傳略》，頁 247；徐丹俁，〈音節羅列讀出來的，它不是滿語呀！〉，頁 11；邱永君，〈瀛生先生訪談錄〉，《燕情民意》，頁 390。

¹⁰² 《啓功口述歷史》，頁 6、146。

¹⁰³ 楊東曉，〈滿語拯救者〉，頁 115；Verna Yu, "A Language Los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9 August, 2011, News, p.4 也指出「文革」時說滿語的人被看作是間諜。因此，滿人都自動停用滿語，參看 Shao Dan, *Remote Homeland, Recovered Borderland*, pp.265, 267—68。

¹⁰⁴ 除了日本的「海外關係」外，瀛生在美國人接收燕京大學時，也曾替美國人當過翻譯。這更加重了他「裏通外國」的罪名。見徐丹俁，〈音節羅列讀出來的，它不是滿語呀！〉，頁 4、9。

相反，他對作為族群特徵的滿語的研究和推廣，一直不遺餘力，這和他「身體」的滿洲化，不能說沒有關係。在訪談中，他重點談的就是滿文。

滿文：滿洲人之根本

眾所周知，滿人入關後，急劇漢化，其「身體」包括外貌裝扮、行為舉止幾與漢人無異，原來的民族特徵已難察看出來。唯一剩下能證明滿人身份的就是旗籍。不過，現在的滿洲人，特別是年輕一代，大都不知道自己原來是哪個旗的。在我任教過的幾個大學中，研究生也好，助教也好，滿族學生不乏其人，如內蒙古的包麗豔、北京的賀一平、臺灣的佟二格，¹⁰⁵他們都不清楚自己的旗籍。以前，八旗是特別階級，身份的像徵，「國中之國」。¹⁰⁶辛亥以後，八旗消亡，¹⁰⁷國家行政管理以地緣戶籍為主，省籍取代旗籍。瀛生所著的《滿語雜識》、《老北京與滿族》二書中的作者簡介，亦只列省籍，不列旗籍。由此可見，在漢人主導的國家權力形塑下，旗籍不再是界定身份的著力點。

但光憑自我認同並沒有足夠的說服力。如果不將滿洲特質重新植入徒具虛名的滿洲「身體」，滿人身份只是空洞的「集體記憶」。為了「展演」其滿洲「身體」，不同的人會採用不同的策略，以突顯其滿洲特質。方法之一就是改變身體的外觀。有人選擇換穿民族服裝，甚至剃頭留辮，以便別人能辨識出自己的滿人身份。在東北，滿文教師陳光遠（圖 4），¹⁰⁸為了要展示其滿洲特質，不但留了辮子，而且也剃了頭。對他來說，辮髮所代表的意義是清朝的光榮和偉大。雖然滿族傳統在東北比較強，但陳光遠的作法仍是少數例外。在廣州，有一自認為多爾袞十世孫的人，¹⁰⁹

¹⁰⁵ 三人為我以前滿文班的學生或助教，名字皆經改動。

¹⁰⁶ 孟森，《清代史》，第四章〈八旗制度考〉，頁 20。

¹⁰⁷ 1928 年，北伐成功，八旗制度正式終結。參見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頁 846。

¹⁰⁸ 陳光遠（1948—2007）生於哈爾濱市，祖籍黑龍江省五常市拉林滿族鎮，佛滿洲鑲白旗。滿語由祖父啟蒙在先，復於 80 年代初隨愛新覺羅·啓琮學習。2004 年 9 月，任哈爾濱工程大學首屆滿語班教師。

¹⁰⁹ 此人在廣東出生，出生時叫「多迪」，又自號「州迪」、「溥迪」、「毓迪」，漢名「周佑錢」或「周興國」，自謂老家在東北，所以把兩個孩子送到東北讀書。不過，廣州滿族協會會長汪宗猷卻說「州迪」是漢族，其祖先原是綠營，後來始拼入漢軍八旗。汪宗猷提出的理由是：（一）滿洲八旗來廣州始自乾隆時代，這與「州迪」說他的祖先是康熙時代來廣州者不合，（二）正史記載多爾袞僅有一個女兒，並無兒

剃頭留辮以外，有時更換穿清裝，作為區別內外「界線」的民族識別。不過，這種「光前垂後」的髮式，過於突兀，並不容易為一般人所接受；而傳統的民族衣飾，除了於節慶儀式外，平日不會穿著，¹¹⁰因為在別人看來，這與奇裝異服沒有分別。因此，若強行恢復辛亥以後日漸廢棄的滿人髮式和裝扮，在現代社會將格格不入。上面提到廣州那個攀附多爾袞的「滿洲」人，他讀小學的小兒子也想學他的裝扮，但學校並不以為然。即連滿族大老、溥儀的四弟溥任(金友之)亦批評這些外在改造是形式主義。他在香港定居的哥哥，也剃髮留辮，但卻被視為「怪物」，為他人所取笑。¹¹¹在臺灣，藝術家葉永青，因自覺是滿族，所以他留了辮，不過卻沒有剃頭(圖 5)。他不敢貿然造次，為的是避免太突出而招引旁人的奇

子，所以「州迪」不可能是多爾袞的後裔。不過，「州迪」並不同意。他說祖先康熙時來廣州這一事實，在《駐粵八旗志》、《清實錄》中都有相關記載，如康熙時拜音達禮/理以世職駐防廣州，和康熙時駐防廣州滿洲八旗的設額，都可資證明。有關前者，《駐粵八旗志》等資料的確載有拜音達禮自康熙十九年至康熙三十七年間，歷任副都統、左翼副都統、將軍的記事。但有關後者，則似無相關載記。康熙時來粵者應為漢軍八旗，不是滿洲八旗，拜音達禮即隸漢軍正白旗，而且原是蒙古烏魯特人，史載滿洲八旗來粵自乾隆始。參看《駐粵八旗志》，卷 8，頁 1a-2b/854-55，卷 14，頁 2a-2b/99，《八旗通志初集》，卷 218，頁 4996；《聖祖仁皇帝實錄》，卷 64，頁 13b/825；卷 93，頁 16a/1180；卷 133，頁 15a/440；卷 189，頁 13a/1011；卷 243，頁 7b/414。「州迪」說多爾袞並非無後的根據源自其自編家譜(1982 年重修)。據其家譜所載，順治七年正月，多爾袞所收繼的福晉博爾濟錦氏，生一子名「多爾真」。這個「多爾真」其後為避禍輾轉逃至雲南投靠吳三桂，康熙年間又遷至廣州，三藩平定後，再經由綠營拼入漢軍八旗。不過，《清實錄》並無「多爾真」的記錄，「州迪」族譜中的「多爾真」極可能即多爾袞的養子多爾博(原多鐸第五子)的誤記。《北京圖書館藏家譜叢刊·民族卷》，第 34 冊的《多爾袞家譜》，頁 1-2 清楚記載多爾袞無嗣，多爾博乃福晉博爾濟錦氏所生的「繼承子」。有學者推測多爾袞與博爾濟錦氏可能生有一幼子，其所據為《清實錄》順治八年正月甲寅條之「夫攝政王擁立之君，今固在也。我當抱王幼子，依皇上為生。」唯此幼子此後即未再見於史冊。見《世祖章帝實錄》，卷 52，頁 3a/407；周遠廉、趙世瑜，《皇父攝政王多爾袞全傳》，頁 435-36。綜上所述，「州迪」自稱是多爾袞之後，明顯是刻意拼湊史事以高攀天潢貴胄，其不理輩分排行，多次改用「多迪」、「溥迪」、「毓迪」與皇族沾上邊的名字，即為明証。「州迪」如果是滿族，他頂多只能與康熙時到廣州的漢軍八旗之後拉上點關係。

¹¹⁰ 薛麗娟，〈滿文部落裏的年輕人〉，《競報》，2005 年 8 月 23 日，D1。

¹¹¹ 見〈留辮搭巴士爭位/被辱「怪物」扯火/報稱溥儀堂弟/打人守行為〉，香港《東方日報》，2009 年 8 月 29 日，A12；〈愛新覺羅後人打人守行為：巴士爭位/不忿清裝衣著被嘲〉，香港《明報》，2009 年 8 月 29 日，A13；〈剃頭梳辮/村巴與人爭執/清裝上庭/滿清皇族後裔打人罪成〉，香港《蘋果日報》，2009 年 08 月 29 日，A8。

異目光。¹¹²對他而言，這樣做可在男士留辮是時下前衛打扮的掩護下，與滿族在感情上作一聯繫。另外，採用滿洲名字，當然也可以突出自己的族群性。但這與改變「身體」外貌一樣，既突兀又不方便。除了在特定的情況之下，一般人不太會採用。

另一「展演」滿洲「身體」的方法是回歸傳統，即重振「清語騎射」。騎射，於現代社會顯得荒謬，不切實際，並不可行。清語，則直指本心，乃認識、親炙傳統滿洲文化的津樑。語言不顯眼，較為內斂，不如外在民族衣飾的炫目，造成異樣的視覺效果，也不如剃頭換裝，有其隨意性，只要願意，任何人瞬間即可變身，輕易裝扮成滿洲人。況且，語言的學習是一種「內化」的過程，得長期「規訓」，刻意浸淫，始能成為「身體」的一部份。如果沒有特別的民族感情，除了學者外，不會花時間去親近、學習這一無實用價值的「胡語」。

自清朝始，滿人即認為滿語為「滿洲人之根本」，是「頭等頭要緊的事」。¹¹³清中葉吉林的滿人，雖然居於關外之地，但部分族人因移居城內，日漸漢化而不能說滿語，遂「娶婦擇屯中女不解漢語者，以此傳家者，庶能返渇還樸，不改鄉音耳」。¹¹⁴在 50 年代末，北京一個滿洲人說：「滿族現在沒有自己的語言……滿族實際上不存在了。」¹¹⁵這清楚說明滿語，即使到了近代，仍然是滿族認同的重要「民族標記」(ethnic marker)之一。榮親王府在 80 年代以後的大力推動滿洲語言、文化的學習，與本身是滿族不無關係。¹¹⁶近日，黑龍江三家子村的滿洲人，¹¹⁷因

¹¹² 參看張華克，〈滿族藝術家葉永青〉，《滿族文化》24，頁 1 及封面。

¹¹³ 《清文指要》(Manju gisun-i oyongyo jorin-i bithe)：Manju gisun serengge. Manju xalangya niyalmai fulehe da，見 šutucin/序，頁 1a；Manju gisun serengge musei ujui uju oyongyo baiita，卷一，中 1a。《一百條》Tangyô Meyen：Manju gisun serengge. Manju niyalmai fulehe da；Manju gisun serengge musei ujui uju (原文誤作 uju uju-i) oyongyo baiita，見 M. Forbes A. Fraser, *Tanggū Meyen and other Manchu Reading Lessons*, pp.1(šutucin), 5。

¹¹⁴ 見薩英額，《吉林外記》，卷 3，1b/66。

¹¹⁵ 《民族問題五種叢書》遼寧省編輯委員會，《滿族社會歷史調查》，頁 122。

¹¹⁶ 恆煦(金光平)、啟琮(金麓崇)、烏拉熙春，《愛新覺羅氏三代滿學論集》，頁 361。烏拉熙春似有漢名曰金壽方，但留日發展後已少用，以突顯其滿洲特質。

¹¹⁷ 三家子村位於黑龍江省富裕縣西南。三家子即滿語 ilan boo 的漢譯，因計、孟、陶三大姓而得名。居民大都是在清朝康熙年間由吉林省隨黑龍江將軍薩布素駐守邊疆而來。早年，三家子村居民只會滿語不懂漢語。到了二十一世紀初，三家子村能

自覺是滿洲之後，為了要延續滿洲人的文化，排除萬難，拼命學習瀕臨消失的滿文。¹¹⁸村內八十二歲的孟淑靜老奶奶是少數仍能說流利滿語的人。她的孫子石君廣說：「奶奶呀，你得教我滿族話，因為什麼呢，咱是滿族人。話語不能扔。等你老（意即去世）哪天我想你，我打開你這話，我就能聽你這聲音了」。當村中的滿族兒童被問到是否想學滿語時，他們說：「想！我盼望著學滿語，因為我是滿族後代，我要是不學滿語，後代就失傳了。」¹¹⁹孟淑靜老奶奶自己也說：「這是我們的語言，我們怎麼能讓它死掉？我們是滿族人。」¹²⁰由此可見，滿族之認定滿語為其獨特的族群標記是有其普遍性的。

滿文的衰落

瀛生慨嘆說清末之光緒皇帝仍能說滿語。他指出《清史稿》內記載了德國親王亨利入覲時，「帝領首答之，操國語慰勞。慶親王跪案左聆玉音，降階，操漢語傳宣。」¹²¹証諸與光緒同時的慈禧亦能說滿語，則知其言不誤。不過，慈禧太后的滿語水準只限於日常會話，平常仍傾向說漢語。例如，她和德齡公主一般用漢語交談。¹²²慈禧雖能說滿語，但卻看不懂滿文。據德齡在其著作《御香縹緲錄》（*Imperial Incense*）中的記載，慈禧讀奏摺時，只看漢文，不看滿文。德齡也會說滿語，但和慈禧一樣，她也不能讀、寫滿文。在奉天射圃（*yabtarā yafan*）看到櫥櫃內兵器

夠非常流利地說滿語的大概僅有三至六人，能聽懂並基本上能說滿語的有十五人。這些滿語掌握較好的人，絕大多數在五十至七十歲之間，年紀最大的已八十多歲。見李巨炎，〈歷史與空間：「伊蘭亭」—中國滿語「活化石」〉，《文匯報》，2011年8月3日，C4。

¹¹⁸ David Lague, "Struggling to Save a Language from Dying," *The New York Times*, 見 *United Daily News*, 2007年3月26日，B4 轉載及同頁譯文〈滿語瀕臨滅絕，無力回天〉。朱建陵，〈滿語快消亡，黑龍江小學獨立傳承〉，《中國時報》，兩岸新聞，2007年3月19日，A13，似乎亦借用了 *The New York Times* 的報導。

¹¹⁹ 嚴峰，〈搶救滿語〉，《新華縱橫》電視紀錄片，2006年02月5日。

¹²⁰ 朱建陵，〈滿語快消亡，黑龍江小學獨立傳承〉，《中國時報》，A13。

¹²¹ 趙爾巽等，《清史稿》，頁2681。參看瀛生，《燕情良意》，頁182。

¹²² 見德齡公主，《紫禁城的黃昏：德齡公主回憶錄》*Dusk of Forbidden City*，第12章，頁142-43：「我不希望讓太后在外國人面前表現得無知，就拉拉她的衣袖，說呆會兒再向她詳細解釋。太后說，『現在就給我稍稍解釋一下』。她這話是用滿洲話講的，與漢語普通話有所不同，客人不可能聽懂。於是我也用滿洲話跟她解釋了一通」。

上的滿文時，德齡還得請教懂滿文的女官，始知其義。¹²³能說但不能看滿文似乎是清末滿洲人的一般情形。¹²⁴降至溥儀時，更是每況愈下，「連字母也沒學會」，「學了許多年，只學了一個字，這就是……『依立』（起來）！」¹²⁵他說：「因為我在平時生活中，無一不是使用著漢語——北京話，那種一曝十寒式的滿文教育，終究是沒能起什麼作用，現在不但滿語單字差不多都已忘個乾淨，就連那些最基本的字母也都記不全了。」¹²⁶對清季滿人使用滿文的情形，滿族作家老舍在他自傳體小說《正紅旗下》裡面，也有相同的描述：

「（福海）這個熟透了的旗人其實也就是半個、甚至於是三分之一的旗人。這可與血統沒有什麼關係。以語言來說，他只會一點點滿文，談話，寫點什麼，他都運用漢語。他不會吟詩作賦，也沒學過作八股或策論，可是只要一想到文藝，如編個岔曲，寫副春聯，他總是用漢文去思索，一回也沒考慮過可否試用滿文。當他看到滿、漢文並用的匾額或碑碣，他總是欣賞上面的漢字的秀麗或剛勁，而對旁邊的滿字便只用眼角照顧一下，敬而遠之。至於北京話呀，他說的是那麼漂亮，以至使人認為他是這種高貴語言的創造者。即使這與歷史不大相合，至少他也應該分享『京腔』創作者的一份兒榮譽。」¹²⁷

1999 年，北京社科院滿學研究所的趙志強所長到黑龍江考察，費了三天功夫，才找到一個 70 多歲、會說滿語的老太太，但在近 40 分鐘的交談中，老太太常常會插入漢語，有時有些詞甚至忘掉滿語原來是怎麼說

¹²³ 見德齡郡主，《御香縹緲錄》，頁 185、189。

¹²⁴ 到清末仍能寫滿文的，如攝政王和拉林的滿人，只屬少數，見愛新覺羅瀛生，《老北京與滿族》，頁 293。

¹²⁵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頁 62、64。「依立」ili 即滿文動詞 ilimbi 的命令形。溥儀的滿文師傅是伊克坦，在他四年多的教導下，溥儀讀過《清單語》、《聖諭廣訓》、《滿文孝經》等滿文書。溥儀的滿文雖不好，但滿文字卻寫得不錯，而且應該也懂一些日常用語。見 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p. 194/莊士敦，《紫禁城的黃昏》，頁 174；王慶祥，《溥儀社交實錄--溥儀人脈地圖》，頁 93（溥儀親書滿文圖）、頁 97。

¹²⁶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灰皮本）》，頁 116。

¹²⁷ 老舍，《正紅旗下》，《老舍全集》，第 8 卷，頁 484。

的。¹²⁸我在上面提到的幾個滿族同學，雖然自覺是滿人，但對學習滿文都不太積極，甚或缺乏興趣。漢語，正如雲南民族學院漢語言文學系主任李恕仁（滿族）所說，已「成了我們滿族的通用語。」¹²⁹根據統計，現在全中國能說流利滿語者不到百人。¹³⁰瀛生說目前從事滿語書面語翻譯的人不到 50 人，而精通書面語的不到 20 人，即使唯一專門研究滿語的黑龍江省滿語研究所也只有 7 人。¹³¹這和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滿文部主任吳元豐的觀察是一樣的。他說有能力閱讀、翻譯、教學、研究的學者全國只有 30 多人，¹³²其中的三份之一應在吉林省。¹³³

回歸滿語的正統

瀛生所以選擇語言作為利器，奪回被消音滿人的「在場」權，當然與其本身不一般的滿文造詣有關。瀛生初到王府時雖然對滿語比較陌生，但在王府的「規訓」下，滿人自覺油然而生，對滿文的學習並不抗拒。到高中時，更立志要學好滿文，特別是口語。1930 年代，北京城內少部分滿洲人仍能說滿語。瀛生的滿語啟蒙老師是所謂「同光六賢」之一的愛新覺羅·樸厚(字力田)。他是瀛生的族伯。隨樸厚學習滿語三年後，瀛生又與同屬「同光六賢」的阿克敦布學習滿語達 16 年之久。40 年代初，瀛生從滿文翻譯專家克敬之¹³⁴學習滿、漢文翻譯。40 年代中，再師從著名語言學專家羅常培學習古漢語音韻和西方語音學。¹³⁵

¹²⁸ 薛麗娟，〈滿文部落裏的年輕人〉，《競報》(2005 年 8 月 23 日)，D1。

¹²⁹ 愛君，《雲南民族女性文化叢書·滿族，追尋不滅的情懷》，頁 28。參看 Shao Dan, *Remote Homeland, Recovered Borderland*, p.272。

¹³⁰ 朱建陵，〈滿語快消亡，黑龍江小學獨立傳承〉，《中國時報》，A13。《滿語言文化研究通訊》1，頁 27、28、33。

¹³¹ 陳曉鴻、劉剛，〈拯救瀕滅滿語文化〉，《羊城晚報》，2005 年 5 月 31 日，A8。

¹³² 楊東曉，〈滿語拯救者〉，頁 115；薛麗娟，〈滿文部落裏的年輕人〉，《競報》，2005 年 8 月 23 日，D1。

¹³³ 《滿語言文化研究通訊》1，頁 36。

¹³⁴ 克敬之，蒙古族，精通滿、蒙、漢語，曾做過咸安宮滿文教習，滿蒙高級學堂教授。祖父是內閣學士賽尚阿，父親崇綱，曾任駐藏幫辦大臣，伯父崇綺，是清朝唯一的蒙古族狀元，官至內閣大學士。遺稿包括《滿、漢、蒙對譯 ala 篇》、《滿、漢對譯十二月歌》、《滿、漢對譯歇後語》、《滿、漢對照詞語概說》、《盛京賦滿漢對譯》、《盛京賦漢文解說》、《滿文小篆研究》、《滿漢古文用法解釋》等。

¹³⁵ 徐丹俚，〈音節羅列讀出來的，它不是滿語呀!〉，頁 6；瀛生，《燕情良意》，頁

為了規訓「身體」，使之更貼近滿洲傳統，瀛生特別措意滿語的「正統性」及「規範性」。他說滿語大略可分為四個方言，即西音（北京滿族當年的口音），東音（甯古塔方言），北音（阿爾楚喀方言），南音（盛京方言）。就其發音而言，盛京方言是滿語四大方言中最接近原來的建州女真口音。瀛生學自「同光六賢」樸厚及阿克敦布者即盛京音，他說與其他三種方言相比，雖「音有細別，但語無巨異」，¹³⁶現在唯有新疆的錫伯語與之最為相似。¹³⁷錫伯語即滿洲南音，這與西遷新疆的錫伯來自盛京一帶的事實相合。¹³⁸瀛生說他記得廣祿夫人蘇美琳（Mergen Guwargiya（Γôwalgiya））曾經說過：「Bi oci Manju uqsurai Sibe aiiman-i niyalma inu（余乃滿洲錫伯族之人也）」。¹³⁹如此一來，滿洲的語言版圖得以擴大，滿語一旦消失，尚可以錫伯語補救，回歸建洲正統。但不幸的是錫伯語也因族人逐漸漢化而有消亡的可能。¹⁴⁰

瀛生強調學習規範滿語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是傳統的「畫紅」教學法。他說滿洲人因種種原因把語言丟了，現在所謂的滿語只是滿語詞的「音節

390；愛新覺羅瀛生，〈愛新覺羅瀛生〉，戴逸主編，《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傳略》，頁246。

¹³⁶ 瀛生，《滿語雜識》，頁407-445。

¹³⁷ 徐丹良，〈音節羅列讀出來的，它不是滿語呀!〉，頁10-11。錫伯族學者安俊到了黑龍江三家子、五家子考察，發現兩地所說的話互通，交流無礙；北京社會科學院滿學所所長趙志強，雖然也是錫伯人，但開口說話卻被東北的滿洲人誤認為是佛滿洲。見徐丹良，〈音節羅列讀出來的，它不是滿語呀!〉，頁2。廣定遠、張華克，〈三家子村滿語調查記〉，頁55-60；廣定遠、張華克，〈三家子村滿語調查記〉（下篇），頁91-94；廣樹誠，〈尋根之旅〉（一），頁44；楊東曉，〈滿語拯救者〉，頁114。

¹³⁸ 瀛生，《滿語雜識》，頁318-340。

¹³⁹ 此處瀛生記憶有誤，原文是「Bi oci Manju niyalma-i dorgi Sibe inu」，漢譯即「我乃滿洲人之內錫伯也」。見Mergen Guwargiya, "Enduringge Šuxowan[Šuxôwa]-i Ulabun," p.170.

¹⁴⁰ 楊東曉，〈滿語消失，也就是100年的事情〉，頁119。根據新疆伊犁師範學院杜秀麗教授2013年6月15日於「國際滿一通古斯學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在伊犁能純熟讀、寫、聽、說錫伯語的人，即使用較寬鬆的標準，亦僅剩30人左右。為了「搶救」錫伯文，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政府除了在各級學校開設錫伯文班外，自2006年起也多次舉辦錫伯文培訓班。見戈思明，〈從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開辦錫伯文班看文化搶救工程的盲點〉（上），頁77—79。台灣滿文研究開山廣祿的兒子廣定遠（Arbun Saiin Kunggur）自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幾乎每年都回伊犁探親。據他的觀察，雖然目前在伊犁一部份人還能說錫伯語，但人數已日漸減少，而且話中多已參雜漢語，連電台播音員的語調也有別於從前。錫伯語的前景，不容樂觀。

羅列」和「機械拼讀」，並不是語言。因此，他視「畫紅」為其滿洲研究的三大成就之一。¹⁴¹ 所謂「畫紅」也者，即在學習書面語時，在詞語旁以紅筆勾劃圈點，指出字音的輕重、脫落、粘合，以便看著書面語，出口便成標準口語。書面語與口語有別，唸口語時，滿文單字的第二音節的重音，常往前移至第一音節，¹⁴²以致第二音節尾之母音弱化並順勢脫落，如 beye（身體）唸做 [bei]，temgetu（標記）唸做 [teŋət]，niyalma（人）唸做[nəm]。句子如：Gene! Sini ama-de ala. Sikse bi xoton-de genehe（去！告訴你爸爸，昨天我到城裡去了）口語唸做 Gen! Sin am-d al! Siks bi xot-d genhei；Tere mini deo waqa. Tere sikse Sinkiyang-de jhengge（他不是我的弟弟，他是昨天從新疆來的）口語唸做 Ter min du waq. Ter siks Sinkiyang-d jheng.瀛生謂「畫紅」其法極為簡單，學習三月已足夠，《清文啟蒙》中的異施清字其實即口語發音。¹⁴³

不過，自 20 世紀 30 年代以後，懂「畫紅」的老師相繼逝世。50 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羅常培有見及此，遂推薦瀛生到研究所專力研究滿語口語，可惜由於研究員吳曉鈴反對，¹⁴⁴安插未能成事。¹⁴⁵曾教授瀛生遺傳學的著名學者吳仲賢，¹⁴⁶為免他脫離原來的農業專業，以當時電子顯微鏡剛出現，著他繼續研究染色體，以謀求突破云云。但瀛生卻志不在此。到了 60 年代，學習滿語已無人「畫紅」。雖然瀛生是仍

¹⁴¹ 瀛生的其他二大成就就是巴拉人的研究以及「金趙說」。所謂巴拉人，滿文稱做 bala banin niyalma，即旗外諸申，部分於吉林張廣才嶺 Julgen Saiin Alin(運好山)一帶狩獵。瀛生對巴拉人的研究，現在只有腹稿。相關的研究，可參考與瀛生私交甚篤的滿族學者穆曄駿的研究以及其門人的續作，包括穆曄駿，〈居住在張廣才嶺的滿族巴拉人〉，頁 64-68；穆曄駿，〈巴拉語〉，頁 2-31、128；趙阿平、朝克，《黑龍江現代滿語研究》，頁 112-162。有關「金趙說」，我將在下面討論。

¹⁴² 徐丹俚，〈音節羅列讀出來的，它不是滿語呀!〉，頁 1、18。

¹⁴³ 有關「畫紅」，可參看徐丹俚，〈音節羅列讀出來的，它不是滿語呀!〉，頁 12-18。

¹⁴⁴ 吳曉鈴（1914-1995），著名戲曲及小說研究專家。隸鑲藍旗漢軍，原籍遼寧綏中縣人。1937 年，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畢業。1951 年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學術秘書。1956 年轉入文學研究所，從事古代文學研究，一直到他逝世。參見孫文良主編，《滿族大辭典》，頁 319-20。

¹⁴⁵ 徐丹俚，〈音節羅列讀出來的，它不是滿語呀!〉，頁 3。

¹⁴⁶ 吳仲賢（1911-2007），湖北省漢川縣人，中國動物數量遺傳學科的奠基人，曾任國立北京大學農學院教授兼畜牧系主任、中國農業大學動物科技學院教授，編著有《動物遺傳學》，《統計遺傳學》等書。

知其所以然的極少數學者之一，但他擔心清代正規的口語教學將有失傳的一日。¹⁴⁷

四、滿洲著作與族群認同

瀛生對滿文，特別是滿語的執著，以及由之而衍生出對滿洲舊俗、文化的研究，¹⁴⁸與其滿洲認同密切相關。這可以從他為數不少的著作中得到證明。除了在《滿語研究》上發表了 15 篇有關滿語口語的重要論文外，¹⁴⁹瀛生一共出版了 37 本著作。這些著作，可分為兩類，一為涉及滿洲語文或者滿洲文化者，一為與此無關者，如農業畜牧、日語學習、翻譯著作。農業畜牧的著作多發表於早期。日語學習的著作多發表於文革結束後。值得注意的是有關滿洲的著作全部發表於 80 年代改革開放後至近期。這時正值中央對滿族採取較以前寬鬆的政策和滿族主體意識同步復興的時候。¹⁵⁰現按出版先後，將其著作列表如下：

序號	書名	名號	出版社	出版年
1	《有機合成》，(蘇)列烏托夫(O.A.Рейтов)撰	安吉、石英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52
2	《海洋》，(蘇)包戈羅夫(B.Г.Богоров)撰	安吉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52
3	《河流的生命》，(蘇)包達闊(E.B.Болдаков)著	石英、安吉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	1952

¹⁴⁷ 另一對「畫紅」有研究的學者是穆曄駿。他是在拉林學塾學的滿文，黑龍江省滿語研究所第一任所長，1989 年離世。見徐丹佺，〈音節羅列讀出來的，它不是滿語呀！〉，頁 7、14。

¹⁴⁸ 瀛生的近作《老北京與滿族》，除一部分談到他最自豪的滿語外，另一部分則涉及滿洲習俗的描述。在談到滿洲習俗時，中間多加插滿文單詞，如頁 285。

¹⁴⁹ 邱永君，〈瀛生先生訪談錄〉，《燕情良意》，頁 392 記作 17 篇，似受收入同書劉潞所寫〈平凡而又不平凡〉一文（頁 380）的誤記所致。劉潞原文登於《炎黃春秋》，頁 77，作 15 篇。複查《滿語研究》各期目錄，瀛生在其上發表的文章確為 15 篇，故應以未刊稿及《民族學名家十人談》所記為正確。參看愛新覺羅瀛生，《滿語雜識》，頁 221-538。

¹⁵⁰ Lian Bai, "Identity Reproducers beyond the Grassroots: The Middle Class in the Manchu Revival since the 1980s," pp.183-201；文章後收入 Colin Mackerras, ed., *Ethnic Minorities in Modern China: Critical Concepts in Asian Studies*, vol. II, pp.227-49。此文基本上脫胎自同作者的碩士論文 "Representation Sphere: Manchu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Movement in 1980s'" 中的第三章、第四章、結論。Shao Dan, *Remote Homeland, Recovered Borderland*, pp.210-16。

序號	書名	名號	出版社	出版年
4	《養牛學》，(蘇)裏斯肯 (Е.Ф.Лискун)著	常瀛生譯	上海：中華書局	1953-54
5	《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自然科學》，(蘇)凱德羅夫 (Б.М.Кедров)著	汪玢、瀛生譯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5
6	《動物生理學實習指導》，維克托洛夫 (К. Р.Викторов)著	常瀛生譯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6
7	《家畜解剖學》，(蘇)克立莫夫 (А. Ф. Климов)、(蘇)阿卡耶夫斯基 (А.И.Акаевский)著	常瀛生譯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1956
8	《莫斯科近郊的“戰士”集體農莊》，(蘇)斯科爾涅科夫 (С.М.Скорняков)著	安吉譯	北京：農業出版社	1956
9	《趣味地球化學》，(蘇)費爾斯曼 (А. Е. Ферсман)著	石英、安吉譯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	1956
10	《乳牛的飼養》，(蘇)德米特羅欽科 (А.П.Дмитроченко)著	常瀛生、劉迺琴譯	北京：財政經濟出版社，1957	1957
11	《農畜病理生理實驗指導》，(蘇)卡迪科夫 (Б.И.Кадыков)著	常瀛生等譯	南京：畜牧獸醫出版社	1958
12	《家畜病理生理實驗指導》，(蘇)卡迪科夫著	常瀛生等譯	南京：畜牧獸醫出版社	1958
13	《動物學》，(蘇)普拉維利錫科夫 (Н. Н.Плавильщиков)著	常瀛生譯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8
14	《復蘇》，(蘇)施密特 (П.Ю.Щmidt)著	常瀛生譯	北京：科學出版社	1958
15	《家畜病理生理學》，(蘇)卡迪科夫著	常瀛生譯	南京：畜牧獸醫圖書出版社	1958
16	《突厥語分類問題》，(蘇)巴斯卡科夫 (Н.А.Баскаков)著	安吉、李國香譯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1958
17	《飼料學》(節譯本)，森本宏著	常瀛生譯	北京：農業出版社	1981
18	《日語常用詞例解詞典》	常瀛生、吳緒彬編譯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1983
19	《日語讀音指南》	常瀛生著	北京：知識出版社	1984
20	《科學與思考》，田中實著	常瀛生譯	北京：知識出版	1985

序號	書名	名號	出版社	出版年
			社	
21	《滿語讀本》	愛新覺羅·瀛生 著	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1986
22	《日語公文、書信寫法指南》	常瀛生著	北京：知識出版社	1987
23	《中國宮苑園林史考》，岡大路 著	常瀛生譯	北京：農業出版社	1988
24	《清宮慶隆舞初探》（上、下）	愛新覺羅·瀛生 著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88
25	《速成自學滿語基礎講義》	愛新覺羅瀛生 編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1988
26	《初級袖珍日漢簡明詞典》	常瀛生編	北京：知識出版社	1989
27	《日語辭彙的奧秘：日語單詞學習手冊》	瀛生著	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1989
28	《日語簡捷記詞法：日語構詞的剖析》	瀛生、鄭伯承 編	北京：中國對外經濟貿易教育出版社	1993
29	《北京土話中的滿語》	愛新覺羅·瀛生 著 ¹⁵¹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3
30	《邂逅有話題》，豪斯(Pachira House)著	瀛生譯	新店：圓神出版社	1994
31	《中國書法史》，真田但馬著	瀛生、吳緒彬 譯	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1998
32	《京城舊俗》	愛新覺羅·瀛生、於潤琦著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8
33	《滿語雜識》	愛新覺羅瀛生 著	北京：學苑出版社	2004
34	《老北京與滿族》 ¹⁵²	愛新覺羅瀛生 著	北京：學苑出版社	2005
35	《中國宮苑園林史考》（插圖本），岡大路 著	瀛生譯	北京：學苑出版社	2008
36	《燕情良意》	瀛生著表單的 頂端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9

¹⁵¹ 書的內頁作愛新覺羅·瀛生，但出版社在封面誤記作常瀛生，圖書館登錄多以前者為準。

¹⁵² 《老北京與滿族》一書，於 2010 年，又以另一形式出版。見北京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京俗溯源》。

序號	書名	名號	出版社	出版年
37	《滿語口語音典》	愛新覺羅瀛生 著 ¹⁵³	北京：華藝出版社	2014

在這 37 本著作中，¹⁵⁴凡不涉及滿洲語文或者滿洲文化者，瀛生皆使用筆名安吉或者較難察覺與其滿洲背景有關的名字如常瀛生、瀛生，¹⁵⁵但凡與滿洲語文或者滿洲文化有關的（上表中的 21、24、25、29、32、33、34、37），則皆用滿姓、滿名「愛新覺羅·瀛生」或「愛新覺羅瀛生」。¹⁵⁶有趣的是瀛生的近著《燕情良意》，雖然全書收錄了他關於老北京文化中與東北（即良）滿族有關的文章¹⁵⁷，但卻沒有如以前一樣，使用「愛新覺羅·瀛生」的滿文名字，而只用了「瀛生」兩字。這個例外所涉及的意涵，我將在下面再討論。

五、認同的動機

原生感情

瀛生之所以熱衷於滿語文研究，並以之為沈默的滿洲「身體」向外發聲，其目的並不是為自身謀求任何利益。事實上，堅持滿族的身份並沒有幫助他得到任何好處。在訪談時，瀛生便屢次說自己倒楣。青年時代，他飽受失業之苦。1946 年燕京大學農科撤銷，他失去助教教席，只能在醫院管理病歷，在補習學校教英語。¹⁵⁸文革時又被波及。80 年代以後，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的工作所得只足糊口，何況現已退休，所得除稿費

¹⁵³ 《滿語口語音典》是瀛生的遺著，內容與《滿語雜識》一書基本相同。由於晚年病重，書稿似並未完成，原來由專人錄音整理的新增部分，並未納入新著。書上名字愛新覺羅瀛生應為付梓前出版社所加。

¹⁵⁴ 瀛生原擬繼其先輩昭槿（禮親王代善六世孫）的《嘯亭雜錄》及《續錄》續作，述其一生見聞鮮為人知的清代掌故舊事，惜遽歸道山，壯志未酬。

¹⁵⁵ 我曾疑心瀛生的漢姓「常」與他父親的名字長福有關，但瀛生說這只是美麗的誤會。

¹⁵⁶ 若干有關滿族的文章先用瀛生之名發表，但收進專書時，仍以愛新覺羅瀛生全名出版。如瀛生，〈老北京婚禮中的滿族習俗〉，《世紀》3，頁 58-59 一文，經改寫後收入愛新覺羅·瀛生、於潤琦，《京城舊俗》一書中。

¹⁵⁷ 瀛生，《燕情良意》一書的內容包括北京風俗、滿漢習俗、滿語滿文、滿族人物。

¹⁵⁸ 徐丹俚，〈音節羅列讀出來的，它不是滿語呀!〉，頁 4。

及文史館的一些津貼外，所得不多。他在北京朝陽區安定門外外館東街的居室也頗為簡陋（圖 6）。

瀛生在訪談時雖然多次強調他對滿洲語文的研究主要是出於個人興趣，與族群認同沒有太大的關係，但他的「實踐」其實是在王府內形成的「慣習」（*habitus*）使然，只是他不自覺而已。¹⁵⁹多年前(2006)，瀛生憶及 80 年代搶救滿語的舊事時說：「改革開放以後，滿族文化迎來了春天。1985 年，遼寧省成立了三個滿族自治縣。接著，黑龍江省、吉林省和河北省也有了自己的滿族自治縣。各地的滿語研究所、滿學研究所也相繼成立，大家學習滿語的熱情日益高漲。對滿語的搶救有了新的希望，我自認為又能利用自己的專長，為社會多做一些工作。我的特殊經歷，使我對滿族和滿族的文化有著一份難以割捨的情感。」¹⁶⁰近年《羊城晚報》有關瀛生的報導也說：他所以要學習滿語是為了「秉承祖訓」，因為這是一個「滿族宗親必須履行的義務」。作為「關內最後一個通曉滿語的滿人」，「滿語對他而言，有著濃烈的家族和民族意義」。¹⁶¹由此可見，瀛生推動滿文的研究和教學與族群認同並非無關。

滿文的「隱喻」

瀛生所特別焦慮的是語言一旦丟失，很難挽回。與有形的民族文物不同，如衣飾器物，較易保存於博物館，無形的語言，如果沒有人繼續使用，稍縱即逝。沒有滿文，滿族猶如失聲的群體，只能透過漢文認識世界，其所承載的滿洲歷史、文化因而消亡，¹⁶²最終滿族的一切亦只能依賴「他者」的概念去理解。¹⁶³瀛生說國家立項修「大清史」，翻譯滿文

¹⁵⁹ 參看 Pierre Bourdieu, *The Logic of Practice*, p.56。

¹⁶⁰ 瀛生，《燕情良意》，頁 391。

¹⁶¹ 李楊，〈滿語，丟失的歷史密碼〉，《羊城晚報》，2012 年 1 月 7 日，B6。

¹⁶² 2008 年，東北師範大學成立「滿語言文化研究中心」，設副主任二人，其中一人為愛新覺羅·肇子瑜。其名字中的「肇」即「趙」，亦即「覺羅」。這樣的名字，美其名可以說是滿漢合璧，但其實是滿人漢化已深，對自己的語言、文化缺乏深入認識的結果。見滿語言文化研究通訊編輯部，《滿語言文化研究通訊》1，頁 3。同樣，臺灣滿族協會的金玲，為了突顯她的滿洲特質，有時把她的名字復原為愛新覺羅·玲，但單名並非滿洲命名的習慣，其受漢人文化的影響顯而易見。

¹⁶³ 一直到近代，滿洲人的思想行為深受內化了的儒家學說影響者比比皆是。金梁，瓜爾佳氏，自覺是忠君愛國抗金名將岳飛的化身。見 Pamela Crossley, *Orphan Warrior: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pp.3,157-58。末代睿親王

檔案刻不容緩，如果滿語消失，持平、客觀的清代史研究將難以為繼。

¹⁶⁴他希冀透過語言的習得，由語言而及於清代的歷史文化，¹⁶⁵以喚起滿族逝去二百六十多年的共同光榮，¹⁶⁶並由此而重建滿人的「集體記憶」。電影、電視、小說如「雍正王朝」、古建築如北京故宮、旅遊景點，特別是瀋陽、新賓等滿人祖居之地、博物館的清代文物展示、有關清代歷史文化的學術討論會、畫冊、書籍、老照片等等，在在提醒滿人，他們的祖先，的確曾經建立過一個偉大的王朝。這種由滿文延伸至清朝故國的浪漫「情思」（emotion-thought），¹⁶⁷乃「身體」由內而外的反應，說得更確切點，即所謂的「懷舊」感（nostalgia）。對瀛生而言，他年青時學習滿洲語言和禮俗的古老王府的拆遷，¹⁶⁸猶如滿族二百多年傳統的崩壞。然而，大清遜國，回天乏術，¹⁶⁹遺下的只有惘然的追憶與惆悵。因此，瀛生充滿感情的憧憬，與其說是「懷舊」，倒不如說是「傷逝」更為貼切，亦即他對故國榮光的遙望、滿洲舊事的追憶、先輩偉業的思慕、王

金寄水，對勸他去滿洲國承襲世爵的人說，「金某人縱然餓死長街，也不能向石敬瑭輩稱臣」。滿洲國三週年時，金梁邀請溥心畬分畫四季堂屏作為獻禮，但卻被他所拒。溥心畬自書條幅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並將之掛於書房之內，以明心志。見趙書，〈辛亥革命後的北京滿族〉，頁 7。溥傑的女兒慧生將關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父親比作南唐的李後主。見船木繁著、戰憲斌譯，《末代皇弟溥傑》，頁 150。即便是溥傑自己，在面對關東軍的欺凌時，也是用「哀莫大於心死」、「寧為玉碎，毋為瓦全」的漢人思想去理解自己的處境。見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溥傑回憶錄》，頁 79。經學大師愛新覺羅·毓璽，雖自覺是滿人，但對儒家學說卻拳拳服膺。見張輝誠，《毓老真精神》。

¹⁶⁴ 瀛生，《燕情良意》，頁 391；陳曉鴻、劉剛，〈拯救瀕滅滿語文化〉，《羊城晚報》，2005 年 5 月 31 日，A8。

¹⁶⁵ 除滿語外，瀛生也措意滿醫、滿俗、薩蠻教、氏族、「紅學」的研究。見瀛生，《燕情良意》，頁 399-400。

¹⁶⁶ Katarzyna Golik, "Facing the Decline of Minority Languages: The New Patterns of Education of Mongols and Manchus," p. 102.

¹⁶⁷ 「情懷」是由文化所形塑，而思想又離不開「情懷」而獨立存在。很多時，身份的選擇，反映的正是在特定時空下所激發的充滿舊日「情懷」的自我敘事，「情懷」與認同的關係密切。參看 Michelle Z. Rosaldo,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Self and Feeling," pp.137-57; C. A. Lutz, *Unnatural Emotions: Everyday Sentiments on a Micronesian Atoll and Their Challenge to Western Theory*, Hermann Schmitz, *Leib und Gefühl: Materialien zu einer philosophischen Therapie*.

¹⁶⁸ 參看注 57。

¹⁶⁹ 1934 年，瀛生兄長文葵響應溥儀的號召，到滿洲國從軍，但後來對滿洲國失去希望，覺得再沒有發展的機會，1941 年左右，辭掉一切職務，閉門隱居，不再過問世事。見張嘉鼎，〈末代王爺——文仰辰〉，頁 11-12。

府興衰的哀嘆、個人際遇的感懷。簡言之，滿語滿文其實是瀛生緬懷已消失了的「故土」的「隱諭」。¹⁷⁰

六、認同與「身體」實踐

滿族的「意見領袖」

在滿族之間，瀛生屬於菁英知識份子。他精通日、中、滿、英、俄文。¹⁷¹ 1945 年，他於北京大學農學院畢業，其後曾任燕京大學助教三年。¹⁷² 1950 年，他進入出版總署編譯局工作，在高等教育出版社擔任編輯，並在北京農業大學、鎮江農業機械學院任教。1978 年「文革」結束後，獲得「平反」，先後在商務印書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工作，其間參與了修訂鄭易里編著的《英華大辭典》、《中國大百科全書·生物學卷》，並協助編譯《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等重要工具書。¹⁷³ 八十年代，任政協北京市東城區第六屆委員。1985 年獲聘為北京滿文書院顧問及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顧問。1986 年，被聘為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同年，又受聘於民族出版社為特約編審，對照滿、漢文本，校訂《八旗通志》全書。¹⁷⁴ 瀛生的學、經歷，他滿語研究的成就，加上他的皇族背景，給他作為滿族「意見領袖」（*opinion leader*）的身份提供了強而有力的背書。

¹⁷⁰ 19 世紀中葉，文康有感滿洲的盛衰，在《兒女英雄傳》一書中發出過同樣的慨歎。見李婷，《京旗人家：兒女英雄傳與民俗文化》，頁 246-48。

¹⁷¹ 瀛生說英文是跟燕京大學洪業教授的太太江安真學的。江安真 Rhoda Kong 於廣東生出，在夏威夷長大，只能說幾句客家話，不懂國語，畢業於麻州維頓女子學院 Wheaton College，後在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唸教育。見 Susan Chan Egan: *A Latterday Confucian: Reminiscences of William Hung, 1893-1980*, pp.64, 85；陳毓賢，《洪業傳》，頁 80、109。至於俄文，1949 年以前，瀛生已開始跟北京的俄羅斯人學習。1950 年，在出版總署編譯局工作時，經著名俄文學者劉澤榮及來自蘇聯的語文專家指導，俄語快速進步。瀛生還學過蒙文，老師是蒙古國著名語言學家羅布桑旺丹 (bLo-bzan dban-bstan/Sh·Luvsangwangdan) 院士。1958-1961 年羅布桑旺丹在北京大學東語系蒙古語教研室任教。見徐丹佺，〈音節羅列讀出來的，它不是滿語呀！〉，頁 4、17；愛新覺羅瀛生，《滿語雜識》，頁 233-34。

¹⁷² 徐丹佺，〈音節羅列讀出來的，它不是滿語呀！〉，頁 8。

¹⁷³ 瀛生，《燕情良意》，頁 390。

¹⁷⁴ 見戴逸主編，《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傳略》，頁 248。

滿學研究會與滿文書院

由於對滿族文化消逝的焦慮及強烈的使命感，瀛生在 1987 年，發起成立「北京滿學研究會」。協會由溥傑、¹⁷⁵胡絜青任名譽會長，瀛生任會長，設科研、聯絡、資料、交流四部門，¹⁷⁶並且與北京大學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合作。藉著滿學研究會的成立，瀛生可有效地推動其延續滿洲語言、文化的理想，以免滿族成為有名無實的民族。

在成立學會之前，為了推動正規滿語學習，瀛生除著書立說外，更身體力行，積極投入滿語教學。自 1984 年始，他在各地協助滿文班的成立，包括北京滿文書院滿文班、東城區政協滿文班、承德滿文班等。北京的滿文書院，初期獲得同是族人的北京市人大常委會主任趙鵬飛的支持。教師除了瀛生外，尚包括著名的滿文學者如王慶豐、安俊、安雙成。用過的參考教材有《清文啟蒙》、《六部成語》（Ninggun juryan-i toqtoxo gisun-i bithe）、《公文成語》（Siden-i bithe icihiyara-de baiitalara toqtoxo gisun）、《摺奏成語》（Wesimbure bithe icihiyara-de baiitalara toqtoxo gisun）、《初學必讀》（Tuqtan tacire urse urunaqô xôlaci acara bithe）、《清文總匯》（Manju gisun-i uheri isabuxa bithe）、《字法舉一歌》（Zi' fa gioi i-i bithe）等。書院雖然以教授滿文為主，但開設的課程並不限於滿文，還兼授滿族史、清史、滿族文學、民間文學、古文獻學，可見書院並不欲將滿語獨立於滿洲文化之外。¹⁷⁷教學以外，書院也是一個族人互動的平臺，「凡是為民族事業服務的事，書院都願意做並盡力做好」。¹⁷⁸來學習的數百名學生中，大部分是滿族，¹⁷⁹其中包括人大代表、政協

¹⁷⁵ 中國大陸，因使用簡體字，多將溥傑寫作溥杰，但如此一來則失去用字的偏旁來辨親疏的原意。見金松橋纂修，《愛新覺羅宗譜》（十一），頁 624-25；參看注 256。

¹⁷⁶ 邱永君，〈瀛生先生訪談錄〉，《燕情良意》，頁 396-98。

¹⁷⁷ 文史課程由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馬汝珩、李華、王俊義，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楊寶隆，滕紹箴授課。書院並不時邀請研究滿洲的學者如王鍾翰、穆曄駿、宋和平、趙書、閻崇年、金啟琮、戴逸、周遠廉等講演。見北京滿文書院，〈成立《北京滿文書院》的宗旨和作法〉，頁 1—2；金寶森，〈為培養滿文人才、促進滿學研究而建立的北京滿文書院〉，頁 5；趙書，〈北京滿文書院〉，頁 455-56，趙文亦見《拙存集》，頁 11-14，但內容略有出入。

¹⁷⁸ 金寶森，〈為培養滿文人才、促進滿學研究而建立的北京滿文書院〉，頁 7。

¹⁷⁹ 戴逸主編，《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傳略》，頁 248。

委員、大學教授、工程師、廠長、校長等。¹⁸⁰他們學習滿文是出自真正的民族感情，而非借之以謀求一枝之棲。¹⁸¹這和瀛生推廣滿文的初衷是一樣的。

滿族被迫缺席

雖然不懂滿文亦可以自認為滿族，但這只是時勢使然，萬不得已的事。對瀛生而言，「理想」的滿洲人最好懂滿語。奈何民間並沒有使用滿語的外在環境。北京滿學研究會即因資源不足，運作了三年，於 1990 年解散。滿文書院也因缺乏中央的支持，¹⁸²加上沒有固定的辦學地點和編制，教師年事漸高，最終亦於 2003 年底停辦，書院培養出來的畢業生不到千人。¹⁸³即便是中央民族大學，滿語亦不如其他少數民族文字，列為常規課程。¹⁸⁴

在這種情況下，滿族難以有效地累積足夠的「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以形成抗衡主流漢文化的所謂「反文化」來突顯其族群特性，¹⁸⁵連帶地，滿族在全國性事務的參與上，和在日常生活的實踐中，也被迫缺席。人民幣自 1948 年發行以來，票面上除漢文以外，少數民族語文一直只有蒙、藏、維、壯四種文字，代表滿族的滿文，從來沒有在流通全國的紙幣上出現過。即便 1988 年發行第四套鈔票的一角鈔票上選用了滿族頭像作為圖案，但頭像的輪廓，沒有突出的滿族特徵，搭配的服飾，不細看也看不出是滿族的馬褂（olbo）或坎肩（guwalasun），¹⁸⁶與旁邊並排，

¹⁸⁰ 金寶森，〈為培養滿文人才、促進滿學研究而建立的北京滿文書院〉，頁 5。

¹⁸¹ Lian Bai, "Representation Sphere: Manchu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Movement in 1980s'," p.66.

¹⁸² 雖然東北等地也成立了若干滿文教學點，但主辦者多是民間的自發組織，與政府無關，見 Katarzyna.Golik, "Facing the Decline of Minority Languages: The New Patterns of Education of Mongols and Manchus," pp. 100-102。

¹⁸³ 王歧豐，〈滿文瀕危，千萬滿族人多不識滿文 尋老師不容易〉，《北京晨報》，都市新聞，2010 年 11 月 29 日，A09。

¹⁸⁴ Katarzyna.Golik, "Facing the Decline of Minority Languages: The New Patterns of Education of Mongols and Manchus," p. 101.

¹⁸⁵ 參看 Theodore Roszak, *The Making of a Counter Culture: Reflections on the Technocratic Society and Its Youthful Opposition*; Milton Yinger, *Countercultures: The Promise and the Peril of a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¹⁸⁶ 到目前為止，人民幣共發行五套。1948 年發行第一套，票面只有漢文。1955 年發行第二套，票面上除漢文外，另加印蒙維藏三種少數民族文字。之後，1962 年發行

以穿戴鮮明民族服飾來突出民族特徵的高山族頭像相比，明顯有別（圖7）。滿族頭像這時之所以被選為鈔票上 14 個代表民族之一，是中央為了順應 80 年代後期滿族主體意識高漲而不得不作出聊備一格的回應。¹⁸⁷滿族在全國能見度的喪失，也可以在全國播放的「央視春節聯歡晚會」上得到證明。¹⁸⁸例如，2011 年「春節聯歡晚會」的五大民族歌舞「幸福大家庭」中的五族，不是大家熟悉的滿、漢、蒙、回、藏，而是蒙、回、藏、維、壯。滿族身影第一次出現在「春晚」是超過四份之一世紀以前的事。在 1987 年「春晚」的「民族團結大聯唱」節目中，滿族與藏、維、納西、朝鮮、蒙、回、彝等民族同臺演出。不過，這亦是滿族在「春晚」自 1983 年舉辦以來唯一的一次，¹⁸⁹而該次表演也正是在 80 年代後期，滿族積極爭取權益之時。

由此看來，滿族儘管是全國第三大的少數民族，¹⁹⁰但由於已丟失了包括語言在內的族群特徵，其存在並沒有得到中央賦予應有的重視。¹⁹¹滿族的名稱已變得空洞化。滿族實際上已變成了一個人們「視而不見」的族群。¹⁹²瀛生的滿洲「身體」，好比置身於一個「虛擬」的族群空間，

的第三套，1987 年發行的第四套，和 1999 年發行的第五套，票面上再加印壯文。參看 Edward Rhoads, *Manchus & Han*, p. 282。五套鈔票中，只有第四套的鈔票刻意從 56 個民族中選用了 14 個民族作為圖像，滿族是其中之一，以示民族大團結。

¹⁸⁷ 80 年代後期，滿族積極爭取權益，自治縣於此時陸續成立。見金啟琮、張佳生，《滿族歷史與文化簡編》，頁 357-58。

¹⁸⁸ 在地方的「春晚」亦一樣。遼寧雖然是滿族的龍興之地，但在遼寧衛視 2012 年「春晚」的民族歌舞節目「祝福」中，表演的只有漢族、蒙古族、朝鮮族，沒有滿族，滿族「就像被人忘了一樣」。見〈2012 年遼寧電視臺春晚對滿族“不老夠意思的”〉，《吉祥滿族》，2012 年 1 月 22 日。

¹⁸⁹ 那英據說是葉赫那拉氏後人。自 1992 年以來，曾多次上過「春晚」，但她的獲邀表演主要因為她是受歡迎的流行歌曲歌手，與「展演」民族團結的大型歌舞節目沒有關係。

¹⁹⁰ 據 2000 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是壯族，依次為滿族，1068.23 萬人，居第二位。但據 2012 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滿族只有 1038.79 萬人，少了 300 萬人，變成第三位。

¹⁹¹ 雖然中央積極鼓勵少數民族使用民族文字，甚至幫助沒有書寫系統的少數民族創造文字，但瀕臨消失的滿文卻並沒有獲得中央給予應有的關注。Lian Bai, "Identity Reproducers beyond the Grassroots," p.190。

¹⁹² 在臺灣，滿族的能見度也不高。在談到中國的邊疆民族時，國立政治大學前維吾爾語文教授阿不都拉只說「維、蒙、藏……各族」，沒有提滿族。見劉學鈺，《淡水河邊談國史—你是中國人嗎？》書前的「阿序」。

缺少相對應的族群實在感，而他自己也變成了末代滿洲人的代名詞。

七、「身體」的「國家化」：去滿洲中心

在訪談時，瀛生因其滿洲背景，不自覺地將話題牽引至內陸歐亞的阿爾泰世界。他開玩笑說自己是最後的匈奴。可是，匈奴是遊牧的，與蒙古的關係較為密切，跟世代住於森林中的滿洲無太大關係。雖然話一說完，瀛生便馬上發現其口誤，並即時作了更正，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對漢人世界感覺較為疏離。他說他對多爾袞（Doryon）恨之入骨，因為他堅持入關，結果滿族漢化，滿族傳統被毀，滿族因此變得名存實亡。

「趙宋之後」

不過，最令人驚訝的是，在強調自己是滿族的同時，瀛生又自認是宋室趙氏之後。¹⁹³這是我自上個世紀 80 年代中認識瀛生時，直到本世紀初整整四分之一個世紀都沒有聽他說過的事。瀛生認為他的這個「新」見解是上面提到他對滿洲研究的三大貢獻之一。他說，在愛新覺羅家族中，這原是個秘密。他小時候王府內的族中老人紮拉豐阿（Jalafungya）告訴他，¹⁹⁴滿人其實乃宋代為金人於「靖康之難」擄去的趙宋徽欽二宗及其皇族的後代，其根據是努兒哈赤與明人對話時，曾經自稱謂：「Bi Aisin Gurun-i niyalma. xala Gioro/我是金國人，姓覺羅」。¹⁹⁵瀛生說，愛新（Aisin）即金，覺羅（Gioro）中的「覺」~gio，按明代遼東音，應讀作[tɕiau]，即「趙」，一如「嶽」字在東北之讀作[jau]，「學」字之讀作[ɕiau]，¹⁹⁶「愛新」和「覺羅」連起來就是歸附大金的趙氏的意思，所以他的漢文名字該寫作金趙瀛生才對。¹⁹⁷不過，瀛生認真看待這個「金趙」

¹⁹³ 參看瀛生，《燕情良意》，頁 386。

¹⁹⁴ 紮拉豐阿曾於清宮任職，原是光緒皇帝的伴讀，因不欲回寧古塔，為隆裕太后安排在王府工作。

¹⁹⁵ 這裡紮拉豐阿所指的金國，應是建於 12 世紀的完顏金，而非努兒哈赤入關前所建的金國。

¹⁹⁶ 愛新覺羅瀛生，《滿語雜識》，頁 367。不過，1946 年 8 月 16 日，溥儀在東京大審判讀出自己的名字時，「覺」字依北京音讀作[tɕɛ]，見《偽滿洲國揭秘：家國夢斷十四年》(2)。就發音而言，應以瀛生的記音為是。有關此點，本人將另有專文討論之。

¹⁹⁷ 徐丹俚，〈音節羅列讀出來的，它不是滿語呀！〉，頁 7；瀛生，《燕情良意》，頁

看法，應是頗為晚近的事。三十年代回到中國時，他大概只把王府的傳聞，當作掌故來看待。五十年代以後，在反封建思想的籠罩下，他應不會將漢人的帝王背景，積極移植到滿洲皇族的「身體」上來思考。到了八十年代，在與我的通信中，他還沒有使用金趙瀛生之名。¹⁹⁸「金趙」的具體想法應該是到了 21 世紀初期才開始成形的，¹⁹⁹但這時頂多亦只是作為茶餘飯後的談資。瀛生在 2004 年出版的《滿語雜識》中，於解釋「愛新覺羅」一詞時，尚沒有將之連繫到「金趙」上面去。一直到 2005 年出版的《老北京與滿族》，作者的名字，用的仍然是「愛新覺羅瀛生」。²⁰⁰

這個「金趙說」其實在愛新覺羅氏族間並不陌生。乾隆皇帝第五子榮純親王永琪七世孫愛新覺羅·啓琮在他的一篇文章中亦談到了相同的事情。他說在 30 年代，即瀛生剛回到中國的時候，這個滿人乃趙氏之後的說法早已為人所熟知。根據他的研究，覺羅的前身即十二世紀女真的交魯氏（Giao-ru），交魯乃女真的姓氏之一，與漢姓「趙」無關。²⁰¹從對音的角度看，啓琮的理論是站得住腳的。在金代，「覺」字的讀音，在 17 世紀尚未顎化前，屬見母[k]，與屬澄母[d]或定母[d]的「趙」字，讀音並不相同。²⁰²

追本溯源，所謂的「金趙說」，應該不會出現在入關以前，因為如果滿人真是趙宋後裔，即可據此裝扮成漢人，作為入據中原時的正當性依據，於其統治並非沒有益處，所以「金趙說」應該出現於入關之後。順康時，有關滿洲為宋裔的記載便已出現。張縉彥所著的《甯古塔山水記》一書中說：「甯古村落之大者，莫過牡丹、交羅。……交羅，滿音趙姓也，蓋因族氏以為屯、或言國姓上世有居此者，後遷去，不可考矣。」²⁰³到了清中葉，滿洲為宋人之後的說法更廣為流傳。乾嘉時，宗室宜興在《庸言知旨》（An-i gisun-de amtan-be sara bithe）一書中說：「國朝之姓曰愛

394。

¹⁹⁸ 1986 年 1 月 10 日，瀛生給我的私函。

¹⁹⁹ 徐丹俔，〈音節羅列讀出來的，它不是滿語呀！〉，頁 7；瀛生，《燕情民意》，頁 394。

²⁰⁰ 愛新覺羅瀛生，《滿語雜識》，頁 977。

²⁰¹ 金啓琮，〈愛新覺羅姓氏之謎〉，頁 205—11。

²⁰²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頁 72、260；244、266。

²⁰³ 見張縉彥，《甯古塔山水記》，頁 27。

新覺羅，或有稱為趙姓的（Musei gurun-i xala Aiisin Gioyoro sembi. Ememungge Joo xala seme tukiyehegge）」。204嘉道之際，昭槤的《嘯亭雜錄》和姚元之的《竹葉亭雜記》，皆有相關的紀錄，205唯兩書於光緒時始有刻本行世。不過，清室對於這些賡續不斷的傳說，並不以為然，也不覺得有為之辯解的必要。畢竟，滿人是統治民族，說滿人即漢人，兩者的辨別性將因而消失，所以即便滿漢同源是事實，亦無需刻意宣揚，以維持滿人與被統治民族的區隔。何況，滿人以異族入關這個概念已深入人心，辯之徒增紛擾。雍正主張調和滿漢，他的《大義覺迷錄》也沒有特別提及滿洲是趙宋之後的這個說法。至少，到目前為止，在清宮內尚沒有發現滿洲祭拜其「祖先」宋帝之處，或其相關的文物擺設。因此，以覺羅即趙來推斷滿洲和趙宋有關，似乎是部分滿洲人在近代排滿的洶湧浪潮中，將此流傳已久的傳說，轉化為歷史事實的一廂情願的「重新發明」。206

「滿漢一家」的「金趙說」之所以在愛新覺羅氏族間流傳，並不是空穴來風，而是產生自入關後宮中長期滿漢混同的歷史形塑。自順治起一直到溥儀，漢人為后妃者不乏其人。207康熙、嘉慶之母皆為漢人。208乾隆之母，雖名為鈕祜祿氏（Niohuru xala），但其實亦為漢人，而有關其出身於漢人的傳說，一直到近代，仍不絕於耳。209滿洲宗室女嫁漢人的例

204 轉引自胡增益，《新滿漢大辭詞》，頁 876。

205 見金啓孫，〈愛新覺羅姓氏之謎〉，頁 206。昭槤亦代善之後，與瀛生同宗，同隸正紅旗。

206 辛亥遜國後，除了愛新覺羅的「金趙說」外，基層滿族也有類似的滿人漢源說，如黑龍江富裕縣三家子滿族村的孟氏 Meljere 的攀附為孟子之後，見定宜莊、邵丹，〈歷史“事實”與多重性敘事——齊齊哈爾市富裕縣三家子村調查報告〉，頁 27—31。

207 姜守鵬、劉奉文，《愛新覺羅家族全書》(2)，頁 8-9；劉潞，《清代皇權與中外文化》，頁 241-53；楊珍，《康熙皇帝一家》，頁 83-87、393-97；孫繼新，《康熙后妃子女傳稿》，頁 424-26；於善浦，《乾隆黃帝的香妃》，頁 15-30。

208 鄭天挺，《清史探微》，頁 20-21。

209 乾隆生母鈕祜祿氏原為漢人，應無疑問。雍正元年（1723 年）二月十四日的上諭即以熹妃原為格格錢氏，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諭旨彙編》，第 1 冊，頁 36—88。至後出的《世宗憲皇帝實錄》，卷 4，頁 14a/101，始改熹妃為鈕祜祿氏。蕭爽所編的《永憲錄》，卷 2 下，頁 176 亦據檔案所記，以熹妃為格格錢氏，可為佐證。錢氏因乾隆踐祚而封皇太后，故不得不改藉滿洲，攀附八大家鈕祜祿氏，以掩蓋其原來出身。雍正的后妃多為漢人，故錢氏原為漢人，實不足為奇。相傳乾隆皇帝是清代浙江海寧陳閣老的兒子。陳閣老即雍、乾時代的名宦大吏陳世

子也不少，康熙許配第九女溫憲公主與佟國維之孫舜安顏（Sungayan），以及許配第十四女和碩公主與散秩大臣一等男孫承運，即為其例。²¹⁰滿中有漢，漢中有滿，滿漢這兩個混雜不純的意符，其內涵在清代早已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混合體。²¹¹不過，滿洲被完全「塗抹」以前，儘管「身體」已經大部漢化，其名號仍稱滿洲。²¹²有關這有

信（1680-1758）。不過，乾隆若為陳閣老之子，則意味著漢人篡了滿洲人的皇位。因此，在清代，尤其是當事者的陳家，因事關敏感，不特不視之為傳言，反而更加戒慎恐懼，寧願相信其確有其事。季羨林的叔母陳紹澤是陳家的後人。根據她的憶述，家族為了避禍而散居各地。她的父親先把她帶到天津，再將之寄養在濟南親戚家。季羨林生於 1911 年，以之往上推，他叔母的父親應為道咸時人，距乾隆之世約百年之後。見季承，《我和父親季羨林》，頁 24-26。值得注意的是格格錢氏也是浙江人（嘉興府）。她是五代吳越國錢鏐的後代。康雍乾時，錢家子孫姻親多為朝廷重臣。其顯赫的家世與同為世家大族的海寧陳家不相上下。其兄錢陳群（1686-1774），康熙六十年（1721）進士，乾隆時任內閣學士、禮部轉刑部尚書加太子太傅。此與陳世倌的經歷相仿。陳世倌康熙 42 年進士，乾隆時亦任內閣學士、兵部轉工部尚書加太子太傅。此外，乾隆南巡修海塘、賜匾，以及錢陳群迎駕諸事，與陳家的傳說亦相近。或因錢陳二字音近，民間將二者張冠李戴，致誤傳乾隆是浙江陳閣老的兒子。有關海寧陳家與嘉興錢家的研究，可參看賴惠敏，《清代的皇權與世家》，頁 37-111；錢治冰（錢斌），〈關於乾隆生母最新考證的最終結果〉，2005 年 6 月 26 日；國立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人名權威檔》。有關鈕祜祿氏的研究，可參考賴惠敏，《清代的皇權與世家》，頁 177-208。

²¹⁰ Evelyn S.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pp.72, 324. 與漢人后妃不一樣，滿洲宗室女與漢人聯姻自入關前即已開始，如李如柏、李永芳、佟養性。參看鄭天挺，《清史探微》，頁 28-29；定宜莊，《滿族婦女生活與婚姻制度研究》，頁 326；杜家驥，《清皇族與國政關係研究》，頁 453、457-58。

²¹¹ 清代滿漢的混雜性 hybridity 亦可從御製詩歌和子弟書中窺見。乾隆御製《盛京土風雜詠十二首》的題目皆用漢字滿文入詩。見張佳生，《獨入佳境：滿族宗室文學》，頁 67-71。子弟書的唱本，滿漢合璧或滿漢兼，其全漢文本，很多時亦夾雜著漢語音寫的滿文。把漢文當滿文使用的情形，在清代後期愈見普遍。見趙志忠，《清代滿語文學史略》，頁 153-56、190-222。

²¹² 滿漢二詞的指涉是不穩定及混雜的，不宜過於拘泥其字面上的刻板含義。入關前，滿人的「身體」，滿的成分較多，入關後，漢的影響愈往後則愈大，最後漢文化變成了滿人自己「想當然」的既有文化（putative givens）而不自知（從滿人的「主位」觀點（emic）看）。因此，即便至清末，滿人幾乎全面漢化，仍自覺是滿洲而無突兀不安的感覺。見 Stevan Harrell, "Introduction," in Melissa J. Brown, ed., *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p.2; G. Carter Bentley, "Response to Yelvington," p.169。由於滿洲本來就是統治民族，因此其「挪用」漢文化與「建構」及「攀附」無關。這裡引用德希達 Jacques Derrida 的「延異」différance 理論，旨在說明滿漢二詞，由於延宕增衍，流轉互訓，恆常處於「塗抹」sous rature 的不穩定狀態下而二元對立消融，自我解構。參看 Stuart Hall, "Cultural Identity and Diaspora," in Williams, Patrick & Laura Chrisman, eds., *Colonial Discourse &*

名無實的現象，我在另一篇文章中，仿照法農（Frantz Fanon）的名著《黑皮膚，白面具》（*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稱之為「滿洲面具，漢人身體」。²¹³值得注意的是，上面提到與清代皇室結成姻親的這些「漢人」，多屬於八旗漢軍（*ujen cooxa*）。²¹⁴在清代，他們被視作為「漢人而非漢人者」。²¹⁵瀛生的庶母王氏，如上所說，便是杭州駐防八旗之後，可見漢軍在滿漢混一的過程中，扮演著樞紐性的仲介角色。

然而，宮中的滿漢混同只是滿族長期漢化過程中的冰山一角。在入關前，滿洲漢化便已開始。²¹⁶入關後，滿洲人的「身體」更是滿、漢兩種力量爭辯、角力、競爭、協商的活躍場域。清末民初之際，族際的跨界焦慮已不復存在，俄國學者史祿國（С.М. Широкогоров）到瑗瑁調查時，他發現當地的滿洲人竟把「身體」的外在表徵辮子當作是漢人的傳統，同時又把形塑「身體」的儒家思想看作是純滿洲的舊俗。²¹⁷馴至滿洲國時，慶祝「孔聖誕」和將孔子像印在鈔票上（圖 8）已變得理所當然。鈔票上沒有滿文，因為當時使用的所謂「滿洲語」早已變成了漢語。²¹⁸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pp. 394-97。為免論述前後矛盾，學者常常將認同的內涵臨時「定格」在特定的時空內 temporary closure of meaning，作「定著」fixing 處理，參見 Stuart Hall, "Minimal selves," in *Studying Culture: An Introductory Reader*, A. Gray and J. McGuigan, eds., pp.136-37。在清代，滿漢二詞所代表的，與其說是文化上的差異，毋寧說是政治地位上的區分。

²¹³ 見甘德星，〈乾隆五十三年御製臺灣滿漢文碑的「碑石性」研究〉，《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排印中]。

²¹⁴ 定宜莊，〈滿族婦女生活與婚姻制度研究〉，頁 350-54；姜守鵬、劉奉文，〈愛新覺羅家族全書〉（2），頁 8-12；張玉興，〈明清史探索〉，頁 686。

²¹⁵ 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頁 32。

²¹⁶ 《無圈點檔子》所記老滿文之十位數，除 tofoxon（15）一字外，餘皆借用自漢語。數目字是族群日常生活的基本用語，可見滿洲入關前漢化滲透力之深。見甘德星，〈論滿文數目字 15〉，《中正大學滿洲研究》，2016 年 5 月 29 日。

²¹⁷ 見 S. M. Shirokogoroff,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anchus. A Study of the Manchu Clan Organization*, p.148。

²¹⁸ 滿洲國成立後，其頒行的所謂「國語」課本，用的全是漢文。參見啊麼徒，〈滿洲國語文法：現代支那語——北京官話〉（1936），收入《中國語文資料彙刊》，頁 157-265；吉野美彌雄，〈滿洲語基礎〉（1935），收入《中國文學語學資料集成》，頁 191-273；宮越健太郎、清水元助、杉武夫，〈短期支那語講座〉——附・滿蒙語會話，三卷三冊（1934），收入《中國語教本類集成》，頁 51、146-53；陳清金、宗內鴻，〈支那語滿洲語講座〉（1940），收入《中國語教本類集成》，頁 155-316；秩父固太郎，〈ラヂオテキスト初等滿洲語講座〉（1938），收入《中國語教本類集成》，頁 273-80；伴直之助編，〈清語ト清文〉，第一號（1904），收入

（圖 9）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在滿洲「慣習」的持續鬆弛下，瀛生亦不排除用漢文、說漢語，其日常所用的印章，所寫的書、信皆全用漢文。不過，在滿族漢化的同時，他也不忘提醒我們漢中有滿，漢族無論在語言、文化、習俗等方面亦深受滿洲的影響。這在北京地區尤其明顯。在《老北京與滿族》一書的代序中，他說：

「老北京的語言中，一開口就帶出滿語詞。老北京的邂逅語中，有三份之二以上是從滿族生產，生活內容來源的。老北京的習俗中，來自滿族者數之不盡。老北京的衣、食、住、行、體育、娛樂、戲劇、曲藝、婚、喪、喜、壽、誕、年、節、花、鳥、蟲、魚等等，以及諸般器物、各項物品及其他等等，一切多與滿族有關。有的是滿人從白山黑水故土帶來的，有的一直保存滿式原貌，有的則是入關後與漢式相結合而成的滿漢混合式。」²¹⁹

瀛生在此時將「金趙說」從塵封的記憶中發掘出土，自與他所面對「後清」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情境，息息相關。隨著清朝覆滅，旗人集團崩解，八旗貴族的政治「身體」亦從天潢貴胄的顯赫和深院高牆的蔭蔽中退出；而寄附於其「身體」上，成為其外在族群表徵的「慣習」，因八旗王公及旗人經濟拮据，²²⁰無法再充撐其特有的「品味」taste 和

《中國語教本類集成》，頁 281-90；藤井嘉作，《受験參考滿洲語問題の捉へ方》（1935），收入《中國語教本類集成》，頁 263-305；藤木敦實，《直ぐ役に立つ滿洲語の話し方》（1936），收入《中國語教本類集成》，頁 61-153；滿洲國文教部禮教司，《滿洲國禮俗調查彙編》（1936），收入波多野太郎編、解題，《中國語學資料叢刊白話研究篇》，頁 523-35；川瀨侍郎，《必攜滿洲土語解說》（1937），收入波多野太郎編、解題，《中國語學資料叢刊白話研究篇》，頁 537—69；滿洲語普及會編，《初等滿洲語の第一步》。張耀先曾任滿洲國文教部教學司編審部的編審官，在〈偽滿中小學教科書的編發〉一文中，他指出滿語即華語；參看劉第謙，〈我所瞭解的偽滿建國大學〉、王稔五，〈回憶我到大同學院受訓的經過〉，收入孫邦主編：《偽滿文化》，頁 423、642、656。

²¹⁹ 參看愛新覺羅瀛生，《老北京與滿族》書前的〈數語代序〉；愛新覺羅瀛生，《滿語雜識》，頁 585-849。

²²⁰ 王公一旦祖業無存，有一技之長者如順承郡王文仰辰，可以賣畫為生。無一技之長的，如另一「鐵帽子王」克勤郡王晏森，最後淪落到街上拉洋車，晏森亦因之而被戲稱為「車王」。見趙書，〈辛亥革命後的北京滿族〉，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後的北京滿族》，頁 7；馮其利，《尋訪京城清王府》，頁 53。參看 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pp. 211-16/莊士

「傾向」(disposition)(禮儀排場、旗人習氣)，在產生象徵性權力的「象徵性資本」(symbolic capital)破產下，變得無所依存，²²¹以致自清代以來一直得依靠特權界定、維繫，處於「虛擬」狀態下的滿洲身份，也倏爾變得模糊難辨。²²²

「漢/滿人」

不過，在滿漢畛域因階級消融而逐漸化除的同時，滿族提籠駕鳥、好吃懶做、亡國奴的刻板印象，在「他者」眾目睽睽的「凝視」下，仍然揮之不去。在漢人的潛意識中，「滿洲人」喚起的形象多是負面的。康雍乾雖為滿洲盛世，卻讓漢人聯想起之前的「楊州十日」、「嘉定三屠」，三朝早期的光芒也蓋不過人們對鴉片戰爭後「滿清」腐敗無能的記憶。晚清的成都人覺得滿洲人「窮」、「懶散」、「骯髒」、「粗魯」。²²³民國以來，滿人備受歧視。²²⁴五十年代，滿族被認為是中國在近代落後的根源，滿族自己亦以身為滿族為恥。²²⁵六十年代末，滿族由於以前曾成立過滿洲國，對國家的忠誠備受懷疑，一些滿人甚至被拒諸參軍大門之外。²²⁶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滿族仍是中國十一個人數較多的少數民族中，唯一不獲准成立族自治縣的族群。²²⁷據說，有些政府幹部為免節外生枝，或個人升遷受影響而隱諱他們的滿族背景。²²⁸一直到 1989 年，滿人

敦，《紫禁城的黃昏》，頁 191-95；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頁 847-53。

²²¹ 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pp.171-83。瀛生逼於無奈離開象徵滿人權力的王府，以及其後王府的拆遷，正是這個「後清」情況的縮影。王府賣掉後，原來圍繞著王府始能實踐的極具象徵意義的生活和行事戛然而止。有關滿洲王公的生活，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晚清宮廷生活見聞》，頁 255-57 的生動描寫。

²²² 入關後，由於滿人持續漢化，滿洲的「身體」已被逐漸掏空，其滿洲特性只能靠特權所支撐的獨特生活型態來彰顯。滿洲遜國後，特權失去，此僅餘的外在滿洲特性同時消失。滿洲，作為一個近代族群，最後只剩下空洞的旗籍來維繫。這時的八旗已成了記憶的符號，與清代的八旗仍然是一個制度有別。參見 Mark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p.350-354。

²²³ 王笛，《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頁 251。

²²⁴ 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頁 848。

²²⁵ 金啟琮，《金啟琮談北京的滿族》，頁 162；《滿族社會歷史調查》，頁 121-22。

²²⁶ Lian Bai, "Representation Sphere," p.96。

²²⁷ Edward Rhoads, *Manchus & Han*, pp.280-81。

²²⁸ Lian Bai, "Identity Reproducers beyond the Grassroots," p.196, Lian Bai, "Representation Sphere," pp.30-31, 82-84。Shao Dan, *Remote Homeland, Recovered*

才獲准舉行紀念滿族誕生的「頒金節」，而北京的滿族，因為處於首都敏感之區，更曾被阻撓舉辦這個對滿人別具意義的節日。²²⁹九十年代以後，雖然情況似有所改善，如滿族自治縣和自治鄉已有所增加，但滿族仍不獲准成立如蒙、藏、維三族的「自治區」。²³⁰社會對滿族的負面看法也沒有完全消散。我以前的一個滿族研究生包麗豔，在 2000 年論文口試時，說到滿人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之際，竟一時感觸而淚灑當場。2008 年，清史學者閻崇年，因言論被認為過於偏袒滿洲，在無錫新華書店簽書時，竟遭一位在網上自稱為「大漢之風」的人（黃海清）掌摑。²³¹

在以漢人為主的社會中，滿洲的「身體」仍然帶有原罪。²³²瀛生刻意將「金趙說」由幕後搬到臺前，即欲藉著滿人的普遍漢化，因勢利導，順水推舟，利用滿族兼具主體民族漢族的身份，覆蓋滿人較為負面的形象，以提升滿族至漢族同樣的地位。何況，這個滿族不單是漢族的一個分支，而且還是漢族中較為高貴的宋代皇室。換句話說，滿族原來是高等的滿化漢人或漢裔滿洲人（hyphenated Manchus），簡言之，即「漢/滿人」。

顧名思義，「漢/滿人」的「身體」，滿漢相容，其中的滿洲特質，在漢化成分的擠壓、戕賊、侵奪下，光芒雖難以盡顯，但卻沒有消亡，相反卻因而得到了依傍；而且，這個看似相形失色的滿洲特質，只要適當的時空一旦出現，又可在滿漢的「身份拔河」中，隨時反客為主，回復至顯眼的位置。是以，表面上，「金趙說」看似相互矛盾，但實質上，乃一以退為進的「矛盾修詞」（oxymoron），相異而不對立，其模稜兩可的曖昧性質，正好給族群特質的選擇預留了方便的操弄空間。這樣一來，滿族經由策略上的退卻，透過「金趙說」，強調其漢族成分，去除滿洲中心，原來相對於漢族的 55 個少數民族之一的弱勢地位亦因而得以消解。因

Borderland, pp.208-09 也有同樣的記載。

²²⁹ Lian Bai, "Representation Sphere", p.81.

²³⁰ Edward Rhoads, *Manchus & Han*, p.281, Shao Dan, *Remote Homeland, Recovered Borderland*, pp.207-16。

²³¹ 大漢之風，〈我為什麼掌摑閻崇年〉，2008 年 10 月 22 日。

²³² 臺灣的滿族同樣受國民政府的打壓。臺灣滿族協會的成立一波三折，滿族子弟就學就業亦無優待。見瀛雲萍，《滿族史》，頁 92—93。

此，「金趙說」可說是滿族在漢化大趨勢下對政治現實作出妥協的反映：瀛生主觀的自我去滿洲中心其實是整個「他者」去滿洲中心結構下的產物。

瀛生晚年所刻的一方閒章上的十二字印文「涿郡趙氏、歸化大金(金邦)²³³、瀛生文籙」(圖 10)是他「漢/滿人」身份認同的總結性說明。

「涿郡趙氏」表示他所屬的愛新覺羅氏族原是漢人，為趙宋之後。「歸化大金」是說在 12 世紀時，他的祖先(即宋室趙氏的後人)女真化後，身不由己的變成了女真人。到了 17 世紀，這些原為趙宋之後的女真人，入關後又變成了漢化的滿洲人。「瀛生文籙」是說他自己是在日本出生的已漢化滿洲人之後。為了突出其滿漢背景，瀛生刻意將印文中的「金」、「趙」部分並排，並將「瀛生文籙」四字置於其下，以明其心跡。

瀛生這種複雜多變的身份認同，如果用「多重認同」的概念來解釋，自無不可。不過，「多重認同」的個別身份雖然同時並存，但很多時卻相互隔斷，不會同時顯現，有時更是相互排斥(異質互排)。²³⁴瀛生同時公開認同於兩個共存的不同族群，表面上看，兩者似乎是對立矛盾，但實際上，卻是相容不悖，關係密切(異質共存)。由於瀛生的滿漢認同，相互包孕，有時是滿在內，漢在外(這時漢的部分較為突出，但滿的部分並沒有完全消失，即「滿漢人」)；更多時是漢在內，滿在外(這時滿的部分較為顯眼，但漢的部分卻沒有被完全遮蔽，即「漢滿人」)，兩者的主客、輕重、先後，因時空轉換而適時變易，所以我把這種同時並存，但族群相異，卻又互為表裡的合成認同稱為「包孕認同」，其所屬的「漢

²³³ 瀛生大概在 2007 年後，將「大金」改為「金邦」，因為他覺得這個「大」字太囂張霸氣。友人贈他「涿郡趙氏、歸化金邦，瀛生文籙」一印，但他不太喜歡用，印交他人保管。

²³⁴ 有關「多重認同」的不同面向，可以 1997 年香港「回歸」前的認同說明。大部分戰後在香港出生的華人，一般可以有三種身份，即香港人、中國人、英國人。在「回歸」前的「語境」下，中國與英國的「多重認同」是相互排斥的，到英國時，如符合資格的話，用的是代表已歸化「母國」的英國護照，以方便入境，強調中國身份只會造成不必要的困擾；同樣，到中國時，特別是「文革」期間，則只會用代表中國人身份的「出入境通行證」，敏感的英國身份不會提及(異質互排)。不過，相對於這種中、英相互隔斷的多重認同，香港與中國(祖國)的認同(香港的中國人，中國的香港人)，以及對部分依戀英國並自覺是英國人的人而言，香港與英國(母國)的認同(英籍港人，港籍英人)卻都是相容的(同質共存)，而大部分香港人又以這個複合身份中的香港認同為優先。

滿」、「滿漢」兩種變異形式，可視之為「認同變體」，兩者作「互補分布」，有此即無彼。²³⁵

作為「漢/滿人」，瀛生儘管自認是趙宋之後，但卻沒有因為他的「漢人」王室背景而積極向漢族全面傾斜，他對自己的滿人認同，仍有所堅持，他的「漢/滿人」「身體」即經常處於「漢滿人」的狀態（mode）之下。

中國人

在訪談中，瀛生說他以作為中國人為榮。這應是他自 30 年代「到」中國後，經歷民國及人民共和國長期形塑的結果。這兩個新興的民族國家認為關外滿人祖居之地的「東三省」是中國的固有領土，而滿族則是自古以來在白山黑水間繁衍的中國民族。²³⁶瀛生這個在大腦中逐漸浮現的中國人自覺，與他在王府內形成的滿洲身份並不矛盾。畢竟，按照他的理解，滿人乃源自作為中國主體民族的漢人。瀛生說他對推翻清朝故國的孫中山並無恨意。²³⁷辛亥遜國，只是一如以往中國的改朝換代。在他看來，不管是民國也好，後來的共和國也好，都是大清的延伸。大清國、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上是同國而異名，中國現代的疆域終究也是繼承自清朝的。大清與中國在概念上基本重疊。他特別指出「中國」這個詞在光緒時已出現在致法國國書中。²³⁸那時大清尚在，滿族仍然是中心。又說 1912 年 2 月 12 日，隆裕太后在清宣統皇帝溥儀退位詔書中宣

²³⁵ 語言學中有「語素變體」allomorph、「音位變體」allophone、「字位變體」allograph 的概念，我這裡用的「認同變體」（alloid）一詞即據此而來。「互補分布」即語言學中的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²³⁶ 參看 Shao Dan, *Remote Homeland, Recovered Borderland*, Chapter 3, pp.117-122.

²³⁷ 代善另一後人愛新覺羅·毓鋆對孫中山的推翻清朝也毫無怨言。見許仁圖，《長白又一村》，頁 289。

²³⁸ 「中國」這個詞在光緒前已出現，如康熙六十一年（1726）的遺詔中已有「中國」Dulimbai Gurun 兩字。在清代，「中國」指的即大清。這個地理名詞的政治意涵一直延續到清朝遜國。1946 年 8 月 16 日，東京大審判時，溥儀說：「1909 年的時候，做中國皇帝的這個地位……1911 年在中國發生這個內部的一種革命」。見《偽滿洲國揭秘：家國夢斷十四年》（2）。即便在滿洲國時，滿洲人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溥傑在「九一八」後拒絕歡送開赴東北的日軍時說：「我是中國人，怎能到車站去歡送打中國的日本兵呢？」見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溥傑回憶錄》，頁 41。

稱：「仍合滿蒙漢回藏五族²³⁹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²⁴⁰這時滿族被去中心化。至人民共和國時，滿族雖然如瀛生所說是「中華民族內五十六個民族的一枝奇葩」，²⁴¹但相對地卻變成了以漢族為主體的邊緣。滿洲的逐步去中心化，有助滿洲從清代「家天下」的統治者心態，和清末民初的「旗族」體認，²⁴²逐漸過渡至現代的「國族」（中華民族）認同。中國不再屬於一族一姓。滿族已被迫離開中心。滿洲不再是征服民族，愛新覺羅氏族不再是統治者。大清遜國已有百年，滿洲「國中之國」的族群統治已一去不復返。

瀛生的「身體」實踐說明他對這個新的政治現實的認知：他的「身體」不屬於已滅亡的大清，而是屬於全國各族人民組成的新興共和國。2000年11月，他與北京大學達成協議，要在過世之後，把他的滿洲「身體」捐獻給這所全國各地最優秀學生入讀的頂尖大學，作為人體解剖學和顯微解剖學的學習材料，並打算將其遺骨製成標本，供師生學習之用。²⁴³瀛生之選擇在百年後將遺體捐獻給國家，相對於其同宗死後歸葬東北祖居之地，²⁴⁴可以說是在現代國族論述下「身體」徹底國家化的結果。因此，在談到族人傅履仁時，瀛生說他是美國有史以來第一位「華裔」將軍，也就不難理解了。²⁴⁵與溥儀被國家「召喚」（interpellate），「身體14」被強制由皇帝改造成人民共和國的國民這一事實相比，瀛生「身體」的國家化是「到」中國後逐漸演化生成的。

²³⁹ 滿漢蒙回藏五族合稱可追溯至乾隆時。十八世紀末乾隆征服準噶爾，回部併入大清版圖。嗣後，回部與滿漢蒙藏四族並稱。乾隆時所編的《御製五體清文鑑》，將回部的察合臺語加在滿漢蒙藏《御製四體清文鑑》上，即是此事實的反映。

²⁴⁰ 《宣統政紀》，卷70，頁1293。

²⁴¹ 邱永君，〈瀛生先生訪談錄〉，《燕情良意》，頁396。

²⁴² 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頁840-44。

²⁴³ 邱永君，〈瀛生先生訪談錄〉，《燕情良意》，頁400。

²⁴⁴ 瀛生的實踐，與同隸正紅旗的愛新覺羅·毓璽的想法，成一強烈對比。毓璽雖身在臺灣，但堅持自己是滿洲人，不是「中國人」，在過世前，已計畫好歸葬東北。參看注254。

²⁴⁵ 見邱永君，〈瀛生先生訪談錄〉，《燕情良意》，頁396。德齡郡主也認為滿洲是中華民族的一部份。1946年，美國發起援華運動，德齡郡主參加了「中國之夜」及「一碗飯運動」。見德齡郡主，《御香縹緲錄》，頁5、184。

要之，瀛生不單是中國人，他同時也是中國的滿洲人，²⁴⁶一如清代的滿洲人是中國人一樣，²⁴⁷只不過現代的滿族，已不是多民族共和國的

八、結語

身份認同，很多時被認為是在「結構」下「論述實踐」（discursive practice）的結果。不過，這個看法不一定完全適用於瀛生。在他的整個「認同計畫」中，特別是其滿洲認同，是一種存在主義式的感情抉擇，具有一定的「能動性」。²⁴⁸

瀛生「到」中國前，滿洲認同只是其「象徵性族屬」。雖然這個滿洲身份看似被擱置一旁，但其滿洲認同毫無疑問仍沈潛在其深層意識內。「到」中國以後，經王府的「規訓」，原來沈潛的滿洲身份，一經強化後，又變成了核心身份。到了近期，滿洲身份之外，又加上了漢人身份。不過，這個包孕的漢人身份只是策略上的轉換，其目的在顯示滿洲來源的尊貴；在滿漢兩者之間，滿洲身份優先，並且是其認同的核心。觀乎瀛生自「到」中國以後，從來沒有隱瞞過其滿人身份，其滿人意識也從未動搖過，並且以菁英分子之姿，積極投入重振滿洲之道，不能不說瀛生的滿洲認同，有較大的「原生」傾向，²⁴⁹與「工具論」者所主張族群特質是獲取個人實惠的「理性選擇」（rational choice）關係不大。²⁵⁰

²⁴⁶ 2011 年（辛亥年六月初六），瀛生《題滿語口語音典》一詩云：「祖國文化萬葩紛，民族兄弟競耕耘。將得祖授滿口語，繽紛叢隅獻微馨。」自認作「胡」的啟功也說，「如果用生物學的綱和目來說明的話，那麼我——啟功，就是中華民族那個‘綱’，滿族那個‘目’……在我的同鄉、同族人中間，我不可謂不“漢化”，我現在連滿族語也不會說了，但我的民族特性、民族感情卻很濃烈。」劉增林，〈“我是中華民族那個綱，滿族那個目”——訪啟功先生〉，《中國民族報》，2001 年 10 月 9 日，第 06 版。

²⁴⁷ 甘德星，〈康熙遺詔中所見大清朝皇帝的中國觀〉，《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頁 109—114。

²⁴⁸ 有關「認同計畫」identity project 的能動性 agency 及反思性 reflexivity，可參看 Anthony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pp.53-54.

²⁴⁹ 從民國至近代，滿人不理會歧視，堅持自己為滿族的，為數不少。見《滿族社會歷史調查》，頁 120。這種意識雖缺乏相對應的外在表徵，但其實卻深植在很多滿人的心中。見 Pamela Crossley, *Orphan Warrior*, p.228.

²⁵⁰ 瀛生的滿族認同，若從「主位」emic 的觀點看，應是原生的，而他後來加入的漢人

由於滿人幾乎完全漢化，其滿漢相容的「身體」中，漢的成分越來越多，滿的成分越來越少，文化「他者」因而逐漸退隱，結果連滿人自己也覺得他們跟漢人沒有太大的分別。²⁵¹為了使其文化變遷變得合理化，有些滿人更巧妙地辯解說，滿族其實並沒有漢化，相反是漢人自己變得跟滿人一樣。²⁵²的確，在漢族的汪洋大海中，滿人要完全甩掉其長期浸淫於其中的漢文化並不容易。雖然滿人漢化後並無礙其自認為滿人，但滿人一旦喪失了實在的族群特質，其剩下的微弱象徵性認同，最終亦將為國族認同所覆蓋而不顯。瀛生冀求用滿文來填充內裡被漢化斲喪的滿洲「身體」，以及替補因特權喪失而消亡的外在滿洲特質，正是對這一現實的迫切回應。他的滿洲「身體」有力地說明滿族在「後清」的民族國家中仍頑強地存活著，沒有消亡。

可惜，瀛生唐吉訶德式的「身體」實踐卻效果不彰，即使他自己，最後亦難逃漢化的宿命。上面提到他新近出版的《燕情良意》一書，沒有打正旗號使用「愛新覺羅·瀛生」的滿文名字，而只避重就輕地用「瀛生」兩字，可以說是其滿中有漢的「身體」所承載「金趙」情結的反映。晚年的瀛生對「金趙」中的「趙」字特別執著。2010年8月底，我乘到北京之便，就此事向瀛生相詢。他說原來《燕情良意》一書打算用「金趙瀛生」之名出版，不用「愛新覺羅·瀛生」的滿文名字，以突顯「覺羅」即「趙」的意涵，但出版社沒有同意，所以只好妥協，改用「瀛生」之名作結。瀛生晚年之所以驀然提起「金趙說」，可以說是他對滿族因長期被邊緣化而作出無可奈何的反應，其目的無非欲說明在這繼清而起的民族國家中，滿洲並非異類，而是與漢人同源的中華民族的一份子，滿族不是陪襯的次等公民，而是與漢人地位相同的中國國民。

在臺灣，剛辭世的百歲老人愛新覺羅·毓鋆是著名的「民間學者」，自1947年來臺以後，六十年間，以傳承經學為其職志，²⁵³並自喻：「在

身份，若從「客位」etic的觀點看，則建構的成分居多。

²⁵¹ Stevan Harrell, ed.,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p.31; 《滿族社會歷史調查》，頁122。

²⁵² 劉正愛，《民族生成の歴史人類學——滿洲旗人滿族》，頁327。

²⁵³ 愛新覺羅·毓鋆（1906-2011），人多尊稱「毓老」，漢名劉柱林是他借用自他人的名字。與瀛生一樣，系出禮親王代善一脈。幼時入宮讀書，受業於陳寶琛、王國維

日本滿洲國時不做漢奸」（這是上面提到滿漢二詞自我解構後的結果）²⁵⁴，又說：「我不是中國人，偏要說自己是中國人」；²⁵⁵愛新覺羅·溥聰（金溥聰）²⁵⁶竟當上滅其國的中國國民黨秘書長；關中，²⁵⁷滿洲八大

等名儒，學問屬公羊一派。後留學日本、德國，習軍事。曾任職於滿洲國，特簡「御前行走」。來臺後任教於銘傳商專、中國文化大學、輔仁大學、政治大學哲學系，自立講堂「天德覺舍」，後改名為「奉元書院」。參看張輝誠，〈毓老真精神〉，《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07年10月12日，E7；張輝誠，〈大隱——懷毓老師〉，《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10年1月1日，E7（張輝誠二文亦見《毓老真精神》，頁188-200）；許仁圖，《長白又一村》，頁144、200、201、204、206、207。

²⁵⁴ 愛新覺羅·毓璽，因為漢化，不自覺地用了「漢奸」一詞。他說：「我們不是漢人，但我們祖先學習漢人文化，每個滿人都有漢姓，我們不作漢奸。」這裡所謂的「漢奸」，指的應是叛徒之意，藉之以說明他不願受日本人的擺佈，做出對關外滿洲國，以及關內清朝故土的不利之事，畢竟在清遺民眼中，兩者同屬中華。他在滿洲國任職期間，曾直接參與抗日活動。參見許仁圖，《長白又一村》，頁155、157；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頁329-30。蔣勳在《毓老真精神》的序中（頁10）說：「有一次老師在課堂上大聲罵起來了——『偽滿』，什麼『偽滿』，我們本來是滿洲人，家在滿洲，不是侵略了中華嗎？退回老家滿洲，怎地又『偽』了？『漢奸』？誰是你們『漢』哪？」說到關內，毓璽用的也是中華。據與毓璽諳熟的金玲女史2011年5月31日賜告，毓璽曾說過一句話，「什麼『漢奸』？我們是滿人，再怎麼說也不會是『漢』奸」。正因為毓璽堅持自己是滿族，所以他出資修葺永陵，並在過世前計畫好將骨灰運回東北安葬。參看張輝誠，《毓老真精神》，頁140-56，張輝誠，〈大隱——懷毓老師〉，《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10年1月1日，E4；林欣誼，〈一生傳奇，經學宗師毓老逝世〉，《中國時報》，「文化新聞」，2011年3月22日，A10；張輝誠，〈泰山頽兮——悼毓老師〉，《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11年4月8日，E4；張輝誠，〈毓老師與我——悼毓老師〉，《聯合報》，「聯合副刊」，2011年4月8日，D3（張輝誠後二文亦收於《毓老真精神》，頁201-211）；何定照，〈經學宗師毓老最後一課，聲影震學生〉，《聯合報》，2011年4月11日，A7；許仁圖，《長白又一村》，頁91、155-57、294-95。

²⁵⁵ 愛新覺羅·毓璽說「我不是中國人」時，他是受到「中國只屬於漢人，滿洲人是外族」的一般見解所左右，這種自民國以來即流行的說法明顯是受到革命黨的影響。參看Edward Rhoads, *Manchus & Han*, pp.13-18, 293。但因為大清即中國，所以他又不覺得自認是中國人有何不妥，而且更有「繼成華夏天下」的志向。見許仁圖，《長白又一村》，頁213；張輝誠，《毓老真精神》，頁131-39；許仁圖，《盤皇另闢天的毓老師》。有關清末中國即大清的實例不少，如滿人創辦的天津《大公報》批評刺殺恩銘的趙錫麟之被斬首後挖心為「不期見於二十世紀中國」的野蠻行為，見丁守和主編，《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頁8；Shao Dan, *Remote Homeland, Recovered Borderland*, pp.16-17也舉出了一些有趣的例子。

²⁵⁶ 愛新覺羅·溥聰，據說隸滿洲鑲黃旗，屬「溥」字輩旁系（自嘉慶始，規定直系人名第二字的部首須相同，如同系的溥儀、溥傑皆以「人」字為偏旁，「啟」字輩以下，行輩的第二字偏旁不再統一）。參看孫喆珪，《中國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傳》，頁85。金溥聰的父親是前臺灣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金鑾。

姓瓜爾佳氏，曾任中國國民黨副主席，2011 年元月，在考試院院長任內，無懼被誤解為「認賊作父」，提出在院內為「亂黨」「逆賊」孫中山立「國父」銅像，並親為揭幕。²⁵⁸

在漢人「語境」中，不論在文化上或者在政治上，滿洲人似乎已怡然自得，毫無扞格窒礙之處。滿漢的邊界已日漸消融。滿漢的「慣習」已幾乎大部重疊。滿漢的「身體」亦逐漸從混雜趨向同質。「漢/滿人」、漢人這兩個「意符」（signifier）的「意指」（signified）已日趨一致。滿族，由原來靜態的「多元一體」的大中華論述下的一員，²⁵⁹正逐步轉向動態的「多元融入一體」的新範式。滿族自覺，儘管頑強，最終亦難與「涵化」（acculturation）的力量相抗衡。在這個視角下，近代的滿族極可能步鮮卑、女真的後塵，成為歷史上的名詞。²⁶⁰愛新覺羅·瀛生（金趙瀛生）是在這個大趨勢下不自願的自覺參與者。

表 1 愛新覺羅·瀛生的世系：²⁶¹

清太祖努兒哈赤——代善（禮烈親王）——薩哈璘（穎毅親王）——勒克德渾（順承恭惠郡王）——諾羅布（順承忠郡王）——錫保（無諡）——熙良（順承恪郡王）——泰斐英阿（順承恭郡王）——恒昌（順承慎郡王）——倫柱（順承簡郡王）——春山（順承勤郡王）——慶恩（順承敏郡王）——訥勒赫（順承質郡王）——春佑（鎮國公）——謙德（輔國將軍）——長福（奉恩將軍）——長子文葵（字仰宸，其叔訥勒赫無嗣，襲其郡王爵），²⁶²次子文蓬（字瀛生）

²⁵⁷ 關中，遼寧鳳城人，隸滿洲正白旗，其父關大成是中華民國行憲後安東省選區的第一屆立法委員。

²⁵⁸ 見楊湘鈞，〈百年首尊，試院花百萬，立國父銅像〉，《聯合報》，2010 年 12 月 30 日，A4；楊湘鈞，〈考試院首尊國父銅像〉，《聯合報》，2011 年 1 月 7 日，A11。

²⁵⁹ 費孝通主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修訂本）。

²⁶⁰ 早年的人類學者吳文藻的看法與我不謀而合，他甚至說滿族「已成歷史名詞」。見〈邊政學發凡〉，《吳文藻人類學社會學研究文集》，頁 271。

²⁶¹ 瀛生，《燕情良意》，頁 387-88。

²⁶² 金松橋纂修，《愛新覺羅宗譜》（六），頁 3412、3417；寶如忠，《北京清王府》，頁 66-67。

參考書目

一、傳統文獻

《世宗憲皇帝實錄》，收入《清實錄》，第7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世祖章皇帝實錄》，收入《清實錄》，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多爾袞家譜》，收入《北京圖書館藏家譜叢刊·民族卷》，第34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宣統政紀》，收入《清實錄》，第60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

索寧安，《滿洲四禮集》，收於《續修四庫全書》，卷82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乾隆京城全圖》，北京：興亞院華北連絡部政務局調查所，1940。

《清文指要》Manju gisun-i oyongyo jorin-i bithe，北京：三槐堂，1809。

《聖祖仁皇帝實錄》，收入《清實錄》，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滿文原檔》，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館，2005。

《穆爾哈齊譜錄》，收入《北京圖書館藏家譜叢刊·民族卷》，第33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諭旨彙編》，第一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

申忠一，《建州紀程圖錄》，收入稻葉岩吉編，《興京二道河子舊老城》，興京：建國大學，1939。

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卷33，서울市：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長善等，《駐粵八旗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昭槤，《嘯亭續錄》，收入《嘯亭雜錄》，北京：中華書局，1980。

崑岡等，《清會典事例》，北京：中華書局，1991。

張廷玉等，《欽定大清會典》（乾隆朝），收入《大清五朝會典》，北京：線裝書局，2006。

鄂爾泰等，《八旗通志初集》，長春：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

蕭爽，《永憲錄》，北京：中華書局，1997。

薩英額，《吉林外記》，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

二、近人著作

丁守和主編，《辛亥革命時期期刊介紹》，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三田村泰助，《清朝前史の研究》，京都：京都大學東洋史研究會，1972。

川瀨侍郎，《必攜滿洲土語解說》，收入波多野太郎編、解題，《中國語學資料叢刊白話研究篇》，第一卷，東京都：不二出版，1992。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晚清宮廷生活見聞》，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出版，1982。

戈思明，〈從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開辦錫伯文班看文化搶救工程的盲點〉（上），《歷史文物》，第二十二卷，第二期，No.223，臺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12，頁 74—79。

文仰宸，〈記憶中的順承郡王府和我襲爵的經過〉，收入《北京文史資料》54，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頁 245-56。

王梓，《王府》，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

王笛，《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李德英、謝繼華、鄧麗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

王稔五，〈回憶我到大同學院受訓的經過〉，收入孫邦主編：《偽滿文化》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頁 646-51。

王慶祥，《溥儀社交實錄--溥儀人脈地圖》，北京：團結出版社，2007。

北京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京俗溯源》，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2。

北京滿文書院，〈成立《北京滿文書院》的宗旨和作法〉，北京：北京滿文書院，1985，頁 1—2。

甘德星，〈「正統」之源，滿洲入關前後王權思想之發展與蒙藏轉輪王關係考辯〉，《民族認同與文化融合》，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6，頁 119-74。

甘德星，〈乾隆五十三年御製臺灣滿漢文碑的「碑石性」研究〉，《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北京：中華書局，[排印中]

甘德星，〈康熙遺詔中所見大清朝皇帝的中國觀〉，《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中壢：中央大學人文中心，2014，頁 109—114。

甘德星，〈滿文羅馬字拼寫芻議〉，《滿學研究》，第六冊，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頁 50-68。

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溥傑回憶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12。

吉野美彌雄，《滿洲語基礎》，收入《中國文學語學資料集成》，第四篇，第三卷，東京：不二出版，1989。

朱誠如編，《清史圖典》2，順治朝，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

老舍，《正紅旗下》，《老舍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1999。

伴直之助編，《清語卜清文》，第一號，收入《中國語教本類集成》，第九集，第二卷，東京都：不二出版，1997。

吳文藻，《吳文藻人類學社會學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宋和平、孟慧英，《滿族薩滿文本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7。

李婷，《京旗人家：兒女英雄傳與民俗文化》，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

李燕光、關捷，《滿族通史》，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2003。

杜家驥，《清皇族與國政關係研究》，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8。

周勁思，〈恭王府宗教生活初探〉，《清宮史研究》，第 11 輯，北京，2013 年 12 月，頁 70—79。

周遠廉、趙世瑜，《皇父攝政王多爾袞全傳》，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孟森，〈八旗制度考〉，收入《清代史》，臺北：正中書局，1971，頁 23-128。

季永海譯注，曾壽著，《隨軍紀行譯注》，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7。

季承，《我和父親季羨林》，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定宜莊，《滿族婦女生活與婚姻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定宜莊、邵丹，〈歷史“事實”與多重性敘事——齊齊哈爾市富裕縣三家子村調查報告〉，《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4

卷第 2 期，南寧，2002 年 3 月，頁 26—33。

於善浦，《乾隆黃帝的香妃》，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

林志宏，《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9。

邸永君，〈瀛生先生訪談錄〉，2008（未刊稿）。

邸永君，〈瀛生先生訪談錄〉，收入瀛生，《燕情艮意》，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頁 384-401。

邸永君，〈瀛生先生訪談錄〉，《民族學名家十人談》，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頁 193-210。

金松橋纂修，《愛新覺羅宗譜》，收入《北京圖書館藏家譜叢刊·民族卷》，第 16 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據民國二十七年(1938)愛新覺羅修譜社鉛印本影印。

金玲，〈懸案與解答（落葉歸根）〉，《滿族文化》，第 27 期，臺北，2002，頁 14—15。

金寄水、周沙塵，《王府生活實錄》，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88。

金啟琮，《金啟琮談北京的滿族》，北京：中華書局，2009。

金啟琮、張佳生，《滿族歷史與文化簡編》，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92。

金啟琮，〈愛新覺羅姓氏之謎〉，收入恒煦(金光平)、啟琮(金麓)、烏拉熙春：《愛新覺羅氏三代滿學論集》，呼和浩特：遠方，1996，頁 205-11。

金寶森，〈為培養滿文人才、促進滿學研究而建立的北京滿文書院〉，收入啟霖編，《拙存集——金寶森與北京滿文書院》，北京：自刊，2004，頁 4-10。

侯芳，〈筆墨留聲 風物銘心—溥心畬和他的書畫〉，恭王府管理中心編，《清代王府及王府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頁 308-11。

姚元之，《竹葉亭雜記》，收入《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2。

姜守鵬、劉奉文，《愛新覺羅家族全書》(2)《世系源流》，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福建師範大學歷史系合編，《清季中外使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85。

胡增益，《新滿漢大詞典》，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苑洪琪，〈清代宮廷祭祀對王府的影響〉，《清代王府及王府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6-21。

孫文良等，《滿族大辭典》，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0。

孫喆甦，《中國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傳》，北京：華文出版社，1990。

孫繼新，《康熙后妃子女傳稿》，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

宮越健太郎、清水元助、杉武夫，《短期支那語講座》——附・滿蒙語會話，三卷三冊，收入《中國語教本類集成》，第九集，第一卷，東京都：不二出版，1997。

徐丹俚，〈音節羅列讀出來的，它不是滿語呀！〉，2004（未刊稿）。

徐蘋芳，《明清北京城圖》，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秩父固太郎，《ラヂオテキスト初等滿洲語講座》，收入《中國語教本類集成》，第九集，第二卷，東京都：不二出版，1997。

《偽滿洲國揭秘：家國夢斷十四年》(2)，北京：九州音像出版公司，2006。

啊麼徒，《滿洲國語文法：現代支那語——北京官話》，收入《中國語文資料彙刊》，第二篇，第四卷，東京都：不二出版，1992。

張玉興，《明清史探索》，瀋陽：遼海出版社，2004。

張佳生，《獨入佳境：滿族宗室文學》，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7。

張華克，〈滿族藝術家葉永青〉，《滿族文化》24，臺北，1998，頁 1。

張嘉鼎，〈末代王爺——文仰辰〉，收入北京文史研究館編，《北京文史》，第 2 期、總第九期，北京，1997，頁 9-13。

張輝誠，《毓老真精神》，中和：INK 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2。

張縉彥，《甯古塔山水記》，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4。。

啟功，《啟功口述歷史》，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船木繁著、戰憲斌譯，《末代皇弟溥傑》，北京：中國卓越出版公司，1990。

莊士敦，《紫禁城的黃昏》，臺北：博雅書屋，2009。

許仁圖，《長白又一村》，高雄：河洛圖書出版社，2012。

許仁圖，《盤皇另闢天的毓老師》，高雄市：河洛圖書出版社，2015。

郭錫良，《漢字古音手冊》（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陳清金、宗內鴻，《支那語滿洲語講座》，收入《中國語教本類集成》，第九集，第一卷，東京都：不二出版，1997。

陳毓賢，《洪業傳》，臺北：聯經出版社，1992。

富育光、孟慧英，《滿族薩滿族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

彭林，〈論清代王府祭祀制度中的中原文化因素〉，恭王府管理中心編，《清代王府及王府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頁 251-57。

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修訂本），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3。

馮其利，《尋訪京城清王府》，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

馮其利、楊海山、王林，《順承郡王府資料》，自刊本，2005。

黃彰健，〈滿洲國國號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7 下，臺北，1967，頁 459-473。

愛君，《雲南民族女性文化叢書·滿族，追尋不滅的情懷》，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1995。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灰皮本）》，北京：群眾出版社，2011。

愛新覺羅·溥儀，《我的前半生》，北京：群眾出版社，1979。

愛新覺羅·瀛生、於潤琦，《京城舊俗》，北京市：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

愛新覺羅烏拉熙春（吉本道雅譯），《最後の公爵愛新覺羅恒煦，激動の中國百年を生きる》，東京：朝日新聞社，1996。

愛新覺羅毓嶠，《愛新覺羅毓嶠回憶錄》，北京：華文出版社，2005。

愛新覺羅瀛生，〈愛新覺羅瀛生〉，收入戴逸主編，《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傳略》，北京：北京市文史研究館，2002，頁 245-250。

愛新覺羅瀛生，《老北京與滿族》，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

愛新覺羅瀛生，《滿語雜識》，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

愛新覺羅瀛生，《滿語口語音典》，北京：華藝出版社，2014。

楊東曉，〈滿語拯救者〉，《新世紀週刊》19，海口，2008，頁113-118。

楊東曉，〈滿語消失，也就是100年的事情〉，《新世紀週刊》，19期，海口，2008，頁119-121。

楊珍，《康熙皇帝一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

楊學琛、周遠廉，《清代八期王公興衰史》，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

萬依、黃海濤，〈清代宮中坤寧宮祀神音樂〉，《滿學研究》第四輯，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頁230-68。

葉明、石軍，《正說清朝十大貴族》，福州：海風出版社，2006。

滿洲國文教部禮教司，《滿洲國禮俗調查彙編》，收入波多野太郎編、解題，《中國語學資料叢刊白話研究篇》，第一卷，東京都：不二出版，1992。

滿洲語善及會編，《初等滿洲語の第一步》，大阪市：博潮社書店，1937。

滿族簡史修訂本編寫組，《滿族簡史》，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滿語言文化研究通訊編輯部，《滿語言文化研究通訊》1，長春，2009。

趙志忠，《清代滿語文學史略》，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2。

趙阿平、朝克，《黑龍江現代滿語研究》，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1。

趙展，《滿族文化與宗教研究》，瀋陽：遼寧民族出版社，1993。

趙書，〈北京滿文書院〉，收入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後的北京滿族》，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頁452-60。

趙書，〈辛亥革命後的北京滿族〉，收入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後的北京滿族》，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頁1-25。

劉小萌，《清代北京旗人社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劉小萌，《愛新覺羅家族全書》（1）《家族全史》，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劉正愛，《民族生成の歴史人類學——滿洲旗人滿族》，東京：風響社，2006。

劉第謙，〈我所瞭解的偽滿建國大學〉，收入孫邦主編，《偽滿文

化》，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頁 600-46。

劉學鈔，《淡水河邊談國史—你是中國人嗎？》，中和市：三友圖書公司，1995。

劉潞，〈平凡而又非凡的瀛生〉，收入《燕情艮意》，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劉潞，《清代皇權與中外文化》，香港：商務印書館，1998。

廣定遠、張華克，〈三家子村滿語調查記〉（下篇），《滿族文化》21，臺北，1995，頁 91—94。

廣定遠、張華克，〈三家子村滿語調查記〉，《滿族文化》20，臺北，1994，頁 55—60。

廣樹誠，〈尋根之旅〉（一），《滿族文化》25，臺北，1999，頁 40-45。

德齡公主，《紫禁城的黃昏：德齡公主回憶錄》，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

德齡郡主，《御香縹緲錄》，臺南：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

鄭天挺，《清史探微》，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燕大文史資料編委會編，《燕大文史資料》，第 3 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

穆曄駿，〈巴拉語〉，《滿語研究》2，哈爾濱，1987，頁 2-31、128。

穆曄駿，〈居住在張廣才嶺的滿族巴拉人〉，《北方文物》2，哈爾濱，1984，頁 64-68。

蕭默編注，《北京歷代建築：巍巍帝都》，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

賴惠敏，《清代的皇權與世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遼寧省編輯委員會，《滿族社會歷史調查》，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

閻崇年，〈北京滿族的百年滄桑〉，收入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後的北京滿族》，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頁 1-16。

鞠殿義，《愛新覺羅家族全書》(3)《人物薈萃》，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瀛生，〈老北京婚禮中的滿族習俗〉，《世紀》3，上海，1998，頁 58-59。

瀛生，《燕情艮意》，北京：北京出版社，2009。

瀛雲萍，《滿族史》，無出版時地。

藤井嘉作，《受験參考滿洲語問題の捉へ方》，收入《中國語教本類集成》，第五集，第二卷，東京都：不二出版，1995。

藤木敦實，《直ぐ役に立つ滿洲語の話し方》，收入《中國語教本類集成》，第六集，第三卷，東京都：不二出版，1996。

嚴峰，〈搶救滿語〉，《新華縱橫》電視紀錄片，2006年02月5日。

竇如忠，《北京清王府》，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7。

三、報紙

《中國民族報》（北京）。

《中國時報》（臺北）。

《文匯報》（香港）。

《北京晨報》（北京）。

《羊城晚報》（廣州）。

《明報》（香港）。

《東方日報》（香港）。

《聯合報》（臺北）。

《競報》（北京）。

《蘋果日報》（香港）。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Hong Kong)

四、網路資源

大漢之風，〈我為什麼掌摑閻賊崇年〉，
http://bbs.tiexue.net/post2_3125158_1.html,

2008年10月22日

不著撰人，〈2012年遼寧電視臺春晚對滿族“不老夠意思的”〉，
《吉祥滿族》www.manchus.cn，2012年1月22日。

不著撰人，〈老舍自殺之迷新解〉，<http://Article/200607/show416359c17p1.html>，2006年10月22日。

甘德星，〈論滿文數目字 15〉，《中正大學滿洲研究》，2016年5月29日。

甘德星，〈滿漢合璧《滿洲實錄》與清太祖滿文御名〉，《中正大學滿洲研究》<http://ccumanchustudies.blogspot.tw>，2012年4月15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人名權威檔》，<http://npmhost.npm>.

gov. tw。

錢治冰（錢斌），〈關於乾隆生母最新考證的最終結果〉，[http :
//bbs.tianya.cn/
post-no05-24219-1.shtml](http://bbs.tianya.cn/post-no05-24219-1.shtml)，2005 年 6 月 26 日。

五、西文著作

Bai, Lian. "Identity Reproducers beyond the Grassroots: The Middle Class in the Manchu Revival since the 1980s." *Asian Ethnicity*, 6:3(2005), pp.183-201.

Bai, Lian. "Representation Sphere: Manchu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Movement in 1980s'." M.Phil. thesi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2000.

Bentley, G. Carter. "Ethnicity and Practic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9:1(1987), pp.24-55.

Bentley, G. Carter. "Response to Yelvington,"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3:1 (1991), pp.169-75.

Bourdieu, Pierre.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London: Routledge, 1984.

Bourdieu, Pierre.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trans. R. N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Bourdieu, Pierre. *The Logic of Practic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0.

Chan Egan, Susan. *A Latterday Confucian: Reminiscences of William Hung (1893-1980)*. 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7.

Cresswell, Tim. *Place : A Short Introduc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Pub., 2004.

Crossley, Pamela Kyle. *Orphan Warrior: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Di Cosmo, Nicola . *The Diary of a Manchu Soldier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Elliott, Mark.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Fraser, M. Forbes A. Tanggū Meyen and other Manchu Reading

Lessons : Romanised text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side by side. London: Luzac & Co., 1924.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 Vintage Books, 1979.

Foucault, Michel.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Fanon, Frantz. Peau Noire, Masques Blancs. Paris : Éditions du Seuil, 1952.

Gans, Herbert J. Making Sense of America: Sociological Analyses and Essay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1999.

Giddens, Anthony.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Cambridge: Polity, 1991.

Golik, Katarzyna. "Facing the Decline of Minority Languages: The New Patterns of Education of Mongols and Manchus," *Roczniki Orientalistyczne*, T. LXVII, Z. 1 (2014), pp. 92–106.

Gorelova , Liliya. Manchu Grammar. Leiden, Boston, Koln: Brill, 2002.

Guwargiya, Mergen. "Enduringge Šuxowan[Šuxôwa]-i Ulabun," in Ch'en Chieh-hsien, ed. Proceedings of International Ch'ing Archives Symposium.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1978, pp.170-77.

Hall, Stuart. "Minimal selves," in A. Gray and J. McGuigan, eds. Studying Culture : An Introductory Reader. London, New York: Edward Arnold, 1993, pp.134-38.

Harrell, Stevan. "Introduction," in Melissa J. Brown ed. Negotiating Ethnicities in China and Taiw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6, pp.1-10.

Harrell, Stevan ed.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Johnston, Reginald Fleming.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1934.

Kam, Tak-sing. "The Romanization of the Early Manchu Regnal Names," Writings in the Altaic World, *Studia Orientalia*. Helsinki: Finnish Oriental Society, vol. 87 (1999), pp.134-37.

Lacan, Jacques.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W.W. Norton, 1981.

Lague, David. "Struggling to Save a Language from Dying," The New York Times. In United Daily News (Taipei), 26 March, 2007, B4.

Lutz, C. A. *Unnatural Emotions: Everyday Sentiments on a Micronesian Atoll and Their Challenge to Western The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Mackerras, Colin, ed. *Ethnic Minorities in Modern China: Critical Concepts in Asian Studies*, vol. II.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11.

Olney, James. *Memory & Narrative: The Weave of Life-Writing*.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Rawski, Evelyn S.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Rhoads, Edward J.M. *Manchus &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Rosaldo, Michelle Z.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Self and Feeling," in Richard A. Shweder and Robert A. LeVine, eds. *Culture Theory: Essays on Mind, Self, and Emo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137-57.

Roszak, Theodore. The Making of a Counter Culture: Reflections on the Technocratic Society and Its Youthful Opposition.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1969.

Shao, Dan. *Remote Homeland, Recovered Borderland: Manchus, Manchoukuo, and Manchuria, 1907-1985*.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1.

Shirokogoroff, S. M.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anchus. A Study of the Manchu Clan Organization*. Shanghai: Royal Asiatic Society, North China branch, 1924.

Schmitz, Hermann. *Leib und Gefühl: Materialien zu einer philosophischen Therapeutik*. Bielefeld: Aisthesis Verlag, 2008.

Stuart, John Leighton. *Fifty Years in China: 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54.

von Möllendorff, P. G. A Manchu Grammar with Analysed Texts. Shanghai: Th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2.

Tuan, Yi-fu. "Space and Place: Humanistic Perspective," in S. Gale and Gunnar Olsson, eds. Philosophy in Geography, Dordrecht. Boston: D. Reidel Pub. Co., 1979, pp.387-427.

West, Philip.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Yelvington, Kevin A. "Ethnicity as Practice? A Comment on Bentle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3:1 (1991), pp.158-68.

Yinger, Milton. Countercultures: The Promise and the Peril of a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New York: Free Press, 1982.

圖 1 愛新覺羅·瀛生（2006 年）



圖 2 順承郡王訥勒赫



圖 3 順承郡王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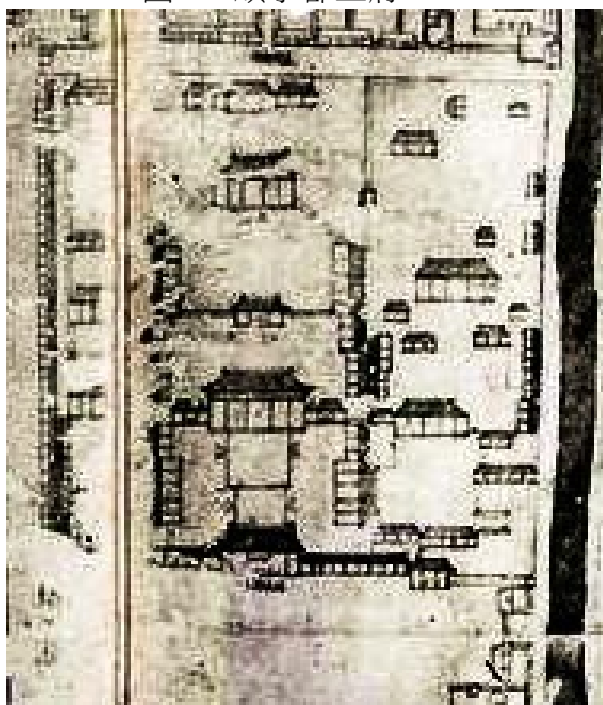


圖 3a. 《乾隆京城全圖》中的順承郡王府，採自東洋文庫藏《乾隆京城全圖》
圖》，vol.7（第七排），v-7/10，ID17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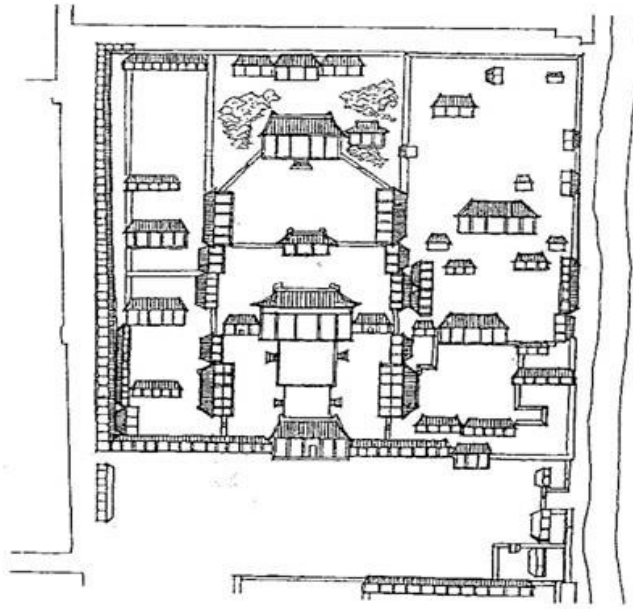


圖 3b. 劉大可據「乾隆京城全圖」及現狀的重繪圖，採自蕭默編
注，《北京歷代建築：巍巍帝都》，頁 2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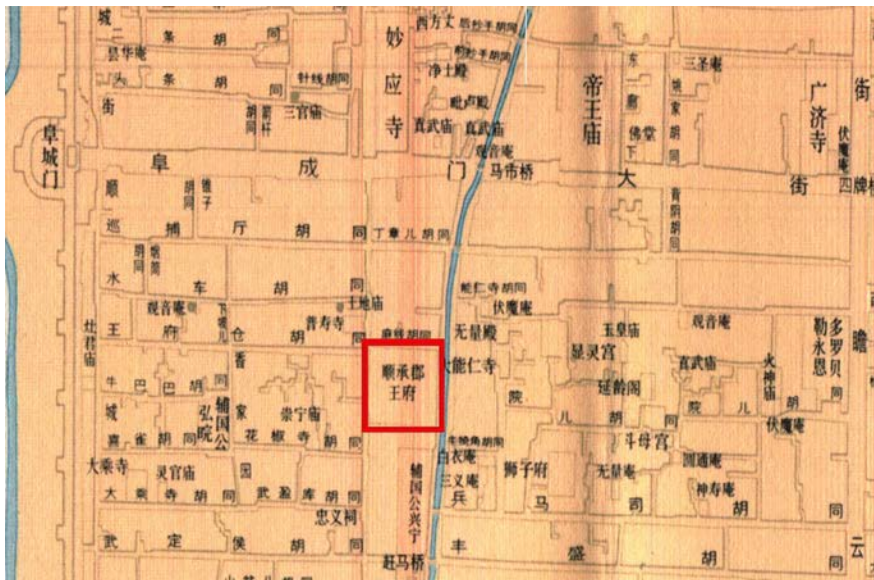


圖 3c. 順承郡王府於清代北京城內位置圖，採自徐蘋芳，《明清北京城圖》所附《清乾隆北京城圖》。



圖 3d. 順承郡王府鳥瞰圖（196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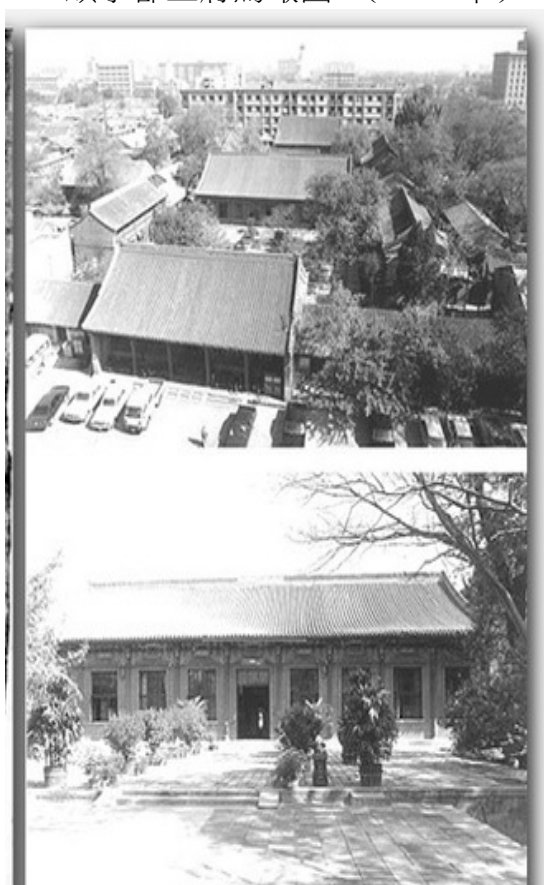


圖 4 陳光遠（1948—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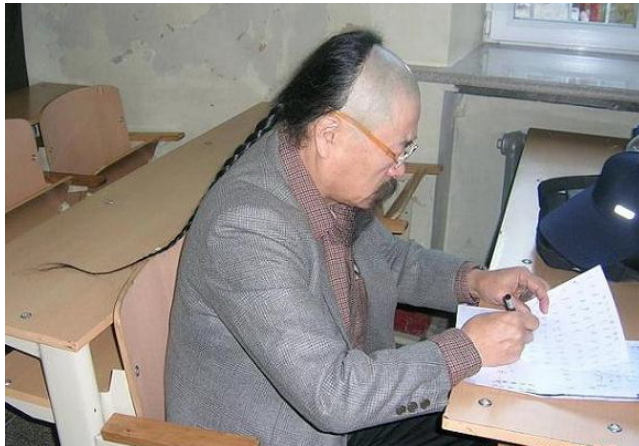


圖 5 臺灣藝術家葉永青



《滿族文化》24，封面

圖 6 瀛生外館東街的住處



圖 7 1988 年發行的第四套壹角鈔票



圖 8 滿洲國鈔票（1944 版）



圖 9 滿洲國滿語教科書（康得十一年/19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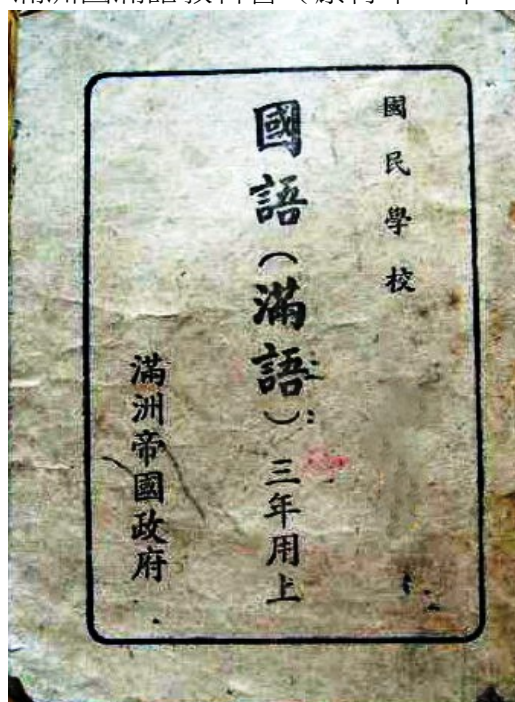


圖 9a. 封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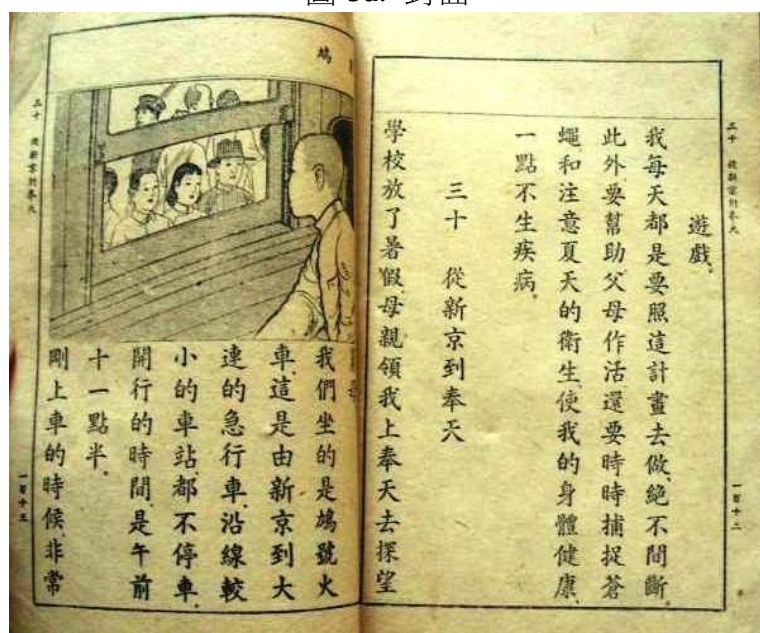


圖 9b. 課文

圖 10 愛新覺羅·瀛生晚年愛用的全漢文閒章



清初建州女真外郎群像

張華克

中國邊政協會常務監事

摘 要

「外郎」，在努爾哈齊起兵之初，大致上就是當地懂得漢文秘書的代稱，其滿文稱之為「wailan」，地位不高，作用也不大。不過巧合的是，當時出現了至少三個「外郎」，分別是「政治外郎」、「文學外郎」與「軍事外郎」，對清初的歷史，還頗具影響力，值得一提。所謂「政治外郎」，指的就是《清太祖武皇帝實錄》中出現的尼康外郎。經過近年《滿族佟氏家譜總匯》證實，尼康外郎不過是一個稱號，其本名為「阿東布巴彥」，是遼東的名門望族，因與努爾哈齊爭奪女真的領導地位，而遭到抹黑與追殺。「文學外郎」則是指一個名為「龔正陸」的漢人。龔在年輕時客居遼東，意外成為女真的包衣（奴僕）。幸運的是他輾轉到了努爾哈齊麾下，成為文膽，還得到了富貴。明萬曆二十三年（1595）十一月，朝鮮國通事河世國以朝鮮使臣身分進入建州，打探消息，將龔正陸「文學外郎」的身分，公諸於世，外界才知道努爾哈齊重用了這麼一位紹興師爺。至於「軍事外郎」，則出自《滿文原檔》。該書〈寒字檔〉內記載了十三名擔任外郎職務的將領，負責登錄戰功。本文選擇其中一位名為「翁阿岱（伍哈代）」者，當作代表加以介紹。翁阿岱以漢字紀錄其父「達住胡」的戰功，十分詳實生動，堪稱傑作。後來翁阿岱、達住胡卻雙雙殞命沙場，成了父子英烈，令人扼腕。本文對以上三種以往所忽視、誤解的外郎，加以分析評述，期望能就清初建州歷史缺失處，發揮一些補充作用。

關鍵字：《滿文原檔》 尼康外郎 龔正陸 布三 翁阿岱

壹、前言

十六世紀末葉，出身東北邊疆的努爾哈齊與皇太極父子，在五十年間，由蕞爾「看邊小夷」，一躍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轉身成為大清國主，變化極其驚人。¹

不過萬丈高樓從地起，努爾哈齊在創業之初，卻是靠著兩個名為「外郎」的小人物而興起的。了解這段過往，可以使人跳脫以往清初歷史刻板的「古勒山大戰」、「薩爾滸之戰」大型殺戮場景，而更認清一些內外情勢的演變。其中小至家族糾紛，大到國際情勢，都能牽扯進去，因此頗有一提的必要。

第一個「外郎」名為「尼康外郎」。²這人曾是努爾哈齊的殺父仇人，也許算是一個反面教材。不過由於努爾哈齊一心要報仇雪恨，卻在多場追逐砍殺之餘，逐步建立了自己的穩固的軍事勢力，成為「有心栽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最佳案例。

至於另一個「外郎」，形象則是十分正面，名字叫做「龔正陸」，號稱「文學外郎」。³這個外郎是在努爾哈齊強敵環伺，身畔無人的時候，誤打誤撞，擔任了首任顧問的。他的出現，讓努爾哈齊的政治領導，得以步入坦途，可說功不可沒。對於這種襄助有功的「天降貴人」，努爾哈齊對其當然禮遇有加，視如國師。讓龔正陸從一介光棍，變身為「有子姓群妾，家產致萬金」的富豪。⁴不過龔正陸的紀錄，卻是有如「門縫裡吹噴吶，名聲在外」，《滿文原檔》不載，明朝廷也對其一無所知，資料都是朝鮮人報導的。朝鮮人之所以能知道得這麼多，都要拜當時「倭寇」入侵

¹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一，頁 iii。《滿文原檔》的舊版，是出版時間相差三十六年的《舊滿洲檔》：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舊滿洲檔》，（臺北市：國立故宮博物院編，民 58[1969]）。

² 尼康外郎又稱尼堪外蘭，為 nikan wailan 同音異譯。

³ 王鐘翰，《王鐘翰清史論集》，（北京市：中華書局，2004，第 1 版，4 冊(2828 面)），頁 546。

⁴ 閻崇年，《天命汗/清帝列傳》，（吉林市：吉林文史，1993，第 1 版），頁 67。

朝鮮半島所賜。因為日本豐臣政權跨海侵略，與大明王朝、朝鮮國之間爆發激戰，努爾哈齊地方勢力強大，又身處國際情勢前緣，讓朝鮮王國不得不加以重視，屢屢派員探聽所致。

現在就先將這一反、一正，具有強烈對比的兩個「外郎」人物，分別加以說明如下。

貳、實例考析

先談「尼康外郎」。明萬曆年間，原來遼東的建州三衛、⁵毛憐衛、喜樂溫河衛等女真部族，在激烈動盪中形成了五部，即蘇克蘇滸河部、渾河部、王甲部、董鄂部、哲陳部等。其中蘇克蘇滸河部的女真首領阿台，經常盜邊遼東，抄略撫順、鐵嶺之間，挑戰遼東將領李成梁的權威。因此明萬曆十一年（1583）二月，李成梁揮軍攻打古勒城的阿台，以維持地方秩序。⁶

努爾哈齊的祖父覺昌安，當時擔任建州左衛指揮使，塔克世是努爾哈齊的父親，隨時跟隨在覺昌安身旁效力。

而所謂尼康外郎者，本是建州女真蘇克蘇滸部的圖倫城主，算是與覺昌安家族競爭的另一股地方勢力。根據清史學者趙東升所寫〈為尼堪外蘭正名〉一文所說，尼康外郎（尼堪外蘭）只是一個稱號或別名，不過卻因長期受清朝的官修史書醜化的影響，使得他的真實姓名和族屬從來鮮為人知：

由於歷史上的原因和政治上的原因，尼堪外蘭以反面的丑角形象被寫入清朝典籍。他的真實姓名和族屬長期以來不為人知，而尼堪外蘭名字的由來及其含義更無人瞭解。清朝的官修史書往往側重於愛新覺羅皇室的利益，有的帶有片面性，還有的帶有人為的歪曲和編造，歪曲歷史事實，美化自己、醜化對立面的行為時有發生。近些年來，在清朝發祥地遼東撫順地

⁵ 閻崇年，《清朝第一帝：努爾哈齊》，（北京市：華文出版社，2006年，第1版），頁10-11。建州三衛早期歸屬奴兒干都司，奴兒干都司廢除後改屬遼東都司。其統治範圍大致上由東北至圖們江流域、東南至鴨綠江、西至開原及遼東邊牆一帶。

⁶ 孫喆，《天命王朝》，（北京市：中國青年，2008，第1版），頁14-15。

區，特別是新賓、清原等縣，發現了大量的滿族譜牒，這些保存於民間的歷史資料，大部分記載了關於清前史中一些真實情況，為我們補闕拾遺、匡誤糾謬提供了切實可信的第一手資料，撫順的《佟佳氏宗譜》便是其中一例，它解開了尼堪外蘭身世之謎，還歷史上一個真實的尼堪外蘭。⁷

然而近年來在遼東撫順一帶，發現了大量的滿族民間譜牒，卻使得真相逐漸浮現出來。例如最近出版的《滿族佟氏家譜總匯》記載，尼康外郎是女真人，原本姓佟佳氏，名字為「阿東布巴彥」：

四世，胡胡那生四子，長子，拜渾巴圖魯，次子，阿楚虎巴圖魯，三子阿什那，四子，阿東布巴彥，尼堪外蘭生二子，長子，拉都哈瓜拉，次子，代吉恩費羊烏。⁸

這個發現十分重要。因為尼康外郎是滿語「nikan wailan」的音譯，意思是「漢人秘書」，早年學者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和族屬，以致只能憑直覺說尼康外郎「似非人名」。⁹現在從《滿族佟氏家譜總匯》的記載中，得以「還歷史上一個真實的尼堪外蘭」，使人開始知道，尼康外郎是遼東望族佟氏家族的一支，始祖為巴虎特克甚，枝葉繁茂。佟佳氏遍及遼東大地，尼康外郎的政治屬性，也就能與其他佟佳氏密切結合，而不再只是一個模糊的別名了：

到明朝中後期，幾乎遍及遼東大地。馬察、雅爾湖、加哈、佟佳諸地散佈著大量佟佳氏居民。建州勢力興起前後，佟佳氏哈拉內部分裂成兩種政治傾向：一是反明勢力，如效忠努

⁷ 趙東升，〈為尼堪外蘭正名〉，《滿族佟佳氏研究》，（瀋陽市：遼寧民族出版社，2004，第1版），頁238。

⁸ 佟明寬，《滿族佟氏家譜總匯》，（瀋陽市：遼寧民族出版社，2010，第1版），頁12-13。以下補充一些始祖至四世尼堪外蘭的佟氏家譜資料：「始祖，巴虎特克甚，生七子，長子，吞圖木圖，二世，吞圖木圖生一子，佟冊巴彥，三世，佟冊巴彥生五子，五子福麻斐羊武，四世，福麻斐羊武生一子，胡什那。始祖，巴虎特克甚，生七子，次子，圖木圖，二世，坦圖木圖生一子，他木齊代木齊，三世，他木齊代木齊生一子，尼堪外蘭，四世，尼堪外蘭生二子，五世，拉都哈瓜拉、代吉恩費羊烏。」本項資料承蒙大陸學者趙東升、汪亭存提供，特此致謝。

⁹ 陳捷先編著，《努爾哈齊事典》，（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5[民94]，初版），頁62。

爾哈赤的扈拉瑚、扈爾漢父子，撫順大商人、號稱“遼東首富”的佟養性家族。而早在“成化之役”中參與鎮壓建州女真李滿住的佟昱，嘉靖時屢次擊敗建州女真進犯的遼東總兵官佟登，這些都是佟佳氏哈拉中親明勢力的代表，而最有影響者要數效忠明朝，依靠明朝，企圖借助明朝支持統一女真各部的尼堪外蘭。¹⁰

只是當時無論是圖倫城尼康外郎，或是建州左衛覺昌安，¹¹都在蘇克蘇訥河部阿台的轄下，阿台才是當地真正的共主。

不過身處亂世，這些女真頭目為了生存，卻偏向巴結李成梁，以藉機壯大本身的聲勢。覺昌安、塔克世、尼康外郎等都跟隨著李軍出征古勒城（今遼寧省撫順市新賓滿族自治縣西北古樓地方），攻打共主阿台，行為十分曖昧。

據清代史料記載，尼康外郎主動出面誘騙古勒城守軍投降。他謊稱只要阿台肯投降就可以免死。但是李成梁大軍卻趁機攻克古勒城，連努爾哈齊的祖父和父親也一併加以殺害。¹²因此，努爾哈齊視尼康外郎為殺祖、父的仇人，《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裡就曾清楚記錄了這一段往事：

阿太妻係祖大父李敦之女，祖覺常剛聞古勒被圍，恐孫女被陷，同子塔石往救之。既至，見大兵攻城甚急，遂令塔石候於城外，獨身進城，欲攜孫女以歸，阿太不從。塔石候良久，亦進城探視，及城陷，被尼康外郎唆使大明兵併殺覺常剛父子。後太祖奏大明日：「祖父無罪何故殺之？」詔下，言：「汝祖父實是誤殺」，遂還其屍，仍與敕書三十道，馬三十匹，復給都督敕書。太祖曰：「殺我祖父者，實尼康外郎唆使

¹⁰ 趙東升，〈為尼堪外蘭正名〉，《滿族佟佳氏研究》，（瀋陽市：遼寧民族出版社，2004，第1版），頁239。

¹¹ 陳捷先編著，《努爾哈齊事典》，（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5[民 94]，初版），頁62。圖倫城。在今遼寧省撫順市下轄新賓滿族自治縣上夾河鎮境內。滿語「圖倫」（turen），意為「轟」。圖倫地處蘇子河與渾河會流處東南附近，為女真人漁獵之區，努爾哈齊於明萬曆十一年（1583），率兵攻打不共戴天仇人尼堪外蘭而奪得該城，為統一女真各族的勝利奠基。

¹² 陳捷先編著，《努爾哈齊事典》，（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5[民 94]，初版），頁62。

之也，但執此人與我，即甘心焉。」邊臣曰：「爾祖父之死，因我兵誤殺，故以敕書馬匹與汝，又賜以都督敕書，事已完矣。今復如是，吾誓助尼康外郎築城於甲板，令為爾滿洲國主。」于是國人信之，皆歸尼康外郎。¹³

在以上《清太祖武皇帝實錄》中，述說努爾哈齊的祖父覺昌安、和努爾哈齊的父親塔克世，是因「恐孫女被陷，同子塔石往救之」，而遭到尼康外郎毒手的。

不過史家從一些明朝史料的記載中，卻看到不同的因果關係。認為覺昌安父子與尼康外郎一樣，都曾與明暗通款曲，以獲得支持，大家並非仇敵。何況當時建州左衛不只父執輩與明朝關係良好，孫輩的努爾哈齊本人，還曾投靠過遼東將領李成梁，關係相當特殊。¹⁴因此對尼康外郎叫陣，可說只是一種情緒轉移，讓尼康外郎暫時變成代罪羔羊而已。以下這一段情勢分析，說得相當透徹：

明朝史料記載，覺昌安父子與尼堪外蘭一樣，都曾暗中通款於明，以獲得支持。這從戰役結束後，明軍的善後處理也可以印証出來。明廷一方面給努爾哈赤敕書 20 道、馬 20 匹，承認他是建州左衛的頭目之一；一方面又承認尼堪外蘭繼阿台為蘇克素護部的首領，統轄建州左衛各城寨。因此，覺昌安父子為明軍所誤殺的可能性要大。明廷在態度上基本對二者是一視同仁的，然而，在實際好處上，尼堪外蘭所得似乎比努爾哈赤要多一些，作為新的部落首長，他收集了阿台的舊部，並逼迫努爾哈赤歸附。寧古塔穆昆中覺昌安兄弟六人的子孫中有些對努爾哈赤得以承襲其祖父的職位也多有不服，共同對神立誓，要謀害努爾哈赤，歸附尼堪外蘭。這必然促使努爾哈赤與尼堪外蘭的矛盾激化，並將父、祖被殺的仇恨心理更多地轉嫁到尼

¹³ 復旦大學. 圖書館. 古籍部.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編年類，清太祖武皇帝實錄》，（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 1 版），冊 368，頁 228。覺常剛即覺昌安、塔石即塔克世，阿太即阿台，尼康外郎又稱尼堪外蘭，皆為同音異譯。

¹⁴ 陳捷先編著，《努爾哈齊事典》，（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5[民 94]，初版），頁 61-63。

堪外蘭身上。萬曆十一年(1583)五月，努爾哈赤率領自己的擁護者攻取圖倫城，尼堪外蘭猝不及防，倉惶逃往嘉班城。努爾哈赤“克圖倫”一事，被清朝史書大書特書，成為“太祖起兵”之端。¹⁵

也就是說，努爾哈齊與尼康外郎的仇恨，只是肇因於競爭關係。努爾哈齊希望能在覺昌安兄弟六人的子孫中「承襲其祖父的職位」，而「必然促使努爾哈赤與尼堪外蘭的矛盾激化」。於是同年（1583）五月，努爾哈齊採取行動，趁夜突襲圖倫城。尼康外郎不敵，敗逃至顎勒琿城。努爾哈齊順勢攻占圖倫城，為統一女真各族奠定勝利的基礎。明萬曆十四年（1586）七月，努爾哈齊又追蹤攻陷顎勒琿城，尼康外郎再度敗逃至明朝領地。但明朝並未給予援手，致被努爾哈齊手下齋薩所擒獲，隨即遭到處決，努爾哈齊總算為祖父和父親報了所謂的「血仇」。¹⁶

可是在剿滅尼康外郎之後，這件「殺父之仇」案卻並未結束，反而立刻轉移了對象，開始歸罪於明朝。足見這個「血仇」，頗有「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的意味存在，真是何其虛幻。「殺父之仇」又再度上榜，成為後來討明檄文〈七大恨〉的第一大恨，可稱變化多端。轉變的理由也很簡單，與努爾哈齊關係曖昧的李成梁（1526-1615），¹⁷在〈七大恨〉推出的天命三年（1618，明萬曆四十四年）已經解職過世數年了。既沒有了人情包袱，努爾哈齊「移」罪於明朝的「惱恨」，說起來就更是理直氣壯了。

〈七大恨〉版本甚多，清末民初史家孟森相信有份〈天聰間木刻印刷黃榜〉正是原文。他為了這種論點，還跟日本學者打過筆戰。¹⁸原因是起

¹⁵ 孫喆，《天命王朝》，（北京市：中國青年，2008，第1版），頁17-18。

¹⁶ 陳捷先編著，《努爾哈齊事典》，（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5[民 94]，初版），頁61-63。

¹⁷ 陳捷先編著，《努爾哈齊事典》，（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5[民 94]，初版），頁60。

¹⁸ 孟森，《明清史論著集刊》，（北京市：中華書局，2006，第1版），頁265。名為〈清太祖告天七大恨之真本研究〉的附錄〈關於「清太祖告天七大恨真本研究」答日本今西春秋氏〉一文。在這篇文章裡，孟森自承未學過滿文，但是因為滿文的譯本跟《東華錄》接近，他推斷那也是修改過的文字，而「榜文乃當時告關內外軍民者，至今仍是原件，檔案則隨時整理。」所以堅持「七大恨之真本」是那份木刻版

於孟森認定木刻版漢文本是宣傳品，需要及時公布，所以是原文。而譯成滿文、收入檔案庫的資料，還可以私下修改，反而是較晚的作品。¹⁹因此榜文的參考價值頗高，引用者甚多，現列示其中第一大恨如下：

金國汗諭官軍人等知悉：我祖宗以來，與大明看邊，忠順有年。只因南朝皇帝高拱深宮之中，文武邊官，欺狂壅蔽，無懷柔之方略，有勢利（之）機權，勢不使盡不休，利不括盡不已，苦害侵凌，千態萬狀。其勢之最大最慘者，計有七件：我祖宗與南朝看邊進貢，忠順已久，忽於萬曆年（間），將我二祖無罪加誅，其恨一也。²⁰

在這第一大恨裡，直接訴說明朝「忽於萬曆年（間），將我二祖無罪加誅」，意思是罪在明朝。對照前面《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裡所記「太祖曰：『殺我祖父者，實尼康外郎唆使之也。』」意思又是罪在尼康外郎。從以上兩段文字可以看出，「前言不搭後語」，簡直毫無邏輯性可言。可是尼康外郎卻在這樣的政治漩渦裡被犧牲掉了，成了可嘆的「政治外郎」。

但是努爾哈齊似乎並不在乎是否能自圓其說。因為尼康外郎既已斃命，有力人證李成梁也已亡故不在人間。只要符合當時的政治需要，誰當罪人都是順理成章、毫不遲疑的事情。

說過了尼康外郎的冤屈，接著再來談另一個也重要的「外郎」。這位「外郎」當時號稱「文學外郎」，顯然跟前一位名為尼康外郎的「政治外郎」，身分上有所不同。

就在消滅了尼康外郎勢力後的第二年，明萬曆十五年（1587），努爾哈齊在建州老營廢城址「呼蘭哈達」（hUlan hada 意為煙筒山）重築新城三層，建了費阿拉城（今遼寧省新賓縣永陵鎮二道子河村東南山坡）。努爾哈齊在這裡「定國政、禁悖亂、戢盜賊、法制以立」，²¹打造當時的政

漢文。

¹⁹ 孫喆，《天命王朝》，（北京市：中國青年，2008，第1版），頁46。

²⁰ 李光濤，〈清人入關前求款之始末〉，《明清檔案論文集》，（臺北市：聯經，民75[1986]），頁415。

²¹ 華文書局輯，《大清滿洲實錄，大清太祖高皇帝實錄》，（臺北市：華文：華聯書局，民53[1964]），卷2，頁6。

治指揮中心。這種政權建立的工作，當然要靠文職人員來完成。人人都清楚，如果僅憑起起武夫之勇，是沒有辦法在「馬上治天下」的。

這時出現了一位賢達文人龔正陸，又叫作龔正六，是明末浙江紹興會稽人，投效努爾哈齊處，擔任首任顧問。龔正陸在嘉靖末年，年紀很輕的時候，客居到了遼東，意外被女真人捉住。由於明朝女真人有將俘虜發配為奴的習俗，常稱之為「包衣」。包衣裡面各色人等都有，除了女真人之外，還包括有朝鮮人、蒙古人，更多的是漢人：

包衣的名稱。包衣 Boo i niyalma，包漢語為“家”，衣為虛字“的”字，包衣漢語譯為家的或家裏的。包衣即家裏的人，也就是奴隸。滿洲初起，各部落之被俘者，皆以為包衣，這便是貴族們所能當做牲畜來買賣屠殺的會說話的工具。包衣除女真人外，有朝鮮人蒙古人，更多的是漢人。²²

大約在明萬曆十七年（1589）時，「包衣」龔正陸歸向了努爾哈齊。努爾哈齊尊其為師傅，職掌文書，處理外事，參與接待朝鮮、明朝使節。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底，朝鮮使臣河世國、申忠一等先後造訪費阿拉城，記錄了當時費阿拉城的建置、規模、兵力、生活的事項，鉅細靡遺，龔正陸的資料剛好也包含在其中。²³

根據朝鮮宣祖昭敬大王實錄十一、二十八年（明萬曆二十三年，1595）通事河世國十一月初二日所記，提到「老乙可赤（努爾哈齊）」的兵力部屬情形。他說內衛為「老乙可赤常時所住之家，麾下四千餘名，佩劍衛立，而設坐交椅。」又說外圍為「大概目睹則老乙可赤麾下萬餘名」，實力驚人。而這段紀錄中，就出現了本文所關心的「文學外郎」龔正陸的身影：

戊子，平安道兵使邊應奎馳啟曰：「滿浦僉使柳濂牒報：去八月十八日，唐官家丁與鄉通事河世國等梨坡胡童汝古、童坪古等一時宣諭事，老乙可赤處入送。今十一月初二日，各人及

²² 莫東寅著，《滿族史論叢》，（北京市：人民，1958，第1版），頁136。

²³ 陳捷先編著，《努爾哈齊事典》，（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5[民94]，初版），頁63-64、70-71。

老胡兄弟次將馬臣、佟羊才等一時出來，河世國處虜情推問，則老乙可赤常時所住之家，麾下四千餘名，佩劍衛立，而設坐交椅，唐官家丁先為請入拜辭而罷，然後世國亦為請入，揖禮而出。小乙可赤處一樣行禮矣。老乙可赤屠牛設宴，小乙可赤屠豬設宴，各有賞給。老乙可赤城周回八十餘里許，城門七處，無弓家石築，胡家五百餘戶，城外六百餘戶。內城周回十里許，石築弓家樓閣五處則已造，又以木手時方赴役，造作老乙可赤兄弟所住家舍，則蓋瓦。各以十坐分為木柵，各造大門，別設樓閣三處，皆為蓋瓦。大概目睹，則老乙可赤麾下萬餘名，小乙可赤麾下五千餘名，常在城中，而常時習陣千餘名，各持戰馬著甲，城外十里許練兵。而老乙可赤戰馬則七百餘匹，小乙可赤戰馬四百餘匹，並為點考矣。畫員二名，瓦匠三名，則天朝命送之人云，而時方始役燔瓦、文學外郎則以唐人投屬虜地，幾至三十餘年，而凡所通書，此人專掌云。甲匠十六名，箭匠五十餘名，弓匠三十餘名，冶匠十五名，皆是胡人，無日不措矣。²⁴

通事河世國說「文學外郎則以唐人投屬虜地，幾至三十餘年，而凡所通書，此人專掌云。」其中「唐人」指的是「明人」，「虜地」就是「建州」。也就是說，龔正陸當時的身分是文學外郎，而抵達建州生活已經三十餘年。估計約在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左右，龔正陸就已經來到建州，那時努爾哈齊（1559-1626）才剛滿週歲，兩人的年齡差距不小。龔正陸憑著年長與漢人修為，職掌文書，也是相當合理的事情。

通事河世國以朝鮮使臣身分進入建州，打探消息，如果按照明朝的體制，應該是不符規矩的。不過這件事另有原委，因為當時有一個自稱「差委平安道練兵官」名為余希元的，跑到朝鮮的兵曹判書李德馨（1561-1613）那裏，說是「是蒙遊擊差委而來」，所述「遊擊」名稱是胡大受，負責「教練朝鮮八道官兵」：

²⁴ 吳吟編著，《朝鮮王朝實錄抄：中國史料》，（首爾市：景仁文化社 1982），頁2167。

癸卯，兵曹判書李德馨啟曰：臣昨日就見余希元於下處，諭以為小邦遠勞，又盛贊其不戰伏人之功，則希元歡喜答謝。臣問其與虜人間答曲折，則希元說稱：俺初列滿浦，招胡人童怍古使之傳通宣諭之意，則老乙可亦不信曰：若唐官宣諭，則當自撫順所為之，何故至於滿浦哉。俺答稱：遊擊教練朝鮮八道官兵，而俺乃差委平安道練兵官也，天兵八萬七千餘人，驅逐倭賊之後，分屯朝鮮八道，而餘兵則扈衛王京。朝鮮控弦精勇之士又過十五六萬，弓矢火器，山積無數。朝鮮欲以二十餘萬兵進入滿浦等鎮勦滅犯境達子，遊擊聞其言，謂稱：朝鮮於天朝屬國也，爾達子於天朝亦屬國也。我當宣諭講解。達子若不從我言，則當奏聞天朝，一面將朝鮮兵入屯江邊，一面將天兵從撫順所勦滅爾達子無遺。俺於是蒙遊擊差委而來云。則胡人果為信服。馬臣，馬三非之子，老乙可赤副將也。佟羊才亦一般將官也，年年進貢天朝，慣解華話。²⁵

胡大受、余希元二人，是因日本入侵朝鮮「壬辰之亂（1591）」，由明朝正式派遣到朝鮮，是負責訓練朝鮮兵丁戰技的教官。但是沒有想到，這二人卻「不務正業」，涉入朝鮮的外交事務，想作為朝鮮與建州間的溝通橋樑，引進朝鮮人參訪建州：

丁酉之役，努爾哈赤再請征倭，復被拒絕。他雖肆無忌憚的讓女真人到朝鮮滿山遍野的挖蔘，仍要求受職朝鮮，進朝王京，然以明朝大兵駐紮遼東、朝鮮，建州既不敢冒進，朝鮮也未敢明目張膽的與建州交往。胡大受、余希元戲劇性的行動，暫時消解了努爾哈赤對朝鮮的攻掠。此外，由於他們二人的介入鮮建關係，朝鮮人員得入建州，從而產生了數篇建州行程紀錄，成為後世了解舊老城-費阿拉時期建州情況的珍貴史料。這是意外收獲。²⁶

²⁵ 吳吟編著，《朝鮮王朝實錄抄：中國史料》，（首爾市：景仁文化社 1982），頁 2179。

²⁶ 許倬雲，〈宗藩關係制度的運作〉，《中國歷史論文集》，（臺北市：臺灣商務，民 75 1986，初版），頁 461。

這裡所說的「丁酉之役」，是指日本第二次入侵朝鮮的「丁酉再亂（1597）」。²⁷當時努爾哈齊一直想乘著日本屢次入侵朝鮮，報復女真人越界挖蔘被殺之仇，並到朝鮮去撈一點好處，²⁷屢屢美其名為「再請征倭」。但因「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明朝早已看出努爾哈齊是別有所圖，以致並不允許。然而朝鮮卻深怕努爾哈齊不聽節制，擅自出兵。自覺大禍將至，就私下委託胡大受、余希元等人出馬疏通。其實胡、余二人，基於明朝外派朝鮮駐軍的立場，也擔心自身腹背受敵，雖是有違國法，卻只好通權達變接受朝鮮人的請託，出馬說項。

不過學者許倬雲認為，雖然當時各方都有盤算，卻意外「產生了數篇建州行程紀錄，成為後世了解舊老城--費阿拉時期建州情況的珍貴史料。」則是不爭的事實。

例如在兵曹判書李德馨的呈文中，就透露了不少關於龔正陸的背景資料，很是難得。這份呈文大部分引自余希元的說詞。余希元時常慣用「俺」這個字自稱，根據余希元的說詞，他也知道努爾哈齊的秘書是龔正陸，：

馬臣等至呈訴狀，而歷言刷還天朝人口及朝鮮人口之功。

其訴狀則往在胡爺身邊，明日當取上也。俺既不許償命一事，

則胡人等又要得朝鮮賞物，俺說稱：「爾等犯境，於法可殺，朝

鮮豈賞爾乎？」胡人說稱「然則欲得老爺賞物」。俺答以「我

²⁷ 吳吟編著，《朝鮮王朝實錄抄：中國史料》，（首爾市：景仁文化社 1982），頁2183-2184。「甲辰，上教政院曰：『每觀胡遊擊咨帖，詞意不平，深恐因此成激，以釀他日之變。天下之事莫不起於微，前日予以姑且耐之之意言之，昨日亦親諭兵判矣。予過慮恐有大不好事，備邊司宜知此意，勿露形跡，厚待之以當。言於備邊司。』」移咨於協守副總兵府，其咨曰：『朝鮮國王為體訪夷情以便防備事，本年十一月十五日據陪臣平安道兵馬節度旋遑應奎馳啟：『該滿浦鎮僉節制使柳濂呈，本年十月十八日，差本鎮通事河洗國等二名，隨同遊擊府宣諭官家丁楊大朝前往建州，密探本夷動靜去後。十一月初二日回。據本人等報說：『蒙差前往建州，看得奴兒哈赤及伊弟速兒哈赤同坐一城，方調到各處達子，日逐出城操練。又廣拘達匠打造弓箭等器，有溫火衛達子修大吉老等來到本處，對俺等密說：『奴兒哈赤兄弟要於明年正二月間進搶你們地方，今方調集人馬。』』又有本衛達子修海老說稱：『我的馬法將要湊了兵馬，以報日前渭原之仇』等因。具啟據此行。』據議政府狀啟：『奴兒哈赤兄弟要於明年正二月間進搶本國地方報仇，今方調練人馬，廣造弓箭，所據通事河洗國等探報情形，似係的確，合無再差的當官員，前赴協守副總兵府請乞仍留府下，密切體訪，遇有緊急聲息，星夜馳報，以便隄備相應等因具啟。』』

只為宣諭而來，今無賞可寄爾。然則我當稟遊擊轉報軍門，將以正月十五日為期，期至我當親領賞爾。」馬臣等說稱「牛皮山近處木柵有五，而其中精兵整飭二萬餘矣。今蒙老爺宣諭罷兵，願老爺往看其撤兵形止。」俺答稱：「我既為宣諭，則罷兵在爾，我豈勞往，如怕爾不信者然哉。」馬臣等答稱「當及老爺未回前，盡撤兵馬以待」云。俺又稱「你達子或入朝鮮咸鏡道殺害人物，而朝鮮不要你償命」云云。則馬臣等又稱「咸鏡道達子我都不管」云。俺謂曰：「若有一人作可於咸鏡道，則是不是間，天朝當加兵間爾之罪。」馬臣等稱「我等當盡力禁_{ᡵᡠᡳᡳ}，老爺如以文移口傳為不信，則當斬首級驗實」云。俺差人楊大朝入虜中，見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龔正六，年少客於遼東，被搶在其處，有子姓群妾，家產致萬金，老乙可赤號為師傅，方教老乙可赤兒子書，而老乙可赤極其厚待。虜中識字者，只有此人，而文理未盡通矣。此漢聞楊大朝係是浙人，俺與胡遊擊俱是同地方之人，待之甚為縑繆。引大朝指示老乙可赤戰馬軍器所在處，且言「俺有一子尚在浙江，爾若率來，則欲以此金帛給遺」云。俺聞其言，作一書使大朝傳謝曰：「爾若盡告賊情而無誤大事，則我當招爾子使得相見」云矣。胡人所給紅綠金段，是天朝撫順所賞給。²⁸

以上余希元提到的楊大朝，是余希元的手下。楊大朝被派赴建州，見到了龔正六（龔正陸），一談之下發現大家都是浙江人，關係立刻拉近不少。龔正陸還有意無意間「指示老乙可赤戰馬軍器所在處」，算是透露了不少建州的軍事情報。龔這麼做是有原因的，原來他還有一個兒子留在浙江，希望楊大朝能幫忙帶來，一家團聚。並表示如果楊大朝能夠完成任務，他願意以金帛相贈。反正龔正陸財產豐厚，「有子姓群妾，家產致萬金」，出得起這筆金帛錢。

除了以上《朝鮮王朝實錄》裡在談論龔正陸之外，朝鮮官員申忠一還寫了一本名為《建州紀程圖記》的書，也提到了龔正陸，並且稱呼龔正陸

²⁸ 吳吟編著，《朝鮮王朝實錄抄：中國史料》，（首爾市：景仁文化社 1982），頁2180。

的別名是「歪乃」。

這是因為在通事河世國十一月二日去了建州之後，才一個月，明萬曆二十三年（1595，朝鮮宣祖二十八年）十二月，朝鮮官員申忠一也奉朝鮮國王之命，到建州費阿拉探視努爾哈齊居城虛實，以為因應。當時他直接遇到那位「文學外郎」，漢人龔正陸。此外他還多知道龔正陸的女真名字稱為「歪乃」，是浙江會稽紹興府人。說歪乃粗通文墨，擔任努爾哈齊的文膽，還兼任家庭教師，頗獲重用。對照起來，這跟其他人所說的，沒有太大差別。

在這冊《建州紀程圖記》裡不再稱努爾哈齊為「老乙可赤」，而說他是「奴酋」。另有「小酋」則為舒爾哈齊，是努爾哈齊的弟弟。這一年努爾哈齊才三十七歲，活力正旺，看到遠客申忠一來訪，心情愉悅，就在宴會中大彈琵琶、跳聳肩舞，以娛嘉賓，真是一團喜氣：

歪乃，本上國人，來于奴酋處，掌文書云，而文理不通。此外之人，更無解文者，且無學習者。一，二十九日，小酋兄弟，請臣相見後，令佟羊才，設小酌以慰之。一，丙申正月初一日巳時，馬臣、歪乃，將奴酋言，來請參宴，臣與羅世弘、河世國往參。奴酋門族及其兄弟姻親與唐通事，在東壁；蒙古沙割者、忽可、果乙者、尼麻車、諸億時，在北壁；臣等及奴酋女族，在西壁；奴酋兄弟妻及諸將妻，皆立於南壁炕下；奴酋兄弟，則南行東隅地上，向西北，坐黑漆椅子，諸將俱立於奴酋後。酒數巡，兀刺部落新降將夫者太起舞，奴酋便下椅子，自彈琵琶，聳動其身。舞罷，優人八名，各呈其才，才甚生疎。一，是日未宴前，相見之時，奴酋令馬臣，傳言曰："繼自今，兩國如一國，兩家如一家，永結歡好，世世無替。"云。²⁹

據申忠一認定，文膽歪乃的漢文程度，是「文理不通」，跟前面朝鮮的講法一樣。不過這些說詞裡面卻有可議之處，因為申忠一等人一開口就稱努爾哈齊為「奴酋」，「酋」字通常有匪徒或部落首領含義，可不是什

²⁹ 申忠一，《建州紀程圖記》，（臺北市：臺聯國風出版社清史資料，第三輯，開國史料(三)，1970），頁15-16。

麼美稱。一般朝鮮官員對於女真人有些習慣用語，現在看來十分古怪，值得一提，例如朝鮮的備邊司向國王啟奏，說明當時渭原採蔘女真人被殺的糾紛處理情形，稱努爾哈齊等為「夷狄」、「獸心」、「達子」、「虜」等。其中「達子」的「達」字，左邊還帶一個犬字部首，真是洋洋灑灑，蔚為奇觀：

乙亥，備邊司啟曰：「臣等伏見平安監司狀啟，及上送老乙可赤文書，與唐官回答票文，夷情固為難測，然其情只以當初自為刷還我國之人所希覲，而尚無還償之物，且有渭原採蔘胡被殺之怨、故其怒未解，而欲逞凶於邊境。唐將所言以牛償命者，亦以夷狄性貪，欲以此戢其獸心也。渭原之胡雖邊將過於斬殺，而虜既越境深入見殺，以此償以牛馬則似示弱。但初以刷還之功，欲為宴享兼且賜物以慰其心，而虜更發怒不來，此則當以實狀語之曰：『你既以好意刷還我國之民，故我國亦深嘉你意，多備宴享之需，且辦段衣、人蔘、綢布等物，以待你等之來，我國之於汝意亦不薄。不意渭原有偶然格鬥殺傷之事，此亦非我國兵官與你有心仇殺也。只是你的達子私自越境，散入山谷，昏夜不知好歹之人，以至於此。然我國以地方官司不能禁抑，方為拿究。以此觀之，我國與你無仇可知，今你反以此為辭，不來受宴享，此何意也。然當初備設之物，本欲與你，且以刷還我國人厚意，不可不報，故送與你的差人』云云。」³⁰

這正好可以反映出，這些朝鮮官員的基本態度，頗不乏一些的倨傲自大成分在內，甚至口不擇言，開口閉口都說人「文理不通」。他們似乎完全不管龔正陸的背景出身，是鼎鼎有名的「浙江會稽紹興府」，就很快的下了結論評語。要知道那紹興府可是一個人文薈萃的地方，地靈人傑，專出師爺。俗語說「紹興師爺遍天下」，在中國具有一定的光環。這就像現代人都認為美國哈佛是名校，專出菁英，是一樣的道理。當然或許申忠一

³⁰ 吳吟編著，《朝鮮王朝實錄抄：中國史料》，（首爾市：景仁文化社 1982），頁 2164。

來自朝鮮，並不一定知道這種中國說法。不過愛新覺羅家族對「紹興師爺」可是一直偏愛，甚至貫穿了整個清朝：

龔正陸的女真名字是「歪乃」。愛新覺羅一家對這位啟蒙教師和祕書無疑是極為尊重的。後來有大批漢人投奔努爾哈赤，他們的文化和地位遠遠超過了歪乃，自然也就擔任了更重要的職務，歪乃也就不再受人注意了。日後愛新覺羅家族成為中原帝室，全國的大小衙門都要聘用紹興人作師爺，師爺下是官職，不列入衙門定員，他們是長官的私人祕書。大衙門有好幾個師爺，他們用外人聽不懂的方言交談，這是一種保密手段，又增加了大衙門的神祕感。所以人們稱「紹興師爺遍天下」，這大概是帝室對第一位紹興師爺的懷念吧！³¹

龔正陸的女真名字叫做「歪乃」，這個詞其實只是一個職銜，在滿文寫為「wailan」，是「書記」的意思，³²其詞源來自於漢語的「外郎」，「歪乃」是朝鮮人的記音。³³「外郎」除了有學問，會讀書寫字之外，還是遼東女真的一個官銜，負責軍中的戰功紀錄工作，這一點正是本文所想要談論的重點。

除了看不起「歪乃」的學問之外，朝鮮官員申忠一的言論甚至冒犯了整個建州，他說「此人之外更無解文者，且無學習者。」這個論點可就大有問題，需要繼續檢驗一下：

據當時到費阿拉與努爾哈齊洽談公事的人說：除了龔正陸以外，還有「唐人教師方孝忠、陳國用、陳忠」等人，這些漢人知識分子留居建州，對傳播先進文化、培養人才、治理國家都起重大的作用。³⁴

這麼一說，顯然在龔正陸以外，另有其他的唐人教師如：方孝忠、陳

³¹ 李守中作，《長城往事》，（臺北市：遠流，2010，第二版），頁408。

³² 陳捷先著，《皇太極寫真》，（臺北市：遠流，2004[民93]，初版），頁132。

³³ 王鐘翰，《王鐘翰清史論集》，（北京市：中華書局，2004，第1版，4冊(2828面)），頁741。

³⁴ 陳捷先，《努爾哈齊寫真》，（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3[民92]，初版），頁61。

國用、陳忠等人，投效建州服務。這些漢人明明可以「解文」，不能說是「更無解文者」。而且既然有那麼多漢人擔任教師，不可能都養著飽食終日，哪會「無學習者」呢？由此可知申忠一的那些講法，真是有些過火。不過史學界不少人卻附和申忠一的論調，例如明清史學者李光濤就據此認定「努兒哈齊寨內文化低落」：

由於「文理不通」之歪乃，而竟為奴兒哈赤所倚重，乃至令其掌管文書之職，則奴兒哈赤寨內文化之低落，可以想見。³⁵

努爾哈齊重視皇子教育，推測皇太極（1592－1643）的啟蒙老師，就極可能是龔正陸。因為二十四年後，一個叫做李民賓的朝鮮人，就提到皇太極是認識字的。李民賓之所以會到建州，說來頗不光彩。因為他當時擔任朝鮮元帥姜弘的幕僚。不幸姜弘屬於明朝一邊，帶著朝鮮兵參加薩爾滸戰役，而慘遭重創。兵敗之後，李民賓就被俘囚禁在建州一年（1619，後金天命四年，明萬曆四十七年、朝鮮光海君十一年）。前面提到過，朝鮮官員申忠一到建州，是擔任朝鮮使臣，因而受到努爾哈齊親自奏樂舞蹈盛宴款待，好不風光。不過李民賓是俘虜，只有吃牢飯的份，十分淒慘。他所紀錄的情形與申忠一大不相同，可說人事已非。他蒐集了當時同樣被俘的朝鮮人耳聞目睹資料，寫出以下情形：

奴乙可赤（胡人無姓），體非魁梧，而容貌猜厲，年近七十，而頗強健（或云甲寅生，或云己未生）。有子，長曰紅破都里（六七年前，為奴酋所殺）。次曰貴盈哥（癸未生，有子五人）。次曰紅歹是（戊子生），次曰亡古歹，餘三子幼。女壻於斗者乙古赤，表應古兀古歹，其餘未詳。胡語呼八將為八高沙，奴酋領二高沙，阿斗於斗摠其兵，如中軍之制。貴盈哥亦領二高沙，奢夫羊古摠其兵。餘四高沙，曰紅歹是，曰亡古歹，曰豆斗羅古（紅破都里之子也），曰阿未羅古（奴酋之弟，小乙可赤之子也，小乙可赤有戰功，得衆心，五六年前，

³⁵ 李光濤，《明清檔案論文集》，（臺北市：聯經出版公司，民 75[1986]，初版），頁 22。

爲奴酋所殺)。³⁶

上述資料裡所記人名，都是朝鮮發音，如：奴乙可赤即努爾哈齊，長子為「紅破都里」即指其稱號為「紅巴圖魯」的褚英，³⁷貴盈哥，為「古英巴圖魯」的音轉，指代善。紅歹是指皇太極，亡古歹為莽古爾岱，豆門羅古是杜度阿哥，褚英的長子，努爾哈齊的長孫。阿未即阿敏，為舒爾哈齊之子。小乙可赤即舒爾哈齊。³⁸

在這些朝鮮人眼裡，努爾哈齊「殺子殺弟」，猜厲威暴。所謂的「子」，就是長子「紅巴圖魯的褚英」，而「弟」，按指舒爾哈齊。³⁹不過李民賓遭俘時，當時努爾哈齊已經六十一歲了，⁴⁰老態已現，不再像申忠一到訪時「夜夜笙歌」那麼活耀了，李民賓說「奴酋常坐，手持念珠而數之」有些狀似僧侶：

男胡皆拔鬚剪髮，頂後存髮，如小指許，編而垂之左。女人之髻，如我國女之圍髻，插以金銀珠玉爲飾，耳掛八九環，鼻左傍，亦掛一小環，頸臂指腳，皆有重釧。奴酋之所居五里許，立一堂宇，繚以垣牆，爲禮天之所，凡於戰鬪往來，奴酋及諸將胡，必往禮之。奴酋常坐，手持念珠而數之，將胡則頸係一條巾，巾末懸念珠而數之。胡中之禮，絕無拜興，將胡之見奴酋，脫笠叩頭，卒胡之於將胡亦然。女胡之行禮，跪膝而坐，以右手指，加於眉端。親舊之相見者，必抱腰接面，雖男女間亦然。嫁娶則不擇族類，父死而子妻其母。胡中只知蒙書，凡文簿皆以蒙字記之，若通書我國時，則先以蒙字起草，

³⁶ 李民賓，〈建州聞見錄〉，杜宏剛等主編，《韓國文集中的明代史料. (10)》，（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第1版），頁388。

³⁷ 陳捷先，《努爾哈齊寫真》，（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3[民92]，初版），頁252。

³⁸ 陳捷先著，《皇太極寫真》，（臺北市：遠流，2004[民93]，初版），頁55。

³⁹ 陳捷先，《努爾哈齊寫真》，（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3[民92]，初版），頁252。

⁴⁰ 當時人是「人生七十古來稀」，清初開國五大臣的壽命：費英東五十七歲、額亦都六十歲、何和理六十四歲、扈爾漢年甫四十八、安費揚古年六十四。六十一歲當然算是老人。

後華人譯之以文字，聞胡將中，惟紅歹是僅識字云。⁴¹

文中的「紅歹是」是指皇太極，李民寯說皇太極是建州女真將領中唯一識字的人，按時間推算，應該就是壘正陸在當家教辛勞的成果。

不過對於朝鮮人李民寯的這段記載，附和者固然多，學者陳捷先卻提出了質疑，認為李民寯所見到的，應該不是蒙文，而是滿文。因為那時滿文早已發明，稱為「無圈點老滿文」，外形幾乎跟蒙古文是一樣的。如果朝鮮人一時查覺不出其中有任何差異，是很容易產生誤解的：

李民寯的這段記事可能稍有問題，因為我們知道清太祖創製滿文的目的最主要的是「文移往來」上的需要。李民寯被俘的時候已經是滿文創製後的第二十年，滿文應該在滿洲郡族中通行。如果當時還用蒙文來記事通書，似乎與情理不合。再說滿文是由蒙文脫胎而來，字形和發音都很相似，李民寯看到的究竟是蒙文還是滿文，實在很成問題。⁴²

看來李民寯寫下的這段記事，即使有些誤差，還算是相當寶貴。因為這至少說明了當時「無圈點老滿文」的使用情形。

至於滿文的外形何以跟蒙文一樣，滿人並無隱晦，直言就是從仿造蒙文而來，是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二月，清太祖努爾哈齊下令利用蒙古字母創製出來的，⁴³以往有許多討論，在此不贅。

不過朝鮮人李民寯所說「聞胡將中，惟紅歹是僅識字云」，可能又跟朝鮮官員申忠一所犯的倨傲毛病一樣，而頗有問題。因為建州軍中真的是只有皇太極認識漢字嗎？除了壘正陸這位「國師」，在教努爾哈齊的孩子之外，還有其他的唐人教師如：方孝忠、陳國用、陳忠等人，這些漢人難道都交了白卷，而毫無成果？

⁴¹ 李民寯，〈建州聞見錄〉，杜宏剛等主編，《韓國文集中的明代史料. (10)》，（桂林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第1版），頁389-390。

⁴² 陳捷先，〈「舊滿洲檔」略述〉，《老滿文原檔論輯》，（臺北市：李學智自行出版，民60[1971]，初版），附錄（二），頁3。

⁴³ 張華克，〈滿文的源流與辨認〉，《中國邊政》，（臺北市：中國邊政雜誌社，民103[2014]12月，200期），頁169-181。蒙古文字最西方的來源出於埃及文，與希臘文、羅馬文、英文等文字基本上是同源的。

叁、更多案例

這個謎題如果要解開，想看現成的答案，大致上是沒有的。因為以往許多人都相信朝鮮人申忠一、李民寯的記述，而毫無疑問，認為「寨內文化低落」，以致缺乏探索的誘因。

但是如果偏不信邪，決心想要翻案，倒也可能因為「運氣」，而找到一些線索。當然，許多資料都跟解讀方法有關。否則見面不相識，也是會徒呼負負的。

現在從《滿文原檔》（「舊滿洲檔」）的資料中整理出一份名單，列示如下表一〈建州女真兼併扈倫四部期間部分外郎名單〉，看看是不是真如朝鮮人李民寯所說，胡將都不懂得漢字：

表一〈建州女真兼併扈倫四部期間部分外郎名單〉

敕諭	頁數 1	原文	漢名 1	滿名	漢名 2	頁數 2	備註
7	117	伍哈代，占本身。	伍哈代	unggadai	翁噶岱 3	597	1
8	118	趙三，外郎，占丁夫一名。	趙三	jaosan	兆三	597	2
12	129	卜三，外郎，占丁夫五名。	卜三	busan	布三	600	3
12	129	風苦，外郎，占本身。	風苦	fungkU	峰庫	600	4
15	136	哈空，外郎，占丁夫四名。	哈空	hakUn	哈坤	601	5
15	136	哈失土，外郎，占本身。	哈失土	hasitu	哈希圖	601	6
15	136	狗皮，外郎，占本身。	狗皮	geopi	勾皮	601	7
15	136	凹失那，外郎，占本身。	凹失那	wasina	瓦什納	601	8

敕諭	頁數 1	原文	漢名 1	滿名	漢名 2	頁數 2	備註
16	137	二黑土，兀刺陣上砍上一處，外郎，占丁夫五名。	二黑土	erhetu	額爾赫圖	601	9
18	141	太必扇，外郎，占本身。	太必扇	tabiSan	塔畢山	603	10
20	144	古兒馬虎，外郎，占本身。	古兒馬虎	gUlmahUn	古勒瑪琿	603	11
20	145	慢他失，外郎，占本身。	慢他失	mantasi	滿塔西	604	12
21	147	牙海，外郎，占本身。	牙海	yahai	雅海	604	13

本表一資料的格式與出處需要說明一下。左方的「頁數 1」、「敕諭原文」、「漢名 1」、「滿名」等項目，出自《滿文原檔》、⁴⁴右方的「漢名 2」、「頁數 2」則摘自漢譯《滿文老檔》。⁴⁵「備註」裡所記為排序編號，共有計 13 人。而表一標題所謂「建州女真兼併扈倫四部期間」，是指明萬曆二十七至萬曆四十一年（己亥-癸丑，1599-1613）間，時間長達十五年。⁴⁶與李民賓被俘囚禁在建州的那一年（1619，後金天命四年，明萬曆四十七年、朝鮮光海君十一年），相差只有六年，人事變化有限。

又表一基本上是從《滿文原檔》的〈寒字檔〉文件中五十一頁漢文敕諭資料摘錄構成的。眾所周知，乾隆朝因為資料破損，曾將《滿文原檔》重抄，製成《滿文老檔》。純滿文的《滿文老檔》，近代再翻譯成漢文

⁴⁴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四，頁 117-147。

⁴⁵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 版），頁 597-604。

⁴⁶ 張華克，〈〈寒字檔〉中漢文敕諭資料解讀〉，《中國邊政》，（臺北市：中國邊政雜誌社，民 107[2017]6 月，214 期），頁 125。

《滿文老檔》，這五十一頁漢文敕諭資料，能跟漢文《滿文老檔》第八函第六十二冊天命九年的二十二份皇帝敕諭目錄直接對應，⁴⁷其細目如下：

表二〈《滿文老檔》第八函第六十二冊天命九年目錄〉

編號	目錄	頁數	備註
1	天命汗論額亦都巴圖魯等人之功頒賞	592	
2	天命汗論班塔什等人之功頒賞	593	
3	天命汗論牽爾格依等功頒賞	593	
4	天命汗論貝和齊等人之功頒賞	594	
5	天命汗論尼喀里等人之功頒賞	595	
6	天命汗論哈喇等人之功頒賞	596	
7	天命汗論達柱虎等人之功頒賞	596	
8	天命汗論圖梅等人之功頒賞	597	
9	天命汗論阿都等之功頒賞	597	
10	天命汗論額爾訥等人之功頒賞	598	
11	天命汗論章噶爾吉等人之功頒賞	598	
12	天命汗論圖水布魯等人之功頒賞	599	
13	天命汗論舒沙蘭等人之功頒賞	600	
14	天命汗論伊勒慎等人之功頒賞	600	
15	天命汗論齋薩等人之功頒賞	600	
16	天命汗論烏納哈賴等人之功頒賞	601	
17	天命汗論札木布祿等入主功頒賞	602	
18	天命汗論胡希吞等人之助頒賞	602	
19	天命汗論碩色等人之功頒賞	603	
20	天命汗論尼堪等人之功頒賞	603	
21	天命汗論巴喜等人之功頒賞	604	
22	天命汗論雅爾納等人之功頒賞	604	

⁴⁷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年,第1版),目錄,頁70-71。

本表《滿文老檔》的翻譯，顯然是根據《內閣藏本滿文老檔》的滿文資料所譯出來的，⁴⁸因為每份敕諭資料的開頭，都以「天命汗論」起始。正好與滿文「han hendume」完全吻合。

可是翻開《滿文原檔》，原始的漢文卻是「皇帝敕諭」四個漢字，也就是說，漢文的「皇帝敕諭」才是滿文「han hendume」的原文。⁴⁹

這就表示，翻譯《滿文老檔》的過程，其實是有誤差的。這種現象之所以出現，其實還很好解釋。遠的不說，最接近的案例就是前面談過的「歪乃」一詞。「歪乃」這個詞來自滿文翻譯寫為「wailan」，而「wailan」詞源又起自於漢語的「外郎」。也就是說，「外郎」先翻譯為「wailan」，「wailan」再翻譯為「歪乃」，卻並沒有回譯為「外郎」本身，於是產生翻譯誤差。由此可見，翻譯誤差的現象所在多有，並不罕見。

因此這份依據漢文譯本《滿文老檔》所做的目錄，只能說是「意譯」文，當作參考則可，卻不能認真當作《滿文原檔》的本意看待，因為到底「意譯」文與敕諭原文是有相當距離的。

不只如此，「意譯」文的「天命汗論」，還容易讓人引喻失義，造成其他的誤解。這種誤解會產生兩種結果，一是努爾哈齊是否稱帝，另一則是當時採用哪種文字，變得很模糊。

第一種誤會「稱帝與否」不是本文關心的重點，何況以往也曾討論過，⁵⁰可以逕往參考，這裡就姑且從略。第二種誤會「哪種文字」則是本文探索的重心，需要進一步研究。想想朝鮮人當時簡直把建州女真都當成文盲看待，趾高氣昂的態度，實在令人印象深刻。據說，這是因為古代朝鮮在文化上號稱為「小中華」，深染儒風，文化上先進優越，才不把「四夷」建州女真放在眼裡所致：

況且，古代朝鮮在文化上的這種優越地位，還得到了來自

⁴⁸ 吳元豐主編，《內閣藏本滿文老檔》，（瀋陽市：遼寧民族，2009，第1版），冊6，頁2815-2867。

⁴⁹ 張華克，〈〈寒字檔〉中漢文敕諭資料解讀〉，《中國邊政》，（臺北市：中國邊政雜誌社，民107[2017]6月，214期），頁125-166。

⁵⁰ 張華克，〈早期滿文「汗 han」字解析〉，《中國邊政》，（臺北市：中國邊政雜誌社，民107[2017]9月，215期），頁71-111。

中國朝野的肯定：“新羅號為君子之國，頗知書記，有類中國”。“遠國通王化，儒林得使臣。六君成典冊，萬里奉絲綸”。(耿漳《送歸中丞使新羅》)“異俗知文教，通儒有令名。還將大戴禮，方外授諸生”。(皇甫冉《送歸中丞使新羅》)古代朝鮮人已經“知文教”、“通王化”了，如此一來，與那些尚未“知文教”，“通王化”的四夷相較，古代朝鮮人就自然而然地認為自己應該排除在四夷之外了，正所謂“表裡山河習俗醇，地連華夏必親仁”。(李崇仁《奉使錄》)他們已經與“華夏”幾無二致了。既然號稱“小中華”，況又深染儒風，那麼自然而然地也就應該像“大中華”一樣，擔負起向四夷傳播儒家先進文化、維護秩序的道義責任。這些觀念，隨著時間的流逝，逐漸滲透於朝鮮的民族心理之中，並成為一種穩定的“深層結構”，它與“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種表層的文化心理彼此呼應，形成一種帶有強烈感情色彩的價值判斷。至此，我們也就清楚了，李民賓對建州風物的描述正是這種價值心理的反映。它隱含著這樣的邏輯，即建州這塊荒涼苦寒之地，必然會形成女真人剽悍蠻勇的風氣，相反的，剽悍蠻勇的女真人也愈加使李民賓覺出建州的荒涼苦寒。《聞見錄》描述建州地理的潛在意蘊，在於以一種霸權話語言說出自己文化上的優越。⁵¹

因此這裡就適時列出建州懂得漢字的「胡中將領」名單，組成表一，也算是為當時的建州女真人所遭受的冤屈，略加平反。

這些「外郎」，僅僅從名字看，就大致上知道他們是女真人：伍哈代、趙三、卜三、風苦、哈空、哈失土、狗皮、凹失那、二黑土、太必扇、古兒馬虎、慢他失、牙海等，共十三名。

另外從他們自己登記的功勞「僅免其身」，⁵²也可以看出「敕諭原文」是以「女真式漢文」撰寫的。道理很簡單，其中如表一第一列的「敕

⁵¹ 劉廣銘；徐東日，〈《建州聞見錄》中的女真人形象〉，《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延吉市：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編輯部，2006年01期)，頁12。

⁵² 《列子，楊朱》：「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意思是可免死罪。

諭 7」所記「伍哈代，占本身。」就是一則「女真式漢文」。「占」字在這裡是一個關鍵字，幾乎每則敕諭原文都有一個「占」字，「占」字不是漢語，需要稍加說明。

例如「伍哈代，占本身。」翻譯為滿文是「unggadai be baksi seme beyei teile.⁵³」「占」字在這裡是省略掉的動詞，無法證明。

不過在別的句子裡，「占」字是與滿文「吃錢糧」的「吃 jembi」字音義互通的，十分明確，例如：

皇帝敕諭：半他失在兀喇（地名）鎮上馬刺一鎗，備禦占
丁夫十名。○ han hendume, bantasi ulade morin emu feye
gidalabuha seme uju jergi beiguwan obufi juwan niyalma caliyān
jembi.⁵⁴

「占」字的用法，算是滿文「吃 jembi」字的直譯，一般漢人師爺，即使懂得滿文，也不會這麼寫。由此可以看出，當時的女真將領，為了讓漢字更為鮮活貼切，已經創造了一種漢語方言，形成一種次文化，在語用上頗具民族性的。⁵⁵

這位伍哈代外郎，滿文是「unggadai」，在表一〈建州女真兼併扈倫四部期間部分外郎名單〉的「漢名 2」項下記為「翁噶岱 3」。這裡加上一個「3」，實在是因為太祖朝《滿文原檔》裡，稱為「翁噶岱 unggadai」的人多達六人，⁵⁶不編號實在難以區分，現在就以表三〈太祖朝《滿文原檔》中名為翁噶岱 unggadai 者名單〉，列表如下：

⁵³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四，頁 117。

⁵⁴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冊四，頁 101。

⁵⁵ 類似的例子，在廣東話裡經常出現。例如一種常見的路邊植物「七葉蓮（Chinese Elder）」，莖與葉曬乾之後是民間治療跌打損傷、消腫毒的漢方藥「蒴藿」，廣東稱之為「冇骨消」，冇音某，算是廣東話的方言字。

⁵⁶ 滿文老檔研究會譯註，《滿文老檔》，（東京：東洋文庫，昭和 33[1958]），冊三，人名索引，頁 53，參考 unggadai(1)至 unggadai(6)。

表三〈太祖朝《滿文原檔》中名為翁噶岱 unggadai 者名單〉

編號	漢名	頁一	原文	頁二	譯文	備註
1	貝勒翁阿岱	冊一 8	suwayan bonio aniya, sure kundulen han i susai sede ilan biya de, argatu tumen amin taiji de sunja minggan cooha be adabufi unggifi ula i ihan alin i hoton be kafi afame gaiha, minggan niyalma be waha, ilan tanggU uksin baha, ulai bujantai de korcini monggoi unggadai beile dafi bujantai cooha gaSanci tucifi orin bai dubede ilifi afaci ogoro cooha waka seme gisurefi amasi bederehe argatu tumen tere hoton de juwe dobori dedufi jihe,	上冊 5-6	戊申年，聰睿恭敬汗五十歲。三月，遣阿爾哈圖圖門、阿敏台吉率兵五千，前往圍攻烏拉宜罕山城，克之。斬千人，獲甲三百副。時科爾沁蒙古貝勒翁阿岱助烏拉布占泰。布占泰率兵出村，止於二十里外，曰：「此兵不可攻也。」乃退。於是，阿爾哈圖圖門於其城中住兩夜而還。	萬曆三十六年（1608）三月
2	翁噶岱	冊一 272	cooha bederere de emugUsai coohai meiren i ejen cergei gebungge amban i tatani unggadai gebungge niyalma nimembi seme geren coohai tatara ingde tatahakU encu fakcafi dobori deduhe seme cergei de uile arafi meiren i ejen	上冊 106	班師之日，乃有一旗之梅勒額真名車爾格依之大臣，其屬下名呼翁噶岱者，因病未宿於眾兵營中，另宿他處，故將車爾格依治罪，其梅勒額真所得之賞物，盡行籍沒。	天命四年（1619）七月

編號	漢名	頁一	原文	頁二	譯文	備註
			seme Sangnaha jakabe gemu gaiha.			
3	伍哈代	冊四 117	伍哈代，占本身。	冊四 117	unggadai be baksi seme beyei teile.	天命 九年 (16 24) 六月
4	翁哈帶	冊四 129	翁哈帶，在迴法陣上中一 箭，伍赤台，在亦哈阿令 中一箭，每人五兩之錄。	冊四 129	unggadai hoifade emu feye, ucitai ihan alinde emu feye baha seme sunjata yan i uile waliyambi. 129	天命 九年 (16 24) 六月
5	翁哈代	冊四 138	翁哈代，在扎苦塔陣上中 一箭，在兀刺陣上中一 箭，都拜，兀刺陣上中二 箭，每人九刃之錄。	冊四 138	unggadai jakūtade emu feye, ulade emu feye , dumbai ulade juwe feye baha seme uyuta yan i uile waliyambi. 138	天命 九年 (16 24) 六月
6	翁噶岱	冊四 414	han hendume, Sabtu, gUwalca goloi amban bihe, ama mafai giran, banjiha ba, jeke muke be waliyafi emu biyai on be, alin be dabame, muke be olome jihengge tereci jilakan ai bi, ere baime jihe gung de, tubaci dahame jihe niyalma be gemu, juse omosi jalan halame, alban de ume	上冊 682- 683	汗曰：沙布圖，原係卦 勒察部之大臣，棄其祖 墓，離鄉背井，歷經一 月，跋山涉水來歸，殊 堪憐憫。因此來歸之 功，凡自彼處隨從來歸 者之所有子孫，准其世 世免充官賦。犯過失死 罪，概行赦免。犯抄沒 之罪，均准免罰。如此 恤典，永不絕斷。一	天命 十一 年 (16 26) 五月

編號	漢名	頁一	原文	頁二	譯文	備註
			dabure, endeme calame bucere uile bahaci guwebu, ulin gaijara uile bahaci waliya, gosire doro be ume lashalara, ○ uju jergi Sabtu, ○ jai jergi unggadai, oni, ○ ilaci jergi sangsina,		等：沙布圖。二等：翁 噶岱。鄂尼。三等：桑 希納、	

從表三〈太祖朝《滿文原檔》中名為翁噶岱 unggadai 者名單〉可以看出，在《滿文老檔》索引中有六個人名為翁噶岱（unggadai），其中只有翁噶岱 3 是外郎，記為伍哈代，其他的都不是。例如其中翁噶岱 1，是一個蒙古科爾沁貝勒，《清史稿校註》記為「貝勒翁阿岱」，⁵⁷翁噶岱 2「因病未宿於眾兵營中」，翁噶岱 4「迴法陣上中一箭」，翁噶岱 5「扎苦塔陣上中一箭」翁噶岱 6 得到「二等恤典」等。

表三的「頁一」項下，有「冊一」、「冊四」兩個標示，意思是《滿文原檔》的第一冊、第四冊。⁵⁸另外「頁二」項下，有「上冊」標示，意思是《滿文老檔》的上冊。⁵⁹

表三還有一個特點，是證明外郎懂得漢字的鐵證，就是表三「原文」項下所寫漢字，是《滿文原檔》中少見的漢字檔案「真跡」，雖然經過重抄，但似乎都是「全文照錄」，並未修改。

例如外郎伍哈代（翁噶岱 3）所記「達住胡」功績，就可能是努爾哈齊的「口諭」，因為出現了「朕」字。這類文字，在努爾哈齊這種「嗜殺」的君主領導之下，大概也無人敢擅自改動。其文詳見表四〈建州女真兼併扈倫四部期間部分代事名單〉。所謂代事者，算是一種管理營務的官

⁵⁷ 國史館校註，趙爾巽等纂，《清史稿校註》，（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民88]），頁 7731。「布占泰與蒙古科爾沁貝勒翁阿岱合兵出烏喇二十里」

⁵⁸ 馮明珠主編；張起玉等編輯，《滿文原檔》，（臺北市：沉香亭企業社，民 94-95[2005-2006]，初版）。

⁵⁹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 版）。

員，又稱為「代子 daise」，⁶⁰或者可稱為「分得撥什庫 funde boSokU」，撥什庫職司文書、餉糈等事務。⁶¹這種工作需要認識文字，才能推動業務，所以這類官員雖不必寫字記事，卻必須「識字」。列表如下：

表四〈建州女真兼併扈倫四部期間部分代事名單〉

敕諭	頁一	原文	漢名 1	滿名	漢名 2	頁二	備註
6	冊四 112	哈喇代事，副將，占丁夫十二名。	哈喇	hara	哈喇	上冊 596	
7	冊四 115	達住胡擅自領兵殺敗胡兒哈之眾，但是行動之處，並無致朕憂慮，屢屢勝捷而回，因陞為代管副將之職，遊擊之錄，占丁夫十六名。	達住胡	dajuhU	達住虎	上冊 596	

表四〈建州女真兼併扈倫四部期間部分代事名單〉的資料出處，與表一相同，就不另外說明。

這就回到朝鮮人李民賓所說「聞胡將中，惟紅歹是僅識字云」，這個主題來了。以上這些人，包括表一的十三人、表三的二人，都是當時建州的「胡將」，都是能寫漢字的人才，堪稱允文允武，怎能說「惟紅歹是僅識字云」？

也許有人會懷疑，何以認為以上這十五人都識漢字？而不是滿文。其實證明也很容易，明萬曆二十七年（1599）二月，清太祖努爾哈齊雖曾下令利用蒙古字母創製出來滿文，但是由於兵馬倥傯，滿文研發相對遲緩，軍中所使用的依然是以漢字記事為主。這點在《滿文原檔》〈寒字檔〉中編為冊號六十二漢文敕諭檔的記事中，可以明確看出。時間約在建州女真與扈倫四部戰爭時期，即早在明萬曆二十七至萬曆四十一年（己亥-癸

⁶⁰ 陳捷先編著，《努爾哈齊事典》，（臺北市：遠流出版公司，2005[民 94]，初版），頁 167-168。

⁶¹ 商鴻達[等]編著，《清史滿語辭典》，（上海：古籍社出版：新華發行，1990，第 1 版），頁 42。

丑，1599-1613）之間。⁶²

因此朝鮮人李民奐於後金天命四年（1619）到訪建州，以上這十五名將領，都早已在清太祖努爾哈齊麾下任職，職司文書、餉糈等事務，而且保有漢字檔案紀錄在案，正好可以駁斥「惟紅歹是僅識字云」這種謬論。

另外或許有人會懷疑，這十五人可能只是士兵，而不是將領。關於這一點，就跟當時的八旗制度有關了。因為只有皇親國戚，或是投效首領，才會登入紀錄，分享賞銀或得到免死令。至於一般士卒，是將「戰利品」如人口、牲畜、金銀、布帛等，集中堆放，現場直接分配的：

此外，八旗還是分配擄掠財富的基本單位。如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五日攻取明撫順諸城堡，次日，努爾哈齊就在甲版野地設營，按旗分配“俘獲”三十萬人畜。每次戰勝之後，“降者編為戶口，所俘各照牛条，派數上獻”。他還將在戰爭中擄獲大量的人口、牲畜、金銀、布帛，按八旗分賜與貝勒和各級額真等。如薩爾浒之役後，將繳獲的戰利品堆放八處，按八旗進行分配。⁶³

至於分配的原則，則是依功勞大小行賞：「立大功者重賞，立小功者輕賞，而負傷者視傷勢輕重，酌情行賞、重賞陣亡之甲兵。」⁶⁴例如攻取明撫順諸城堡俘獲三十萬人畜，從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六日到二十三日，努爾哈齊的四萬甲兵耗時八天，才將「戰利品」一一分配完畢。⁶⁵

再將焦點移回到這些將領。前面所謂努爾哈齊的外郎、代事將領，都是皇親國戚，或是投效首領，也是有所依據的。

先說「皇親國戚」。例如表一〈建州女真兼併扈倫四部期間部分外郎名單〉「敕諭 12」的卜三（busan），也可寫為布三，就是愛新覺羅家族

⁶² 張華克，〈〈寒字檔〉中漢文敕諭資料解讀〉，《中國邊政》，（臺北市：中國邊政雜誌社，民 107[2017]6 月，214 期），頁 165。

⁶³ 閻崇年，《清朝第一帝：努爾哈齊》，（北京市：華文出版社，2006 年，第 1 版），頁 131。

⁶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 版），頁 57。

⁶⁵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 年，第 1 版），頁 57-58。

一員，論年紀血統，還是太宗皇太極的從兄，來頭不小，而在表一中他只是一名中階的外郎：

興祖系：德世庫，興祖第一子。尼揚古，德世庫子。庫爾喀，尼揚古子。布三，庫爾喀子。布祜，布三子，封三等男。額訥布，布祜子，封三等男。⁶⁶

覺羅布祜，也可寫為覺羅布古。從覺羅布古身上，可以回頭看到布三的屬性，是鑲紅旗滿洲。布三孫子額訥布在雍正十三年（1735）四月過世，這個三等男的爵位就失傳了：

三等男。覺羅布古：鑲紅旗滿洲。順治四年，特恩授半個前程。恩詔加為三等阿達哈哈番。十八年，襲父覺羅布三之三等阿達哈哈番，並為三等阿思哈尼哈番。今漢文改曰三等男。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卒。覺羅額訥布：覺羅布古子，康熙二十五年四月襲，雍正十三年四月，卒，無襲。⁶⁷

再說「投效首領」。表三〈建州女真兼併扈倫四部期間部分代事名單〉擔任「代管副將」的達住胡（dajuhU），又可寫為達住虎、達珠瑚、答主戶、達朱戶、達諸護等，⁶⁸翻譯名字雖多，卻都是同一人。《清史稿校註》有達珠瑚的傳記，列示如下：

達珠瑚，兆佳氏，先世居訥殷。祖達爾楚，國初來歸。旗制定，隸滿洲正藍旗。達珠瑚初任牛錄額真。從太祖伐烏喇，斬級四千。從克西林屯，俘其人以歸；追者至，還擊敗之，斬級五千。從伐葉赫，斬級三百，俘五十人。遇明人越境採參，斬三十人，俘六人。敵侵寧古塔，出戰，斬其將及兵百，獲甲

⁶⁶ 國史館校註，趙爾巽等纂，《清史稿校註》，（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民88]），《清史稿校註·卷一百六十八·表一·皇子世表一》，頁4455。

⁶⁷ 國史館校註，趙爾巽等纂，《清史稿校註》，（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民88]），《清史稿校註·卷一百八十·表十三·諸臣封爵世表五下》，頁5245-5246。

⁶⁸ 滿文老檔研究會譯註，《滿文老檔》，（東京：東洋文庫，昭和33[1958]），冊三，人名索引，頁13。這些不同的漢字譯名，各有出處：達珠瑚（《大清滿洲實錄》、《八旗滿洲氏族通譜》）、答主戶（《太祖武皇帝實錄》）、達朱戶（《大清太祖高皇帝實錄·康熙版》、《大清太祖高皇帝實錄·乾隆版》）、達諸護（《八旗通志·初集》）等。

百副、馬三百匹。授三等副將。天命十一年，伐東海瓦爾喀部，又伐卦爾察部，皆有功。太宗即位，設十六大臣，伊遜及達珠瑚佐鑲黃旗。天聰元年，太宗伐朝鮮，克義州，留兵駐守，命達珠瑚分將之。旋復帥師伐瓦爾喀。師還，為俘卒所賊。八年，以其子翁阿岱襲三等梅勒章京。太宗復遣將伐瓦爾喀，因誡之曰：「前遣達珠瑚，以疏見害。念其從事久，有勞，方令襲世職。汝曹未能如達珠瑚之功，儻不自慎，欲覬例外恩，不可得也。」順治間，追諡襄敏。⁶⁹

達珠瑚的出身，從上面這一段記載中，可以清楚看出來，他不是皇親國戚，而是訥殷部落的兆佳氏，乘著努爾哈齊建國初期需要人手時，投效來歸，算是外籍兵團。這一篇《清史稿校註》的小傳記錄，比起外郎伍哈代在「敕諭 7」中所記的文字「達住胡擅自領兵殺敗胡兒哈之眾，但是行動之處，並無致朕憂慮，屢屢勝捷而回，因陞為代管副將之職，遊擊之錄，占丁夫十六名。」，要乏味多了。

不過也從這篇傳記，也可以發現，外郎伍哈代，其實就是「三等梅勒章京翁阿岱」，兩者的滿文名字「翁噶岱 unggadai」是相同的。原來伍哈代、達住胡原本就同列在「敕諭 7」中，關係密切，同屬滿洲正藍旗，竟然是父子檔。伍哈代識字當上外郎，看得出是家學淵源，所以達住胡（達珠瑚）當初才能擔任「代管副將之職」，掌管營務。這兩點都是《清史稿校註》裡沒能掌握得到的早期資料，可說十分珍貴。

這對父子不只文武全才，也是「馬革裹屍」的典範。前面說過達珠瑚隨太宗伐瓦爾喀，「為俘卒所賊」，而翁阿岱（伍哈代）同樣戰死沙場：

（崇德）六年，從伐明，圍錦州，明總督洪承疇屯山口拒守。卓布泰與梅勒額真翁阿岱迎戰，明兵敗走，大軍合擊，復與翁阿岱力戰破敵。師還，敵躡我後，翁阿岱中創仆，卓布泰還殲敵，掖翁阿岱乘馬歸。⁷⁰

⁶⁹ 國史館校註，趙爾巽等纂，《清史稿校註》，（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民88]），《清史稿校註·卷二百三十三·列傳十三·諸臣封爵世表五下》，頁 7967。

⁷⁰ 國史館校註，趙爾巽等纂，《清史稿校註》，（臺北市：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民88]），《清史稿校註·卷二百三十三·列傳十三·諸臣封爵世表五下》，頁 8171。

翁阿岱的過世，比他的老子達珠瑚還要悲壯。原來他是在對敵作戰時中創摔下馬背，再由同僚卓布泰從明兵手中搶回，乘馬而歸，回營時發覺已經殞命矣。也可以這麼說，後金的江山，就是靠翁阿岱這類外郎出身的人物，一刀一槍捨命換來的。

肆、簡評外郎

上面說了外郎翁阿岱（伍哈代）的事蹟，可以大致了解，早年努爾哈齊建國初期轄下的建州女真，有許多是出將入相、允文允武的人才，並不全是朝鮮人口中目不識丁的「韃子」或「胡虜」。

即使是漢人外郎龔正陸（歪乃），朝鮮人也說他「文理不通」。但是努爾哈齊當時能「定國政、禁悖亂、戢盜賊、法制以立」，顯然龔正陸脫不了關係，也不可小看。

再回頭說那最先提到的「外郎」尼康外郎。尼康外郎姓佟佳氏，名為「阿東布巴彥」，本是建州的女真貴族，名門大戶。無奈身處亂世，淪為努爾哈齊階段性的「殺父仇人」，遭到汗讎與追擊，以致身亡。但是當討明檄文〈七大恨〉出現之後，原來「殺父仇人」是明朝，照說這種誤會也就該煙消雲散了。只是「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六月寒」，傷害似乎不斷擴大，連他的「外號」也跟著變質，有學者李學智認為，「尼康 nikan」就是「膿包」：

若吾人以上之臆測不誤，是可知滿人之稱明代之漢人「尼康 nikan」者，其始或祇不過係卑稱明代駐防遼東之軍隊。亦不過形容明兵之無能，每戰必改，不值一擊而已。繼而與明之衝突擴大，又將所有之明兵，均給以別號「尼康 nikan」以增強滿人之士氣。其後甚至於將所有明朝之官民，均稱謂「尼康 nikan」以示誣蔑與輕視。日久成俗，實地上所有之漢人均被清人視之謂「膿包」，而漢人不自知，尚自認為「膿包」之「尼康 nikan」而不疑，豈不怪哉？⁷¹

⁷¹ 李學智，〈滿人稱謂「漢人」為「尼康」意義之臆測〉，《大陸雜誌》，（臺北

尼康外郎（尼堪外蘭）的「尼堪 nikan」，跟「膿包」畫上等號，這種解釋，真是有失平允。因為「尼堪 nikan」如果是「膿包」，努爾哈齊怎麼會讓自己的愛孫，取一個這麼不堪的名字呢？這就無法通過以下這段史料的檢驗：

四月二十二日，汗曰：「多鐸阿哥之母，爾當以原本之禮恭養尼堪阿哥之母。儻忘我之前訓，不將其與己同等待之，則過矣。休想得到與其均等之衣食。多鐸阿哥、將尼堪阿哥之財產諸物合於爾處者，乃為恐當事者不知支給領取八家之何物而間隔之，故使合之。又為恐爾家於衣食用時，將其財物做為共同之財物揮霍之，當共同監管之。」⁷²

這裡所提及的尼堪阿哥（1610—1653），在當時天命九年（1624年）時年紀很輕，只有十四歲，是以前遭處死的褚英所遺留的兒子，也就是努爾哈齊的孫子。由於尼堪阿哥的財物都交予大妃阿巴亥保管，努爾哈齊對大妃不很放心，所以訓誡一番，也顯示祖孫之情，溢於言表。

此外，尼堪也是牛录的名稱。以一牛录三百人計算，讓三百人都背上「膿包」惡名，似乎也不是帶兵之道：

汗曰：「尼堪牛录之東阿，在烏拉被射傷一處，被刺傷一處，准折十五兩之罪，列為十等。」⁷³

由以上舉證可知，「尼堪 nikan」就是「漢人」的意思，不好不壞，建州女真人常用，沒有必要強加附會其他的涵意。再說一下尼康外郎（尼堪外蘭）的整體解釋，還有以下說法：

尼堪，女真人稱漢人為尼堪，或稱蠻子（意為南方人）為尼堪。外蘭有兩種解釋：一為首領或大人；另一個是指亂叫的鳥。從民間調查可知，外蘭一詞還是滿族民間土語“窩”，“窩”是一種擅長叫而不務實的鳥類，比喻人擅長空談不務正

市：大陸雜誌社，1962年5月特刊2），頁138。

⁷²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年，第1版），頁590-591。

⁷³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北京市：中華書局，1990年，第1版），頁609。

業，習性輕浮。尼堪外蘭的真實含義顯然是後者，純屬貶義。

這是清王朝強加給他的稱呼，而非真實姓名，一直流傳了三百多年，並且還被寫進了史籍。⁷⁴

這種看法似乎悲觀了一些，明明有兩種解釋，怎麼都選擇了「貶義」。從前面表一〈建州女真兼併扈倫四部期間部分外郎名單〉可知，當時至少有十三名中階將領，擔任「外郎」職務，負責以漢字記錄戰場實況。其中有翁阿岱（伍哈代）者，更是文武全才，戰死沙場。另有漢人「外郎」龔正陸別名「歪乃」，擔任努爾哈齊的文膽，籌畫內政、外交、教育等工作，責任重大，也難以輕視。

再說當時女真人稱號「外郎」，也可能只是一種習慣。例如《清太祖武皇帝實錄》裡就記載了哈達部酋長有名為「王住外郎 wanju wailan」者，頗有「政治外郎」的意味，可為參考：

哈達國汗姓納喇，名萬，本胡籠族也。後因住哈達處，故名哈達，乃兀喇部轍轍木之子，納奇卜祿第七代孫也。其祖克世納都督被族人八太打喇漢所殺，萬遂逃往什白部瑞哈城。其叔王住外郎逃至哈達部為酋長，後哈達部叛，王住外郎被殺，其子泊兒混殺父讎人，請兄萬為部長。萬於是遠者招徠，近者攻取，其勢愈盛，遂自稱哈達汗。⁷⁵

因此實例中有女真酋長，名為外郎，有軍職將領，擔任外郎，有文職外郎，身居要職。由此看來，尼康外郎（尼堪外蘭）這個「外郎」外號的解讀，無論是「尼堪 nikan」或是「外郎 wailan」，當以正面的成分居多，是當時遼東一帶，一個響亮的稱號，似乎並沒有什麼需要釋為貶義。

伍、結語

清初努爾哈齊建國時期，建州女真出現了一群以「外郎」為稱號、職

⁷⁴ 趙東升，〈為尼堪外蘭正名〉，《滿族佟佳氏研究》，（瀋陽市：遼寧民族出版社，2004，第1版），頁239。

⁷⁵ 復旦大學．圖書館．古籍部．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編年類，清太祖武皇帝實錄》，（上海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1版），冊368，卷1頁3。

銜的活躍人物。這些人物包含努爾哈齊的敵人，也有努爾哈齊的朋友，更有許多是努爾哈齊的部屬。這些人都直接參與了後金的建國活動，是組成當時歷史無法忽視的一環。因此認識這些人，理解他們在做些什麼，有什麼評價，對了解清初建州女真歷史的建構，會有所幫助，因此當有其研究的必要。

第一個「外郎」名為「尼康外郎」，本文歸類為「政治外郎」。「尼康外郎」是一個稱號，屬於遼東望族佟佳氏家族的一支，名為「阿東布巴彥」，始祖為巴虎特克甚。佟佳氏枝葉繁茂，在遼東勢力龐大。尼康外郎又是圖倫城主，效忠於明朝，企圖藉由明朝的力量，統一女真各部。不過當時建州左衛的覺昌安，也就是努爾哈齊的祖父，也具有相同的雄心，因此尼康外郎與覺昌安實處於競爭的地位。

明萬曆十一年（1583）遼東將領李成梁要討伐蘇克蘇滸河部的阿台，出兵古勒城。覺昌安、尼康外郎等都跟隨著李軍出征，想藉機壯大自己的聲勢。不過李成梁攻克古勒城時，卻誤殺努爾哈齊的祖父和父親，努爾哈齊則開始放話尼康外郎為殺祖、父的仇人。以致後來尼康外郎遭到努爾哈齊追殺斃命。不過努爾哈齊接著卻又改口聲稱明朝才是真正殺祖、父的仇人，推出討明檄文〈七大恨〉，令識者為尼康外郎感到惋惜。由此可知，尼康外郎不過是一名代罪羔羊而已。

本文則藉此機會，探討「尼康外郎」這個稱號，是否屬於辱稱。學者李學智認為，「尼堪（尼康）nikan」就是「膿包」。清史專家趙東升則認為「尼堪是蠻子」，外蘭（外郎）是滿族民間土語「窩」，是一種亂叫的鳥，比喻人擅長空談不務正業，總之是充滿了「貶義」。然而從史料中得知，努爾哈齊的孫子名為「尼堪阿哥」，努爾哈齊的軍隊中有一支稱作「尼堪牛录」。尼堪具有「漢人」的意思，並不是壞詞。而且努爾哈齊的文職武將，都有採用「外郎」當作頭銜的案例，另外當時還有哈達部酋長，名為「王住外郎」的。可見「外郎」也沒有什麼不好的意思在。說來尼康外郎（尼堪外蘭）這個稱號，在「政治外郎」領域，應為美稱才對。

第二個「外郎」，名字叫做「龔正陸」，號稱是「文學外郎」，其女真名稱「歪乃」，其實是朝鮮語、女真語混合發音的「外郎」異寫。龔正陸，又叫作龔正六，是明末浙江紹興會稽人，嘉靖末年，那時龔還很年

輕，客居遼東，意外被女真人捉住成為包衣，輾轉到了努爾哈齊麾下。明萬曆二十三年（1595）十一月，朝鮮國通事河世國以朝鮮使臣身分進入建州，打探消息，發現龔正陸是「文學外郎則以唐人投屬虜地，幾至三十餘年，而凡所通書，此人專掌云。」

同時明朝派駐朝鮮的練兵官余希元也派下屬楊大朝進入建州，紀錄有關龔正陸的資料是「見浙江紹興府會稽縣人龔正六，年少客於遼東，被搶在其處，有子姓群妾，家產致萬金，老乙可赤號為師傅，方教老乙可赤兒子書，而老乙可赤極其厚待。虜中識字者，只有此人，而文理未盡通矣。」

同年十二月，朝鮮官員申忠一也奉朝鮮國王之命，到建州費阿拉探視努爾哈齊居城虛實，所得資料為「歪乃，本上國人，來于奴酋處，掌文書云，而文理不通。此外之人，更無解文者，且無學習者。」

本文分析朝鮮官員申忠一等人的言論，認為其中不乏自大的成分。例如朝鮮的備邊司向國王啟奏，說明當時渭原採蔘女真人被殺的糾紛處理情形，稱努爾哈齊等為「夷狄」、「獸心」、「達子」、「虜」等習慣用語，以現在眼光來看，頗具種族歧視的意味。更由於成見太深，以致無法看出許多「胡將」，也有懂得漢字者。

第三個「外郎」，名為伍哈代，其實是一群女真外郎中的一個。這群女真外郎，本文歸類為「軍事外郎」，在《滿文原檔》至少出現了十三名，包括：伍哈代、趙三、卜三、風苦、哈空、哈失土、狗皮、凹失那、二黑土、太必扇、古兒馬虎、慢他失、牙海等，只是限於篇幅，僅選擇一位當作代表，加以介紹。

外郎伍哈代（翁阿岱、翁噶岱、unggadai）記錄自己父親達住胡功績的文字，十分生動活潑「達住胡擅自領兵殺敗胡兒哈之眾，但是行動之處，並無致朕憂慮，屢屢勝捷而回，因陞為代管副將之職，遊擊之錄，占丁夫十六名。」文字模仿努爾哈齊口吻。可見其不只識字，而且頗具文采。

「軍事外郎」以往未曾有人提及。因為在《滿文原檔》中，屬於被人忽視的〈寒字檔〉漢文敕諭資料，十分可惜。此次加以整理介紹，或能略補清初建州歷史建構上的不足之處。

（本文於 2018 年 8 月投稿，於 2018 年 10 月審查通過）

邊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時間像流水，生活如漩渦。（維吾爾族）

老虎學抽煙。（水族）

雷聲大，雨點小；人驕傲，成就小。（白族）

人狂有禍，風狂有雨。（壯族）

眼光高，不長智慧；穗頭高，不出糧食。（藏族）

鷹哭麻雀假慈心。（苗族）

花美在外地，人美在裏也。（土族）

馬看強壯，人看心腸。（撒拉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伊犁厄魯特營上三旗卡倫的建置與形制

納森巴雅爾*

摘 要

清政府平定準噶爾及大小和卓叛亂，將天山南北重新納入中華版圖。出於對國計邊防的考慮，在哈薩克、布魯特、浩罕沿邊及新疆內部地區，設置了大大小小數百座卡倫。卡倫是清王朝國家統一的象徵，也是新疆各族人民維護祖國領土完整，誓死捍衛邊疆抵禦外侮的見證。本文以歷史時期為分界，對厄魯特營上三旗駐守的卡倫建置形制做一番論述。

關鍵字：厄魯特營上三旗、卡倫數目、卡倫變化、卡倫形制

伊犁厄魯特營是清乾隆年間平定準噶爾後實行軍府制度的產物，為當時伊犁駐防四營之一，與其他三營（即伊犁河南岸的錫伯營、霍爾果斯河東西兩岸的索倫營，以及博爾塔拉地區的察哈爾營）共同構建新疆西部邊防的週邊前哨。厄魯特營存在近 150 年之久，為保衛邊疆、建設邊疆、抵禦外侮、維護內部安定作出了歷史性貢獻。它是集軍事、行政、生產三項功能於一身的特殊組織，有嚴格的內部結構和管理、訓練制度，以及經濟保障系統。在清季民國時期，厄魯特營的主要職能是駐守卡倫巡查邊境戍守台站等。厄魯特營駐守的卡倫在伊犁四營中數量最多，而駐守現今昭蘇縣的上三旗的卡倫又最為繁雜，不同的歷史時期，上三旗駐守的卡倫又有不同的變化。2018 年 8 月 9 日-13 日，筆者對伊犁昭蘇縣遺存的厄魯特營上三旗卡倫遺址進行了為期一周的田野調查，取得了第一手資料，在此次田野調查的基礎上結合文獻資料，以歷史時期為分界，依次梳理厄魯特營

上三旗卡倫建置與形制。

一、厄魯特營的建置

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清政府平定大小和卓叛亂後，如何治理新疆便被提上乾隆皇帝的議事日程上，乾隆皇帝在他親撰的《平定準噶爾勒銘格登山碑文》中回顧歷史：“漢置都護，唐拜將軍”，大有以漢唐之制治理新疆之念。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陝甘總督楊應琚與參贊大臣舒赫德、阿裏袞奉旨議奏，“請于伊犁、阿克蘇、葉爾羌各設總兵一員，兵備道一員。其同知、通判、都司、遊擊及佐雜、千把等員弁，均按南、北兩路情形添設”。¹但此後清政府考慮到“伊犁、回部各處俱由辦事大臣，已足控制遠近，若添設鎮道以下各官，既與口外體制不符，而一切建造衙署，添設俸工。俱以內地經理，更滋煩費。且回眾不相浹洽，易起猜疑，殊未妥協。總之，新疆非巴里坤、哈密可比，當因地制宜，在回城固不易久駐官兵，既伊犁一帶，亦仍當以滿洲將軍大員駐守”。²明確否定了在新疆全境實行州縣制治理的可能，決定以滿洲將軍大員統轄其地。不久，乾隆皇帝再次降諭闡述這一問題：“新辟疆土，如伊犁一帶，距內地穹遠，一切事宜難以遙制。將來屯田駐兵，當令滿洲將軍等前往駐紮，專任其事，固非鎮道綠營所能彈壓，亦非總督管轄所能辦理。楊應琚如未經到彼，即可不必前往，既已其履其地，略悉情形，即可回任。總之，該督統轄所及，至烏魯木齊而止。自此以外，現有舒赫德等在彼經理，該督自應仍回內地，俟將來有應行接應之處，妥為料理，是其專責，此時正毋庸久駐口外籌辦一切，反致遺誤內地要務也”。³這裏明確限定了陝甘總督在新疆的管轄範圍和職責，排除了以陝甘總督治理新疆的可能性。其後又於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清政府以參贊大臣阿桂為辦事大臣總理伊犁

* 作者簡介：納森巴雅爾又名趙鐵生(1975-)，男，錫伯族，新疆伊犁州瑟公錫滿文化傳播中心，2015 年參加石河子大學兵團屯墾戍邊研究中心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彙編》翻譯工程。聯繫電話：18194901908，郵箱 2388913068@qq.com。

¹ [清]傅恒等編：《平定準噶爾方略》續編卷一，乾隆二十五年三月甲子。

² [清]傅恒等編：《平定準噶爾方略》續編卷一，乾隆二十五年三月甲子。

³ 《清高宗實錄》卷六一二，乾隆二十五年五月丙子。

事務，籌辦屯田築城，為設置將軍作前期準備。一切籌備妥當後。次年，乾隆皇帝令明瑞赴伊犁代替阿桂辦事，並於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正式頒降設置將軍的諭旨：“伊犁為新疆都會，現在駐兵屯田，自應設立將軍，總管事務，昨以簡用明瑞，往膺其任，著授為總管伊犁等處將軍，所有敕印旗牌，該部照例頒給”。⁴明瑞被授為首任伊犁將軍。伊犁將軍的設置，標誌著清朝政府對新疆正式行使管轄權的開始，也標誌著天山南北地區數百年由地方割據勢力控制和戰亂不斷局面的終結。又對後來新疆多民族分佈格局的形成和發展，中國西北疆域的形成和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有重大影響。

伊犁將軍設立後，駐軍問題首先被提上議事日程，經軍機處與伊犁將軍等數次討論廷議，考慮伊犁地區宜農宜牧地域廣闊的自然條件，以及處西北戰略要地和“形勝之地”的地位，決定以戰鬥力較強的滿洲、索倫、錫伯、蒙古等官兵攜眷駐防伊犁。自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先後有察哈爾、索倫、厄魯特、滿洲、錫伯等 1 萬余名官兵攜眷進駐伊犁各地，組建了察哈爾營、索倫營、錫伯營、惠甯城滿營、惠遠城滿營、厄魯特營共同承擔安內守邊的國防任務。

厄魯特營主要由三部分組成：一是投附內地的準噶爾人，其中大多數是原準噶爾二十一昂吉的達什達瓦部屬，乾隆二十九年（1764 年）春，500 名攜眷之厄魯特達什達瓦官兵奉命來到伊犁，被安置於特克斯河、察林河及塔瑪哈一帶(今新疆昭蘇縣境內)。乾隆三十年（1765 年）達什達瓦部眾被編為一昂吉，為厄魯特營左翼；二是清朝出兵準噶爾汗國時逃入哈薩克、布魯特部游牧地後又陸續返回的準噶爾人，及被清廷贖回的曾給維吾爾族當奴隸的準噶爾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後，少部分劫後餘生逃入哈薩克、布魯特游牧區等地的準噶爾人不堪為奴，陸續投靠清朝，對此，清廷實行了招撫和安置政策。乾隆二十七年（1762 年）有 6 個佐領，次年設一昂吉，設置了總管、副總管、佐領、驍騎校等官，並頒發了關防印記。乾隆三十年（1765 年）該 6 個佐領編入厄魯特營右翼。直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投清的準噶爾人有 1408 人，其游牧區為崆吉斯

⁴ 《乾隆上諭檔》卷六七三，頁五一九，乾隆二十七年十月乙巳（十六日，1762 12 1）

河、喀什河及大小霍諾海等地，即現在的尼勒克縣、特克斯縣、新源縣境內；第三部分為乾隆三十六年（1771 年）隨土爾扈特部東歸的大喇嘛羅卜藏丹增屬下的沙比納爾，其牧地為特克斯河下游(今新疆特克斯縣境內)。

乾隆三十二年（1767 年）7 月，厄魯特營按八旗編制，左翼被編為三旗，即鑲黃、正黃、正白，稱“上三旗”，置 6 個佐領，右翼置 5 個旗，即鑲白、正紅、正藍、鑲紅、鑲藍，稱“下五旗”，有佐領 8 個，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8 個佐領擴編為 10 個佐領。加上沙比納爾 4 個佐領，共有 14 個佐領。由於準噶爾部是屬於反抗清朝統治，而被清朝征服的蒙古部，因此，厄魯特營和察哈爾營一樣實行的是總管旗制。全營設領隊大臣 1 員，總攬邊防要務，大都由滿族人擔任。上三旗設總管 1 員、副總管 1 員、佐領 6 員、驍騎校 6 員、領催 24 員、世襲雲騎尉 2 員、空藍翎 3 員、委筆帖式 2 員、食 1 兩 5 錢披甲 2 名、食 1 兩披甲 474 名，食 5 錢披甲 664 名。下五旗設總管 1 員、副總管 2 員、佐領 10 員、驍騎校 10 員、世襲雲騎尉 3 名、空藍翎 3 名、委筆帖式 1 名、拜唐阿 1 名、領催 40 名、食 1 兩披甲 500 名、食 5 錢披甲 1077 名。⁵沙比納爾 4 個蘇木（牛錄），1817 年（嘉慶二十二年）經伊犁將軍松筠奏准，設佐領 4 員、驍騎校 4 員、空藍翎 2 員、領催 16 員、委領催 16 員、食 5 錢披甲 571 名。⁶

厄魯特營的職能是駐守卡倫台站，遠戍塔爾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市），經營伊犁地區的孳生馬場、駝場和牛場。並於特克斯河、崆吉斯河、喀什河流域從事小規模屯田。

二、乾隆-同治時期的厄魯特營上三旗卡倫

厄魯特營作為軍事組織，其首要任務是駐守卡倫，巡查邊防，卡倫滿語寫為“karun”，漢語亦作喀倫、卡路、喀龍，為“台”或“站”的滿語音譯。卡倫由於任務、作用、設置地點和條件不同，有多種形式。如戰時“營前卡倫”，負責警衛和探察敵情；皇帝專用獵場的“圍場卡倫”，專門負責圍場警衛；在禁區、山場、礦山設置的卡倫，負責查禁私人採伐捕獵；設置於山川要隘處的卡倫，負責維持秩序，保證交通安全，稽查逃

⁵ 〔清〕松筠修，徐松纂《欽定新疆識略》卷 5.官制兵額。

⁶ 〔清〕松筠纂定，汪廷楷、祁韻士修撰《西陲總統事略》卷 5.糧餉。

人，解送馬匹，護送貢物，傳遞文書等；在一些遊牧部落設置的卡倫，則各有地段，防止牧民越境放牧，避免發生糾紛；在邊境地區設置的卡倫，則是為了保衛邊疆，巡查國境。卡倫駐地和駐守的時間也不相同，有些卡倫常年設置，駐地不變；有些卡倫雖然常年設置，但駐地隨季節變更。還有一些卡倫雖然駐地固定不變，但設置的時間則按季節確定。有的季節設立在固定地點，而在另外季節則撤回。這些不同的卡倫其稱謂也有不同，有常設、移設和添設之別。清代卡倫有完整的巡查會哨制度，各種卡倫根據各自的任務，有的在固定地點守望，有的在一定範圍內巡邏。卡倫官兵駐防某地執行任務，稱為“坐卡”。相鄰兩卡倫之間，每天要按規定路線巡查，並在適中之地立記（或插杆，或堆石）會哨，互換木質戳記信牌為憑，稱之為“遞籌”。兩卡倫遞籌巡查之路，名曰“開齊”，即卡倫路。通過遞籌巡查之路，把一處處單個的卡倫聯繫起來，形成一條條維持治安的巡查路線，這種卡倫路線，遍佈天山南北各行政地區。

雍正五年（1727 年），清政府在與準噶爾汗國交戰過程中，開始在西北地方設置卡倫。乾隆二十年（1755 年）以後，清政府在北疆伊犁、塔爾巴哈台等地區大量設置卡倫，接著在南疆陸續設置了一系列卡倫，在新疆共設立 250 多座卡倫分南北兩路。北路卡倫分佈在齋桑湖北、額爾齊斯河西岸的輝邁拉虎卡倫（今蘇聯巴特）以南，天山以北，巴里坤以西，伊犁所屬特莫爾圖淖爾（今蘇聯伊塞克湖）以東等地區。南路卡倫分佈在天山南脈以南，和闐河兩岸，哈密以西的喀什噶爾、烏什、英吉沙爾、葉爾羌、和闐、阿克蘇、喀喇沙爾、吐魯番等地區。彼時，卡倫貫穿新疆東西遍及天山南北，作為治安工具設立於各行政區域的山川隘口、重要通道上，這些卡倫與邊界無涉。乾隆三十七年（1772 年）時“伊犁周圍道路關隘，每年自二月至九月，此八個月，於二十七處設置卡倫；自十月至正月，此四個月，降雪封路，裁撤卡倫十座，其餘十七處，仍設卡倫”。⁷各駐防旗營的分佈情況是“東北則有察哈爾，西北則有索倫，西南則有錫伯，自西南至東南則有額魯特，四營環處，各有分地”⁸。各營卡倫年年

⁷ 《伊犁將軍舒赫德等奏由錫伯察哈爾厄魯特營選人管理伊犁卡倫折》（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彙編第 110 冊，廣西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2012 年 12 月第一版，第 1 頁。

⁸ 〔清〕松筠修，徐松纂《欽定新疆識略》卷 11 邊衛。

都在固定的地點、固定的時間、固定的卡房駐守，在卡倫駐兵問題上，按規定，雖為本營所屬卡倫，但不准許只派本營官兵駐守，而是各營相互派兵共守，即每個卡倫，最少有兩個不同旗營官兵同駐，其卡倫侍衛必須是非本營弁員。其目的是避免官兵共守同盟、營私舞弊、放棄職責等行為的發生。駐卡官兵，必須有 1 員侍衛，委官或空藍翎 1 員，兵十名至數十名不等。“伊犁沿邊大小卡倫七十余座，周圍地逾數千里，各卡相離數十裏至百餘裏之遙。每卡僅設弁兵十餘名及三十餘名不等。惟按月周巡，可期聲勢聯絡。其索倫、錫伯、察哈爾、額魯特四營，每月派總管、副總管、佐領等官一員，各帶本營兵丁三十名，于該管卡倫挨次行查，至各營交界會哨”。⁹

厄魯特營起初駐守的卡倫數目不多，乾隆四十二年（1777 年）伊犁將軍伊勒圖奏請“將伊犁河南塔木哈等四卡，交錫伯部領隊大臣德成額管轄；特莫爾哩克至那喇特所設七卡，交厄魯特部領隊大臣慶林管轄”。¹⁰筆者根據成書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年）的《伊江匯覽》記載，由各營卡倫內將屬厄魯特營管轄的“特木爾裏克、格根、科特克畢、鄂爾和珠爾、哈爾奇拉、烏帑固特卡、納拉特卡”七處卡倫析出，¹¹此內，特木爾裏克卡、格根卡、科特克畢卡、鄂爾和珠爾卡、哈爾奇拉卡為厄魯特營上三旗管轄卡倫，這些卡倫均設在伊犁通往天山以南的要道及與哈薩克、布魯特接壤的邊界線上。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又添設了察林河渡口等處布克申¹²。

⁹ 《錄副奏摺》軍務·防務，道光十四年。

¹⁰ 《錫伯族檔案史料》（上下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譯，遼寧民族出版社出版、發行，1989.7，下冊第 572 頁《伊犁將軍伊勒圖等奏將伊犁河南塔木哈等四卡交錫伯部領隊大臣管轄折》（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¹¹ 〔清〕格臻額纂《伊江匯覽》台卡，吳豐培整理，中國邊疆史地資料叢刊新疆卷之《清代新疆稀見史料彙集》。《伊江匯覽》內記“其伊犁所屬境內周圍舊設卡倫十五處，後續次添設卡倫十一處，計卡倫二十六處”，較注②的伊勒圖奏摺卡倫數目少 1 處，在乾隆二十七年敕修的《欽定皇輿西域圖志》卷三十一兵防·伊犁屬卡倫內，亦僅記有 26 處卡倫數目。

¹² 〔清〕松筠修，徐松纂《欽定新疆識略》卷 11 邊衛釋：小卡倫分置瞭望之處，名曰布克申，而統名之則曰卡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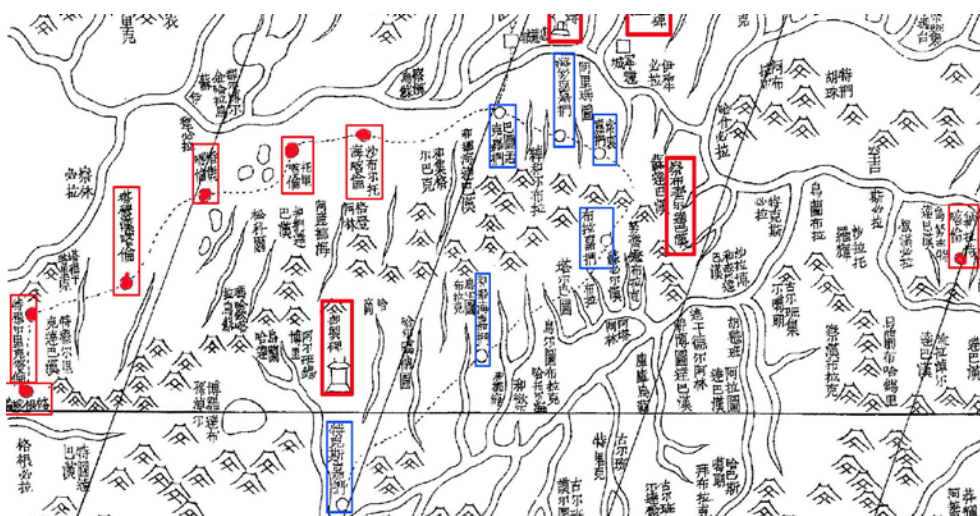


圖 1：《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乾隆十三排輿圖八排西三局部，圖中紅框點紅圈者為卡倫。



圖 2：《清廷三大實測全圖集》乾隆十三排輿圖八排西四局部，圖中紅框者為卡倫。

圖 1 和圖 2 為清乾隆二十五年鑄制銅版，民國二十一年一月故宮博物院重印的清乾隆內府輿圖（又稱乾隆十三排圖），圖中標注的特莫爾裏克喀倫（即特木爾裏克卡倫）、格根喀倫（即格根卡倫）、科體克必喀倫（即科特克畢卡倫）、哈爾奇拉喀倫（哈爾奇拉卡倫）、珊塔斯喀倫（卡倫），未見標注鄂爾和珠爾卡倫，這五處卡倫應屬伊犁

地區早期初設之卡。其後，隨著邊疆局勢的穩定和歷任伊犁將軍不斷調整，至嘉慶中葉厄魯特營上三旗有大小卡倫 32 處（見圖 3），其中常設卡倫 4 處：

特克斯色沁、敦達哈布哈克、伊克哈布哈克、察察；移設卡倫 4 處：特莫爾裏克、烏弩古特（下五旗）、鄂博圖渡口、昌曼（下五旗）；添撤卡倫 24 處：特莫爾裏克渡口、雅巴爾布拉克、鄂博圖、額爾格圖、筍拉圖、庫圖勒、格根、鄂爾果珠勒、哈爾幹圖、齊齊罕圖、垓爾巴特（下五旗）、

拜布拉克（下五旗）、博托木（下五旗）、綽羅圖（一作赤老圖）（下五旗）、那（納）喇特（下五旗）、博爾克阿滿（曼）（下五旗）、巴噶塔木（巴噶喀木哈）、察林河渡口、察林河察罕鄂博、格根西哩克、銅廠外（下五旗）、沙裏（喇）雅斯、那林哈勒噶（一作那林哈布哈克）、哈爾奇喇¹³。厄魯特營除了駐守以上卡倫外，還派兵 5 至 17 名不等協助巴彥岱（惠寧）、錫伯、索倫、察哈爾等營領隊大臣駐守 24 座卡倫。

19 世紀 20 年代時，沙俄加快了吞併中亞的步伐，不斷向哈薩克草原擴張，新疆同沙俄之間的邊界問題產生了，伊犁地區卡倫的設置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據《伊犁文檔匯抄》載道光中葉，厄魯特營管轄的卡倫有 9 座，即：鄂爾果珠勒卡、特莫爾裏克卡、格根卡、哈爾齊拉卡、沙爾雅斯卡、那喇特卡（下五旗）、烏弩古特卡（下五旗）、鄂蔔圖卡、阿墩格爾布胡圖卡。

布克申 14 座，即：伯爾克阿漫（下五旗）、察汗哈達、烏遜胡吉爾、特克斯色沁、巴哈塔木哈、庫圖爾、齊齊哈那、哈爾噶圖、銅廠外（下五旗）、筍拉圖、雅巴爾布拉克、特莫爾裏克渡口、額爾格圖、哈布哈克。¹⁴

道光中葉的卡倫與嘉慶時期的卡倫數目對照，上三旗卡倫內未見敦達哈布哈克、伊克哈布哈克、察察、鄂博圖渡口、察林河渡口、察林河察罕鄂博、格根西哩克、那林哈勒噶（一作那林哈布哈克）等卡倫名稱，但增加了阿墩格爾布胡圖卡和察汗哈達、烏遜胡吉爾、哈布哈克三個布克申。筆者查到一份道光十一年（1831 年）十月十七日《伊犁參贊大臣布彥泰奏敦達哈布哈克卡倫錫伯官兵拿獲盜馬賊犯情形折》¹⁵，該折明確記錄敦達哈布哈克卡倫在道光年間仍在行使職責，《伊犁文檔匯抄》所記應屬未盡詳細，上述乾嘉時期的卡倫在道光時處於使用狀態。對於卡倫數目記載存在的差異，據《欽定新疆識略》釋稱“以上系卡倫實數，與前總數不符

¹³ 〔清〕松筠修，徐松纂《欽定新疆識略》卷 11 邊衛。

¹⁴ 《清代邊疆史料抄稿本叢編》/國家圖書館分館編.-北京：線裝書局，2003.4.第 23 冊《伊犁文檔匯抄》364 頁-372 頁。

¹⁵ 《錫伯族檔案史料》（上下冊）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譯，遼寧民族出版社出版，發行，1989.7，下冊第 588 頁。

者，以移設卡倫，隨時移地，雖有兩處三處地名，實只一卡倫也”。¹⁶此種現象屬一處卡倫不同季節設在不同地點造成。道光時增設的阿墩格爾布胡圖卡、哈布哈克布克申是為了查禁茶葉大黃，而于道光八年（1828年）由時任伊犁將軍玉麟奏請于通往南路隘口添設，有確鑿的文獻可以佐證。¹⁷其中阿墩格爾布胡圖卡駐守厄魯特兵三十名，經筆者田野調查考證其遺址現在夏特穀中，距離谷口的沙圖阿滿軍台遺址約二十公里處，其附近有道光十年（1830年）添設的阿東格爾驛站遺址。



圖 3：《欽定新疆識略》內載伊犁西南境的厄魯特營上三旗卡倫示意圖

三、清末-民國時期的厄魯特營上三旗卡倫

同治三年（1864年）隨著新疆天山南路的庫車等地爆發農民暴動，伊犁地區的維吾爾、回、哈薩克等族也群起響應。同治五年（1866年）1月底，暴動軍攻陷惠遠城，伊犁將軍明緒自盡，已革前伊犁將軍常清被俘，清政府在伊犁的統治暫時被推翻，暴動者成立以艾拉汗為蘇丹的“蘇丹汗國”。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以“代收代守”為名，出兵消滅

¹⁶ [清]松筠修，徐松纂《欽定新疆識略》卷11 邊衛。

¹⁷ 《伊犁將軍玉麟等奏請伊犁增設驛站折》（道光十年五月初十日）清代新疆滿文檔案彙編第251冊，廣西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2012年12月第一版，第323頁。

“蘇丹汗國”佔領伊犁，開始了對伊犁的十年殖民統治。光緒四年（1878年）清軍勝利收復天山南路地區後，開始與沙俄就交收伊犁問題進行談判。光緒七年（1881年）中俄《伊犁界約》劃定自伊犁西南天山之陰那林哈勒噶山中起至伊犁東北喀拉達板（又稱噶爾，該段即今博樂市、溫泉以北、霍城縣、察布查爾縣、昭蘇縣以西）一段邊界，共立界牌鄂博 33 處。光緒八年（1882年）清政府從沙俄手裏交收伊犁，伊犁將軍金順率軍進駐伊犁，接著進行招民墾荒，修復城池等善後工作，伊犁地區原先的駐防旗營也先後被恢復。此時，厄魯特營上三旗劃界前的駐牧地基本喪失，退縮至蘇木拜河以東新劃界內遊牧，曾經駐守的卡倫全部歸入俄境。劃分新界後屬於厄魯特營上三旗牧地界內的界牌共有 10 處，即那林哈勒噶水沿界牌 4 處（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牌博）、諾海托勒蓋山（又寫為莫霍托勒海、莫霍托羅蓋）界牌（第五）、特克斯河南沿界牌（第六）、蘇木拜界牌（第七）、沙爾套山界牌（第八）、康喀山水西沿界牌（第九）、康喀山水東沿界牌（第十）。光緒九年（1883年）1月28日伊犁將軍金順、參贊大臣升泰上奏沿新劃邊界設置卡倫，“應設卡倫，已於現分中段地界，自納林哈勒哈至沁達蘭，計一千三百餘裏，新設卡倫十八處，一律撥兵守護。錫伯、索倫、額魯特等營，安卡倫台站四十五處，修造房屋棚廠，及官弁口分鹽菜銀兩，已用銀一萬九千三百餘兩。”¹⁸據《伊犁府鄉土志》記載：“額魯特營設卡倫七處：一那林哈勒噶卡，南至阿東格爾驛。一那林噶勒卡，距那林哈勒噶卡五十三裏。一胡素木圖卡，距那林噶勒卡五十二裏。一布胡圖卡，距胡素木圖卡四十六裏。一特克斯各塔爾幹卡，距布胡圖四十八裏。一莫合托羅海卡，距特克斯各塔爾幹卡五十裏。一阿爾班蘇木卡，距莫合托羅海卡五十三裏。錫伯、額魯特兩營合設卡倫一處：一阿裏幹穀卡，距阿爾班蘇木卡五十三裏”。¹⁹而《新疆四道志》內載額魯特營所設卡倫為：“那林哈勒噶卡，在城南八百一十五裏；那林噶勒卡原名那林哈爾哈卡倫，在城南七百五十九裏；胡蘇木圖卡，在城南七百七裏；布胡圖卡，在城南六百六十一裏；特克斯噶塔爾幹卡，在城南六百一十三裏；莫霍托羅海卡，在城南五百六十三裏；阿爾班

¹⁸ 《平定陝西甘肅新疆回匪方略》卷三一六。

¹⁹ 〔清〕光緒三十四年修，許國禎纂《伊犁府鄉土志》地理類·卡倫。

蘇木卡，在城南五百一十裏；格登山卡，在城南四百四十裏；沙圖阿滿卡，在南五百八十裏；阿裏幹穀卡，在城南四百六十裏”。²⁰比《伊犁府鄉土志》多出格登山和沙圖阿滿兩處卡倫，該兩處卡倫系光緒十年五月由伊犁將軍金順奏請添設。

筆者查閱光緒三十二年（1906 年）鉛印本《舊刊新疆輿圖》，對照《伊犁府鄉土志》和《新疆四道志》記載內容，新見蘇木拜、哈升、沙爾諾海三處卡倫，而格登山卡和沙圖阿滿卡未見標注。但據史料記載，光緒二十六年（1900 年）格登山卡倫委官烏魯布吉爾曾向厄魯特營左翼總管博泰、副總管庫克報告格登山紀功碑亭損壞，烏魯布吉爾報告稱：“上年冬季，風雪過大，格登上原建禦碑亭被風吹紐，柱頭與檁木交樑處業已損壞，全亭向東南斜欹”。²¹該史料顯示此時尚無蘇木拜卡，否則按《舊刊新疆輿圖》所繪，蘇木拜卡在格登山禦碑西，其位置最接近格登碑，出現狀況上報的應是蘇木拜卡的弁員，而非相隔數十裏的格登山卡弁員。筆者經過田野調查認為兩處卡倫設置地點不同，二者並非同地異名，相關文獻記載清晰。關於沙圖阿滿卡的記載，20 世紀初葉，沙皇俄國皇家近衛騎兵團中校軍官馬達漢受俄軍總參謀部指令，到中國西部執行一項為時兩年的軍事偵察任務。為了掩蓋其敵探活動，馬達漢以俄屬芬蘭國男爵和探險家的身份，作為法國探險家伯希和科考隊成員，從中亞進入新疆並單獨活動。光緒三十三年（1907 年）四月，他翻越冰嶺到達沙圖阿滿卡，他在自己的日記裏記錄：“沙圖實際上不是什麼村莊，而是一個軍事哨所，看守著中俄邊界，就像人們說的那樣，為防止吉爾吉斯人入境搶劫而設的。沿著大約 100 步長的街道，建造了 16 間一模一樣的木頭房子。街道盡頭較大的一所房子是哨所司令官住的……士兵們都住在小木屋裏，一人一小間。軍官和士兵都是卡爾梅克人……他們配備的武器是射程達 1100 米的小型毛瑟卡賓槍。哨所人員應配備 120 人，但現在只有十來個”。²²馬氏以軍事眼光記錄了駐沙圖阿滿卡的人員配備軍械，以馬氏此

²⁰ [清]光緒十二年佚名修撰《新疆四道志》卷二·伊塔道，綏定縣圖說·卡倫。

²¹ 《奏為重修格登山禦碑亭事》（[光緒二十六年三月十二日]），伊犁將軍長庚奏摺，檔號 04-01-37-0144-034。

²² 《馬達漢西域考察日記》（芬）馬達漢著；王家驥譯·北京：中國民族攝影藝術出版社，2004.4.167 頁。

文推斷其址當在今昭蘇縣夏塔鄉政府駐地。綜上蘇木拜、哈升、沙爾諾海三卡應屬光緒二十六年（1900 年）之後新設，此內蘇木拜卡倫又兼具通商口岸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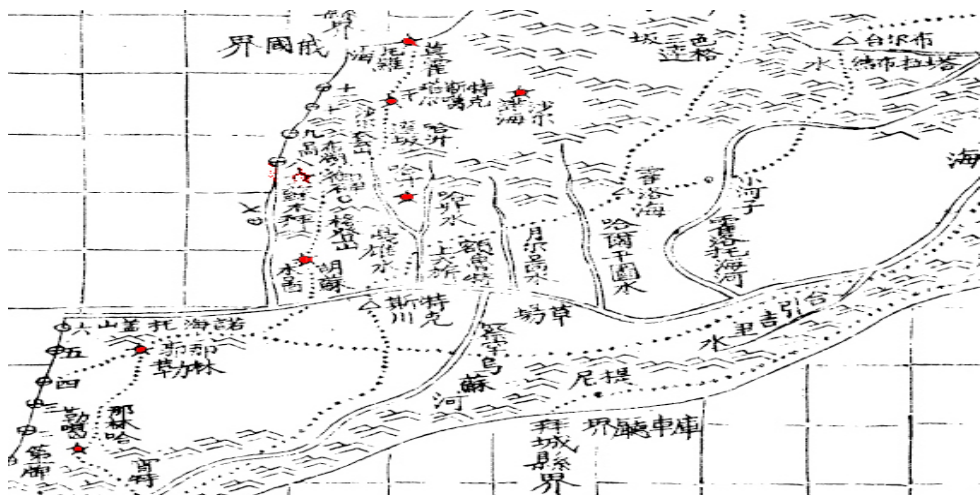


圖 4：光緒三十二年鉛印本《舊刊新疆輿圖》內標注的厄魯特營上三旗卡倫示意圖，圖中標紅者為卡倫。

1911 年辛亥革命後清帝遜位，民國成立，伊犁地區的卡倫隨著改朝換代也經歷了一番變更，在伊犁西部與沙皇俄國連界沿邊共設有卡倫四十二處。其中“額魯特營左翼六蘇木所屬邊卡：一曰那林郭勒，一曰莫霍托勒海，一曰蘇勒吉爾，一畢勒奇爾，一格登山，一達巴吐，一哈升，一沙爾諾海，一察罕額爾根，一博爾依西幹，一昂吉爾太，一鄂洛勒古，共十二處，南北綿長三百里”。²³由時任伊犁鎮守使的牛時所著《伊犁兵要地理》一書，也記有民國時期伊犁卡倫數目，“計額魯特營十三處，曰那林郭勒卡，曰莫霍托羅蓋卡，曰蘇勒吉爾卡，曰畢裏齊爾卡，曰格登山卡，曰達巴吐卡，曰哈升阿滿卡，曰沙爾諾海卡，曰察幹額爾格卡，曰博羅依喜卡，曰昂吉爾太卡，曰鄂勒卡，曰阿恰勒卡”。²⁴此內阿恰勒卡（即登奴斯口）系厄魯特營下五旗十蘇木所屬邊卡，其餘為厄魯特營上三旗所屬卡倫。

筆者經過田野調查和比對資料輿圖，認為清末和民國時期的厄魯特營

²³ 《創修新疆綏定縣誌》（抄稿本）佚名撰，國界。

²⁴ 《伊犁兵要地理》牛時撰，陳劍平整理，第 11 章卡倫即〔暨〕牌博。

上三旗某些卡倫存在同地異名的情況，清代的那林哈勒噶卡改名為那林郭勒卡（昭蘇 74 團團部西南），那林噶勒卡改稱莫霍托羅蓋卡（昭蘇 74 團 3 連處，其地有山名莫霍托羅蓋山，即蛇頭山），在特克斯河南岸又新設蘇勒吉爾卡，河北原胡蘇木圖卡裁撤，新設畢裏齊爾卡（昭蘇 76 團 6 連處），格登山卡未予更改，布胡圖卡、特克斯噶塔爾幹卡、莫霍托羅海、阿爾班蘇木卡裁撤，新設達巴吐卡，哈升阿滿卡與沙爾諾海卡未撤，往東又新設察幹額爾格卡、博羅依喜卡、昂吉爾太卡、鄂洛勒古卡（《兵要》記為鄂勒卡），此內蘇木拜卡（松柏卡）亦未見記載，但據成書於三十年代的佚名《新疆省第二區昭蘇縣誌》（抄稿本）記載，伊犁西南邊界與蘇俄之間的貿易往來，均經松柏卡通過²⁵。

卡倫的裁撤變更相應使伊犁西南境邊防的巡邏線也發生了變化，清末厄魯特營上三旗的卡倫由最南端一號界碑處的那林哈勒噶卡，向北依次至扼守納林道莫霍托勒海山口的那林噶勒卡，再向北渡特克斯河沿胡素木圖卡、蘇木拜卡、布胡圖卡、特克斯各塔爾幹卡、莫合托羅海卡、阿爾班蘇木卡、錫伯、厄魯特兩營合設的阿裏幹穀卡，最後與錫伯營設的特奇勒幹卡相接，並一直向北延伸至伊黎河北索倫營設各卡，始終以國境線走向為各卡倫的巡邏線。而民國時期的厄魯特營上三旗卡倫自那林郭勒卡（即清末那林哈勒噶卡），向北至莫霍托勒海卡（即清末那林噶勒卡，又作莫霍托羅蓋卡）、蘇勒吉爾卡，渡特克斯河沿畢勒奇爾卡、格登山卡、達巴吐卡、哈升卡、沙爾諾海卡，再轉東至察罕額爾根卡、博爾依西幹卡，向北至昂吉爾太卡（即現在昭蘇縣與察布查爾縣交界的安格列特達阪處）下洪納海溝至鄂洛勒古卡，最後與錫伯營的洪納海（又稱麻紮卡）卡相接，並向北延伸至伊黎河北索倫營設各卡倫，卡倫巡邏線呈之字型。此內那林郭勒卡又為重中之重，“俄國於距該凱西之巴音溝，平日駐騎兵百名”。²⁶時厄魯特營設領隊一員，佐領一員，領催四員，委官三員，委領催五員，前鋒一員，披甲兵一百六十七名。民國三年，因經費不敷，營制又經變

²⁵ 該書第三章道路橋樑內容“由松柏卡渡過阿拉阪河、特克斯大河，再經毛蓋吐魯海白馬卡渡木筍爾特河到夏塔，均系乘馬能行之小路”。第七章手工業及商業狀況第二節內容“土（貨）（皆）由松柏卡以牛、羊、馬換出，概為布疋雜貨，各種價值在伊區各縣局中尚稱平緩。”

²⁶ 《伊犁兵要地理》牛時撰，陳劍平整理，第 12 章邊要地域。

更。厄魯特營設領隊一員，卡倫總理一員，卡官十二員，卡兵一百三十名，軍台弁目七名，台兵三十五名。²⁷

四、厄魯特營上三旗卡倫形制

關於厄魯特營上三旗卡倫的形制，筆者在昭蘇縣對位於格登溝內的格登山卡倫和哈桑溝口的哈升卡倫進行田野調查，發現格登山卡倫雖然牆垣倒塌保存較差，但內部基址保留較為清晰，仍可管窺內部形制，具有比較典型的清代卡倫特徵，而哈升卡倫內部設施基址無存，僅有坍塌的牆垣遺址。格登山卡倫位於伊犁地區昭蘇縣夏特柯爾克孜族鄉闊斯托別村北約 36 千米（兵團農四師七十六團一連（格登莊）北約 6 千米），中天山沙爾套山南麓的格登溝內。南距特克斯河北岸約 16 千米，西約 7 千米為中哈邊界線。東北側 10 米為 1 戶蒙古族牧民的院落，卡倫內牧草繁盛，被作為草場使用。西南約 5.8 千米的格登山上有著名的“平定準噶爾勒銘碑”，南部山腳下縣城至松拜的公路東西穿過。地理座標：北緯 $43^{\circ}0'16.18''$ ，東經 $80^{\circ}29'44.65''$ （卡倫中心），海拔 2041 米。筆者即以格登山卡倫為例同伊犁地區現存的錫伯營、索倫營所屬卡倫牆垣的走向、構造、附屬設施進行比對，發現厄魯特營上三旗卡倫所反映出來的形態規制同伊犁地區其他卡倫，在形制上體現出較強的統一性，具體表現在卡倫的平面形狀、牆垣的構造、附屬的角台、城門等。

首先，伊犁地區目前發現的卡倫形狀均為方形，以長方形為多。牆垣的規格也以邊長在 30 米左右的居多，僅察汗鄂博卡倫的邊長超過了 60 米。方向多為坐北朝南，但很少有正北朝南向，多是向東、或者向西兩側有偏移，但其總體方向仍是朝北。格登山卡倫建築也是坐北朝南偏東，平面呈方形（見圖 5），夯土建築，殘存牆垣，南北長 58 米、東西長 53 米，面積僅次於察汗鄂博卡倫。其次，伊犁地區現存卡倫殘存牆體的高度、厚

²⁷ 據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政協、伊犁哈薩克自治州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察布查爾錫伯自治縣政協編，新疆新協印務有限公司 2001 年 6 月印刷《新疆錫伯族人物錄》第 39 頁吳興額履歷記載：“吳興額於民國三年（1914）楊飛霞充任伊犁鎮守使時，他被征去當兵，在特克斯厄魯特營駐卡，歷任司務長、排長等職，民國十七年（1928）復原回家”。由此記載可知，民國時期，厄魯特營的卡倫並非僅由厄魯特蒙古族駐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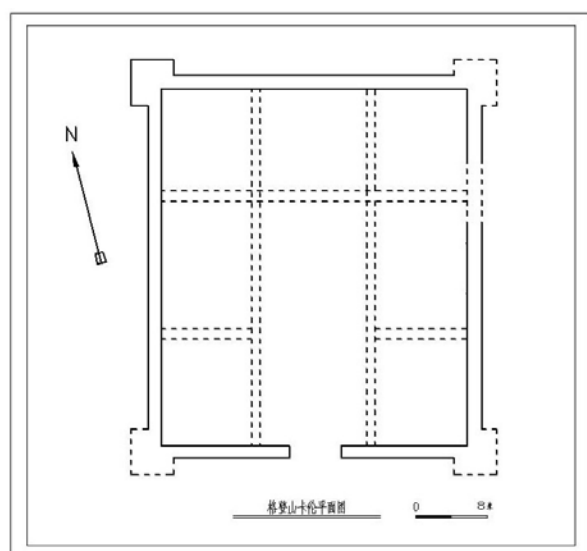


圖 5：筆者繪製的格登山卡倫平面圖

度不等，殘存牆體最高的可達 3.6 米多（梧桐孜卡倫），最厚的可達 3.5 米（登元卡倫），比較厚實高大，而格登山卡倫的牆厚經測為 6.4 米，殘高約 1 米，這是因昭蘇縣氣候屬多雨雪地帶，牆垣倒塌後牆土流向兩側所致。現存的各卡倫牆體均為夯築，經測納旦木卡倫夯層厚約 7-8 釐米，洪納海卡倫夯層厚 20 釐米，並且在夯層之間夾雜石子、草木等，格登山卡倫牆體夯層厚約 18 釐米，夯

層內見夾雜石子。

在卡倫牆垣的附屬設施方面，伊犁地區各卡倫大都有角台，均設一門，且位於南牆中間。從現存情況來看，卡倫城門設施較為簡單，應該僅設有門道。門道的寬度實測多為 3 米，個別卡倫（頭湖卡倫、洪納海卡倫）城門寬度可達 4 米以上。格登山卡倫門道經測殘寬達 4.5 米，考慮到遺址均破壞嚴重保存較差，所以 4.5 米的門寬可能是由於門道兩側牆土流失造成。而且格登山卡倫遺址內較均勻分佈 8 個部分，門道內兩側各為一間房址，正對門道有一間房址，該房址東西側也各有一間房址，在卡倫門道兩側房址與北側三處房址之間，東西兩翼亦有殘牆遺存，似為馬廄。下表為根據 1989 年第 2 次全國文物普查檔案繪製的伊犁地區現存各卡倫資料對比一覽表，表內 15-16 項為筆者 2018 年 8 月田野調查資料。

序號	卡倫名稱	規格 (米)	牆厚 (米)	牆高 (米)	門道寬 (米)	方向	角台
1	阿爾索胡爾卡倫	28*27.4	0.8-1.5	2.7		現遺址無存	有角台
2	契格爾幹卡倫	25*23	1.5	3	3	門朝南開	有角台
3	富爾幹卡倫	35*33	1.2-1.5	2.2		偏西，門朝南	有角台

序號	卡倫名稱	規格 (米)	牆厚 (米)	牆高 (米)	門道寬 (米)	方向	角台
						開	
4	沙彥卡倫	35.3*32.8	頂寬 0.8	3-3.5	3	偏東， 坐北朝 南	有角台
5	察汗鄂博卡 倫	60*52	3	2.4		偏西， 門朝南 開	有角台
6	登元卡倫	35*37	3.5	2-3		偏西， 門朝南 開	有角台
7	河源卡倫	28*25	1.5	3.2		門朝南 開	有角台
8	頭湖卡倫	26.2*25	1.7	2.6	4.5	偏東， 門向南	有角台
9	梧桐孜卡倫	28*28.5	1.5	3.6	3.8	偏西， 坐北朝 南	有角台
10	納旦木卡倫	34.4*45.3	2	2.5	3.5	偏東， 門朝南 開	有角台
11	阿布散特爾 卡倫	34.4*31.6	0.6-1.3	4	2.9	正北門 向南有 門廊	有角台
12	多蘭圖卡倫	31.5*27	1.3	2.7	3.5	偏東， 門朝南 開	有角台
13	吐庫爾渾卡 倫	36.4*33.8	底寬 1.5	1	3	偏東， 坐北朝 南	
14	洪納海卡倫	35*30.4	1.2	3.6	4.2	偏西， 門朝南 開	有角台
15	格登山卡倫	58*53	6.4	1	4.5	偏東， 坐北朝 南	有角台
16	哈升卡倫	30*26	2.5	0.8	4.2	偏西， 門向北 開	有角台

結合以上田野調查資料，筆者認為格登山卡倫的整個形制與著名的清

咸豐年間滿文散文“輝番卡倫來信”²⁸敘述輝番卡倫院內“正中有平房三間，謂之嘎賚達（翼長）住室，房屋雖低矮窄小，亦甚堅固。兩旁有索倫官兵住房二間，東西兩翼蓋有馬廄，大門內兩側，各有一間平房”的描述極為接近，這也說明清代伊犁地區各營所設卡倫，有嚴格的規制要按統一標準建造，而且不論是清乾隆時期修建的卡倫，或是清末光緒乃至民國時期修建的卡倫，其形制上都有傳承，內部設施也在不斷完善。筆者查到一份道光十四年（1834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軍機處字寄時任伊犁將軍特依順保的上諭，內容如下：

“奉上諭：前據特依順保奏酌擬沿邊巡查會哨章程，當降旨著蘇清阿于到伊犁後會同體察情形，悉心妥議。茲據特依順保等會議覆奏：意見相同，請按照原奏章程辦理。並據稱：各邊卡倫相去穹遠，中間舊設瞭墩間有坍塌，不足以資守望。各卡馬匹向系散牧荒灘，難以固守，請飭令各卡修理馬圈，朝放暮收，加意堤防。將各卡兵丁輪流坐守，不許刻離，見有賊跡立即稟報，如各卡官兵稍有疏懈，立予嚴懲……將此諭令知之，欽此。遵旨寄信前來”。²⁹

由該段上諭可知，道光十四年（1834 年）以前，各卡倫之間都設有瞭望墩台，“輝番卡倫來信”也述及“卡倫以西，有瞭望台一座，名曰“鄂博”，巍然屹立”。道光時這些墩台因年久已有坍塌，而且明確卡倫官兵騎乘的馬匹，一向都是散牧荒灘，各卡倫沒有修蓋馬圈。諭令從當年（即道光十四年）要各卡修理馬圈，朝放暮收，加意堤防。說明卡倫的附

²⁸ 《輝番卡倫來信》系清咸豐初年伊犁錫伯營侍衛何葉爾·文克津去輝番卡倫換防時所寫，該書信後被本地錫伯族人傳抄流傳至今，成為清末新疆錫伯營官兵巡邊的歷史見證。該書信系書信體散文，用滿文創作，譯成漢文 2500 字。反映了錫伯族官兵戍邊衛疆的歷史活動，其歷史價值高於文學價值，而且藝術上也很成功，在錫伯族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位置。作者用優美順暢的文學語言，細緻描寫了自錫伯營至輝番卡倫沿途自然景致、地理風貌、村落人情、每到一處，對所見所聞又發表議論，暢抒自己的見解；以及面對卡倫官兵的戀鄉心態和日益鬆弛的卡倫現狀，出於保家衛國的高度責任心，鄭重闡述了面對虎視眈眈的外夷加強防守卡倫的重要性，並記述了其本人以身作則整頓輝番卡倫秩序的情況。

²⁹ 《嘉慶道光兩朝上諭檔》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2000.11，第 39 冊《道光朝上諭檔》，第 498 頁-499 頁。

屬設施並非一次性完備，而是經過長期使用不斷完善，最終形成目前所看到的這種形制。

五、結語

2018年8月9日-13日五天，通過對伊犁昭蘇縣遺存的厄魯特營上三旗卡倫遺址進行田野調查，筆者由取得的第一手實地資料結合歷史文獻，以不同歷史時期為分界，依次梳理了厄魯特營上三旗卡倫建置及形制。不同的歷史時期，厄魯特營上三旗駐守的卡倫又發生不同的變化，其所駐守的大小卡倫，由乾隆中期初設時的5處，到嘉慶時期的32處，道光時期又有所增改，再到光緒朝劃定新界後的9處，其後又添設3處，至民國時期始終保持在12處，並且同一處卡倫在不同時期又有不同的名稱。厄魯特營上三旗駐守的卡倫由清乾隆時的與國界無涉，有常設、添設、移設之分，演變為同治光緒年間的沿邊常川駐守的國境哨所。卡倫駐守卡兵也由前期的各營搭配，到後期的專營專守，其變化既是18-19世紀中國西部邊疆走向的見證，也是清王朝國力由盛到衰的體現。在形制上厄魯特營上三旗的卡倫與伊犁地區現存的錫伯營、索倫營所屬卡倫，在牆垣的走向構造、平面形狀、附屬的角台、門道上，具有較強的統一性和傳承性，也是厄魯特營蒙古部眾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精神文化上始終與內地血脈相連的體現。（本文於2018年7月投稿，於2018年9月審查通過）

少數民族美食簡介（卅一） — 瑤族食品「剝雞生」

華華

壹、前言

瑤族是一個分佈於大陸中南地區的少數民族，2010 年人口數為 285 萬，其中有 62%在廣西（147 萬），21%在湖南（70 萬），8%在廣東（20 萬），8%在雲南（19 萬），1%在貴州。此外，江西、湘西等地亦有瑤族蹤跡。

許多人都不知道，瑤族其實是一個跨境而居的民族，在越南、寮國、泰國北部也有分布。越南瑤族人口數不少，數量接近百萬，是越南的第九大民族。越南瑤族慣說瑤語、寫漢字，與大陸瑤族血脈相連，常有來往。主要居住在高平、河江、老街等北方山區各省，距離中越邊界很近。

瑤族民風比較強悍。由於常受歷代統治者的驅除和歧視，一般在山區居住，因此有「無山不成瑤」之說。瑤族有自己的語言，分支眾多，語言差異大，分為勉語、布努語、拉珈語等多種。在語言學分類上，瑤語屬漢藏語系瑤語族瑤語支，瑤族中一半以上的人說「勉語」，屬於苗瑤語族瑤語支；有五分之一的人說「布努語」，屬於苗語支；廣西地區有少數瑤族說「拉珈語」，屬於壯侗語族。不同語言之間，要通話十分困難。

不過瑤族多通漢語、壯語，廣西一帶很多人能同時操壯語、苗語等語言，另外越南瑤族也會越南話，所以跟大環境溝通，並無困難。在民族文字方面，1980 年代大陸曾創製過瑤文，用拉丁字母拼寫勉語優勉土語。一般瑤族通用漢文，連說帶唱的口頭文學極為豐富，其中包括祖源神話與歷史演進，是相當珍貴的研究題材。

瑤族歷史極為悠久。有學者認為，瑤族起源於古代東夷部落，與九黎族關係密切，尊奉先祖蚩尤、盤瓠（音讀如護，ㄆㄢˋ ㄨˋ）。盤瓠這種「狗崇拜」是苗、瑤、畬三族共通的祖先神話，算是苗、瑤、畬三族同源的有

力證據。¹

大部分瑤族支系名稱源於生活習俗和婦女裝束的特點。瑤族婦女的服裝一般包括肚兜、上衣、褲子、各種金銀首飾和頭巾等。男子服裝一般為開胸短衫，胸前是一排扣子。瑤族支系名稱不僅源於風俗習慣，也來自服裝和外表特徵，如盤瑤、藍靛瑤、紅頭瑤、角瑤、大板瑤、漆頭瑤、三島瑤、俄黃瑤、侬嘍瑤，錢瑤，白褲瑤，青衣瑤等，多達四百多種，可說不勝枚舉。其中最有名的屬於白褲瑤系列中的「兩片瑤」。所謂白褲瑤，就是該族裡的男子一年四季都穿著白褲，與其他瑤族衣著顯著不同。至於「兩片瑤」，則僅存於貴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下屬的荔波縣境，當地生活的白褲瑤族婦女，至今仍保留最原始的服裝，就是上身前後僅各搭一塊黑布，算起來剛好「兩片」。不過「兩片瑤」婦女卻不穿現代人習用的內衣或胸罩。因此只要雙手一晃，或微風輕拂，就會把毫無遮攔的雙峰展露出來，而被旁人看到。其風情特殊，遠近馳名。據說這種風俗原始完整，屬於聯合國認定受保護的文化遺產。荔波縣也因此吸引了許多外地觀光客到訪，想一探究竟。

不過觀光也不能餓著肚皮，總要吃飽飯才能繼續行動吧。瑤族有什麼民族美食值得一嘗呢？現在就來介紹一種有些奇特的瑤族美食「剝雞生」，讓大家開一開眼界。

貳、瑤族食品「剝雞生」

瑤族飲食以玉米、稻米為主食。嶺南四季溫暖，適宜蔬菜生長，菜園裡終年都可以吃到鮮嫩的蔬菜。肉類主要有豬、雞、鴨、牛、羊等；油類有菜籽油、豬油、花生油、茶油、火麻油、向日葵籽油等，食物種類多樣，營養均衡。桂北地區的瑤族盛行「打油茶」，²即以油炒泡開的茶葉後煎成濃湯，再加上食鹽調味，然後用沖入茶碗裡的炒米花、炒花生或炒黃豆，有的還加蔥花、菠菜、臘肝等物，風味特殊，亦茶亦飯，甚至可以

¹ 唐屹等撰寫，《我國少數民族概況研究》，（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研究所，民81[1992]，初版），頁191。

² 廣西壯族自治區的簡稱桂。

代替正餐。廣西金秀瑤族為小孩做「三朝」時，³會招待客人特別製作「肉山」來吃。肉山一般由九層菜肴組成，底層由竹筍、香菇、青菜、豬腸、豬肉等組成；第二、四層是瘦肉、豬肝、豬肚等，每塊都切成巴掌大，以示豐厚；第三、五層是肥肉片；最上層則用一塊重約兩斤的肥肉覆頂，也有油水充足，前途光明的意味。整座「肉山」秤重可達二十多斤，所謂「擺盤」只是裝在一個大簸箕裡，尖尖堆放。客人圍在「肉山」四周而坐，各取所需，其樂融融，保證酒足飯飽。

不過「肉山」只是在講究排場，跟美食有段距離。真正的瑤族美食是「剝雞生」，風味獨特，值得介紹。

「剝雞生」的作法，是先選一隻土雞。瑤族所養的土雞，都是放山雞、果園雞，肉質鮮香，特別帶嚼勁，選到時已是成功的一半。

接著將雞宰殺、脫毛、剖肚，取出肚雜內臟等，洗淨，再切下雞胸肉，砍下雞頭、雞腿、雞腳，這些都不用。只用雞脖子、雞脊梁骨、雞胸骨等，連皮帶肉帶骨，一起剝碎，變成肉漿狀。這跟越南人剝魚漿很像，越南式魚漿是整條小魚，只擠掉內臟，就連肉帶刺一起剝碎，變成魚漿，料理之後味道也很好吃。「剝雞生」剝碎的雞漿，只要再配上朝天辣椒、生薑、蔥末、胡椒等配料，接著繼續剝碎，在鍋內用猛火爆炒，等有點焦香時，即可調味起鍋食用了。當然還可根據各自的喜好，加放切碎的香菜、紫蘇、香茅，一起拌炒，風味又有些許不同。

「剝雞生」由於雞漿內含雞脖子軟骨，吃起來脆脆的，嚼勁十足。據說雞骨內的鈣質、鐵質多，也很滋補。當然這道菜看起來糊糊碎碎的，賣像並不好。但是朝天椒的辣味會與肉味結合，配上香菜、紫蘇、香茅的清香，確實十分可口，所以這是一道下酒、下飯，風味獨特的好菜。

叁、結語

說過了「剝雞生」，再談談瑤族的飲食習慣。大部分瑤族有忌食狗肉的禁忌，前面說過，盤瓠這種「狗崇拜」，是瑤族祖源神話的重點，因此瑤族忌諱吃狗。但是狗肉節的存在，卻變成廣西瑤族所面臨相當尷尬的問

³ 小寶寶出生後的第三天，在禮俗上稱為三朝。

題。玉林狗肉節是廣西壯族自治區玉林市民間自發形成的節日，與官方無關。狗肉節緣起是因在每年夏至（陽曆 6 月 21 日或 6 月 22 日），當地以壯族民眾有夏至「補身」風俗，會不約而同開始食用狗肉，日久成俗，多年來並無窒礙。但是商家認為有利可圖，到處宣傳，請外人來「共度佳節」，衝高業績，竟形成觀光熱潮，當地商戶也笑顏逐開。根據據外電報導，每年的狗肉節時，玉林市中外訪客雲集，約有上萬隻肉狗被宰，讓人「大快朵頤」。這個節日的出現，讓許多動物保護組織和愛狗人士都忍無可忍，站出來激烈抗議，其中包括大陸知名女演員范冰冰、趙薇等人。她們公開呼籲，要求玉林市政府立刻廢止這項殘忍的活動，別再虐狗了。

因此，有詩為證。

詩云：「玉林壯族愛進補，無奈瑤祖是盤瓠，低調採補過佳節，大張旗鼓會雙輪。」

◆ 稿 約 ◆

- 一、本刊為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史地政治及現況之中文刊物，歡迎學者專家踴躍賜稿。
 - 二、來稿請依一般學術論文格式撰寫（A4，Word 檔），使用註解，說明來源，文長以一萬字以內為限。並請附摘要（三百字以內）、作者簡介（學歷、現職及研究領域），以上資料請附磁碟。
 - 三、來稿經本社聘請學者審查通過後採用，未刊登者，本社恕不退件。
 - 四、來稿一經刊載，依本刊規定致奉稿酬。
 - 五、來稿限未曾發表過的作品，文責由作者本人自負。
 - 六、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凡經採用之論文，著作權歸本社所有。
 - 七、來稿請以掛號郵寄新店市二十張路 129 巷 2 弄 10 號 3 樓，劉學鈞。
- 電話：（02）2218-6116

0921-883325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一〇七年十二月出版

中國邊政協會

中國邊政季刊

名譽：楊克誠
發行人

發行人：阿不都拉

社長：劉學鈔

主編：劉學鈔

電話：0921-883325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印刷者：晟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和平西路二段141號4樓之6

電話：2314-1423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 0197 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 1658 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